

# 目 录

## 丛 书 序

## 中 文 版 序

都留重人

## 著 者 介 绍

马克·帕尔曼

## 序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 鸣 谢

都留重人

导 论 .....	1
第一章 战争的失败和占领当局的改革措施 .....	9
1. 战争失败的后果 .....	9
2. 美国的初期占领政策 .....	13
3. 日本方面的初期改革思想 .....	17
4. 占领当局的改革 .....	21
第二章 走向经济复兴之路 .....	44
1. 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	44
2. 制止通货膨胀趋向 .....	51
3. 建立单一汇率 .....	56
4. 朝鲜战争及其后果 .....	63
5. 和平条约 .....	68
第三章 高增长率时期 .....	82
1. 快速增长的“奇迹” .....	82
2. 资本主义获得振兴 .....	88
3. 有效需求来自何方? .....	94

4. 工业结构的变化 .....	104
第四章 政府在高增长时期的作用 .....	110
1. 政府的全面计划 .....	110
2. 行政指导 .....	116
3. 工厂用地的开垦 .....	122
4. 工业的特别减税措施 .....	125
5. 低利率政策 .....	129
6. 贸易和资本流入自由化的拖延 .....	133
7. 水电的补贴 .....	137
第五章 转折点的到来 .....	144
1. 1973 年首次“石油冲击” .....	144
2. 结构性爬行通货膨胀 .....	148
3. 对环境的日益关心 .....	154
4. 对 GNP 指数中福利内涵的思考 .....	164
第六章 双重“价格革命” .....	177
1. 两个“价格革命”的同时出现 .....	178
2. 价格革命的古典事例 .....	178
3. 石油冲击引发价格革命的结果 .....	180
4. 城市土地的价格革命 .....	189
5. 土地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 .....	195
6. 土地价格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对策 .....	200
7. 宏观经济管理不善 .....	208
第七章 公司资本主义的进程 .....	216
1. 资本主义的“胜利”? .....	217
2. 日本公司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	219
3. 全球化趋势 .....	229
4. 私有化 .....	242
第八章 日本往何处去? .....	253

1. 两种制度的趋同趋势 .....	254
2. 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的混合经济 .....	258
3. 日本经济的前景及日本在世界中的作用 .....	266

## 译后记

郑勵志

## 导 论

日本经济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绝望的深渊中上升为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之首,这一戏剧性的复兴用“凤凰腾飞了”来形容,也许是最恰当不过的。只要举一个统计数字就足以说明这一惊人成就:以1950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100,日本1973年已达到1412,而美国为210,西德为411。本书的目的部分地是想分析日本为什么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但我认为这还是次要的。

日本人民接受了向富裕挑战,其成就就以国民生产总值而言无疑是显赫的。但富裕所潜伏的危险现在也同样明显,尤其是因为城市土地“价格革命”和金融欢欣症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已深入到一个一切向钱看的社会躯体之中。其危险之一正当我在1991年8月撰写本导论时已开始暴露出来,即出现了涉及证券公司、银行、信用合作社及某些官僚政客的金融丑闻。正如《经济学家》杂志所写的那样:“[这些丑闻]使得人们眼花缭乱得像榨果机那样飞转。更糟的是当每一家金融公司都发现有不诚实行为时,日本人竟都不感到奇怪。这就使许多西方人开始意识到:日本已经深深陷入泥沼之中,行将没顶了……,这些丑闻已经和日本的金融体制、腐败的政治、甚至企业经营习惯交织在一起。它们不仅具有遍及各个方面的性质,而且其造成的危险后果也是全面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资本来源国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的国家充满了欺诈勒索者,又为一批盲目或狂妄自大之辈所管理,可能(但不是说一定)会面临灭顶之灾。日本的泥潭危机四伏。”<sup>①</sup>

很清楚,继“凤凰腾飞了”史话之后应该论及这些遍及各个方面的丑闻与日本经济前此的事态发展以及更广泛的国际金融背景之间有什么逻辑的和历史的联系。读者可以看到,我并未全面地展开这方面的论述,部分原因是由于这些丑闻只是在我写完全书之后才曝光的。但我要指出在第六和第七章中确实也已多少论及了日本资本主义基本方面的长期发展方向,那里面揭露了最近金融丑闻大曝光的全面性根源。为了说明这中间的联系,我想在这里再加上几段话,以使读者了解我对这个问题长期来所持的研究方法。

熊彼特常说:“你可以骑在马上面,但不能骑在对马的要求权上。但对货币的要求权或对货币客体的要求权则与货币同样可靠。”取得信用就是取得对货币的要求权,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按一定价格(即所谓利息率)兑现货币。在熊彼特的理论结构中,信用创造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但很可能他那时从未想到过在他死后几十年间信用手段成倍增长的程度和“象征”经济——资本流动、汇率、信贷流量——从“实体”经济——商品和劳务流量——中分离出来的现象<sup>②</sup>。毋庸置疑,“当今经济形势中具有本质性的新事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中心和重心已从商品和劳务生产转移到金融资产的买卖和其数量的成倍增长上来。”<sup>③</sup>

统计数字显然能证实这一趋势。从国际范围看,与之最有关的数据是将国际商品和劳务贸易量和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外汇成交量作一比较,1989年4月份伦敦、纽约、东京、多伦多四大外汇交易市场上每天平均实际成交额达到4459亿美元,即年成交额达111万亿美元。<sup>④</sup>请注意,这个数字是1989年世界贸易额(约5万亿美元)的22倍。这一趋势还可以用下列事实来说明,即1986年3月到1989年4月四大市场上的外汇成交额增长116%,而1986年1季度到1989年1季度英、美、日、加四国商品和劳务的外贸额

只增长 56%。最近几年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肯定还在扩大。

从日本国内看,如在第六章所论述,我们看到由于城市土地价格革命的结果,1987 年一年内土地资产的资本收益即达 416 万亿日元——超过了这一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343 万亿日元)的 20% 以上。这是货币所有权的增长大大超过生产增长的明显证据。

这样,从国际金融活动和日本国内金融交易活动两个方面都说明了日本资本主义已开始发展成一种头重脚轻的组织形态,即在“实体”经济基础上存在着多层次的货币所有权,这自然地扩大了“象征”经济多层次结构中的人从事敛钱和投机活动的地盘。日本 90 年代开始出现的层出不穷的金融丑闻(涉及到证券公司、银行、眼开眼闭的大藏省,甚至一伙犯罪团伙),都同是富裕社会的危机所在,它使得公司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都极其重视挣钱。加尔布雷思最近提醒人们说:“在那些与货币密切接触的人群中,有可能,甚至极可能会出现一种自我纵容和极易犯错误的行为。”<sup>⑤</sup>这是确实无疑的。但问题还不仅涉及到个人的行为模式。那种为安格立塔和奥林在“金钱的暴力”中所精心剖析的“象征经济”过度膨胀的根子,<sup>⑥</sup>是对今天政治经济学家的严重挑战,是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大问题。

我在第六章中已讨论了土地价格革命的社会后果问题,但不想在这里多谈。金融欢欣症在今天日本许多方面产生的更大范围的恶果,我只想在这方面再举一件对日本未来有着深远影响的证据。

最近对日本高中学生举办的一次意见调查<sup>⑦</sup>表明,有 50% 的答问者对“今日日本是否太重视货币和物质、太轻视发自内心的情感”一题的答复是肯定的。而且对“你选择什么颜色来描绘未来的日本”的答问中,有 38.8% 的答问者选择“灰色”,15.7% 选择“黑色”,而选择“玫瑰色”的只占 3.1%。这一调查清楚地说明生活在今天货币污染的物质生活中的日本年轻一代正在谨慎思考指导自

己的原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问到幼年孩子们是否知道甲壳虫是什么模样时,最普遍的回答竟是“我懂。它是用 100 日元就能买到的”。

我认为现在是我们这一代经历过战争与和平、艰苦与富裕交迭变化年代的人尽到我们的责任、把学到的经验教训传授下去、并直率地、具体地提出对日本未来看法的时候了,以期至少有 30% 的高中毕业生,而不是 3.1% 的学生能看到自己“玫瑰色”的前景。这正是我想在最后一章尽力而为之的。

另外有一点,我想解释一下在论述战后日本经济增长的成就中我之所以没有采用通常都被采用的增长计算方法的原因。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提出的被称为“经济增长计算基本方程式”<sup>⑧</sup>是

$$\%Q\text{增长} = \frac{3}{4} (\%L\text{增长}) + \frac{1}{4} (\%K\text{增长}) + T.C.$$

这里 Q 代表产出, L 代表劳动量, K 代表资本, T.C. 代表促使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或全部生产要素增长率), 其中  $\frac{3}{4}$  及  $\frac{1}{4}$  是每一投入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按照它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但技术变化不能直接测算出来, 就作为余数处理, 从而

$$T.C. = \%Q\text{增长} - \frac{3}{4} (\%L\text{增长}) - \frac{1}{4} (\%K\text{增长})$$

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这个方程式的基础上以美国 1900—1986 年的数字代入, 据计算结果每劳动单位的产出每年增加 2.1%, 其中技术变化的贡献为每年 1.85%, 其余 0.25% 是资本变化所作的贡献。但近期对美国的研究材料表明技术变化在经济增长计算中所占的份额并没有如此之大。

这样自然产生一个问题: 战后日本达 10% 的年增长率中, 劳动、资本和技术变化所作的相应贡献又各是多少? 如果将其结果和

其它国家以及其它时期作一比较是饶有兴趣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日本经济学家们应用上述经济增长计算法得出的研究材料。读者可以从经济企划厅各年度经济报告中找到其答案。例如 1970—1989 年,产出增长为 4.8%,资本贡献为 2.9%,劳动力贡献为 0.3%,技术变化贡献为 1.5%。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数字能说明什么问题。对于我来说,自从罗伯特·索洛第一次提出这种计算增长的想法以来,就持怀疑态度,并且于 1965 年写了一篇批驳文章。<sup>⑨</sup>我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关系到支持我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方法论立场。

读者会注意到,当我讨论技术进步所起的作用时,我只是简单地提到了实际财富方面(或实际方面)和社会体制方面(或价值方面)的区别。<sup>⑩</sup>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是技术进步属于实际财富范畴,它影响着生产方式或社会体制方面,使得后者发生很大的质的变化。这种将实际方面和价值方面加以区别而又需统一起来的方法论上的重要性,对于历史地分析体制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于 1985 年在马堤奥利讲演中已较广泛地谈到了这个问题。<sup>⑪</sup>

更具体地说,经济增长计算法的主要困难在于技术进步属于实际财富范畴,而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则属于价值范畴。为了使这一方法所依据的科布—道格拉斯函数能够用得上,就必须把资本和劳动看作具有同一物质单位属性。但对一种富有生气的经济来说,选用劳动和资本的单位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例如,除非我们假设一种只有一种类型的机器并且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否则就无法避免资本的价值含义受到利息的影响,受到工资率变化时间模式的影响以及受到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丹尼森等人已对经济增长计算法的应用技术作了许多改进;但对于这一方法的实际意义仍有疑点,其实际意义并不会比通常所说日本“1953—1971 年极高的增长率不能归功于任何单一



因素”<sup>①</sup>的讲法好多少。

我认为使用什么单位的问题仍有待解决。凯恩斯和哈罗德等经济学家在发展现代宏观经济理论方面起了先驱者的作用,也各自在工作中注意到了这个选用什么单位的特殊难题——一个渊源于生产过程的,特别是整个经济体制的两重性(价值和实际)难题。大家知道凯恩斯的解决办法是采用劳动单位和(或)工资单位。哈罗德在提出当技术进步为零是否需要新的投资时,也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答复为这是个定义上的问题——取决于选用劳动为衡量价值标准还是选用商品为衡量价值标准。以劳动为衡量标准和以商品为衡量标准之间的区别相当于价值形态和物质形态(实际形态)之间的区别。资本主义社会的微观经济学几乎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价值世界中驰骋,而宏观经济学,特别是富有生气的一类,却感到难以从这个问题的物质(或实际)形态中解脱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更重视研究没有技术变化的短期问题的凯恩斯选用以劳动为衡量标准,而重视研究动力经济学的哈罗德则选用以商品为衡量标准,就十分容易理解了。

我希望上述几点足以表明我的方法论倾向,同时也说明我在本书中所以不采用经济增长计算法的原因。

## 注 释

- ① 《经济学家》,1991年8月17—23,第13—14页。
- ② 彼得·德鲁克:“变化了的世界经济”,《外交事务》,1986年春,第786—791页。
- ③ “当月评论”,《评论月刊》,1988年3月,第9页。
- ④ 国际清算银行,《外汇市场活动概览》,1990年2月。
- ⑤ J·K·加尔布雷思:《金融欢欣症简述》,惠特尔直接图书公司,诺克思维尔,田纳西州,1990年,第80页。
- ⑥ 米歇尔·安格立塔和安德烈·奥林《金钱的暴力》,法国大学出版社,巴

黎, 1982年。

- ⑦ 《朝日新闻》, 1991年8月16日。
- ⑧ P·A·萨缪尔森和W·诺德豪斯:《经济学》, 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 纽约, 1989年第13版, 第863页。
- ⑨ 都留重人:“技术对生产率的影响”, E·A·G·鲁宾逊主编《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麦克米伦, 伦敦, 1965年。

上述经济增长计算方程式, 可以如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那样改写成

$$\%Q/L\text{增长} = \frac{1}{4} (\%K/L\text{增长}) + T.C.$$

或者, 如果我们要计算T.C.在每单位劳动产出中的贡献, 可写成

$$\frac{T.C.}{\%Q/L\text{增长}} = 1 - \frac{1}{4} \left[ \frac{\%K/L\text{增长}}{\%Q/L\text{增长}} \right]$$

这一方程式恰巧和我于1965年论文中所得出的方程式完全一样(虽则我有自己的记号法)。在实证计算中, 只要代表资本相应份额的 $\frac{1}{4}$ 能视为相对的稳定, 方程式的结果将取决于方程式右边比率, 即资本/劳动增长百分比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百分比之比。如果限定[ $\%K/L$ 增长]和[ $\%Q/L$ 增长]多少呈平行线运动, 那末上述方程式的题解(求出T.C.在每单位劳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就十分简单, 其答案是劳动的相对份额为 $1 - \frac{1}{4}$ , 即 $\frac{3}{4}$ 。当然也可能[ $\%Q/L$ 增长]大于[ $\%K/L$ 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 技术进步的贡献就更大。我对这一完全抛开该方法所依据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增长计算方法应用于政策目的的实用意义仍有疑问。

- ⑩ 这一区别与德鲁克所指的“实体”经济和“象征”经济之间的区别并不一样。我在其它场合使用了“物质”方面和“体制”方面这两个对立的名词, 在德鲁克的“实体”经济或“商品和劳务流量”概念中, 我用的“价值”方面一词不可避免地要牵涉进去。
- ⑪ 都留重人:《再谈体制经济学》, 剑桥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 ⑬ E·丹尼森：“增长算法”，《帕尔格拉夫新编经济学词典》，麦克米伦，伦敦，1989年，第2卷，第572页。

# 第一章 战争的失败和占领当局 的改革措施

本书开头一章想为我在以后几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变化提供事实背景材料。因此,我试图尽可能客观地追踪发生的有关事件,避免同我个人参加国家事务的一些情节交织在一起。本章开始总结战争失败的后果,跟着再用有点像教科书的形式叙述由美国政府为首的占领当局通过对日本实行改革试图达到的目标。在改革计划中最重要的或许就是土地改革和修改宪法,这两项改革措施对日本社会已产生长久深远的影响,很可能是因为这两项改革措施得到了日本人民思想上的坚强支持。由于本章所涉及到的主题已经有许多人研究过,我感到只能用一种缩写的办法,至于比较完整的叙述,请有兴趣的读者查阅书末所列举的文献目录。

## 1. 战争失败的后果

战后日本历史必然要从因战败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程度讲起,它涉及领土、物质、人力和组织等方面。

从领土上来讲,瓜分原来的日本帝国,包括:首先根据1943年12月《开罗宣言》的条款,规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并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并且承

诺“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其次,根据1945年2月《雅尔塔协定》,将库页岛的南半部和千岛群岛割让给苏联;此外,根据日本投降的条款,大部分外围岛屿,如琉球群岛(包括冲绳岛)、小笠原诸岛、伊豆诸岛、硫黄岛和马尔库斯岛归由美国托管。换句话说,日本在战争结束时已缩小到只有北海道、本州、四国和九州四个主要岛屿。

同领土损失有关的还有同盟国规定严格限制捕鱼海域。战前,日本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捕鱼国,年捕获量几乎有100万吨。到1950年捕获量已减至36万吨。

如果日本还要在主要的本国岛屿上再战到最后才结束战争,那么物质上的损失和破坏程度就还要大得多。下面是美国赔偿调查团埃德温·鲍莱大使在1945年12月发表的一项声明:

“不管有多大的破坏,日本仍然保留着较多的可以运转的厂房和设备,甚至比其统治者在和平年代允许用于民间供应和消费的还要多。这些多余的厂房和设备必须予以拆除。通过这种拆除来完成日本的非军事化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完全非工业化。我必须非常强调这一点。举出一个关键性工业部门的数字就足以表明我的意思。在炼钢、机床以及由钢材制成的其他机器产业方面,日本的数字表明它可运转的机器设备要比它在1931年侵略中国满洲时所拥有的设备还要多出一倍以上。”<sup>①</sup>

还有通过空中轰炸、战舰炮击和潜艇攻击所造成的损失和破坏程度是非常严重的;大家都认为,在要是没有战时破坏的情况下日本到1945年可能拥有的全国人工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中,大约有四分之一已遭毁坏。<sup>②</sup>这就是说,损失的数量大约相当于1935—1945年这十年间净增加的国家财富,所留存下来的约相当于1935年存在之数。

当然,在不同物质财富的类别中,损坏程度是很不相同的。受破坏最严重的是商船。战前,日本拥有600万吨商船,战时又建造

了 400 万吨。然而，战争期间被击沉了 860 万吨，只剩下约 150 万吨，而其中三分之二需要大修。

除厂房和设备以外，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的主要损坏就是住房。在日本，大多数住房都用木料建成，在空袭时极易为燃烧弹所毁。据估计，轰炸破坏了 210 万户住宅，另外还由于拆迁和毁坏又损失了 55 万户住宅，到战争结束时，如果考虑到遣返回国者需求的净增长以及需要加紧建房以弥补战时实际的住房短缺，则估计缺房 450 万户。

在许多工业部门中还必须看到所谓“间接破坏”，也就是说，由于缺乏零部件材料和加速生产（战时刺激生产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引起维修保养不当而造成的生产能力的损失。这方面损失的难度于按存量计算出来，然而可以按后来的生产流量加以猜测。上面引证的政府报告指出，相当于存量的损失约占“直接破坏”损失的三分之一不到一点；但是这种估计的准确性值得怀疑。

战争对人力供应所造成的全部影响比较复杂。一方面，那些战死在战场上或在前线患病死亡的人员的数字十分准确，因为他们的亲属必然会得到官方正式的死亡通知。根据 1948 年的官方计算，这些死亡的人数是：

陆军	1140429 人
海军	414879 人
总计	1555308 人

然而，这个总数是最低数字，因为并未包括：（1）1948 年估计的 24 万失踪者；（2）重伤而后来死去的人；（3）战场上不是执行官方任务而死去的人。另一方面，由于轰炸（包括原子弹）致死的民众数目更是难以确定，虽然官方数字（1948 年 5 月）表明：

死亡	299485 人
失踪	24010 人
重伤	146204 人

总计 469699 人

但这个总数尚未包括冲绳岛上的民众死亡人数,据不同的估计,其数字大约在 10 万到 20 万人之间。所以,这场毁灭性战争的伤亡总人数粗略估计在 250 万左右。

在这种对人口的不利影响的背景下,我们还应考虑战后从中国大陆和其它亚洲地区遣返回国使国内人口增加的有利影响,这些人数约有 600 万,其中大部分是合格的技术人员。例如,单是铁路工人,从中国强迫遣返的即有近 20 万。绝大多数的这些遣返回国者均进入就业市场,愿意按低于其技术条件所应得的工资工作。

所以,从战后日本大大缩小的领土上急需经济重建的观点来看,可以认为战争失败对人力状况的实际影响却是有利的。

从组织上来看,战时积极备战中过度消耗以后的战争失败所造成的后果至少可以说是很严重的。在军事征用制结束以及在民众反对战时配给的形势下,基本消费品继续严重匮乏,就自然使得正常的分配制度恢复缓慢。一种必然的后果就是:一方面,囤积任何价格将会上涨的商品;另一方面,黑市经营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通过日本天皇 1945 年 8 月 15 日的广播,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到来之前,人人都明显地感到这场战争的失败。因为从 1944 年到 1945 年春季这段时期内,战争败局似乎已不可避免,战时领导人所煽动的那种命定论的民族意识开始迅速消逝;这就必然影响到公认的崇尚礼节的社会准则。可以这么说,是自然力量冲垮了战时日本政府制定的多种限制措施。其明显的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后果是,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不久,清理战时订立的合同以及一次性支付军事人员的退役补助金的需要使政府滥用预算中的战争基金,从而进一步刺激了物价的全面上涨。<sup>③</sup>

物价全面上涨的最明显标志就是官方的大米生产价格,在 1941 年 9 月 18 日规定为每石(合 180 升)49 日元,1945 年 4 月 30

日提高到每石 92.5 日元, 而到 1946 年 3 月则再提高到每石为 300 日元——这一价格还回溯到适用于 1945 年收获的大米。从这种价格变动趋势可以看出,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涨价的百分比为 89%, 而到战争结束时却猛涨到 224%。

虽然战争破坏的影响一定会随着强制性赔偿拆迁、解散财阀以及清洗战时企业界领袖的进行而变得更加强烈, 但在企业管理组织方面的破坏已经是足够严重了。制造业生产的恢复不可避免地要比不经过破坏的情况多花更长的时间。

## 2. 美国的初期占领政策

1945 年 8 月 9 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爆炸的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1945 年 7 月 26 日)规定的无条件投降条款;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天皇通过无线电广播宣读结束战争的历史性文告。同年 9 月 2 日, 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了投降文件, 盟国开始对日本的占领。

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占领当局面临的是一种陷于崩溃的经济; 而原来美国总统对日政策声明(1945 年 9 月 22 日对外宣布的)清楚地表明, 日本经济重建的责任主要落在日本人民及其政府的身上, 声明中的一部分声称, “日本的困境是其本身行为造成的直接后果, 盟国将不承受治理战争破坏的负担”。在对盟军最高统帅发布的“投降后对日本占领和管制的基本最初指令”(1945 年 11 月 8 日)中进一步指明, “你要向日本人民讲清楚, 你们对日本保持任何特定生活水平并不承担任何义务。”这一点在 1945 年 11 月鲍莱赔偿调查团的声明中讲得更加具体, 认为盟国“不采取任何行动来协助日本保持高于受日本侵略伤害的邻近亚洲国家的生活水平。”(着重号是后加的)这项声明毫无疑问是要为从日本取得更多的赔偿制造一种借口。然而, 根据例如印度尼西亚



亚和日本之间存在着生活水平许多倍差异的事实来看,对日本来说,这是十分严重的情况。鲍莱声明的缺乏现实性不久就为盟国所认识,在1947年1月,远东委员会(由十一国组成的委员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集会,负责制定对日政策,发表了一项指令,宣称“日本人民和平时期的需要应规定为大体上保持日本1930—1934年期间的生活水平”。原来规定达到这个目标的日期是1950年,但不久就明显发现这是不现实的,占领当局日益感到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必然会卷入日本的经济重建工作中去。

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政府处理紧迫的经济重建问题中那种拖拉无效的态度感到极不耐烦,在1947年3月22日,他给了吉田茂首相一封严厉的告诫信,其中有这样一部分内容:

“当然,盟国并无义务来维持(或已经在维持)任何特定的日本生活水平,也无任何责任来进口粮食以补足由于日本不能保证公平有效地分配国内粮食而引起的粮食缺口……现在所需要的是在整个经济战线上采取一种协同一致的步骤。因此,日本政府有必要通过为此目的而建立的经济安定本部早日采取强有力的步骤,来发展和执行为当前情况所需要的综合治理经济金融的管制政策。……日本的社会经济福利主要将依靠日本自身将人力和自然资源重新用于和平生活方面的努力,也依靠日本政府对民主和有效的经济管制的正确应用。不能希望对日本的援助会达到足以解决日本国内分配不当和通货膨胀的那种规模。外部援助是以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为前提的,而这完全是日本政府的职责。”<sup>①</sup>

继这一函件之后,盟军最高司令部命令加强经济安定本部的权力,授予其某些司法和执行权,并且向它转移大藏省的一部分预算权限。这一革新的经济安定本部在片山哲内阁——一个联合内阁,由一位社会党人担任首相——的领导下于1947年6月成立。

看来,占领当局在是否在协助日本经济恢复过程中承担较大的责任,还是让日本人自己穷于应付、自作自受之间,是犹豫不决

的。一位资源专家，爱德华·A·埃克曼博士在战后不久作为占领当局的特别顾问对日本资源作了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其对资源情况的评价是比较悲观的，这可以从他在1948年给盟军统帅部的报告中的结束语中看出来：

“根据对日本资源的一次分析，如果日本人口继续增加到1亿或更多的话，今后三十年它似乎会出现下列两种情况中之一。(1)如果外国财政援助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日本的生活水平也许会维持在相当于1930—1934年期间的水平。(2)日本可以依靠‘自给’，但是国内会发生政治、经济和社会灾祸，生活会逐渐接近于勉强糊口的水平。这两种情况比之通过外贸和改善资源利用使日本依靠自给而维持在1930—1934年的水平似乎更有可能。”<sup>⑤</sup>

在战后初期年代，由于有着赔偿问题的背景，普遍存在着悲观气氛。当时日本人民很敏锐地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款的大灾难，以及1894—1895年中日战争后日本向中国强索赔款的冷血态度等历史例证。在后一项行动中，除了强索并获得了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以及使朝鲜归由日本统治以外，日本强迫中国用白银和英镑赔款，其数额达3.64亿日元之巨，相当于当时日本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一或日本全年进口额的四倍。如果日本在1945年后对中国的赔款额与此相仿，那就是说至少要200亿美元，或为当时日本年出口额的七倍。当然这次日本对中国在人力和物质上的破坏要比以前历次战争中中国对日本的破坏大得无法比拟。此外，还有其他如菲律宾、缅甸等国也会向日本要求赔偿。

1945年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早已预先警告日本要承受这种赔偿责任，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将允许日本保持能支持其经济的那些产业，准许以实物赔偿，而不允许保持那些可以使日本重新备战的产业”（加重号是作者所加的）。为什么要用“实物”赔偿？理由是：(1)货币赔款需要外汇收入，这将鼓励日本出口；(2)用派遣日本劳工到国外的方式偿付赔款，会引起接受国劳工市场

上不利的竞争,而这些国家事实上正受苦于非技术工人供给过多;  
(3)由于同样原因,用制造业产品进行赔偿,虽然也是“实物”,但应力求避免,因为,这些产品会帮助日本重振制造业。按照这种基本导向,鲍莱在前面引用的 1945 年 12 月 7 日发表的最初赔偿声明中规定了为赔偿而拆除耐用生产资料的基本范围。

这份声明开头用一种带有戏剧性效果的语气说道:“四年前的今天,日本攻击了珍珠港。美国将永远不会忘记这次攻击。日本将永远不会忘记其后果”,随后就提出了拆除多类设备和厂房的“一项临时计划”,内容如下:

1. 制造机床能力的一半;
  2. 所有日本陆海军军工厂、整个飞机工业、一切制造滚珠轴承和滚动轴承工厂以及一切制造飞机引擎工厂的全部设备;
  3. 在 20 家造船厂中,凡不为占领当局维修船只所需要的一切设备和零部件;
  4. 在现存的年产 1100 万吨产钢能力中,超过年产 250 万吨钢的那部分能力;
  5. 日本燃煤发电厂的一半;
  6. 除为从锌、铅、铜和其他重金属熔炼厂回收废气所必需以外的一切接触法硫酸制造厂;日本最现代化的四家大型苏尔未法纯碱制造工厂;还有 41 家最现代化生产烧碱的大工厂中的 20 家;
  7. 除去用于加工废金属的设备以外的用于生产镁和氧化铝以及从氧化铝还原成铝的全部生产能力,以及用于精制镁、铝的所有带轧机、滚轧机、挤压机等;
  8. 剥夺所有日本人,包括日本政府、天皇、皇室家庭和财阀对日本本土以外任何资产的所有权和管理权;
  9. 在日本积聚的大量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在作出处理决定以前必须运到旧金山的美国造币厂加以保管;
- 此外,鲍莱的建议中还有一条强制性指令,即赔偿用的工厂拆迁应

首先从财阀集团持有的资产开始。鲍莱报告的发表自然引起了日本企业界的严重关注。但是不久就弄清楚了：第一，把工厂和设备拆迁并转移到接受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第二，这些工厂、设备对接受国也许没有多大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什么价值；第三，有些人认为，日本的非工业化会给远东经济形成一种真空，这对所有国家都不利，而不仅仅对日本不利。但是，最与美国有关的论点，是从日本拆迁工厂和设备用于支付赔款实际上将会由美国纳税人付出代价，因为鲍莱的赔偿建议不可能使日本得以自给，而匮乏的日本经济会成为加在美国资源上的一种半永久性负担。随着进入1947—1948年，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鲍莱建议必须修改。对于这一点，后面还会谈到。

### 3. 日本方面的初期改革思想

考虑到以前的民族意志完全垮台以及社会经济结构遭受前所未有的崩溃和瓦解之后所需要的激进变革，人们自然就会很快地提出一个问题：曾经为反对其本国军国主义而斗争并感到自己现在在改造日本的工作中可发挥积极作用的日本人民，是否在战败之后会站出来填补政治上的真空？在从1945年到法律上结束对日本占领的1952年，他们干了些什么？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说，国内政治领导层的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和自由主义甚至还有社会主义思想从休眠中重新觉醒起来，对改革过程只产生了微弱的影响。在占领期间，日本人自己也确实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思想。然而，同1868年以后明治维新时期（当时冒出许多改革思想并且实际上付诸了实施）相比，这一次国内产生的改革思想总起来说有些墨守陈规或软弱无力，而且也不具有非迫切实行不可的力量。当我们认识到日本所面临的问题的艰巨性，即需要对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重大改革的时候，我们必须

说,正如当时日本人自己的普遍评论那样,人民总的说来是处于心理或精神上的衰竭状态。

或许,日本人自己提出的战后日本进行改革的思想的代表,是外务省在投降前夕,意识到投降的不可避免性而组成的“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一份报告<sup>⑥</sup>。实际上,该委员会的首次会议是在1945年8月16日,即战争结束的第二天召开的,而且召集了三十多位学术界人士和国际法专家参加<sup>⑦</sup>。这些人几乎都是知识界的知名人士,有的是反战的,有的是持中立态度的,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和约签署后的日本居于显要地位。这些人包括六位大学校长、一位日本学术会议会长、一位经济团体联合会的头头、一位国会议员、一家全国性报纸的一位编辑作家和一位内阁阁员。

他们的积极建议有哪些显著特点?可简述如下:

1. 从经济民主化的观点来看,特别重要的是金融机构的民主化,这些机构通过有消费者、生产者、多政党的代表参加其活动,对公众负责。

2. 财阀(多种工业、半垄断集团)必须被解散。虽然它们过去曾发挥过某些必要职能,这些职能将由一个新型的民主化政府接管。

3. 一般说来,在经济各重要部门必须实行计划原则,而且要考虑一些关键工业的国有化。

4. 农业现代化是走向经济民主化的第一步,为此必须迫切进行土地改革;并且也需要采取审慎步骤,把劳动力从农村转入制造业。

5. 日本不能没有对外贸易;但过多依赖对外贸易会产生一些危险。所以,绝对需要积极开发和利用国内资源以及使消费活动合理化。

6. 有很多人指出日本人口过多,急需减少人口。然而,减少人口是一项失败主义的政策。从进步的观点来看,寻求一种保证

人口的增长得以延续下去的手段应列入日本的议程。

该报告以下列说明作为结束：“除非日本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日本经济的基本结构仍然保留着一些能使这个国家再度导向军国主义的因素。认识到这种危险，必须继续不断努力，以使日本不仿效纳粹德国，把日本和全世界引入悲惨的灾难中去”。<sup>⑥</sup>

这份报告虽然使用了妥协性的语言，但它所指明的总的方向显然是改革主义的，它特别强调民主化的需要，并且导向一种混合经济的社会。

1947年带来了一种吉兆，社会党掌握政权，同两个保守党联合组阁。这届政府由片山哲——一位社会党人，又是一位基督徒——领导，他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全力支持，满怀信心地上台执政；他发表了“第一个经济白皮书”，启发公众在经济领域内需要采取进步措施。政府也提出实行煤矿的国有化，并且随后在1947年12月颁布了三年内完成的实施法。

该白皮书是在我的领导下，比较仓促地由经济安定本部在两星期内写出来的，以作为1947年6月11日片山哲内阁所宣布的《紧急经济政策措施》的佐证文件。统计资料尽管不够充分，但这是日本第一次运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整体日本经济。它特别强调迫切需要消除经济各部门所存在的黑市的根源，因此，在结尾一段写道：

“用个比喻来说，我们的困难不单是切断了手指或折断了大腿，可以说，我们患的是更为严重的生理上的病症，例如，血液中毒或者内分泌失调。诚实的人经常受到愚弄，诚恳工作的人遭受损失，这些事实证明了个国家经济有机体患上了生理上的疾病……在我们这个组织很复杂的现代社会中，要查出每个人的劳动结果怎样同改善其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关联是很不容易的。它并不像鲁宾逊通过自身努力来改善生活那样简单。然而，当我们面临一场经济危机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去查明它们的真

实直接关系。我们确实必须这样做。当人民经过了在再生产基础越来越受到限制的条件下的艰苦生活后,现在正对未来满怀希望地走上了复兴重建的道路的现阶段,应该是使那些彼此密切合作诚实工作的人通过自身努力生活得较好的阶段。虽然他们不可避免地还要经过一段生活资料暂时不足的困难时期,而这些困难他们应当认为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一个民主政府的出发点应当意味着我们面临着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样一个问题。‘民享的政府’必须是一个‘民治的政府’。我们相信,现在的政府只有在人民的支持和鼓励下才能获得成功。”<sup>⑧</sup>(着重号是作者加的)

白皮书得到公众的普遍接受,但是上述引语中加点的字句却成为左派工人阶级的批判目标。他们认为,它否认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且强令被压迫阶级实行节约。而且正像所预期的那样,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包括那些上面提到的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反对他们所称的“经济学的均衡理论”,并且反对白皮书所强调的不是物质生产的紧迫性,而是分配制度的正常化。

回顾过去,片山哲内阁在引导日本经济走向稳定这一点是值得称赞的,可是他的任期太短(约8个月),不足以产生什么长远的影响。至于在联合内阁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意见分歧,以及与此同时美国占领政策发生的变化(使日本成为反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壁垒),这些都将在后面提到。此外,社会党本身在右派和左派之间发生了裂痕,而且在任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的左翼社会党人铃木茂三郎突然将向公务人员加薪的补充预算提案退回给政府时引起了内阁危机。1948年2月10日,内阁倒台,由保守的民主党人芦田均组织新的联合政府。经过政府的这次变动,一度由和田博雄为领导并有片山哲政府中的进步官员参加的经济安定本部有一大批人离职,失去了作为改革力量的干劲。

## 4. 占领当局的改革

占领当局的改革议程是多方面的,其意图也很深远。实际上,在日本投降后的一年,美国官方意见是明确的,即日本过去军国主义倾向的一切根源必须完全消除。不仅战争罪犯要列名受审,而且一切在战时日本社会中担任要职的人,还有那些被认为其观点倾向于日本扩张主义的人,均应从负责岗位上清除出去。此外,日本的宪法本身应由麦克阿瑟总部加以修改;还要进行重要的组织改革,这方面的典型是鲍莱对财阀的谴责,虽然他主管的具体任务是赔偿问题。下面是鲍莱报告中有关的一段话:

“日本的财阀[原意是‘财团’]是相当少的一批人,按照家族和企业组织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日本现代史上,不仅控制着金融、工业和商业,而且还控制着政府。他们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力。就是这一小批人使得历次日本的征服和侵略成为可能。……不仅财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负责,就像军国主义者本身一样,而且他们通过军国主义获取了高额利润。即使是现在,虽然日本失败了,但他们实际上还加强了其垄断地位……除非解散财阀,否则日本人很少有希望能作为自由人管理自己。”<sup>⑩</sup>

因此,占领当局的改革议程的头一项就是解散财阀,这是合乎逻辑的。

### 解 散 财 阀

早在1946年1月,美国派遣柯尔文·爱德华兹代表团制定解散财阀的具体政策。爱德华兹在抵达日本时特别强调:

1. 解散财阀的目的,是从心理上而且从制度上摧毁日本的军国主义实力。
2. 使过去曾受财阀剥削的日本工人,获得较高工资和薪金,从而扩大日本的国内市场。



第二点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即过去受收入分配过分不均所限制的狭窄的国内市场,导致了一种具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出口扩张政策。根据这种分析,爱德华兹代表团制定了两个目标:(1)取消经济实力的过分集中;(2)肃清垄断(或寡头)组织和就业办法中的半封建残余。

由于这些目标意味着全面改革经济结构,这简直是一种苛求;而企业分析专家爱德华兹完全注意到,这类改革除非扎根在民族自觉的基础上,否则就不会成功。<sup>①</sup>可是盟国还是对这个问题给予特别优先的考虑;美国政府于1947年6月向设于华盛顿的远东委员会发出所谓“第230号指令”,没有对外公布,所以,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就把这个问题作为对日本政府的单方面命令来处理。从而1947年12月,日本议会通过了“取消经济实力过度集中法”。这项法律授权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确定“过度经济集中”的界限,改组这些集团成为独立公司,以保证企业具有合理程度的竞争和自由。1948年2月,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根据法律指明325家公司应受到指控,并发布命令使其分散化。然而,正像爱德华兹所预见的那样,尽管占领当局施加各种压力,这项法律的外来性本身就成为其一大缺点。正如占领当局经管此事的一位官员埃莉诺·哈德利所写的那样:

“实际上,它[该项法律]是盟军最高司令部和华盛顿为一方、狡猾成性的日本政治家为另一方之间两年来迂回曲折的工作所产生的结果……这些勾心斗角的较量如出一辙。首先,力求阻止反垄断立法;第二,如果立法不可避免,就力求尽量删削掉各种条款;第三,作为最后一着,就是破坏法律的执行。”<sup>②</sup>

该法律的命运很可能会像哈德利所描述的那样。但是,不能否认,在1948年初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指名各公司之后,(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的)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在改善其影响方面曾发挥了一部分作用。事实上,甚至在1947年12月通过该项法律之前,

前面提到的远东委员会第 230 号指令,就在该委员会中一位美国委员的要求下,被搁置起来,虽然这件事在日本并未公开。

对麦克阿瑟将军来说,这是有关他的神圣威望的大事,即他所通过并迫使日本政府接受的政策必须尽可能促其实现。因此,麦克阿瑟将军在大家猜疑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的气氛中于 1948 年新年文告中宣称:

“从经济方面来看,盟国政策要求解散那种过去让你们国家的大部分工商业和自然资源由少数封建家族为其私利而拥有和控制的制度。全世界也许从未见过一个对手有这样极不正常的经济制度。它允许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剥削大众。这些少数人完全与政府结合在一起,其对政府的政策有无限的影响并最终走向导致战争和毁灭的道路。”<sup>⑬</sup>

这些话几乎完全是前面引用过的鲍莱报告用词的翻版。然而,形势迅速转变;1948 年 7 月 1 日,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把被解散的公司名单从最初 325 家减少到 100 家。关于在经过 1946 年到 1947 年的一阵吵吵闹闹之后,解散财阀问题的这种转变实际是怎样出现的,将在后面一节讨论。

## 土地改革

日本人深感土地改革的必要性,正如前面引用的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报告中所表明的那样;并且早在 1945 年 10 月,而原喜重郎内阁中的农林大臣松村谦三就曾提出一项改革计划:

1. 把佃户所支付的租金从实物改成货币;
2. 强化采取增加自有土地、自耕农的措施;
3. 使每个地区农业土地委员会的组织民主化。

日本政府曾起草过包括这些措施在内的一个法案,但内部阻力很大,只是在 1945 年 12 月 9 日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备忘录之后,日本议会才在三周之内通过这一法案。这种内部阻力来自农

业地区的地主势力,也来自保守的政治领袖们,他们担心佃农当中的激进主义思想。

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备忘录并不是一份经过仔细准备的产物,而是原先由刚刚于1945年10月被派往东京的美国国务院一位官员罗伯特·A·费尔里制定的。然而,他的备忘录触发了麦克阿瑟的想象力,明显地是由于麦克阿瑟在本世纪初同菲律宾的土地改革有密切联系。而麦克阿瑟在后来有关他的撤职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日本的土地改革,是自从罗马帝国时代的格拉求斯以来在这方面作出的最大努力。<sup>⑩</sup>

第一个土地改革法案(1945年12月)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缺陷——例如:(1)允许持有5町步(合5公顷)的最高定额太多了;(2)土地持有额是按个人而不是按家庭规定的,这样,地主就能把所有权分配给其家庭成员,来逃避强迫分掉;(3)“不在乡地主”的定义过于含糊不清,从而就会出现许多逃避办法。

因此,在日本本身的进步人士中间和在盟国对日委员会讨论过程中就立即遭到反对;特别是该委员会的苏联代表德里夫扬科将军。他在谈到改革的重大意义时指出:“众所周知,反动沙文主义军事集团统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本中世纪势力的猖獗,特别是日本乡村封建主义压迫的存在。”德里夫扬科的意见非常激烈,而该委员会的英联邦代表W·麦克马洪—鲍尔则提出了一种较为缓和的改革计划。

以麦克马洪—鲍尔的建议为基础,加上占领当局官员中的一位能干的土地问题专家拉德金斯基的补充建议,并且再有日本政府官员愿意合作,议会在1946年10月21日通过了第二个土地改革法案。该项法案规定:(1)由政府买下所有不在乡地主的土地;(2)留在乡下的地主拥有的一切租地,超过1町步(合1公顷)(或在北海道超过4町步),均由政府买下;(3)购买价是以债券形式给付,附有3.6%的年利率,30年还清,这个价格同第一个土地改革

法最后规定的一样,但是这次再加上以现金支付的一定利息。每反(一英亩的四分之一,一町步为十反)稻田的支付总额(包括利息)算下来平均不到 1000 日元。据计算(由 A·J·格拉德),当时这个价格在 1948 年只能购买 13 包香烟或 0.24 吨煤,而 1939 年优等稻田的价格可买 3000 包香烟或 31 吨煤。<sup>⑧</sup>此外,森林土地不包括在改革法案之内;这就成为那些留在乡下的地主极不满意的一个原因。这些地主通过自身努力,把森林土地开发成了可耕农地,特别是鉴于在以后年份中森林价格水平不断增长,森林主大获其利。

就整体而言,可以说,占领当局的土地改革在满足日本人民本身的迫切需要方面确实很有帮助。这一成就应归功于占领当局,也应归功于(日本官员中持谨慎而又有开明意见的那些人)。<sup>⑨</sup>下面引述的同这项改革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专家沃尔夫·拉德金斯基的评价,可以说是对功绩评价的公正的概括:

“不能低估占领当局的动力和真心诚意,但必须注意到,它的主要作用犹如一位助产士为即将诞生的改革运动胎儿接生。改革的思想是日本人原有的。它不是征服者强加于被征服者的一种政策。”<sup>⑩</sup>

尽管土地改革法基本上具有进步性质,该法案的贯彻实施并非一帆风顺。它所遇到的棘手问题之一就是同宪法上有关的财产权条款可能发生的矛盾。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联合制定并在 1946 年 11 月 3 日正式颁布(1947 年 5 月 3 日正式生效)(确切地说是在议会通过土地改革法之后颁布的)的日本新宪法中第 29 条款说明:“拥有或持有财产是不可侵犯的”。该条款规定,“只有在公正地补偿的情况下,私人财产才可以用于公共目的”。这就自然地产生了问题:(1)政府征购农业土地是否用于“公共目的”;(2)购买农业土地的补偿是否“公正”。这两个问题曾提交最高法院去审议;特别是关于前一个问题,即把农业土地转卖给以前的个体佃农

是否可以解释为用于“公共目的”，这一点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可以争论的。首先，农业经济学领域中的许多日本改革派一直都主张一种特别强调“耕种权”而不是“拥有权”的土地改革。因此，有人争辩说，一则，从以前佃农中造就个体农业主，并不能解释为用于“公共目的”，而且，伴随着土地私有制而来的各种结构性问题都将得不到改革。然而，最高法院对以上两点都作出了有利于土地改革法的裁定。

### 劳工改革

日本在战前全面压制和迫害具有任何进步色彩的劳工运动。当时，政府手中掌握的针对这方面的主要合法武器就是 1925 年的所谓“和平维持法”，它对个人和组织规定了意识形态上的限制，并且成为炮制对付“思想犯”——政府认为意识形态上具有颠覆性的人——的各种专用手段的基本立法，该项法律所明确的迫害目标是“组织以改变国家政体，或否定私有财产制度为目的的团体之任何人”。该项法律获得通过之后，独立工会就遭到禁止；只允许亲资方或亲军方的劳工阵线组织得以存在。然而，不可否认，在战争年代的压制下，一种基本上具有进步性质的劳工运动潜在势力还是以隐蔽和暂停活动的方式存在着。

在占领期间，劳工领域的基本改革集中在组成强大的工会运动和为劳工谋取重大利益这上面。然而，其模式几乎完全按照美国的实践经验。背景是“远东委员会十六条原则”；但是在被远东委员会（1946 年 4 月 9 日）最后批准以前，美国政府在 1945 年 12 月 28 日已经准备了以下一套明确的改革政策：

1. 鼓励组织自由工会。
2. 取消压制性法令，废除不公正的有关劳工的惯例。
3. 言论、出版、结社等方面的自由。
4. 法律上允许进行集体谈判，并应建立处理劳资纠纷的仲裁

制度。<sup>⑧</sup>

此外,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条款,即凡直接有损于占领当局目标的罢工均予禁止。在占领期间的实际情况下,极不可能会发生违反这项条款的事例。

在我们回顾占领日本期间的历史时,深深地感到麦克阿瑟总部在实行有关劳工改革的一些政策上是非常迅速有效的。事实上,当总部在东京开始活动(即1945年10月18日)之后,就立即下令释放政治犯,解放一批旧时的劳工领袖,而且甚至在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实施上述劳工改革计划之前,占领当局就迫使日本政府通过保证工人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权利、并且承认工人享有罢工权的1945年12月工会法。该项法律明显地模仿1935年的美国全国劳动关系法。1945年的这项法案也列有要求工会向当局注册的具体条款,并要求建立全国和地方性的劳动关系委员会,根据该法处理发生的纠纷。

由于占领当局的这种鼓励,工会的建立和恢复,就像日本人所说的,突然“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1946年2月,有675个工会,会员总数达496000人,到1948年7月,迅速增加到33940个工会,会员总数扩大到6637710人,即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内增加到15倍以上。

要阻止这种日本工人运动复活的势头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不管有无工会,各地都出现了劳资纠纷,并且经常升级到了工人占据企业,或者所谓工人控制生产的地步。这种控制生产的第一个例子于1945年10月发生于读卖新闻社,差不多历时一年,使占领当局在处理一个外国社会的劳工问题上得到了错综复杂的教训。<sup>⑩</sup>然而,占领当局所得到的教训引发了实施第二个重要劳工立法——“劳动关系调整法”,该法于1946年9月20日在国会通过。

该项法令规定了在劳工关系委员会的领导下,可由各方选择

协商、调解或仲裁的法律基础。劳工并不欢迎这项法律，因为它对罢工权利施加了某些限制，特别是禁止各级政府公务人员的罢工行动。而且，公用事业职工，虽然允许组织工会，可是规定在向劳工关系委员会递交调解书之后三十天内不得罢工。该法不仅把运输、邮政、电话和电报、水力供应、煤气和电力、医疗、卫生和公共保健事业定为公用事业，而且，还授权政府可以扩大公用事业的范围，确定任何企业凡其停业会破坏公共经济或人民日常生活者都可以被定为公用事业。这样就只可能是劳工特别反对这些限制了。

劳工运动复活的势头，在 1946 年秋季那项限制性立法的激怒下，随着同年冬季经济危机的加深而开始壮大起来。第一次爆发是有 260 万政府职工参加的争议，他们要求把工资调整到与私营工业工人工资相等的水平。但是，正当政府对这些要求的反应犹豫不定的时刻，拥有 340 万会员的私营工业工会也参加进来；这场运动随即升级成为一次要求吉田茂内閣下台的政治运动。最后号召在 1947 年 2 月 1 日实行总罢工，其人数涉及到除农、林、渔业部门以外所有职工的三分之二左右。如果这场罢工真的发生了，日本无疑将要瘫痪；劳工方面这种好斗精神是对占领当局的容忍限度的第一个考验。

在预定发动致命的总罢工日子的前十天，也许是占领当局与日本工会左翼领导人展开对抗的最具戏剧性的时期。<sup>④</sup>虽然 1 月 22 日以麦克阿瑟将军的名义对工会领袖们发出了一份相当明确的禁止罢工的警告，并附有一条具体的指示，规定劳工领袖们无权公开这份警告。麦克阿瑟显然希望避免公开禁止罢工，认为这种行动会被看作是破坏罢工，或者，至少是默认他的日本民主化政策进行得并不完全顺利。劳工领袖们趁着盟军最高统帅这种犹豫不决的机会，对这种警告置之不理。1 月 31 日清晨当这场总罢工看来已不可避免时最后时分，麦克阿瑟不得不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写道：

“根据我作为盟军最高统帅所拥有的权力，我已通知那些试图联合举行总罢工的工会领袖们，在当前日本处于贫困和衰竭的情况下，我不允许运用这一致命的社会武器，为此，我已命令他们停止推进这类行动。”

从而，这场戏就收尾了；在这场戏里，站在占领当局一边的一位最得力的参加者西奥多·科恩曾对整个事件作出如下的概括：

“然而，这场未能举行的总罢工在占领当局中，特别是在日本对美国所施加的民主化压力所作的反应中，成为一个分水岭。它是极端主义高水位的标志。在此之前，不管什么事，无论多么慌张，只要有希望使国家“民主化”，都是受到欢迎的。但是以工人的名义把人民绝望地逼上灾难边缘的使人感到创伤的经历以及麦克阿瑟将军具有戏剧性地在最后一分钟采取的挽救措施完全改变了民族情绪。日本人民突然又意识到限制措施的必要性。”<sup>20</sup>

占领当局对日本战后劳工关系的干预并没有随着这次使人感到“创伤的经验”而结束。一年半之后，当政府部门职工为工资等级问题威胁要举行罢工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致函日本首相，宣称：“凡在日本行政机关中或任何团体机构中被任命或雇佣的担任职务的任何人均不得采用罢工或参与宕工或其他旨在损害政府行政效率的争议手段。”这封在1948年7月22日发出的函件具有历史性的重要意义，它标志着盟军最高统帅对政府职工雇佣关系的体制结构进行直接的干扰。日本政府为盟军最高统帅这一宣布所鼓励，立即着手公布一项条例，不仅拒绝政府部门职工的罢工权利，而且还拒绝集体谈判的权利。我们在下一节有关改革公务员制度方面，还要述及这个问题。到1948年的这个时刻，形势已经“倒退”，正如日本大众喉舌所通常评论的那样。而且，在占领当局内部，劳工处的一位高级官员詹姆斯·基伦，也为了反对这种倒退行径而辞职。



## 其它改革措施

在日本 1952 年重新获得自主权之前,还有一些关系到占领当局不同程度指导作用的其它重要的改革措施,诸如在教育制度、公务员制度、制定单一汇率、税制等方面。但是,就具有深远影响而言,最重要的也许就是盟军最高司令部试图改革使天皇具有最高权力的明治宪法。我们将首先简明地论述这个问题。

### A. 修改宪法

讨论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具体追述 1946 年 11 月 3 日最后公布日本新宪法所经过的曲折过程。然而,回顾起来,真正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在投降后对于必须对 1889 年明治宪法作重大改革的需要竟如此麻木不仁,而这部宪法无论怎么说毕竟是给“国体”(国家政体)这一特殊概念和日本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奠定基础的基石。

在战后初期,无论是东久迩内阁还是币原喜重郎内阁都认为,不需要对宪法作出基本的修改,特别认为天皇对国家统治的最高权力这一基本原则必须保留。在日本方面,首先考虑这个问题的官方行动是近卫公爵在 1945 年 10 月 4 日与麦克阿瑟将军会晤之后采取的,后来近卫被定为战犯。自此以后,日本政府边后退边抗拒,但在占领当局或多或少始终如一地要求全面修改明治宪法的情况下,最后终于屈服。占领当局不耐烦于日本方面的拖延策略,自行拟制了一部宪法草案,并于 1946 年 2 月 13 日递交给日本政府。根据当时的报导,外相吉田茂和负责宪法事务的松本蒸治大臣都因这部宪法草案与他们想法的距离太远而受到“震动”。日本政府赶快修改其原先的宪法草案,以或多或少能和盟军总司令部的草案相一致,由此制订了后来称之为“3 月 2 日”的宪法草案,它成了同占领当局进一步谈判的基础。

即使为了我们有限的目的,仍有必要讨论一下麦克阿瑟宪法

草案中的一项特定的为日本政府所一再企图撤销的条款。这就是第 28 条款,它是这样写的:

“对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的最终所有权归于作为人民集体代表的国家所有。国家有权为了保证和促进对其保护、开发、利用和管理而在给予公正补偿的基础上据有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

紧跟这一条款之后的另一条款说明“享有财产所有权也必须尽到义务”,这一内容使人们立即想到经常引用的西德宪法(第 14 条)中关于财产权必然包含某些义务的条款。

从一个要在有限自然资源的土地上挤入 600 多万从太平洋战争各个战场上遣返回国者的国家很可能会发生的问题来看,盟军最高司令部提出的“对土地和一切自然资源的最终所有权归于作为人民集体代表的国家所有”这一意见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可是,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府强烈抵制盟军最高司令部的这一意见,最后成功地代之以现在宪法第 29 条的用词,其文字如下:

“不得侵犯财产权。

财产权的内容应适合于公共福利,由法律规定之。

私有财产在正当的补偿下得收归公用。”

这一条款除了 1946 年文本的第三句话提到“在正当的补偿下”以外,基本上与明治宪法的第 27 条相同,其“不得侵犯”的概念可以追逆到法国的人权宣言(1789 年),其中,令人难忘的“神圣不可侵犯”一词从那以后一直在资本主义世界经常被反复使用,并且也是战前日本社会的基本信条。

从当时日本保守派人士的观点来看,麦克阿瑟的宪法草案第 28 条的含义是具有革命性的,然而,在四十年之后,正如在下一章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日本的舆论才开始理解第 28 条所包含的长远智慧而痛惜 1946 年日本政府表现的目光短浅的固执性。

日本新宪法中影响到处理经济事务的独特之点是第 9 条,它是这样写的:

“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些文字几乎同见之于 1946 年 2 月 3 日所谓“麦克阿瑟照会”中的完全一样，这份照会是在所谓“松本草案”于几天前泄漏给新闻界之后匆忙起草的，并且从占领当局的观点来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在随后探索这一理想主义者条款的产生过程中，一些专家认为它或多或少地是由麦克阿瑟总部迫使日本政府就范的。然而，另一方面，人们知道，首相币原喜重郎在 1946 年 1 月 24 日同麦克阿瑟将军会谈时，曾表示他个人愿意根据 1928 年凯洛格—布里安德条约的精神，戒绝战争的愿望，麦克阿瑟对此表示同意。事实上，麦克阿瑟在 1951 年的“致日本人民的新年贺词”中以十分赞同第 9 条款的语气，讲到“你们的宪法拒绝承认战争是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这种观点代表了当代世界迄今所知的最高理想之一，如果不是唯一的最高理想的话，而且如果要使文明保持下去，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适当的时候接受这一点。”

这一基本观念的最初动议也许来自币原喜重郎，但是这一条款的具体文字，以及把它列为一条而不是把这一概念并入序言之中的决定，则最可能出自麦克阿瑟总部。在国会审议的过程中，对较早的文本也曾作过一些修改；但重要的是，虽然“麦克阿瑟照会”（1946 年 2 月 3 日）曾列有“也放弃战争作为一种自卫手段”这样一句话，而在最后文本中则删去了这一句。还有在 1947 年的一次国会讨论中，首相吉田茂十分清楚地表明，第 9 条是说话算数的，而且“禁止保持任何形式的战争力量，不论是为了侵略，还是为了自卫。”这样，在以后的年代里就不可避免地在修改宪法以明确国家“自卫能力”的问题上引起了争论。

然而，目前众所周知，日本保持着“陆海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其规模据估计占世界第三位，而并没有对宪法上的限制作出修改。

在日本政界领袖们(像当时吉田茂)的心目中，第9条的经济重要性，无疑是在依靠美国军事上保证安全的同时，为了加紧经济重建，有可能充分动员贫乏的国内资源。这一巧妙的战略，在战后初期实际上发挥了作用，为后来的经济恢复铺平了道路。

#### B. 改革公务员制度

与占领当局其它的重要改革措施不同，在公务员制度方面需要进行改革的初步设想来自日本方面，可是，当盟军最高司令部着手处理这个问题，并由美国派来了一个特别顾问团时，这一改革计划变成了极不适合的最不幸的外来移植品之一。当时所谓日本公务员制度的“非封建化”肯定是非常需要的；但是美国陆军部选择布莱恩·胡佛担任团长却是一项令人不愉快的任务。他处理这个问题可说极其中肯，这在他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其改革计划“将破坏日本投降前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集团——即严密组织起来的、排外的和自我沿续下去的官僚主义，它根据封建观念的神圣权力，行使统治人民的政府权威——，并将由一个民主挑选、根据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实行法治的官员所组成的机构来替代”。<sup>②</sup>但是，当时担任有声望的美加公务员协会——一个庞大的公务员职业协会组织——主席的胡佛，一心想要把他在美国本土上发展起来的那些原则移植过来，而不去十分注意日本公务员制度的特点，尽管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劳工处官员尽力向他作了介绍。劳工处的一位官员泰德·柯恩后来写道：“胡佛的分析几乎是完全不切题的……，他要把一种历史上旨在取消政党分赃制的美国体制应用到一个不存在这种体制的国家去。有时我在想，如果把把这个顾问团派到北极圈去，那就也会对爱斯基摩人、海豹和海鸥开出同样的处方。”<sup>③</sup>

特别是胡佛忽视了或许是严密地编织起来的日本官僚主义的

最显著特点,即帝国大学毕业生的“同学情谊”。他对存在于日本的诸如公营企业(国营铁路、烟草和樟脑垄断组织、电话事业等)、公立学校和大学中各类公务员活动所产生的许多问题也充耳不闻,因此,胡佛的改革药方主要是功绩考核、“科学的”职业分类、工资等级、效率评估再加上成立一个独立公务员权力机构的混合物。后来制订了一项全国公职法,体现了胡佛关于全国统一的公务员体制、各种公职标准等等所有的意见;并且在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下,1947年10月15日仅仅用了十五分钟就由国会草率地通过。这项法案事先在议会联合委员会进行审议,到会作证的十名“专家”中的四名所发表的肯定意见只不过是胡佛原则的传声筒而已。那好比是说“在占领时期结束后,我们不管怎样,可以改变它”。事实上,胡佛的改革是短命的。例如,使公务员“非封建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打破政府官僚阶层中的教育精英制度;然而,正如赫伯特·帕辛所写的那样:“在胡佛公务员改革的十年之后,到1958年,最高级政府官员中的98%,二级官员中的82%和三级官员中的57%都依旧是七所国立大学(即前帝国大学)的毕业生。”<sup>24</sup>

布莱恩·胡佛并不完全满意于这项“成就”,他继续要解决一些他认为是政府工作人员中“纪律太差”的“致命罪恶”问题。在美国,联邦公务员纪律适用于个人行为,诸如,按时上班,在办公室严肃认真,履行被分派的任务等等。胡佛把这一概念扩大到包括集体行为。他鉴于1947年1月间由政府工会领导的总罢工的发生,相信问题的核心在于政府工会的纪律。他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通过法律禁止所有政府工作人员的集体谈判和罢工行为,不论他们从事哪种形式的工作。这项严厉的立法将侵犯占领当局批准的1946年劳资关系调整法案的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盟军最高司令部中的政府处(支持胡佛)和劳工处(以詹姆斯·基伦为首)之间面对面的冲突。1948年7月22日麦克阿瑟裁定支持政府处的立场,并在同一天给首相芦田一串指令,建议:(1)把政府的铁路

和垄断企业分出来成立独立的国营公司,允许它们的职工可以集体谈判,但不能罢工。作为替代办法,应建立调解和仲裁程序。这至少承认了胡佛所反对的一个现实。(2)另一方面,其余四分之三的政府职工,包括70万交通工人和教师,现在都不能进行集体谈判,剥夺了他们事实上已享受了三年、法律上享受了两年的权利。在这以后,正如以前所提到的那样,詹姆斯·基伦立即辞职表示抗议,而胡佛顾问团的严峻改革建议的实际结果,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萨尔兹曼所说的那样是“日本政治的两极分化”<sup>⑤</sup>。

### C. 教育改革

“在当代,也许没有一种教育实验如此庞大、如此重要和对我们的文明又如此充满危险——也许原苏联除外——能比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人民进行的再教育”。<sup>⑥</sup>这是罗伯特·金·霍尔所写的一段话。他曾在战后至1946年后半期之前担任盟军总部民间信息与教育处教育组的负责人。战后日本的教育改革是否真的如此重要,而且还“充满着危险呢”?这是一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有几个方面内容:(1)现代社会中的基本教育原理;(2)行政管理体制;(3)教育机构的体制机构;(4)教育手段。其中,第一点最为重要,其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美国政府于日本投降前制订的初期教育政策路线所表明的那样,“将禁止散布日本军国主义、民族神道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

毫无疑问,在战争结束前,几百万学校儿童必须背诵的基本指导文件是1890年明治天皇宣布的帝国教育诏书(教育敕语)。<sup>⑦</sup>虽然是作为教育诏书而制定的,但它写有像“如果发生紧急情况,勇敢地把自己献身给国家;保卫和维护天皇与天地共存的繁荣昌盛”这类句子。这句话经常被用来在被征召的士兵中间激发对天皇的效忠。事实上,这个诏书“包含有会引起盟国反感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sup>⑧</sup>当时预计,不仅是占领当局要命令将其废弃,而且日本人本身也会把它作为过去极端民族主义的残余而加

以废除。所以，这份诏书在日本投降后曾维持过一段时期是令人注目的。占领当局一直审慎地对诏书的内容、权威性避而不作官方议论或者作公开表态，其动机也许是因为麦克阿瑟决定保持天皇制度不变、以有利于执行占领任务。根据罗伯特·霍尔的讲法，在占领当局的官员中，有人竭力反对废弃这个诏书，“反对的理由有三个方面：诏书本身并没有什么内在的错误；凡是攻击诏书，就是攻击孔子伦理、佛教哲学和神道神话，这将视为是对宗教的攻击；当那些军事占领中的当权者，主要是统治者，要强制宣布某些目标或目的时，其是有用的。”<sup>⑨</sup>

可是，日本方面的策略步骤却是更加不可思议。可以这么说，在像天皇诏书这样的问题上能对舆论有些影响的日本名流当中有三个“思想派别”。一派是由同志社大学神学教授有贺铁太郎为代表，他们为了要求采用“昭和<sup>⑩</sup>教育诏书”，建议修改明治诏书中的某些重要内容；第二派主要是以1946年5月22日至1947年1月31日期间任文部大臣的田中弘太郎为代表，他们支持继续像信奉宗教仪式那样在学校里遵守明治诏书；第三派是一些进步学者和国际法专家，他们力主废除明治诏书。

在1946年3月美国教育代表团到达之前，占领当局本身尚不能明确地决定支持哪一派，而代表团的某些成员激烈地反对任何授权天皇发表一项“教育诏书”的意见，即使它实际上是由占领当局授意的也不行。因此，美国教育代表团给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报告（1946年3月30日）就建议“学校在国定假日的场合不得继续像宗教仪式那样引用天皇诏书”。但是这一建议被解释为并非“废弃”诏书本身，也并非代之以新的诏书，例如文部大臣田中弘太郎在1946年7月15日日本国会的议员席上继续表述他的意见，说我们根本不想废除这项诏书，因为它的内容基本正确，它表达了“我们日本帝国本质上的光荣”，这应该是我们的教育基础。日本方面的这种策略实际上又持续了两年，直到1948年6月，国会两

院投票废除了天皇教育诏书。

废弃诏书其逻辑上的必然结果是重新制定教育思想标准,使之适合对战前国家政体基本观念进行改造的现状。实际发起这项行动的是田中弘太郎,虽然他感到重新制订一种教育哲理标准是同保留天皇诏书完全相容的。然而,与此同时,一方面取消天皇的统治权力,使天皇成为“国家和人民团结的象征”;而另一方面,列入像保证学术自由、人民都有同等接受教育权利等一些条款的新宪法(1946年11月3日颁布)尚处于起草阶段。而且也必须注意到,美国教育代表团的报告(1946年3月30日)在有关“教育目标”这一节中有着以下一段说明:

“在日本进行教育重建工作之前,迫切需要阐明民主教育思想的基础。而不断重复‘民主’这个字眼毫无意义,除非有它的内容。

民主生活中的教育制度的重要基础是承认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教育制度要为此建立起来,以根据每人的能力和才能提供教育机会。通过授课的内容和方法,它将促进求知的自由,并培养严密的分析能力……

教育应该训练每个人成为社会中一个负责任的和能够合作的成员。也必须理解‘个人’一词既适用于男女儿童,也适用于成年男女。为了建立新日本,各个人都需要获得使自己成长为劳动者、公民和人类一员的知识。他们将作为社会中的成员以自由探索的精神,应用这些知识,参加到社会各个方面的活动中去……。”

在日本投降后不久,即使没有美国教育代表团的这种“指导”,非政府方面的日本人士,主要是所谓“民主教育研究小组”的一批人,也出现过要求起草一套“教育基本原则”、完全替代1890年的天皇诏书的运动。日本文部省在面临公众渴望基本改革的形势下,也不能视而不见,遂成立了称为“日本教育改革委员会”的顾问机构,由前文部大臣安部能成担任主席。该委员会在1946—



1947年冬季抓紧同盟军最高司令部民间信息和教育处合作,起草了教育基本法。

1947年3月3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教育基本法,比官方取消天皇教育诏书早一年多,从此它就成为民主日本教育思想的基本宪章。该法案说明教育的目标是“发展人民心身健康,具有独立精神,尊重个人价值,热爱真理和正义”。它成为政府教育领域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日本政府是否忠实于尊重该法案规定的教育思想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这与我们现在的研究关系不大。

占领当局还提出了其它一些重要教育改革措施,其中美国派来日本的教育代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显然认为该代表团非常重要,在最初的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了像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赫金斯、约翰·杜威和霍华德·芝福德·琼斯这些知名人士,然而这些人最后全部拒绝到日本。该代表团后于1946年3月5日抵达日本,于4月1日离去,共计有18名成员,由美国费城学校总监亚历山大·J·斯托达德担任团长。在麦克阿瑟将军的要求下,该代表团被授予在日本进行教育改革的极其广泛的任任务,并分成五个委员会:

目的与内容

行政管理

教师的授课与教育

语言改革

高等教育

鉴于教育代表团成员中,很少有人对日本教育制度有第一手的接触或者对日本社会的特性有确切的了解,所以代表团能在短短四个星期里完成它的报告,并提出有着深远影响的具体建议,这真是了不起的。然而,当我们仔细研究报告的全部内容并觉察到其中许多具体建议都是移植美国的实际经验,它就并没有什么难

以理解之处。这样说，当然并不必然含有指责其不恰当的意思。例如，上面曾部分引用过的关于“民主教育的目的”的概述就对新日本十分合适，而且在日本人当中受到广泛赞扬，正如报告前言中所说的下列一段话那样备受赞扬。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无限潜力。但我们最大的希望寄托在儿童身上，他们肩负着未来的重担，绝不能被过去沉重的遗产所压垮。”

许多日本人特别赞扬代表团的建议，即剥夺掉文部省的中央管理权力，使它只限于对地方一级由公众投票选举出来的教育局提供技术援助和专业指导。

另一方面，代表团对学校制度中组织机构改革的具体建议，即用美国模式的 6-3-3-4 制度（小学、初中、高中和学院或大学）来代替，却遭受到某些强烈的阻力。<sup>⑧</sup>在高等教育领域，代表团关于按美国州立大学模式在每个县建立地方性大学的建议，也是机械地移植美国的制度。代表团对高等学府的所谓“双轨制”，即由七所帝国大学代表的精英集团和社会地位较低的平民集团，提出了批判性的论断。但是，突然把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译注：指旧制高等工业学校、高等商业学校、高等农林学校、医学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等和高等学校）升格为多学科的大学是一种无法保证提供合格人才的冒险实验。

这里还要提到一项流产的代表团建议，那就是急剧地简化日本语言。代表团报告称“日语的书写形式对学习构成了很大障碍……，显然语言改革是一个基本的和紧迫的问题，它实际上对每个部分的教育改革计划，从小学到大学都投下了阴影。如果对这个问题的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很多已通过的教育目标就很难实现。”<sup>⑨</sup>因此，代表团采取激进的立场，“及时地完全放弃”使用汉字，改用音节体系，极为推崇拉丁字母的语言体系。人们还记得 1868 年明治维新之后，一位有影响的明治时期教育领袖森有礼所提出的把

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方案。森有礼的主张实际上并没有受到重视,主要是因为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语言的逐渐简化在提高大众的基本文化素质方面已卓有成效,而且毫无疑问,它对日本经济从沉睡的封建状态中的初期起飞作出了贡献。

在教育委员会所提出的那份囊括每一个重要之处(除语言改革外)的报告一年以后,美国国务院将基于教育委员会的提议而修订的政策提交远东委员会,这可谓是现实主义战胜理想主义的一个实例。国务院在其后的1948年4月对该结果作出结论:“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态度是:日语书写形式的改革以及完成改革的方法是由日本政府解决的问题,它支持采用一种有益于日本人民开发智力和民主倾向健康发展的适宜的语言形式。”<sup>②</sup>回首往事,许多日本人认为这个明智的结论还适用于美国教育委员会提出的其它建议。

## 注 释

- ① 日本资源协会:《日本恢复的关键》,1986年,第77—78页。
- ② 参阅经济安定本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所受损失的综合报告》,1949年4月。
- ③ 1945财政年度(1945年4月到1946年3月)“特别战争帐户”的预算数字是850亿日元,其中,在4月到7月底的四个月中支出293亿日元。但是,仅8月一个月内,支出竟达120亿日元,这对日本银行货币流通额从1945年8月15日的302亿日元剧增到8月31日的423亿日元,即在半个月内增加40%这一点来讲,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 ④ 重见于日本资源协会编:《日本恢复的关键》,1986年版,第132页。
- ⑤ 同上书,第75页。
- ⑥ 《战后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外务省特别调查委员会,1946年9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发行英译本,1977年)英译本的编者大来佐武郎写道:“这份文件是在战争结束前准备的。如果当时被人发现,凡参加本文

件工作的人都将被宪兵逮捕”(第 iii 页)。但事实上,这份文件是在战争结束后开始编写的,其中并不涉及任何秘密。

- ⑦ 其中著名的有六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内兵卫、有泽广巳、宇野弘藏、山田盛太郎、胁村义太郎和近藤康雄;五位现代经济学家:中山伊知郎、东畑精一、山中篇太郎、森田优三和岸本诚二郎;两位自然科学家:龟山直人和安芸皎一;七位国际法专家:稻叶秀三、平贞藏、佐佐木武、井上晴丸、正木千冬、友冈久雄和土屋清;一位企业界人士:石川一郎;还有几位政府官员,包括本人在内。
- ⑧ 《战后日本经济重建的基本问题》,1946年9月,第136页。
- ⑨ 直接引自原文的直译本,全部译文在占领当局的要求下,一夜之间赶译完成,因此,译文有些粗糙。
- ⑩ 引自鲍莱关于日本赔偿的报告(1945年11月到1946年4月),载于杰罗姆·B·科恩:《日本的战争经济和重建》(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427页)。
- ⑪ 在我当时同他进行私人交谈中,他对我强调这一点;我同意他的观点。
- ⑫ 埃莉诺·哈德利:“日本托拉斯的破产,”《哈佛商业评论》,1948年7月,第425—431页。
- ⑬ 《当代日本》第17卷,第1—3期,1948年1—3月,第97页。
- ⑭ 事实上,麦克阿瑟对他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引以自豪,在以后出版的他的回忆录(麦克格劳—希尔,纽约,1964年)中他指出:“占领日本最具有深远影响的成就之一就是土地改革计划。在持有土地的问题上,日本的封建主义制度是显著的。迟至战争结束时,一种可追溯到古老年代的实际奴隶制依然存在。日本大多数农民不是十足的农奴就是在一种每年由地主攫取高比例收成的体制下的辛勤劳动者。在占领当局成立只几个月后,我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猛烈抨击。我认为凡是在土地上耕种的人,根据法律,必须有获得收成的权利,必须结束交谷租田制度,甚至也许更基本的是使土地归于人民。在当时沿袭的那种制度下,农民实际上不可能购买自己的土地”(第313—314页)。

- ⑮ A·J·格拉德:《日本的土地与农民》,太平洋关系学会,纽约,1952年,第219页。
- ⑯ R·J·多尔:《日本的土地改革》,牛津大学出版社,伦敦,1959年,第148页。
- ⑰ 多尔(同上书,第148页)引自拉德金斯基未发表的文稿。
- ⑱ 在远东委员会的审议过程中,在美、英为一方和苏联、澳大利亚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分歧,后者试图列入工会在促进社会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这一条款。
- ⑲ 一位负责劳工问题的占领当局官员对这一事件作了详细的私人报导,载于西奥多·科恩著:《重建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占领》,自由出版社,纽约,1987年,第240—259页;这份报导揭露了占领当局发现自己介入了那种纠缠不清的麻烦之中。
- ⑳ 西奥多·科恩也对这一事件有过最详尽的报导,同上书,第277—300页。
- ㉑ 同上书,第299—300页。
- ㉒ 《日本政治的重新定向,1945年9月到1948年9月》,盟国最高司令部政府处的报告,美国政府印刷所,第1卷,第246页。
- ㉓ T·科恩:《重建日本》,第382页。
- ㉔ 赫伯特·帕幸,《日本的社会与教育》,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出版社,1965年,第129页。
- ㉕ 引文见科恩《重建日本》,第394页。用日文最详细记录最完整地讨论盟军总司令部劳工政策的记载,可查阅竹前荣治著:《战后日本的劳工改革》,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 ㉖ R·K·霍尔:《新日本的教育》,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49年,第iii页。
- ㉗ 官方英译全文如下:

“我们的臣民们,你们知道:

我们帝国的祖先们在广泛、永不间断的基础上建立了我们的帝国,

并且深厚而又坚定地创立了美德。我们一直以忠孝的道德标准团结起来的臣民们世代代表现了这种美德。这是我们帝国本质的光荣，也是我们教育源泉之所在。我们的臣民们，一定要孝顺父母，兄弟姊妹相亲相爱，夫妻和谐，忠实于友人；谦虚温顺；对人仁慈；追求学问，培养技艺，从而发展知识才能，充实精神力量；此外，促进公益，发扬共同利益；时刻尊重宪法，遵守纪律；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勇敢献身于国家；从而保卫和维护我们帝国皇位与天地共存共荣。你们不仅要成为我们优秀和忠实的臣民，而且要显示你们祖先最优良的传统。

这里规定的做人之道确实是我们帝国祖先们遗留的教导，他们的后代和臣民们都需要遵守，无论是什么年龄的人和生活在什么地方都一样。我们希望把它虔诚地铭记在心，同你们，我们的臣民们一样，我们都可以实现同样的美德。”

⑳ R·K·霍尔：《新日本的教育》，第162页。

㉑ 同上书，第167页。

㉒ 首先，鉴于当时特别缺少与改革计划的要求相适应的学校建筑物，立即执行这项改革计划是不现实的。我作为经济安定本部副长官，曾同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经济与科学处谈判，要求根据代表团提出的计划分配最低的必要资金用于建设急需的学校建筑物；意想不到，占领当局一位负责官员告诉我，这由日本政府自己决定他们是否真正需要按照教育代表团改革学校制度的建议行事。

㉓ 引文见R·K·霍尔：《新日本的教育》，第357页。

㉔ 引文见上书，第359页。

## 第二章 走向经济复兴之路

毋庸置疑,国际事件的发展凑巧给日本走向经济复兴铺平了道路。从宣布杜鲁门主义(1947年3月)以来冷战心理的加剧,再加上1948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进军,美国政府明显地决定要把日本作为一个“反共堡垒”。结果使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加速了日本经济恢复的进程。占领政策的制定权开始为美国政府所掌握,首先是减少赔款和放宽解散财阀计划,然后是建议采取强制性措施,制止通货膨胀和建立单一汇率,最后是加快制定单独对日和约的步伐。促成美国这一决策的最后契机是1950年6月爆发的朝鲜战争。附带说一下,这又成了战后日本经济恢复的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联合国军队”为了进行战争在日本实行特别采购计划,给予日本经济恢复以巨大的推动力。在这一章里,我也试图尽量客观地叙述事件的进展,虽然所选择的主题也反映出我个人的倾向。

### 1. 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从1945年9月2日开始到1952年4月28日结束,共历时六年零八个月。这段时期又可以清楚地再分成两个阶段,反映出美国政府对日基本政策的急剧变化。第一阶段集中体现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得到总统的同意的一篇典型声明中,它说到“日本的困境是其本身行为的直接结果,盟国将不承担重建战争破坏的责任”,前一章引用的鲍莱声明对此更作了具体的

阐释。另一方面,第三阶段的特点则为美国决心恢复日本战前作为“亚洲工厂”的地位,并且尽量维持日本经济,以避免社会主义的侵袭<sup>①</sup>。

1948—1949年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和崩溃毫无疑问是政策的重大分界线。而正是美国陆军部长肯尼思·罗耶尔于1948年1月6日在旧金山联邦俱乐部发表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演说明确地对日本人表明,美国的基本政策已经改变。他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即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必须重新审查,因为世界政治的新情况已“在原来的广泛非军事化概念和建立一个自力更生国家的新目的之间”产生了“一块无法避免的冲突区”,他接着说,“在某个阶段,严格的产业分散化,虽然进一步能削弱发动战争的能力,但同时也会破坏日本工业的生产效率,因此会拖延日本实现自力更生的时间”,又说“如果日本要实现政治稳定,保存其自由政府,它就必须有一个健全独立的经济”。罗耶尔的演讲是背离原来政策的一个重要起点,随之而来的是弗兰克·麦考埃将军1948年1月21日<sup>②</sup>在远东委员会上所作的声明,向全世界显示了美国政府军方已改变其对日政策。

### 关于赔偿问题

然而,这种行动的背景是早自1947年初以来,也就是鲍莱调查团关于赔偿最后报告公开后的几个月以来,美国企业界的一种思想已在逐渐成熟起来,即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复兴总的说来会增进美国企业界的利益,为它提供一个可靠而又日益成长的主顾。很可能由于这个原因,一家纽约大工程公司首脑、克利弗德·斯特赖克于1947年1月被派往日本,为将于同年8月到达的第二个赔偿调查团作准备。斯特赖克在“美国人杂志”(1947年9月)上发表了一篇以“报复的代价十分昂贵”为题的引起争议的文章。他要求即使会遭到远东委员会成员反对,也要修改赔偿计划,并且



主张为了远东的和平与繁荣,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日本。使美国经济战略逆转的最有影响的重要角色之一显然就是当时陆军部副部长威廉·H·德雷珀。他在1948年3月率领一个第一流的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前往日本,下决心要使麦克阿瑟赞同美国对日政策从改组转向复兴经济的“重点转移”。自从鲍莱调查团最后报告公布以来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历次赔偿方案的记载就反映了情况在不断改进(见表2.1)。

表 2.1 历次赔偿方案

(单位:百万日元;按1939年价格)

	报告日期	拆 除		总计
		工业设备	军事设备	
鲍莱方案	1946年11月	990	1476	2466
斯特赖克方案	1948年3月	172	1476	1648
德雷珀-约翰斯顿方案	1948年5月	102	560	662
实际拆除数	(截至1949年春季停止拆除之前)			160

当时,赔偿问题已成为一个次要问题;为了赔偿而拆除厂房和设备的活动在1949年春季已完全停止。在对日和约的谈判中又重新议论了这个问题。该和约于1951年9月8日签署,其中第14条规定:

1. 盟国普遍地对将获得日本政府和国民在各本国所持有的资产感到满意。
2. 曾为日本占领的各盟国除获得上述第1款所述之外,还可获得以生产性活动和打捞沉船为形式的劳务赔偿。
3. 其它盟国将放弃任何赔偿要求。

第2类国家将同日本分别进行谈判,决定细节问题。但是印度和蒋介石中国宣布,它们将放弃赔偿要求。日本同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在保大的统治下)、老挝和柬埔寨这些国家的谈判直到1958年才告结束。日本的总赔偿责任为10.12亿美

元,也就是说,按每年分摊,在相关年份仅占日本国民收入的0.4%,实际上约占1945年9月到1951年12月期间美国对日本救济和复兴援助总额(21.18亿美元)的一半。

### 关于解散财阀问题

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那样,占领当局对解散大财阀的改革方案,在1947和1948年政策转向的过程中也遭到了逐渐后退的命运。在对日占领期间,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司的成员罗伯特·A·费尔里,在对占领当局改革方案所作的一份总结评论中写道:“在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占领政策中一直引起较多争论的问题之一是解散财阀计划。据认为具有“激进”色彩而在国会和企业界引起了很多的批评”。<sup>③</sup>美国公开批评这个计划的最突出人物是詹姆斯·李·考夫曼,战前他是很多美国在日大公司的律师,1947年夏季访问日本,设法获得了一份仍然保密的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的副本。在他返回美国之后,准备了一份长篇报告,把解散财阀的计划作为他发动猛烈抨击的中心<sup>④</sup>。他指责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正是它清洗了为经济恢复所需要的日本企业界人士。他的结论说,特别是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危及了使自力更生的日本成为远东反共堡垒这一目标。

考夫曼报告在美国企业界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中广为流传,特别受到国务卿马歇尔的新任计划小组负责人乔治·凯南的注意。显然凯南在1947年10月16日同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共进午餐时曾不断地重复考夫曼提出的指责,部长在把这次谈话写在日记里时说,凯南担心“日本的社会化已发展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如果签署了对日和约、将日本归还给日本人,日本就不可能自力更生……很可能导致近乎无政府状态,这将恰恰是共产党人所需要的”<sup>⑤</sup>。凯南本人很久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反财阀措施所依据的意识形态观念同苏联关于‘资本主义垄断’罪恶所持的观

点极其相似,只有对日本未来共产主义化感兴趣的人才会完全对这些措施感到满意。”<sup>⑤</sup>

考夫曼和凯南显然都说离了谱;因为爱德华兹调查团所设想并由占领当局官员主持的解散财阀计划,其意图是促进自由企业竞争的经济制度。1948年1月麦克阿瑟将军已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日本人本身正在迅速摆脱这些(寡头政治)体制,以为在这里按照我们那种私人自由竞争企业观点建立一个更加健康的经济扫清道路。”<sup>⑥</sup>然而,考夫曼那些指责性言论的影响,再加上参议员威廉·诺兰1947年12月初在美国参议院谴责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是“不负责任的新政激进派大作”,已在企业界形成了一种气氛,即认为迅速地采取一种反措施势在必行。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有关赔偿问题一样,威廉·德雷珀上场了。他首先在1948年1月初拍电报给麦克阿瑟将军,抱怨财阀解散计划中的许多具体规定,然后又在1948年3月率领一个第一流的代表团到日本,对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当时解散财阀法已在日本国会通过,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已按照法律确定325家公司应予解散。德雷珀的策略是阻挠其执行,采取的方法是建议设立一个独立的美国企业家委员会,负责审评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的指令和按照新法律制定的公司重组计划。麦克阿瑟对其建议表示同意,并且及时成立了财团解散工作评审局,由纽约造船公司总经理罗埃·坎贝尔主持。德雷珀后于1948年4月7日在华盛顿宣布,美国政府正在取消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中的大部分内容。其后,财团解散计划就成了强弩之末;正如上一章所扼要提到的那样,到1948年7月1日,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把解散公司的数目从最初的325家减少到100家,还有,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宣布所有银行都不在解散之列。到1948年12月,远东委员会第230号文件正式被撤销,财阀解散工作评审局在原来应予解散的公司名单上除保留9家外,其余都被一笔勾销了。

## 对政策转变原因的解释

一位社会科学工作者怎样对有关赔偿和财阀问题的美国占领政策中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转变作出解释呢?美国缅因州大学欧朗诺分部教授霍华德·舍恩伯格的解释是:

“国民党中国地位的迅速恶化、日本通货膨胀危机的加剧、国际经济无力吸购足够多的美国出口商品以支持美国繁荣以及美苏之间紧张关系的不断发展,到1947年已产生了一种促使资本家阶级和国家领导人认真考虑美国对日关系的新局面。国家领导人都认为,美国应该协助日本恢复经济……”

1947年和1948年解散财阀政策的变化是说明资本家阶级中一部分人对国家政策的巨大影响的一个强有力的例证。但是,对政策的影响和主控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考夫曼和他代表的企业界施加的影响所以能如此有效,是由于解散日本财阀的计划缺乏任何政治和社会基础。反过来看,在某种条件下,即使在有关财阀问题的争论中没有[美国]企业界的介入,日本资本家阶级对解散财阀的反抗也会影响美国国家领导人放弃该计划……”

[换句话说,]一种变化着的国际环境,特别是日本资本家阶级对美国制定的经济改革政策的反对,促使当时存在于美国国家领导人中间的温和派政策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保证了赔偿和解散财阀计划的废弃,并且保存了日本资本家阶级相对稳定的统治直到现在。”<sup>⑧</sup>(着重号后加的)。

这种分析,特别是以上加着重号的部分,首先为美国国务院一位有经验的远东问题专家罗伯特·费尔里所肯定,他以对日本独特的民族性作了更深入分析的方式写道:

“同国外一种比较普遍的假定相反,日本人对另一种竞争体制的优越性毫无实际经验,他们对战前的财阀很少或者没有什么不满或憎恨,对现在解散财阀也很少或者没有什么喜悦……[他们]

的理智上或者思想上没有经受过竞争体制，而把它看作一个新概念，其优越性必须与它所采取的方法一同表现出来。”<sup>⑩</sup>

他解释这一民族性根源于日本缺少相当规模的中产阶级——根据他的看法，这个阶级在正常情况下是“一种竞争性经济的主要支柱。”<sup>⑪</sup>他继续告诫说：“如果在日本放弃竞争性经济的观念，那么盟国必须认识到这种放弃，是在日本建立民主政治的一大失败……在日本，民主的基础是不牢固的，如果实行社会主义或恢复到战前垄断阶段，从而导致这些制度所必然会带来的对个人积极性和自由的扼杀，那就会严重地阻碍刚刚出现的民主倾向的发展。”<sup>⑫</sup>

可以认为，费尔里的警告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必须说，要对他所讨论的问题作出判断就要具有比他所显示的更多的历史透视力。首先，日本的资本主义发展得较晚，就像德国那样，此外，日本在 1899 年以前并不享有完全的关税自主权——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贸易条约所留下来的遗产。这种环境是导致卡特尔和托拉斯组织的形成和财阀结构的强化、以便于在世界上开展竞争方面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虽然费尔里讲到“刚出现的民主倾向”，似乎这些倾向都是在占领期间由美国指导而哺育起来的，可是日本确实有一个所谓“大正民主”时期，即从 1912 年到 1926 年的大正天皇时代。就在这个时期内，已开始接受所谓“党派政体”，其内阁要根据众议院政党的实力分布而组成，并且第一次（1925 年）实行了成年男子普选权。表明这个时期的特征的还有东京帝国大学法律教授美浓部达吉提出的一篇论文（1925 年），认为天皇是国家机关之一，并没有超越国家的权力，以及加藤内阁时期（1924 年 6 月到 1925 年 7 月），不顾军方的严重抗议，特别对陆海军预算作了较大规模的紧缩。同时在这个期间内，还强调更广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包括承认劳工和佃农工会以及妇女享有较多的平等权。实际上，虽然

1900年的“公共秩序与警察法”曾规定不准妇女参与政治，甚至禁止妇女参加政治集会或者参加政治社团，可是，1920年组成的新妇女协会顺利地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迫使上述法律作了修改（在1922年），允许妇女参加政治集会。

在这段“大正民主”的时期内，日本社会的民主发展进程中还有其他一些进步标志，诸如提倡出版自由和扩大民众参与国家事务等方面。但是，众所周知，在1928年前后，随着军界开始掌握国家事务的主动权，这种趋势开始出现了逆转。不能否认，大正时期的民主种子还很脆弱，而且不稳定；可是，为什么它们不能生长发育成为某种成熟的民主主义呢，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这是一个大问题，已超出本书研究范围；读者可以参阅罗伯特·斯卡拉皮诺<sup>[12]</sup>的一项经过艰苦劳动得出的研究材料，他按照日本“现代化”时序提出的解释，是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还必须记住，1945年7月26日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宣言》，提出需要扫除一切障碍，以恢复和加强日本人民中间的民主倾向，意味着“民主倾向”实际上在一个较早的时期就已经在日本存在了。

## 2. 制止通货膨胀趋向

### 战后的通货膨胀

一旦美国对日政策作出了赞成经济恢复、以使日本恢复其战前作为“亚洲工厂”的地位、并尽可能保持日本经济免受社会主义侵袭的根本改变，那就迫切需要实现经济稳定，即制止占领初期一直延续着的通货膨胀趋势。

前一章已论及战争失败引起的损失和破坏，我们可以容易地看到严重缺少基本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公开和隐蔽的通货膨胀。

关于占领初期通货膨胀的发展情况,可用简单的统计数字加以说明。为此,我选用了东京每月“实际”消费物价指数,这个指数是把官方和黑市物价,按调查中各个月的相关数计算出来的。<sup>⑬</sup>根据这一指数,占领时期开始以来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期是头七个月,即从1945年8月到1946年3月,其指数按每月42%的比率上升,然后,1946年3月实行货币兑换(旧日元换成新日元。——译注),再加上征收资本税及其他一些措施,吸收了大量的过度购买力,导致了六个月内价格水平的相对稳定。但是,从1946年12月起,特别是1947年5月、6月和7月,价格再度上升。食品短缺日益尖锐,物价则按接近每月24%的比率增长。正是这个时候,社会党领导的片山哲内阁执政,并成立了权力大大加强了的经济安定本部;从1947年8月到1948年5月这十个月内,又实现了物价的相对稳定,月平均增长率为4%。1948年2月,由于寻求岁入来源以发给政府官员为抵消通货膨胀影响的“生活费补贴”问题,片山哲辞职。<sup>⑭</sup>首相一职由民主党领袖、职业外交家芦田均接替;经济安定本部的一批高级官员,包括本人在内全部辞职。此

表 2.2 占领期间的通货膨胀趋势

	批发价格指数*	年增长率(%)
1945	3.5	
1946	16.3	365.7
1947	48.2	195.7
1948	127.9	165.3
1949	208.8	63.2
1950	246.8	18.2
1951	342.5	38.8
1952	349.2	1.9

\* 1934—1936年批发价格指数作为1。

资料来源:马丁·布朗芬布兰纳,“盟军最高司令部占领日本期间的通货膨胀理论”,《HOPE》,第7卷,第2期,1975年,第137页。

后,通货膨胀发展趋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且正碰上美国对日基本政策发生转变,麦克阿瑟总部变得非常关心稳定问题,达到了接受华盛顿派来一个专家代表团对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程度。

从较长的历史观点看,我们这里可以概括一下占领期间日本的通货膨胀趋势。我们在表 2.2 中把 1934—1936 年日本批发物价指数作为 1(不是常规用的 100),从而得出相关的倍数,可以看出,日本战后通货膨胀到 1952 年底占领结束最后实现稳定时,其批发物价相当于战前(1934—1936 年)的 350 倍。

可以指出,日本的通货膨胀不仅是因战争失败引起经济崩溃的产物,而且也部分地是日本承担占领费用的结果,在大部分占领时间内居住于日本的马丁·布朗芬布兰纳认为“1945—1949 年这四年时间的日本通货膨胀”是“占领当局在经济领域三大失败”之一。<sup>⑮</sup>他指出:“无论是占领当局还是日本当局都没有认真地控制用于弥补政府和私营企业赤字的货币发行量和银行存款额”;还有“占领政策把‘结束战争’的支出,包括维持占领军及其家属过优于美国生活的支出强加给日本人”。<sup>⑯</sup>事实上,1947 年这类“结束战争”支出的金额为 641 亿日元,占中央政府一般项目支出总额的 30%以上。1948 年这项支出又增加到 1062 亿日元,1949 年略为减少到 997 亿日元。<sup>⑰</sup>

### 美国政府的关心点

当时的陆军部副部长德雷珀正在华盛顿鲜为人知地领导着制定一项恢复日本经济、首先是抑制 1948 年春季再度出现的通货膨胀威胁的计划,那时他也正为 1948 年 7 月 1 日开始的美新财政年度为日本复兴提供拨款问题而操心,并且需要同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局合作。<sup>⑱</sup>这促使德雷珀建议派遣一个由联邦储备局研究处副处长拉尔夫·扬格率领的新的专家代表团前往日本,以便



于作出他们自己的调查和建议。扬格代表团于 1948 年 6 月到达日本,只逗留了 18 天,就向麦克阿瑟将军递交一份报告,建议立即确定 1 美元兑 300 日元的单一汇率,并且为了抑制物价的不断上涨,建议采取关于处理银行准备金、信贷管制、所得税和财产税等问题的一系列技术性措施。然而,正如泰德·柯恩所说,“把所有这些建议产生的影响加在一起,就等于要急剧削减日本的经常消费,特别是要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sup>19</sup>由于到当时为止,盟军最高司令部一直力图在稳定物价的同时,同步提高实际工资,而扬格代表团的建议却是与这项政策完全相反。麦克阿瑟将军在占领当局其他负责官员的支持下不能容忍这项建议,他完全拒绝了扬格的报告,并命令把它作为“绝密”档案,表面上的理由是由于所建议的汇率数字需要保密。这是在占领期间麦克阿瑟将军唯一一次全面拒绝一个外来顾问代表团的报告。

麦克阿瑟似乎赢得了这场斗争,但是不久就清楚地看到他将失去占领当局处理经济事务的控制权。因为,当华盛顿当局接到盟军最高司令部拒绝扬格报告的电讯时,联邦储备局和财政部等单位联合起来,断然拒绝批准德雷珀关于 1949—1950 年的新拨款要求。德雷珀被迫提出了一项妥协计划,从而就出现了一项可以使麦克阿瑟屈服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指令,并确定派遣另一位高级顾问去监督这项指令的执行。1948 年 12 月所谓“九点计划”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就此出笼,并在 1949 年 2 月派出底特律银行家约瑟夫·道奇,以部长级身份、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私人代表赴日。这些措施毫无疑问地表明对盟军最高司令部管理经济事务投了不信任票(并经总统确认);从此以后,可以说麦克阿瑟将军只成了一条传声带,他的权威大大受到了限制。

当我们研究一下这里全文抄录的“九点计划”时,这就很清楚了:

1. 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严格缩减支出,最大限度地扩大政

府收入,包括必需和适当的收入,以实现统一预算的真正平衡。

2. 加速和加强税收计划,保证及时、普遍和强有力地打击逃税犯罪活动。

3. 保证把信贷扩张严格限制在对日本经济恢复有益的项目上。

4. 制定一种实现工资稳定的有效计划。

5. 加强,如果必要的话,并且扩大现行物价管制计划的范围。

6. 改进外贸管制办法,加强现行外汇管制措施,以有利于将来使这些措施恰当地交给日本机构执行为度。

7. 改善目前分派和配给制度的有效性,特别要实现出口最大化的目标。

8. 增加一切本地出产的主要原料和制成品的生产。

9. 提高粮食采集计划的效率。

除这九点以外,还加上一条补充指令,即在稳定计划开始实行后的三个月之内,应建立单一汇率。

重要的是,“九点计划”几乎完全是占领当局按照盟军最高司令部经济与科学处起草的 1947 年 5 月“经济稳定计划”所执行的政策翻版。唯一明显的区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要求“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实现统一预算的真正平衡”,而不仅仅是“走向平衡预算”。这两个计划如此相似的事实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迹象,表明指令所指责的目标并不是政策本身,而是其实际行动。

仅仅五天之后,东京和华盛顿同时以说明性新闻发布形式公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指令;它对日本公众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无论是扬格计划还是三年前的指令(免除麦克阿瑟运筹日本经济活动的责任)当时都没有公诸于众。这种影响主要是由于突然感到来自华盛顿的不祥之兆,并且还夹杂着一种困惑不解的意识,因为到 1948 年底,经济稳定和生产恢复正呈现出肯定的改善迹

象。<sup>20</sup>回顾往事,我认为当约瑟夫·道奇来到日本执行“九点计划”时,很自然,他所主要关心的仅是上述第1点和建立单一汇率的问题。

### 3. 建立单一汇率

#### 道奇来到日本

在自1948年12月19日公开发表“九点计划”到1949年2月1日约瑟夫·道奇抵达日本这两个月内,日本国内政治方面发生了两件有利于道奇代表团,使他易于完成其使命的大事。一件是1949年2月间,由池田勇人代替泉山三六担任大藏大臣;<sup>21</sup>另一件是1949年1月24日以吉田茂为首的自由党在大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道奇找到了最能为他的任务而合作的一批日本官僚,而在占领初期只能同不那么驯服和具有独立思想的日本人争论的泰德·柯恩后来写道:“无论是道奇还是华盛顿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充分理解这两件事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一直认为,如果他是一个赌博者而不是一位严肃的银行家,那他就会被叫作‘幸运的乔’道奇”。<sup>22</sup>

不论道奇是否“幸运”,至少他毫不动摇地坚持执行上级交给他的任务,而且自己感到满意地实现了他的目标。关于“在尽可能早的时间内使统一预算实现真正的平衡”的问题,道奇同样把日本经济比喻为依靠政府补贴和美援这两大支柱;他特别建议把中央政府预算的一般和特别项目中一切隐蔽的补贴进行曝光,这样就可以采取明确的步骤,取消或减少这些补贴,以实现“统一预算的真正平衡”。即使很称职的大藏大臣池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也畏缩不前;1949年财政年度的“道奇预算”最后还是使日本政府强咽了下去,议会别无选择,只得在1949年4月20日予以批准。可以理解,日本新闻界就在这个时候把“经济沙皇”这个头衔赠给了约

瑟夫·道奇。

道奇的这个绰号变得非常合适,因为他在 1949 年 4 月 23 日宣布,决定把日本货币对美元的单一汇率订为 1 美元兑 360 日元,使日本政府和占领当局的官员大为吃惊。汇率问题,一个被认为是十分复杂而且特别重要的问题,从 1947 年夏季以来,一直在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有关部门中间进行深入细致的讨论,并且各方交换过许多探讨性的研究报告。然而,道奇显然对它们不屑一顾,而是自行决定,按照他自己的话,只同“三个知心人”进行过商讨。<sup>④</sup>一周之后,他胜利地离开了日本。

### 汇 率 问 题

在这里需要简略地解释一下当时日本汇率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美国对日政策于 1947 年底前后向加速经济恢复转变之际,日本对外贸易的正常化就被置于占领政策的紧急议程上,为此,决定单一汇率就非常重要。例如,1947 年的贸易情况极不正常。当年日本的出口值为 1.7 亿美元,进口值则为 5.1 亿美元,贸易逆差为 3.4 亿美元。然而,为了能向国外出售,出口商品的价格必须按美元计价定在能在国外市场销得出去的水平上,这就是说,每种商品的实际美元价格对这种商品的具体日元/美元汇率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在战后初期,一部缝纫机从日本出口,在国外售 40 美元,而在日本的生产成本为 24000 日元,其具体汇率应是 1 美元合 600 日元。1948 年这一具体汇价的幅度是 1 美元合 180—800 日元之间。人造纤维纱贸易中的汇率为 1 比 180 日元,自行车为 1 比 540 日元。另一方面,进口商品是按国内官价或管制价格在日本出售的,所以在国外值一美元的一种产品经常在日本以 100 日元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出售进口商品的日元收入总的反映了日元价高的汇率,而对日本出口商的日元支付则反映了日元价低的汇率,结果,即使像 1947 年

进口品的美元值比出口品的美元值高三倍的情况下，日本外贸特别帐户仍出现逆差。<sup>24</sup>

这样一种贸易“温室”性质的补贴必须用打开窗子引进外界空气的办法加以改正，以使市场法则得以发挥作用，提高经济效率。确定单一汇率可以是一个解决办法。可是，困难就在于当时进口品主要是基本食品和原料，即需要保持低价的一类商品，而大量的出口品是生丝和船只，它们在国外要按高于1美元比400日元的汇率标价。尽管如此，“温室窗户”或迟或早总得打开，问题是一步一步去实行，还是一步到位；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选择什么时候，更为重要的是选择哪一种特定的汇率。

在日本政府方面，正巧要我负责草拟一项建议，于1947年12月15日递交给盟军总司令部的经济与科学处，在那项建议中，提出了以下几个步骤：

1. 尽快应用日本官方价格指数（加以某些实际调整）计算出一个普遍适用的单一汇率。
2. 但是，考虑到各种有关的经济问题和发展趋势，何时使该计算出来的汇率公开执行则另行决定。
3. 一旦确定了汇率，则应尽可能久地维持下去。如果以后要加以修订，则应按照不受政治控制的明确的公式进行。
4. 为了不断地达到一种“均衡”汇率的目的，“建议”制定一个可以与实际情况稍微偏离无补贴贸易差额均衡的“平衡”公式。

1948年美日双方官员之间曾断断续续地进行秘密讨论。首先，探求一种暂时性的通用汇率数字；其次是讨论确定单独的“金融汇率”的可取性，对于这种汇率，美国企业界吵吵闹闹地要求最先作出决定。到1948年年底，日本一方在对汇率问题制定一项明确的计划方面进展相当顺利；可是在1949年春季，约瑟夫·道奇介入后，他对卷入这种极其复杂的汇率问题显然不感兴趣，并突然宣布他的不可改变的決定，正像上面所说的那样。

在战后日本的环境下,如果要确定一个单一汇率,就会遇到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即犯币值高估的错误是否会更好一些。甚至在对日战争胜利以前(1945年8月15日),经济学家之间就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建议远远不能取得一致。特别是专门研究过被解放国家和被占领国家货币汇率问题的弗兰克·塔马格纳<sup>⑤</sup>指出:“选择高汇率是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最实际最有效的方法,这种压力是由盟军、特别是美军在日开支造成的。”<sup>⑥</sup>他对宁可犯币值高估错误的观点表示赞同。而另一方面,戈特弗莱德·哈伯勒<sup>⑦</sup>则站在同塔马格纳相反的立场,他认为,低汇率即币值低估将易于取消或宽松当时存在的经济管制措施,并在最近的将来较少需要修订。

总之,正如塔马格纳所说,问题的核心是怎样确定一种货币的均衡汇率,即“在当时国民收入和外国投资流量的情况下,能实现和维持一国国际收支均衡状态的汇率”。<sup>⑧</sup>在日本一方,我们同意这种观点;因此,在1947和1948年日本经济情况极其混乱的情况下<sup>⑨</sup>,我们如前所述,曾建议应用一种“平衡公式”分阶段地接近目标的方法。

但与此同时,我们当时多少有些乐观地意识到,到1949年初,日本经济肯定已处于恢复期,只是还不能显示出其全部潜在能力。所以,我们感到在这种情况下给日本确定一个单一汇率——不会把日本主要出口商品排挤出国外市场的汇率——很像是为一个因久病没有去过高尔夫球场的处于恢复期的高尔夫球手确定对他有利的加打次数。如果说在他患病之前,他的加打次数是18杆,那末在恢复打球之后,他的球友经过讨论允许给他的加打次数是24杆。然而即使有这样特殊的照顾,他还是难以同他的友人竞赛。1949年初期日本的情况就类似这个处于恢复期的高尔夫球手。但正是这位处于恢复期的高尔夫球手在发现优惠的加打24杆之后仍非常努力,他不久就可能恢复病前加打18杆的球技,从

而随着体力的恢复,他就处于有利地位。我们相信身体的康复和技术进步的赶超,不久就可以使日本经济从这一经济恢复初期确定的优惠汇率而获益。我们不知道约瑟夫·道奇决定一美元折合360日元的汇率时是否曾注意到这类问题;但是他的决定,就像我们有些人当时曾评论过的那样,是犯了低估日元的错误。我们下面将有机会来讨论“恢复”期内这一静态汇率对出口所造成的非常有利的影响。

### 为税制改革而来的肖普代表团

道奇对日本预算结构进行单方面的外科手术,创造了超额盈余<sup>④</sup>。很可能作为这一手术必要补充的是,美国政府决定向日本派遣一个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卡尔·肖普教授为首的进行税制改革的专家代表团,成员包括六位研究中央和地方税制各个方面的专家。该代表团于1949年5月10日抵达东京,在日本停留三个多月后,将它的报告递交给麦克阿瑟将军,并于1949年9月15日公布于众。我认为在占领期间美国派遣到日本的所有代表团当中,肖普代表团可以说是工作最认真的一个。所有代表团的成员在应用美国领先的现代租税原理之前,都是非常刻苦地了解当地情况的复杂性(传统的和当代的)。代表团由担任顾问的三位日本经济学家<sup>⑤</sup>协助,在日本酷暑季节付出艰巨的劳动,写成了一份长篇报告(约6万字)。其中除了对当时日本经济的税制改革提出中肯的建议之外,还就日本的税制归纳成一份可读性极强的概要,比日文的官僚主义式的或教科书式的概要具有远为显著的优越性和启发性。即使在40年后的今天,1949年的肖普报告仍然是研究日本税制改革的一份重要参考资料和指南而被广为阅读,这就足以证明代表团的深谋远虑了。<sup>⑥</sup>

肖普代表团建议的主要部分可以概括成以下三方面:

1. 保留作为国家税制结构支柱的累进和广泛征收的个人所

得税,特别强调“横向”的公正性。

2. 引用增值税制度,强调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

3. 按战时和战后通货膨胀状况制定重估土地和固定资本价值的条款,旨在允许积累适当的折旧准备金,并防止以征所得税方式将这些准备金汲走。

关于第1点:如果我们主要依靠直接税作为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显然必须体现出所渴望达到的“横向”公正性和“纵向”的再分配。在肖普代表团到达日本以前的时期内,所得税管理上的一个主要缺陷是,在同等收入的自估纳税人和根据税源课税的纳税人之间,实际赋税存在着明显的不公平性,而后者都是工薪阶层。<sup>⑧</sup>肖普代表团所采取的方法是:一方面通过减低最高一级收入的税率(从85%下降到55%)(明显地牺牲了累进性),使对自估纳税者在缴税方面守法的程度采取更现实主义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建议实行自行记录的专用“蓝色”申报表,在审查时给予自估纳税人以较优惠待遇。肖普在日本曾谈论到,任何经不起税负公正性考验的建议最后都不大会被公众所接受。代表团的这种意图和方法是很值得赞赏的。但是,一种税收制度就像一块布,既需要经线,也需要纬线。如果方法是经线,实际有关的统计资料就是纬线,而后者就得由日本政府机构来提供。回顾过去,我们必须说,肖普代表团对所得税改革的建议严重地为纬线不充足所阻挠,这是不幸的。<sup>⑨</sup>

这里还要提一下肖普代表团在对上述第1点的建议中所作出的一种创新。那就是设立一种净值税,即由中央政府对一切形式的财产征收的一种税,其目的是弥补因减低最高一级收入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而丧失的财政收入。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所要起的职能是牵制所得税的执行,反之亦是。这项建议后来立即正式执行,但在日本重新获得独立之后,有关立法于1953年被废除了。



关于肖普代表团建议中的第2点,总的思想是要加强地方自主权,这对日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地方自主的原则在日本发展很慢,部分地是由于明治维新(1868年)实现的国家统一产生了一种依赖中央来领导和指导日益扩展的国家建设的普遍心理。在这方面,战后立即着手进行的改革,如在1946年实行地方长官民选制代替原有的中央政府指派办法,确是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取消了内务省,建立了新的负责自治机构事务的部门。然而,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上面,旧时遗留下来的集中管理形式还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这种集中管理表现为:(1)“特别项目支出由中央政府拨款”;(2)“指定代理职能”和(3)限制债券发行。肖普代表团建议实行一种平衡赠款制度(不附带任何条件)以代替上述(1)项,完全取消(2)项,给地方政府以自主权,并以新增加的收入来源给予支持。特别是“指定代理职能”一直是中央管理地方行政的最主要工具,它具有强制性,中央有可对不驯服的地方自治机构长官依法起诉之权。从日本官僚机构的观点来看,肖普代表团取消这些遗留下来的集中管理形式的建议确实具有革命性,但它立即得到了关于地方行政问题的神户调查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是由政府继肖普代表团的报告之后,为了审查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重新布局而于1949年12月设立的。

加强地方自治,当然需要在收入方面进行重大的改革。肖普代表团的办法是实行增值税,认为增值税在日本的特定条件下,优于零售税或周转税。在这两方面(即关于行政职能的重新布局和实行增值税的建议),肖普代表团的改革思想是十分中肯和有远见的,事实上是太有远见了,以致当时日本政府并未实行,但是四十年后回忆起来还是值得考虑试行的。

## 4. 朝鲜战争及其后果

### “道奇的通货紧缩政策”

所谓“道奇路线”的牢固预算平衡的命令已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实际上甚至在比原创议人所预期的要快得多的时间内已达到其目标。在流通中的日本银行货币已从1948年底的3552亿日元下降到1949年6月底的3006亿日元,1949年底为3553亿日元。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货币流量差额,在1947年财政年度为从政府部门净流出590亿日元,1948年财政年度净流出210亿日元,而1949年财政年度则呈逆向流动,从私营部门净流入373亿日元。消费物价指数如以1948年平均为100,1949年6月为138,后开始下降,到1950年6月则降到123。另一方面,失业人数则持续上升,从1948年底的26万人增加到一年后的34万人,1950年6月更增加到43万人。一连串的小型企业破产消息刊载在报纸的头号标题上,偶而也刊出一些自杀消息。从理论上讲,“道奇路线”是要创造出一个稳定的基础,使经济可以健康持续地逐步发展。然而事实上,十五个月之后,并不见有什么经济恢复的迹象。工业生产活动增加缓慢,而耐用品生产(为观察家所期待的新资本投资关键指标,以替代所谓的消费品生产指标)实际上在下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部分地是由于道奇断然决定停止利用复兴金融金库在恢复工业生产方面的作用。

该金库早在占领初期即已成立,以对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工业提供融资,因为商业性的“城市银行”缺少资金;复兴金融金库在恢复煤炭生产和支持其它重要工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sup>⑧</sup>但是该金库的资金都是以购买该行债券为形式的政府拨款;这在道奇看来,十足是一种推动通货膨胀的发动机。因此,道奇决定取消复兴金融金库,而代之以设立一种美援对等资金,把美援进口物品的

日元收入存储其中,主要用于提供长期工业贷款(如水力发电项目),以有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进口的美国食品是一种“援助”物品,但当然不是免费分配。所以,消费者在购买美援食品时实际上是在作资本投资,而政府则减少了它的支出。实际上食品价格是在上涨,政府发现将来自美援食品的对等资金进行投资的速度跟不上按高价卖出、从消费者手中换得货币那么快。1949—1950 财政年度在出售美援商品所积聚的对等资金 1290 亿日元中,日本政府只以 500 亿日元用于资本项目投资,其余 790 亿日元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占领当局曾指令日本政府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偿付复兴金融国库债券,并保存部分现金不在市面上流通。

不仅财政上的节支立即产生了通货突然紧缩的影响,而且一大部分货币发行的非货币化也在仍很衰弱的工商界中产生了一种严重情况。为生存而斗争就开始了,在还存在着战前那种权力关系的资本主义背景下,优胜劣汰规律就自然而然地起作用。首先,在 1947—1948 年的全面分散化计划中,银行业是个例外,大的财阀银行仍能保持其地位基本不变,它们能对其联系公司提供资金。即使对这些银行来说,道奇的通货紧缩政策也影响到这些银行贷款资金的日趋枯竭。但日本银行就用一种购买证券的方式进行挽救,以使商业银行持有的证券在其总资产中的比重从战前平均 25% 下降到 1950 年 3 月的 9.9% 的程度。然而银根紧缩现象仍然未见缓和,即使是商业银行都不得不依靠所谓“过度贷款”的办法,即贷款额超出其资产额。这样,从 1948 年底到 1950 年头几个月,全部银行的存款额约增加 100%,贷款和投资额却增加 160%(从 3813 亿日元增加到 9947 亿日元),两者的比例从 0.85 上升到 1.10,各银行从日本银行的借款则从 487 亿日元增加到 1354 亿日元,即上升了 178%。

这就是货币方面的背景,在当时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造成了有利于那些同原来财阀有联系的日本大企业、而危害那些中小

型独立企业的后果。可以这样说,当广大民众都得经受较大程度强制性储蓄的折磨时,通过资本积累而形成的财富的再分配,对大企业十分有利,并且在以前的财阀银行与工业企业之间开始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1949年道奇又回到日本检查他的计划进展情况,他满意地评论说:“这是教科书式的说明一种预算怎么能制止通货膨胀的范例。”<sup>⑧</sup>实际上,正如泰德·科恩正确的评论那样,道奇在“以保守的日本大企业及它们的日本官僚和政治同盟者为一方和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为另一方之间构筑了第一条战后通道”<sup>⑨</sup>。

### 朝鲜战争的影响

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告诉我们,日本经济在1950年中期正处于停滞状态。前面提到的部分地由于盟军最高司令部对劳工权利采取倒退立场而出现的“政治两极分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1949年1月大选中,保守自由党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劳工明显地从与社会党转向与共产党结盟;<sup>⑩</sup>另一方面是,政府借口违反(经过倒退性修正的)劳工法,决定开除一大批工会积极分子,从而引起了劳工阵线普遍的骚动。

1949年发生了三桩难堪的事件。那一年从麦克阿瑟发表新年祝词开始,他说1月份大选的结果是“对保守政治思想的一种明确和绝对的信任”<sup>⑪</sup>。三桩事件的第一件是国有铁路公社总裁下山定则的死亡。他是在政府迫使他宣布解雇120413人后几天,于7月6日发现已被火车辗死。第二件是7月15日发生的所谓“三鹰事件”。当时,在东京郊区的三鹰车站,一辆无人驾驶的电气火车出轨,死亡6人。第三件是8月7日的“松川事件”。当天一辆火车在东京以北170公里的松川镇市出轨,有3名乘务员死亡,很多旅客受伤,据认为是一起阴谋破坏活动。这些事件无不笼罩着神秘的色彩,使得在这个转入50年代的时刻,造成了一种骚乱和

恐惧的气氛,并进一步使因不断恶化的经济困难而产生的黯淡前景更加令人沮丧。

谁都讲不清在未来岁月中被占领的日本前景如何,但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却把许多不确定因素一扫而光。确实,为了在朝鲜的军事活动,美军在几天的时间内就把日本变成多功能的基地。首先,因为要把占领军从日本运往战场而形成的麦克阿瑟认为的那种安全真空地带,必须加以填补;7月8日他命令日本政府建立一支有75000人的警察后备队,再使当时的海上自卫队增加8000人。为了实施这些措施,需要国会预算拨款;大藏省曾试图坚持要让占领当局注意,即使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时期的顶峰阶段,军方要扩张军备也必须通过国会。然而,盟军最高司令部否决了日本政府的预算程序,表明了他们认为这是突发事件的需要。同时也说明当时日本国内经济情况,为了征集警察后备队75000人,报名者竟达到382000人以上,比所需要的人数多出四倍以上,失业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从经济观点来看,更重要的是,美国军方需要各种大量补给物资的紧急定单涌向日本生产厂商,从镀锌铁皮和棉制帆布服到预制建筑构件和化学品。这些物品称为“特需采购”,用美元支付;随着朝鲜冲突的日益激烈,所需要的商品和劳务清单不久就扩大到广大的经济活动领域。事实上,日本汽车制造业后来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它从修理大量涌入的各种美国军车的定单中获得了巨大的早期发展力量。

一个邻国发生战争的悲剧给日本经济带来一种意外的收获。到1953年7月28日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定,即朝鲜半岛战争进行了三整年时止,特需采购总额已达9.7亿美元。日本这项特别美元收入一直延续到1955年,那时估计总额已达35.6亿美元。如果我们以1952财政年度作为一个例子,由特需采购而获得的美元收入约占日本国际收支中美元收入总额的62%。同时,日本的

非军事性出口产品在世界卖方市场上也取得满意成绩,这本身也是军备扩张趋势的结果。从而,日本的外汇储备额从1949年底的仅有2亿美元,增加到1951年底的9.42亿美元,即增加3.5倍。当然,在1949年后半期始的两年内,由于利润率(利润对股份资本的百分比)有了意外的增长,工业生产也迅即出现一片繁荣景象。例如,棉纺业利润率从26%增加到156%;人造纤维从32%增加到194%;钢铁工业从5.4%增加到30%等等。物价也在上升,特别是受到美军采购的“价格第二位”政策的刺激。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年内,批发物价指数提高了52%,消费物价指数提高了24%。<sup>④</sup>

正如泰德·柯恩评论的那样,“谁都说不出来,如果没有这场战争,日本经济会是怎样,但事实上,朝鲜战争减轻了道奇的通货紧缩政策的压力”<sup>④</sup>。虽然不能否认,使美国占领下的日本受到冲击的朝鲜战争在恢复战后日本经济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最重要的分水岭,然而,必须记住,正像前面所述,即使在朝鲜冲突爆发之前,根据约瑟夫·道奇的指令所实行的各种政策已触发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优选过程。朝鲜战争经济景气期间的典型发展事例是,日本钢铁工业在合理化的名义下决定实行一项大规模的扩建计划,它反映了日本经济界心理的激进变化。早在1950年10月,八幡钢铁公司和日本钢管公司都公布了一项三年的现代化计划;同年11月,川崎钢铁公司宣布建设一家联合钢厂计划,这是日本这类工厂的第一家。由通产省给予家长式支持的所谓“钢铁工业第一项合理化计划”准备从1951年到1955年期间,把每年在生产能力方面、尤其在滚轧机方面的新投资扩大十倍。至于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资金,则主要依靠私营银行的贷款,再由政府提供补充资金15%。川崎钢铁公司在千叶的发展计划看来如此野心勃勃,以致遭到日本银行总裁的讽刺:“我们要讲清楚,千叶的工厂只能由牧师募捐去集资。”该行总裁最后只

能食言。但这些正是发生在朝鲜战争经济景气时间以前意想不到的事件。

## 5. 和平条约

### 冷战心理效应

在战后年代不断发展的国际形势下,盟国之间取得对日和约一致意见的问题变得特别复杂起来。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对日交战的盟国,除美国之外,还有英联邦国家、苏联和中国。在它们之间,随着时代的进展,利益冲突也日益增多起来。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件,从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1948年)和柏林封锁(1948-1949年)到中国毛泽东的胜利(1949年)和苏联掌握原子武器(1949年)使冷战心理达到了高峰,这在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的心目中似乎证明了“遏制”战略和所谓“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正确性。这种形势加强了早期由美国陆军部长罗耶尔提出的美国政府把日本变成“亚洲工厂”的决心,目的显然是要使日本作为反对共产主义侵犯的堡垒。这一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美国政府决定促使早日签订宽厚的对日和约的思想,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是一项单独对日和约,其中的一项重要条款就是保证其安全防卫。

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实际上赞成迅速签署对日和约,“部分原因是延长占领期会使日本人把美国看成是帝国主义,而且和约还会产生经济效果”<sup>④</sup>。他并不特别关心安全问题,声称日本首先需要中立,应该变成“太平洋地区的瑞士”。而美国陆军部和海军部的意见却同麦克阿瑟截然相反,不仅反对迅速签署和约,而且甚至建议重新武装日本,如果要使它有利于抵制苏联可能发动侵略的话。国务院在政策研究小组领导人乔治·凯南的倡议下也对急于签署对日和约表示怀疑,担心在日本社会、政治和经济情况仍不稳定的形势下,签署和约之后,可能发生严重的政治力量两极

分化：一方面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是共产主义，使社会陷于分裂。而且，同英联邦国家达成协议也不容易，即使这些国家在冷战的对抗中站在美国一边。我清楚地回想起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在不久以后曾说过一段话：“当告诉澳大利亚人，作为对日本人的一种惩罚，澳大利亚军队将来要保卫日本，而日本人自己却对他们的生产和贸易满面笑容，鞠躬致谢，这对他们中的一大部分人将是很大的震惊。”<sup>43</sup>

现在所能收集到的各种文件都显示出在1949年10月13日最终形成一项成熟的对日和约草案之前，美国政府内部和同盟国之间都有过激烈的争议和谈判。这份草案所体现的主要精神是十足的冷战意识遏制政策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8年11月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和约草案当时是否已秘密地告知日本政府，我们不得而知；但1949年11月，日本首相吉田茂首次向国会表示，日本将接受一项和约；1950年1月24日，他在国会作了一次演讲，大意是宪法中的反战条款并不暗示日本已放弃了自卫权。1950年5月，吉田茂又表示他将愿意接受同西方单独议和，而摒弃苏联的参加。

### 杜勒斯先生在策划单独和约中所起的作用

在1950年4月6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任国务卿的外交政策顾问、开始其对日和约工作之前，美国政府已经为实施单独对日和约的坚定政策铺平了道路。<sup>44</sup>杜勒斯就此着手写他于1950年6月6日发表的第一个关于日本问题的备忘录，其中他强调了以下几点：<sup>45</sup>

第一，日本必须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并应在自由世界中繁荣兴旺，给亚洲其它地区作出榜样，从而为全面抵抗共产主义决心贡献力量。

第二，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它容易陷入共产主义的势力范围，西



方国家必须主动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第三,日本存在着一种受到间接侵略——即颠覆——的危险,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警察力量来应付这种意外事件。

第四,关于和约本身的内容,应列入逐渐减少军事占领的条款;占领期间的各项改革措施应予说明并保留;不规定战争赔偿或经济限制。

第五,和约之外,但也在签订和约的同时,应签订一项安全协定。

当时杜勒斯的想法是在1950年夏末或秋季,在夏威夷召开一次盟国预备会议,邀请远东委员会中的各国代表,再加上来自印度尼西亚、锡兰、南朝鲜和印度支那的代表与会。至于中国,则邀请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两方面的代表都参加。关于要求预备会议上所有与会代表都参与同日本订立的安全条款(上述第五点)的建议,显而易见是同日本与美国结盟的目的(上述第一点)不一致。但不管怎样,会议上关于和约的条款并不要求全体一致通过,杜勒斯似乎对美国政策能够获胜很有信心。

从而,早日实现和平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杜勒斯开始执行其建立必要的信息传递的使命。在1950年6月14日首先作访日、而后访朝鲜之行。在东京,他同麦克阿瑟将军讨论和约问题,同一些日本著名人士晤谈,并且匆忙地视察了分隔两个朝鲜的三八线。正巧在这以后爆发了朝鲜战争,杜勒斯就留在日本,直到6月29日才离去。约翰·根瑟在他的麦克阿瑟将军传记中<sup>⑧</sup>虽然写道:“南朝鲜人和在朝鲜的美国人,更不要说东京的盟军最高司令部,都为这一事件感到无比的吃惊。”但我们在日本却并不那么肯定地认为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未预先觉察到这场冲突。事实上,就在北朝鲜进行战斗的第二天,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海军少将罗斯科·H·希伦科特的一篇声明,其中说到,美国情报已注意到“朝鲜存在的情况可能意味着这个星期

或下个星期会发生一场入侵行动”<sup>47</sup>。我们不难相信他，因为动用四个师的规模，再辅助以三个保安旅和大约七十辆坦克从四个不同地点同时进行战斗，是很难躲开广泛分布在那个地区的美国情报网耳目的。

就在杜勒斯访问日本的时候，一个由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率领的代表团正巧也来到日本，其目的是研究对日和约的军事方面问题；他们同麦克阿瑟将军一起根据东亚地区新的事态发展，尽可能地反复研究了和约问题的各个重要方面。就杜勒斯来说，问题比较简单，因为他当时可以排除共产主义国家，而推行单独的对日和平计划。他深信战后年代对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共产主义运动——尽管发生的时间会有变化和可以临时性妥协——，据信它是以世界革命为目的的<sup>48</sup>，所以，在杜勒斯回到美国之后，他加快了和约谈判的步伐。然而，五角大楼却不是这样想，理由是，在继续占领状态下，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地位远远优于在任何可以想象的和平解决方案下的地位，而在当时情况下保持这种优势地位是必要的。这里有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需要在美国政府内部解决，因为承认日本人民对日本及其领海享有完全主权的建议，将与同一和约中把日本军事力量交给美国的条款有矛盾。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日本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动要求美国的军事援助，而由美国接受这一要求。根据这一基本处理方针，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就可以得到协调。杜勒斯就此继续执行他的单独和平计划，通过外交途径在双边基础上谈判和约条件，而避免采用召开全体会的办法，因为在全体会议上，很可能出现同苏联的直接对抗。对日和约草案尽管根据非共产主义盟国的建议作了某些修改，但还是在1951年9月4日召开旧金山会议以前全文拟制出来了。在那次会议上，由安德烈·葛罗米柯率领的苏联代表团，遇到了程序性否决的障碍，阻止了他们提出任何修改建议（即使在会议中曾有所讨论）。这样，美国排除

了苏联和共产党中国而单独签署对日和约的计划终于在 1951 年 9 月 8 日变成了现实,并随即签署了同对日和约相联系的美日安全条约。

这个安全条约连同单独对日和约,也许在当时冷战的情况下可以满足美国政府的意图。但当时,朝鲜战争危机已恶化到麦克阿瑟主张轰炸中国大陆以及后来他被杜鲁门总统撤职的地步。

接受安全条约(美日之间)被作为签署和平条约的一个条件,它后来成了日本大规模反抗的一个根源。首先,安全条约实质上并没有给仍被占领的日本以国家主权。特别是第一条实际上给予美国以部署其以日本为基地的部队并供应物资、以应付远东任何地方发生事端的权利,但对防卫日本却未作出具体的承诺,虽然允诺给日本政府提供援助以镇压国内大规模暴动和破坏活动。还有,条约的序言中有一项说明,即美国希望日本“不断增加其承担防卫自己、反对直接和间接侵略的责任”。这一点当然同日本宪法中关于放弃武装的条款(第 9 条)是矛盾的。此外,条约的期限是不确定的;当双方政府认为联合国或其它安全措施能保证日本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时,条约即告终止。另外,还谈判了行政协定,规定美军驻日的具体条件。由于这是一项行政协定,不必通过日本国会或美国参议院,因而在 1952 年 4 月 28 日这项协定同安全条约一起就自动开始生效。

### 日本人的反应

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目中,安全条约和相伴随的行政协定意味着在许多具体方面对日本主权的侵犯;随着 50 年代岁月的进展,这种不安情绪日益高涨,终于在 1960 年酝酿修改条约时形成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危机。<sup>④</sup>当时正值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计划突然被取消之际。那次访问原是作为对日本皇太子明仁为庆祝美日两国关系 100 周年访问美国的回访而组织的活动中的一个部分。

乔治·派卡德第三曾评论说：“艾森豪威尔取消访问日本是对日本统治阶层 15 年来使日本从属于美国的政策和加强美日联盟政策的一次重大打击。”<sup>50</sup>

安全条约可以在、事实上也已经在 1960 年得到了修改，取消原条约中引起日本反对的某些特性，并规定，不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在十年后都可以终止这项条约，只是必须在期满前一年通知对方。而另一方面，和平条约则不能修改，其自成一体的性质至今已基本上保持了四十年。<sup>51</sup>就日本的国际关系意义而言，这在当时被认为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单独的和平意味着日本投入了冷战一方的怀抱，必然也意味着至少要同另一方疏远起来，如果不是敌对的话。日本的基本民族利益当然是维持和平；但日本过于弱小，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起领头作用，即使根据放弃武装的宪法在道义上发挥领头作用也不可能。它所能做的，只能是丝毫不去促进冷战的加剧和延长。因此，在日本的大部分民众当中，出现了反对单独和平、要求全面和平的呼声。事实上，我们知道日本以外也有许多抱怨单独和约既没有苏联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的批评意见。<sup>52</sup>然而，每当杜勒斯有机会在日本发表公开声明时，他就唠唠叨叨反复地讲：“凡是鼓吹一个所谓‘全面和平’的人实际上就是鼓吹没有和平。”<sup>53</sup>所以，非常清楚，这位可恰当地被称为“日本和平建筑师”的人当时正在排除和日本实现全面和平的一切努力；而“没有和平”的前景自然对这个厌倦长期被占领状态的国家有一种说服力。

在日本进行的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它越出了本文研究的范围。但是，我可以提一下一个特别的、具有社会科学重要意义的争论点。那就是主张在冷战的形势下谋求全面和平的人所强调的论点，即像现在这种社会经济制度本身的不同，决不应成为一个制度反对另一个制度的理由。这个问题是和平研究小组（和平问题谈话会）所特别提出来的，该小组在为从日

本的观念讨论和平共处问题提供学术领导方面卓有成就。它是1948年由《世界》杂志的哲学编辑吉野源三郎发起,由来自各大学和社会运动各方面的60位著名代表<sup>59</sup>组织起来的,目的是共同讨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战争根源与和平基础问题的一篇声明(1948年7月13日发表)<sup>60</sup>。随着和平条约问题进入公开讨论阶段,该小组仍不断开会讨论,并两次发表有关和约问题的联合声明,第一次是在1950年1月,第二次是在朝鲜冲突开始后的1950年9月。他们采取的一贯立场是主张一个全面和平解决办法,反对在日本领土上存在外国军事基地,主张日本参加联合国并具有不可侵犯的中立性<sup>61</sup>。邓恩曾对这种主张提出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大大忽视了当前世界政治现实性的奇怪方案”<sup>62</sup>。但是该小组在1950年9月份发表的声明中对其主张所作的具体解释,现在读起来仍显示出它对世界政治的错综复杂现象(特别是因出现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使强权政治更加复杂的时代,而这种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毕竟反映了一个历史过程)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这方面,值得回忆一下194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给他在工商界的密友托马斯·W·雷蒙特所写的一封信。<sup>63</sup>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内容:

“在1933年秋天,当我向斯大林提出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时,李特维诺夫奉派而来。我们对一些问题,包括有权派出美国牧师、教士和犹太教教士去关心在俄国的美国人的精神需要问题,进行了四五天拖拖拉拉和筋疲力尽的唇枪舌战。

最后,在李特维诺夫进一步加以反对后,我举起双手对他说:‘这一切有什么用呢?反正你们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相隔之远就像南北两极一样。’

李特维诺夫的回答是值得永远载入史册的。他说:‘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总统先生,因为我就不这样想。在1920年,我们相隔之远就像你说的那样。那时,你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我们是处

在另一个极端——零。在这十三年里，可以说我们已经增加到20%的程度。你们美国人，特别是从去年3月以来，则降至80%。我真正相信，在今后二十年中，我们会进到40%，而你们会退到60%。我不相信两国友好关系会比那个比例更为接近。然则当国家之间有20%和80%的差距时，彼此很难协商，很难相互了解，但如果只存在40%和60%的差距时，两国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也许九年前李特维诺夫的想法如今正在变成现实。”

和平研究小组成员们当时的想法过于理想主义化，认为冷战对抗主要是一种短期事态，并且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趋同从历史上看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现在可以说，自这以后的四十年来，已经证明他们，还有李特维诺夫，都运用正确的长期观点，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方向。

不管怎样，对日和约虽然是一项单独和约，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日本重新获得了独立。那时，战后通货膨胀的趋势已大大受到了遏制，虽然随着朝鲜战争时期的景气而来的是物价的暂时性上涨，1950—1951年间批发物价指数增长了38.8%。而1951财政年度（1951年4月到1952年3月）的工业生产指数达到了131（1934—1936年为100），比一年前政府制定的目标超额完成40%。

## 注 释

- ① 在像赫伯特·费斯和珀西·约翰斯顿这些人（他们两人于1948年3月同W·H·小德雷珀一起来到日本考察占领当局的经济政策）的心目中，所担心的是在当时动荡的情况下，日本不大可能沿着资本主义路线恢复其经济。特别是约翰斯顿，在他同我本人和和田博雄（两人都即将从片山哲内阁中辞去职务）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们很担心如果盟国继续对日本实行强硬政策，日本或许不得不认为它将走上一条社会主义的重建道路。

- ② 声明的一部分宣称：“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监督之下，日本政府必须准备和执行尽可能早地使日本得以自给的计划。在这方面现已有所进展。准备和执行这项计划的主要责任当然在于日本政府和人民，但盟军最高司令部应采取必要措施，保证日本政府和人民能积极有效地履行其职责。”由于我们所不了解的原因，这一段话从当时日文新闻稿中删去了。
- ③ 罗伯特·A·费尔里：《占领日本第二阶段：1948—1950年》，麦克米伦公司，纽约，1950年，第65页。
- ④ 本报告的一部分发表于《新闻周刊》，1947年12月1日，第36—38页。
- ⑤ T·柯恩：《重建日本》，第367页，引自《福雷斯特尔日记》，纽约，瓦伊金出版社，1951年，第328—329页。
- ⑥ 乔治·凯南：《回忆录》，利特尔，布朗出版社，波士顿，1967年，第409页。
- ⑦ T·柯恩：《重建日本》，第371页，引自给众院和参院拨款委员会的声明。
- ⑧ 霍华德·舍恩伯格：“改革思想和日本人的反应”，在法政大学第8届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的一篇文章：“从世界史看盟国对日本的占领”，1983年11月30日。
- ⑨ 罗伯特·费尔里：《占领日本》，第69页。
- ⑩ 同上书，第70页。
- ⑪ 同上书，第75页。
- ⑫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战前日本的民主和党派运动——第一次努力的失败》，伯克莱，加州大学出版社，1953年，特别可参阅第396页。
- ⑬ 指数是由占领当局经济与科学处的研究计划组会同相关的日本政府部门编制的。我本人参与了此项工作。
- ⑭ 1948年1月底，政府已允诺支付这种“生活费补贴”，总额达34亿日元；在关于支付这笔补贴的收入来源问题上，日本政府内部在大藏省和经济安定本部之间发生分歧。前者提出从3月1日起，提高全国铁路客运费150%，从2月15日起提高电信费200%作为新的财政收入；而后者主要由我带头主张因通货膨胀而自动增加的租税收入，未列入原来预算，是足够支付这笔费用的。后大藏省获胜；而政府提交给国会的建议草案

为左翼社会党人铃木茂三郎任主席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所拒绝,从而迫使片山哲辞职。日本政府内部的分歧要比表面上看起来复杂得多;对那些喜欢了解具体内容的读者,我建议参看1948年我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寻求财政的民主化”,载于都留重人的《都留重人著作集》,讲谈社,东京,1976年,第7卷,第209—224页。也可参阅大藏省主要联络官渡边武所写的《盟国占领期间日本财政备忘录》,日本经济新闻社,东京,1966年,第87—99页。

- ⑮ 马丁·布朗芬布兰纳:“美国对日本的占领:经济上的回顾”,载于格兰特·K·古德曼:《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回顾》,劳伦斯,堪萨斯:东亚研究中心,堪萨斯大学,1968年,第17页。根据布朗芬布兰纳的看法,其它失败之处是解散财阀计划和工会政策。
- ⑯ 同上,第18页。詹姆斯·李·考夫曼在他于1947年9月从日本回来之后,对占领当局计划发表了一份带有指责性的报告,其中指出占领当局人员的过高薪金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参阅T·柯恩:《重建日本》,第367页)。只是到了1949年秋季,盟军最高司令部人员才失去在日本铁路、公共汽车、有轨电车上免费旅行的特权;随后,在当年冬季(1949—1950年),当日本不再被划为“艰苦作业区”时,他们也失去了10%的薪金差额。
- ⑰ 见江见康一:《日本政府财政工作与经济增长:1868—1960年》,东京,纪伊国屋书店,1963年。
- ⑱ 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制度化,一切来自国外的和预算方面的申请,必须通过由商业部、财政部、联邦储备委员会,还有国务院和军队代表组成的一个新的全国咨询委员会。
- ⑲ T·柯恩:《重建日本》,第419页。
- ⑳ 物价上涨率,从1948年头四个月每月平均7%,下降到中期四个月的5%,再降至最后四个月的3%。工业生产活动指数从1947年11月的55.6,上升到1948年11月的83.0。见T·柯恩,同上书,第522页。
- ㉑ 奥维尔·麦克戴尔密德曾参加道奇同大藏省的大多数磋商,他在多年后



说过：“在道奇代表团取得的成就中，我最称赞池田先生所起的作用。”（“占领日本的经济政策和改革”，麦克阿瑟纪念堂发起的一次研讨会文件，1978年4月13—15日，麦克阿瑟纪念堂，诺福克，弗吉尼亚，第68页。）

- ② T·柯恩：《重建日本》，第430页。
- ③ 可参阅渡边武：《盟国占领期间日本财政备忘录》，第209页。
- ④ 特别帐户收入由出售进口商品的日元收入构成，特别帐户支出由支付给出口商的日元构成。由于前者根据高价日元比率计算，后者根据廉价日元比率计算，就会产生这类差额。
- ⑤ F·M·塔玛格纳：“汇率的确定”，《政治经济学杂志》，1945年3月。
- ⑥ 同上文，第63页。
- ⑦ G·哈伯勒：“战后汇率的选择”，《美国经济评论》，1945年6月，第308—318页。
- ⑧ 塔玛格纳：“汇率的确定”，第69页。
- ⑨ 以战前平均数（1934—1936年）为100，1948年工业生产指数为58.5，农业生产指数为91.1，出口量指数为7，进口量指数为18，城市家庭消费指数为63.8，批发物价指数仍见猛涨，从1947年的48.2（1934—1936年为1）增加到1948年的127.9，再增到1949年的208.8。
- ⑩ 预算岁入与岁出的百分比是，1946—1947年为58%，1947—1948年为88%，1948—1949年为92%，1949—1950年由于实行了道奇急剧性措施，提高到108.7%，当年预算节余约有10亿美元。
- ⑪ 京都大学的汐见三郎、一桥大学的井藤半弥和我本人。
- ⑫ M·布朗芬布兰纳尔和小菊喜一郎用英文撰写的“肖普税制改革的后果”，对肖普税制改革作了最全面的评价，载1957年9月和1957年12月出版的《国家税制杂志》。1983年由日本税制研究协会用日文编写和发表的“肖普的建议和日本的税收制度”也作出了十分恰当和概括的论述。
- ⑬ 如果我们以1947—1948财政年度的数字为例，预算估计的所得税收入是

(1)193 亿日元来自税源课税组,以按平均每月薪金或工资 1600 日元计算;(2)492 亿日元来自自评组,以按农民每月平均收入 2000 日元,其它业主月平均收入 5000 日元计算。但是到 1947 年 12 月底,前者入库金额为 154 亿日元(占估计该组总收入的 5.4%);后者入库金额为 63 亿日元(占估计该组总收入的 1.2%)。这样,在为所承诺的支付“生活费补贴”34 亿日元开辟税入源问题上,出现了政治危机(前面④已提到这一点)。事实很清楚,大藏省在原来的预算数字中,故意低估自评组的收入,再加上自评组严重地不遵守法令和十分突出的计算上的不公平性,从而出现了上述情况。

④ 我在一篇“税法的公正性和税法应用的公正性”文章里曾具体讨论了这个问题,载《都留重人著作集》第七卷,225—234 页。

⑤ 复兴金融金库贷款额在全部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用 1948 年 3 月底按它在全部未用清偿贷款中的百分比表示:在煤炭工业中占 70.6%,在发电产业中占 87.4%,在造船业中占 65%,在全部工业中占 23.3%。(资料来源:《日本开发银行十年史》,1963 年)

⑥ 参阅 T·柯恩:《重建日本》,第 437 页。

⑦ 同上书,第 441 页。

⑧ 在 1949 年大选中,社会党从 1947 年获票 720 万张减少到 410 万张;共产党从 100 万张上升到 300 万张,农工党在 1947 年尚未成立,1949 年获得 60 万张。

⑨ 《日本时报》,1949 年 1 月 26 日。

⑩ 特别可参阅有泽广巳编纂的《昭和时代经济史》,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 年,第 326—329 页。另见金森久雄的《我在战后经济中的经历》,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85 年,第 55—61 页。

⑪ T·柯恩:《重建日本》,第 440 页。

⑫ 弗雷德里克·S·邓恩:《对日和谈与和平解决》,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 年,第 54 页。

⑬ 罗伯特·孟席斯:“从澳大利亚看太平洋问题的解决”,《外交季刊》,1952

年1月(第188—196页),第190页。

- ④ 在杜勒斯被任命为外交政策顾问时,看来并无明显的证据说明有授予他同日本谈判和约之权的意图。但是,1950年5月18日,他被授权处理和约问题。
- ⑤ 参阅F·S·邓恩:《对日和谈与和平解决》,第99—102页,有更详尽的阐述。
- ⑥ 约翰·根瑟:《麦克阿瑟之谜》,纽约,哈珀兄弟公司,1951年,第166页。
- ⑦ 《纽约时报》,1950年6月26日。
- ⑧ 参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战争还是和平》,纽约,麦克米伦,1953年,第5—16页。
- ⑨ 参阅乔治·R·派卡德第三:《东京的抗议:1960年安全条约的危机》,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6年。
- ⑩ 同上书,第313页。
- ⑪ 1978年8月,日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但这是一项纲领性的和约。至今,日本仍未同苏联签订和约。
- ⑫ 例如,1950年4月29日《新政治家和民族》杂志发表的“对日和约”一文,显然是在美国和英联邦外长讨论对日和约的会议之前不久写的。
- ⑬ 这是1951年4月23日他在日本联合国协会演讲时所说的话。
- ⑭ 虽然乔治·派卡德第三提到他们时说“几乎所有这些学者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派卡德第三:《东京的抗议》第27页),但并不能说这个小组的领导成员诸如安倍能成(学习院院长)、仁科芳雄(科学研究所所长)、高木八尺(东京大学教授)、和辻哲朗(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武田清子(日本女青年会干事)、桑原武夫(京都大学教授)以及其他一些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
- ⑮ 参阅哈德利·坎特利尔(主编):《引起战争的紧张局势》,厄巴纳,伊利诺大学出版社,1950年。
- ⑯ 他们在1950年1月发表的声明摘要,载于E·J·路易·范阿杜埃尔德男爵著:《日本:从投降和平》,纽约,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1954年,

第 149 页。更详细的英语版本载于《世界》的编辑部编：《世界和平的三项声明》，《世界》的单本附录，1950 年 4 月；更完整的文体（日文）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九章”，《世界》的单本附录，1962 年 9 月。

⑤7 邓恩：《对日和谈与和平解决》，第 93 页。

⑤9 日期是 1942 年 11 月 12 日。引自埃里奥特·罗斯福编：《罗斯福书信集》，乔治·G·哈拉普有限公司，伦敦，1949—1952 年，第 3 卷，第 444 页。

## 第三章 高增长率时期

从这一章起,我将作解释性的分析。首先我将用统计数字来证明日本在 1954 年后大约二十年里取得了不同寻常的高经济增长率。特别是与其它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尤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层自然重新获得了自信;并且随着《和平条约》于 1952 年 4 月生效后,原先军事占领时期所颁布的大部分限制性规定开始被撤销,前财阀集团又重新聚集起来,但经营上有了某些变化,例如奉行所谓的“经营齐全”原则。然而,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保持高增长率的有效需求来自何方这个问题仍有待解答。下面将提到的缝纫机出口事例表明,出口增长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私人投资也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促使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毫无疑问,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资本主义得到了振兴。

### 1. 快速增长的“奇迹”

J·M·凯恩斯说:“过去的经验表明,生活水平持续地提高要超过每年百分之一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接二连三的发明也许会使之提高得更多,但我们本身也不容易适应更快的增长率。在过去的几百年间,这个国家也许曾有过那么一个或两个十年,其生活水平的提高超过每年百分之一。但一般而言,生活水平每年持续提高率似乎都小于百分之一。”<sup>1</sup>

凯恩斯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中期说这番话的,那时他也

许在心理上受到了当时悲观主义的影响。但是,历史也表明,英国在1860年至1913年半个世纪的鼎盛时期中,人均实际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也仅仅达到0.9%。当时,很少有经济学家怀疑过凯恩斯言论的正确性。他的断言后来成为经济学界人士的常识。

因此,当西德的国民生产总值在50年代前半期创下年增长率9.3%的纪录时,报刊评论都普遍地毫不迟疑地把这一成就说成是“奇迹”。以后,西德的经济一直持续增长;速度虽有减缓,但1955年至1960年五年中年平均增长6.6%,1960年至1965年间年平均增长5.0%,1965年至1970年间为4.7%,1970年至1974年为3.0%,仍然大大超过凯恩斯提出的并被人们视之为“常识”的增长率。继西德之后不久,日本经济的腾飞使经济学界人士更加吃惊,其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在1954年至1958年这头五年中,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0%,接着在1959年至1963年间年平均增长率为10.8%,1964年至1968年间为10.9%,1969年至1973年间为9.6%,只是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才遏制了日本经济持续增长的势头。日本的情况比之西德更是一大奇迹;这就需要作出解释,因为在所有的人类社会现象中,经济现象也许是最难用奇迹来阐释的。

肯尼思·布尔丁提出了“激发创造力的失败”这一说法,他说:“失败常常会激发出创造性的反应来;日本就是战败引发了不可思议的创造性反应的一个典范。”<sup>②</sup>大家记得,熊彼特过去常常把1924年和1925年日本的经济繁荣归因于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使听他“商业周期”课的学生们大惑不解。当然,日本在上次战争中的战败使其经济遭受到的破坏程度要大得多,几乎在每一个领域都必须重建。然而,只要人民充满信心,经济重建不仅能激发积极性,而且必然还会涌现出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来。如果熊彼特还活着,他可能会预言日本在战败后,其经济会出现某种持续的高增长率。但是,是否存在着布尔丁所说的“创造力”呢?这也许更像

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而已。

首先,对日本的经济增长成就就可以作出一种先验论的解释,即根据一个国家自身固有的保持某种长期趋势的能力这一假设,说明日本只是在经历了战争年代因大量消耗和孤立所造成的背离原来的趋势后,恢复了固有的趋势。倘使我们能够假定日本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长期增长率大致相当于她从明治初期,或者说 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整个发展过程中所能取得的增长率,即年增长 3.5—4% 的话,那末,截止 1970 年前后这段时期内,这种解释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假设以 1934 年至 1936 年的平均数为 100 作起点来画这条年增长率为 4% 的趋势线,那么 1960 年的假设指数将为 267,1965 年为 324,而这两年实际达到的数字分别是 162 和 248。到 1970 年,假设指数是 395,而实际数字已略高于它,达到 407,这表明 1970 年前的增长率多少处于假设的长期趋势线界限以内。然而,如果我们比较几年后 1973 年的数字,就可以发现差距在扩大,趋势线上的数字为 444,而实际数字达到 499。显然,我们需要有比这一趋势线假设更为真实的解释。当然,这里所假定的 4% 年增长率(意味着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为 3%),按照以前引用的凯恩斯的断言,或许已经是过高了。

### 统计分析

解释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第一步可对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构成因素作一个统计分析。我们可以用分式表示经济增长机制中相关各项的关系,设法评价哪一项或哪几项是战后日本高增长率的特别重要的原因。

从定义上看,实际国民生产总值(G)的增长率是劳动力(或总工作时)变动率(x)加劳动生产率(或每工时生产率)变动率(y)之和,或者说是总储蓄率( $\alpha$ )与边际资本系数( $\beta$ )之比,这样:<sup>③</sup>

$$G = x + y = \alpha / \beta$$

从  $G = x + y$  的关系看,我们首先可以指出,在战后初期,日本的劳动力供应条件特别有弹性,这一点在第一章中曾经提到过。在战败后的最初几年中,日本有报酬的总就业人数虽然只略高于 3 千万,但非军工部门的劳动力供给一下子增加了一千多万,包括 710 万退伍军人,260 万主要从亚洲各国返回的人员以及 160 万从军工产业退出后被征集的工人。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强壮男子。当他们回到平民生活时,不能马上得到就业机会,因此许多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农村地区,构成了一大批隐性失业者。这是一座看起来几年都不会干涸的劳动力蓄水库,从而造成的供大于求的状况削弱了劳动力讨价还价的地位,使战后初期几年中的工资率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所允许的水平。这种情况使劳动力供给曲线出现反常弹性,结果是提高了劳动力参加率(特别是妇女和老年人)。例如,50 年代前半期劳动力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在 3.5% 的水平上——一个不寻常的高比率。可以说,在增长方程式中  $x$  项的高水平,不需要靠额外提高工资率就足以吸引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

对于  $y$  项,即劳动生产率变动率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所谓“赶上去”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当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而遭到孤立时,世界上(特别是在美国的带动下)开始了一场“科学工业革命”,<sup>④</sup>这场革命作为进行战争努力的重要一环,把电子、航空、自动化领域的发明如原子能利用以及新合成材料的开发结合在一起。这样,当战争结束时,日本虽然在工业领域应用最新技术方面大大落后于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但通过引进已开发出来的新发明和技术诀窍,就能够迅速赶上其它发达国家。40 年代末,日本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劳动力的总体技术水平都得到了充分提高,因而她可以不太困难地吸收技术进步的成果,甚至改进这些技术,就像电子器件和照相机那样。尤其在制造业,日本和其它发达国家相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表 3.1 所示的每五年平均数字)一直保持非



常高的水平。累计比较更为注目,如以 1950 年的水平为 100, 1973 年日本的指数则高达 1412,而美国和英国各是 210,西德是 411,即日本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美国或英国要快六倍左右。

表 3.1 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国际比较

(单位: %)

年 份	日 本	美 国	英 国	西 德
1950—1955	17.5	2.8	2.5	9.3
1955—1960	6.2	2.7	2.4	6.6
1960—1965	8.9	4.6	3.1	5.0
1965—1970	17.8	1.3	3.5	4.7
1970—1973	10.4	4.7	6.1	3.0*

注: \*1970 年至 1974 年平均数。

资料来源: 日本银行《经济和金融比较统计: 日本和其它主要国家》

如从增长率的另一个公式看,即  $G = \alpha / \beta$  (增长率为储蓄率和资本系数之比),我们可以说,由于众所周知资本系数在发达国家之间不会相差很大,因而除非储蓄率高,否则不可能保持非常高的增长率的。而且,国际比较确实表明,日本的国内储蓄总值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在我们述及的年份中明显高于其它工业国(见表 3.2)。当然,问题是日本如何创下如此高的储蓄率记录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趣而复杂的问题,有必要作详细的分析,本文因篇幅所限,不能在这里详细讨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传统上,日本家庭的储蓄倾向一直高于其它国家,并且这种储蓄通过各种银行机构,包括邮局,被工业部门所吸收。这一现象需要解释,同时要回答日本人是否会把这一特点继续保持下去。过去,曾有过许多解释,例如:(1)在日本,特别在战后,普遍地在 6 月和 12 月份各发

放相当于三个月(或以上)工资的“奖金”,这必然导致消费滞后,形成高储蓄倾向;(2)社会保险制度,特别对老年人,不够完善,必然使出于预防动机的个人储蓄率大大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3)在日本仍然盛行的一种严格的年资制度,促成年长雇员的高储蓄倾向;他们的消费需要实际上小于那些有孩子还在上学或准备结婚的雇员;(4)与其它一些国家相比,日本家庭中个体业主人数大得多,他们不仅以家庭的名份,而且还以企业的名份进行储蓄。

表 3.2 国内储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国际比较

	1964—1968 年平均数(%)	1969—1973 年平均数(%)
日 本	36.2	39.5
美 国	15.7	14.8
英 国	18.8	19.2
西 德	26.7	27.4
法 国	25.7	27.0

资料来源:《日本经济白皮书》,1975年(日文版),第119页。日本的数字按照每年4月1日起的财政年度计算。

### 需要解答的问题

当然,解释经济增长原因有许多方法,上述对增长方程式中的各项作统计分析只是其中的一种。更重要的也许还是这些问题,如:(1)保证高增长率的有效需求主要来自哪里?(2)政府对刺激经济增长起了什么作用?(3)工业结构是否发生过重大变化?如果有变化,是什么原因促成的?(4)前财阀体制的命运以及随后的企业组织发展情况如何?(5)1949年4月确定的单一汇率对这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什么影响?等等。现在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以对战后日本高速增长的“奇迹”作出一个更全面的解释。

## 2. 资本主义获得振兴

我相信大家都会同意,即在朝鲜战争背景下于1952年签订的单独《和平条约》使日本重新获得了独立,这不仅对战后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而且对它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标志着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特别是日本资本主义统治阶层重新有了自信。正如在前面一章(第四节)中所提到的,朝鲜战争引起的特别采购使对各种产品的需求激增,这对当时受道奇通货紧缩政策影响、正处于滞胀下的日本经济来说不啻为天赐良机;许多企业领导人后来公开评论说,朝鲜战争是一股“神风”,吹走了他们的沮丧,带来了充满希望的乐观。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盟军占领时期所进行的许多改革被放弃后日本国内急剧变化的形势。随着军事占领的结束,日本统治阶层很快忘记了1945年12月7日发表的鲍莱战争赔偿调查团的声明中头一段话,即“四年前的今天,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袭击。日本永远不会忘记其后果”。不仅他们,而且大多数日本人显然都感到,随着盟国军事法庭在1948年结束对战犯的审判后,对整个日本民族来说,战争责任问题多少有些被掩饰了。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军事占领当局对岸信介(以后曾任首相)战犯身份的撤消和日本政府为因参与战争期间的活动而不适合在政府部门任职的一万多人恢复了名誉。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52年4月28日《和平条约》生效之前。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重新获得独立后不久提议制定“防止颠覆活动法”,显然是针对群众骚乱活动的;以保守派为主体的国会于1952年7月通过了这一法令,似乎是与美国麦卡锡调查遥相呼应。

## 财阀集团重新组合

按照日本企业领导人的观点,赔偿问题和分散大工业企业的命令是军事占领以来的两大头痛问题。虽然《和平条约》的条款使第一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决(第一章中已作讨论),可第二个问题依然存在。然而,甚至在日本重新获得独立前,又刮起了一股新风,即“从前和前财阀有联系的公司虽然面临种种限制,又逐渐成功地成为主要工业部门的领头羊。1952年4月《和平条约》生效后,那些限制或被取消或被放宽,并且随着不许使用前公司名称、商标等有关禁令的撤消,以前的名称又纷纷恢复<sup>⑤</sup>。”例如,不久以后对反垄断法作了修改<sup>⑥</sup>,允许工业公司持有竞争性公司的股份,把金融机构持有股份的最高限额从5%提高到10%,使互兼董事职位制度合法化,扩大准许设立的卡特尔的经营范围。这一修改很快就被利用,各种形式的卡特尔开始涌现。但是,《和平条约》以后促使迅猛发展的最重要的举措是,许多公司按照前财阀的体系进行了合并和重新组合。典型的事例有三井物产,原来从老三井物产分出来的公司又重新集结在一起。图3.1“三井物产的重新合并”勾划出始于1949年2月、并于1956年4月达到顶峰的这一发展过程。

在战前日本,主要财阀集团的另一巨头是三菱;三菱公司在重新合并过程中走了一条比较平坦的道路,并于1954年7月1日重新组建了古老的三菱商事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三菱通过重新合并使资本增加了四倍,并且有目的地把二千万新股派给三菱集团成员公司。结果三菱集团成员公司手中持有的三菱商事公司股份上升到31.1%,而重新组建前,只有10.4%。<sup>⑦</sup>同时,新组建的三菱商事公司在三菱集团成员公司,如三菱银行、三菱海运公司、新三菱重工业公司、三菱化学公司、三菱电机公司等企业持有的股份也开始占重要份额。通过这种方式,前三菱财阀各公司中交叉拥有

所有权的程度迅速接近战前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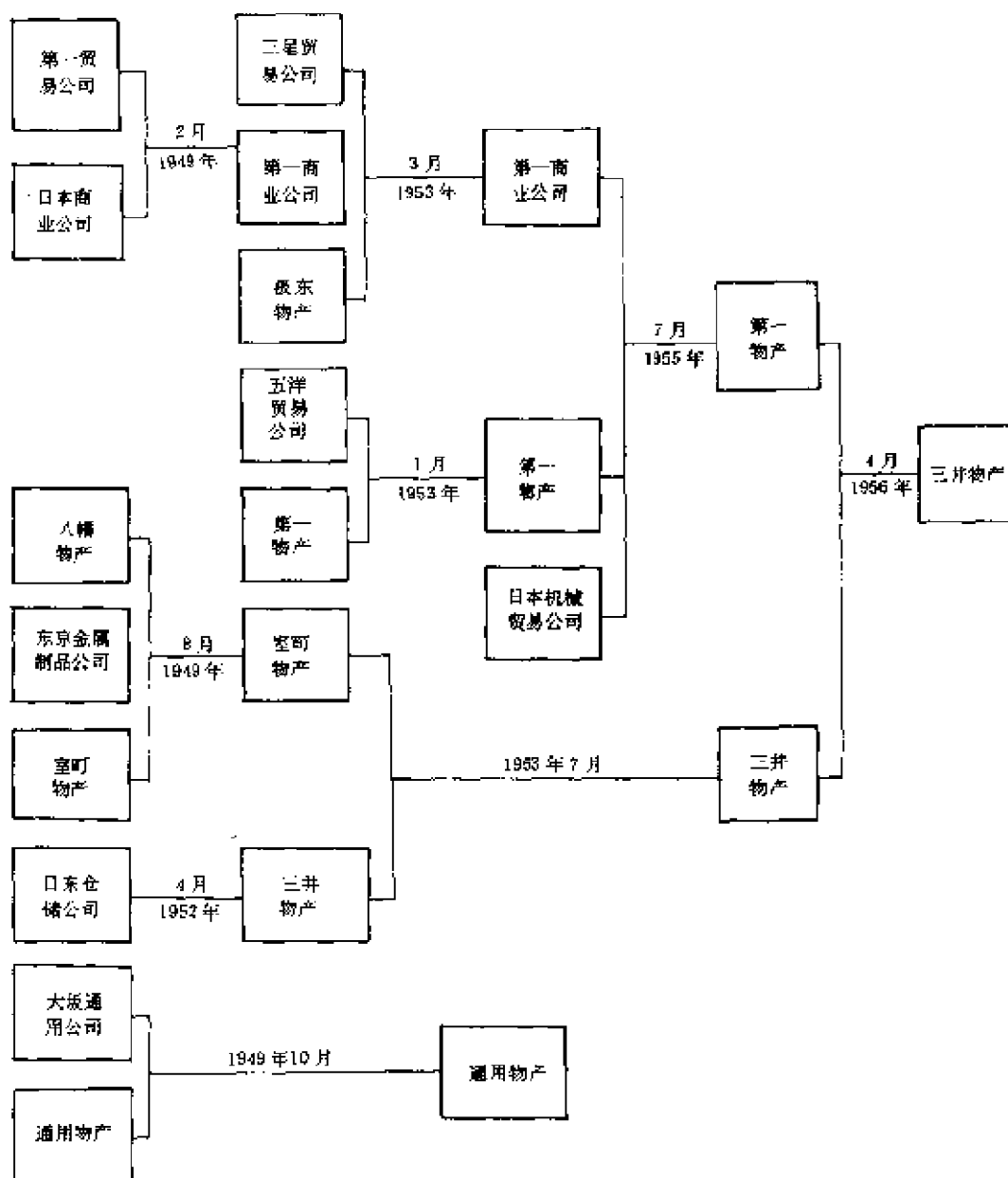


图 3.1 三井物产重新合并过程

这些例子非常典型地表明了日本重新获得独立之后，前财阀公司重新开始迅速组合的方式。在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面曾经引用的麦克阿瑟将军于 1948 年所作的新年祝辞中的一段话：

“这个世界可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有如此畸形的经济制度。这一经济制度允许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对大多数人进行剥削。这少数人和政府完全结合为一体,对政府政策滥施影响,使事态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战争和毁灭。”在日本,人们称 1950 年至 1953 年间的复旧趋势为“倒退之路”;但这一提法太空了,至少对这样的财阀复兴而言,这一提法毫无生气。因为再从银行业看,恢复了有悠久历史的财阀名称的每一家银行都利用制造业公司对外部金融资本异乎寻常的高依赖度,开始占据比战前更重要的中心地位。对金融资本的依赖性的一个显著例子是,日本一些主要制造企业的成本构成中,财务费用(主要是支付利息)占了极高的比重。1965 年,以劳动力成本为 100,日产汽车公司的财务费用则高达 90.2,松下电器公司的财务费用为 50.5,而同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和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相应数字分别为 0.3、1.4 和 0.4。<sup>⑧</sup>

战前和战后工业资金来源的不同状况充分表明了在经济重建阶段初期的融资过程中,当外筹资金为投资所必需时,大银行,尤其和前财阀有关系的大银行,开始取得了关键地位。战前时期(1934 年至 1936 年的平均数)，“自有资本”(利润留存加上认缴新股本,不包括折旧费)占资金来源的主要部分达 86%，“外部资本”(银行贷款、公司债券和政府资金)占 14%。及至有代表性的战后初期年份(1951 年财政年度)中,资金来源发生了变化,对“银行贷款”的依赖程度增加了,达到 62.8%,而“自有资本”来源萎缩到 25.9%。同时,“政府资金”从 0.9%上升到 7.8%。<sup>⑨</sup>从而,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商业银行成为制造企业中长期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它们不仅从我们前面提到的家庭储蓄方面,而且还越来越多地从中央银行信贷中吸纳资金。此外,银行还积极地成为公司股票的持有者,其程度要比其它发达国家更为突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公司因对外部资本的依赖程度很高,也获得了更高的利

润率,因为所付利息虽是增加值的一部分,但可在付公司税时作为一项成本被扣除。

特别由于大银行都是前财阀的银行,它们很自然地与各自财阀体系“家族”中的前成员企业联合在一起,尤其是在1952年《和平条约》生效以及前财阀系统进行合并和重新组合起来以后。不容置疑,通过这种方式形成的、以一家银行为核心、许多企业密切联合在一起的各财阀企业集团,在今天的日本经济活动中已经起到不比战前为弱的领头作用。从组织形式看,虽然不像战前那样有哪一家控股公司统治一个集团,但是,例如,三井集团主要公司的总经理们以“星期四会”<sup>⑩</sup>的名义经常碰头,可认为是为了交流信息之用。其它集团如三菱和住友也有类似的聚会活动。<sup>⑪</sup>因此,自战前以来,三大财阀集团在全日本公司实收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总的来说都在不断上升(见表3.3)。

表 3.3 1937年至1970年财阀集团在全国公司实收资本总额中的比重  
(单位:%)

	三井集团	三菱集团	住友集团	总计
1937年	3.5	3.3	2.2	9.9
1941年	4.4	4.3	2.1	10.8
1955年	3.1	4.1	2.7	9.9
1960年	2.9	4.5	3.6	11.0
1965年	4.0	6.0	4.6	14.6
1970年	3.3	6.6	4.5	14.4

注:根据宫崎义一《战后日本企业集团》(1976年,日本经济新闻社)中的一张详细表式综合而成,第260—261页。

## “经营齐全”原则

三井、三菱和住友是自战前以来著名的三大主要财阀集团。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说战前它们的经营专业化确实很强的话,但各自往往专注于某些工业领域,而不太乐意涉足新项目的投资;<sup>⑬</sup>战后时期,它们的典型行为模式是一旦新技术有利可图,就互相竞争,挤入新的领域。例如三井于1955年建立了一家大型石化工厂(三井石油化学工业)后,三菱马上紧随其后在1956年创办了自己的石化企业(三菱油化)等等。换句话说,每一个大财阀集团的经营行为看上去好像是应邀把一应俱全的业务都置于自己的卵翼之下,如果必要的话,就把兴旺发达的独立公司吸并过来<sup>⑭</sup>。这种“经营齐全”原则不仅被大财阀集团所遵循,而且也被产品种类众多的独立大公司所信奉,如日立公司在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已经占据世界市场主导地位时,与富士通和日本电气公司(NEC)竞相跻身计算机工业。

这种“经营齐全”原则为什么会在日本,特别是在战后时期盛行呢?一方面,在军事占领期间强制推行分散大工业企业指令的形势下,几乎任何产业部门都比平时更容易打进去。同时,想进入这些需要有最新工业技术的领域,必须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在比平时长得多的投资酝酿期内垫付足够多的资本的能力,这种能力只有和财阀集团有联系的大公司,或者独立大公司才具备。而且,从大财阀集团的观点看,在扩大经济活动领域方面还有着一大好处,因为有可能使外部经济内在化。这种根据“经营齐全”原则进行的竞争性投资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相对于对产品的可能需求而言)投资过度这样一个结果。在以后的一章中将详细讨论这种过度投资是如何被避免的,并回顾这种竞争性投资以后又如何显得合乎需要这两个问题。这里,重要的是要论证日本资本主义随着其组织结构在经济迅速扩张的背景下的不断巩固,又重



新焕发了活力。<sup>14</sup>

### 3. 有效需求来自何方？

#### 来自出口增长还是国内资源开发？

战前日本资本主义社会早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就出现的“复利式”增长的独特机制主要在两个方面创造有效需求：即(1)依靠比较廉价的劳动力，特别是来自长期不景气的农村地区的妇女劳动力，发展出口；(2)在发动“连续获胜的战争”的同时不断促进军事工业的发展。换句话说，相对于整个经济规模而言，国内的生活资料市场显得狭小。可以说战争的失败彻底改变了这一机制。但是，国内市场狭小仍然是日本战后初期的特点，劳动力供应过剩，导致工资水平下降，失业人口庞大。当然，根据新宪法不可能发展军火工业，因为新宪法宣布“永远不再保持陆、海、空三军武装力量和其它战争潜力”。以后，从 1950 年起，虽然朝鲜战争的“特别采购”使准军事需求增加，但在军事占领初期几年中，很显然如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主要依靠出口需求。这就在当时日本经济学家中间引起了一个广泛议论的实际问题，即优先实行发展外贸的政策，还是集中力量开发国内人力和物力资源。

正当我们日本方面对此争论不休时，约瑟夫·道奇于 1949 年作出决定，确定了 360 日元换一美元的单一汇率，这一汇率立即给日本的出口命运带来了深远影响。我们曾经提到战后日本最早出口产品之一的缝纫机事例；一台缝纫机在国外能售 40 美元，由于国内生产成本是每台二万四千日元，这意味着在 1949 年的道奇决定前，该产品的美元对日元汇率是 1：600。但缝纫机的生产成本在大幅度下降，到 1960 年，即使一美元兑 360 日元，它的离岸货价仍可以降到每台 12 美元。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曾用过一位病愈后的高尔夫球手重新达到他病前技术水平的比喻，这用在缝纫机

事例上最能说明问题；同时证明我们日本方面一些人认为道奇决定错误地低估了日元的价值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众所周知，直到1971年，日元对美元的汇率才重新作了调整，日元升值为308日元兑换一美元。在此期间，大大压低了了的日元汇率肯定对促进日本出口增长帮了大忙。

### 缝纫机出口事例

由此看来，详细阐述缝纫机出口发展的事例可以给人一些启发，因为这一事例同时也揭示了战后日本经济其它方面的情况。

战前日本的国内缝纫机市场被进口的美国胜家缝纫机所占领，只有在主要用于军事需要的工业用缝纫机市场上，本国的厂家如三菱公司和兄弟公司才得以生存。战争结束产生了一系列特定情况，从而在一些人看来，有利于首先发展国内缝纫机工业以替代进口，随后几乎同时使这个部门发展成为一个出口工业。当时，愿意低薪就业的失业技工人数众多，小规模的家庭工场特别在大阪地区大量闲置，原为战争服务的大约60万台机床必须转为民用，最重要的是，战后初期几年中，美国市场的需求很大，以致美国的生产厂家（主要是胜家公司）也无法全部予以满足。这些情况几乎很自然地促进了这样一种工业组织的形式，即零部件由小工场分别生产，然后在一家独立企业中进行装配。这种外部化或者说社会化分工生产一种产品的形式是不利于实施严格的产品标准化的，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家长式的指导对此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另一方面，这种外部化分工的好处也是肯定的。理由之一是规模经济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并且，这样做可以在行业中分散风险，而在美国，这种风险总是伴随着发生某些不可预料的情况而存在。因此，到1949年底，日本出现了相当多的缝纫机生产厂家，每月产量达3万台左右，其中约三分之一出口国外。当时这些联合型厂家所占生产份额为25%。然而，两年后，即1951年底，它们的份额降为5.4%，而全行

业每月产量增加到 13 万 5 千台,其中 8 万台供出口。在那几年中,成本降低得非常快;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 1951 年推出对进口先进机床给予补贴的计划。这些机床进口价格中高达 50% 的部分由政府支付,而且,在国内仿制这类机床的初期阶段,政府也给予占制造成本一半的补贴。这项补贴计划的目的是推动整个机床工业的发展。而由于这期间,使用机床的其它工业部门发展不很快(如国内电器业)或者刚处于起步阶段(如汽车业),缝纫机工业就成了政府补贴的主要受益者。

正当日本的缝纫机工业因此而迅速发展时,随即在两个方面自然地出现了激烈竞争:一是在日本本土与胜家的竞争,胜家从 1953 年左右起一直想建立一家合资公司;二是稍后在欧洲的竞争,在那里抵制日本进口缝纫机的宣传不断加强。在这两个方面竞争中,政府对这一工业的支持是给予家长式的帮助。胜家的策略则是,一方面对日本制造商使用容易混淆的类似胜家(Singer)的商标(如 Seager)以及对认定犯有剽窃胜家专利的行为(例如夹线调节器)提出诉讼;另一方面,想和一家叫“派恩机器”的日本公司(日本制铁公司的子公司,其前身是一家军工厂)建立一家合资企业。此外,它还对据称同样一台缝纫机国内市场价为 2 万 5 千日元,而出口仅售 1 万日元的倾销做法提出指责。胜家作为一家缝纫机制造商为打入日本市场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派恩”公司的合资项目在 1958 年终于得到日本政府的批准,但条件是对在日本生产的缝纫机数量要有限制。那时,国内制造商已具备足够的实力去和胜家—派恩公司进行竞争。

事实上,到 50 年代末,日本的缝纫机已成功地打进欧洲市场。当然欧洲缝纫机市场的主要供货商除了胜家公司(控制了法国市场)以外,还有西德的制造商,如“帕福”公司和“安卡·凤凰”公司。面对日本缝纫机侵入欧洲市场的形势,欧洲共同市场成员国的最初反应是打算推出针对日本出口缝纫机征收“混合税”的计划,即同时征收

从量税和从价税。日本的瓷器制品早已被征收了这种“混合税”。当时它们的设想是这种特别关税部分应相当于日本缝纫机的进口报价和市场起点价 40 美元之间的差价(这一差价那时约在 10 至 12 美元之间)。事后看来,当时日本出口商要使共同市场国家放弃这种“混合税”想法,并在欧洲市场获得立足之地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经过 1961 年至 1964 年的几年努力,他们成功了;在这当中,日本政府部门和官员,特别是日本贸易振兴会,再次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典型的家长式关心的作用。要冲破的阻力主要在西德,日本采取的策略主要有:(1)在《法兰克福总汇报》那样的报纸上刊登广告;(2)争取喜欢廉价商品的消费者协会和商人的支持;(3)向西德机床制造商呼吁,对他们来说,日本是一个大买家,产品互换的观点会对他们产生作用;(4)在政治谈判中,利用艾哈德的自由贸易政策为日本服务;(5)邀请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和德国缝纫机制造商访问日本。在这期间,其它一些因素也帮了日本大忙。例如,1961 年 8 月柏林墙的关闭引起一大批人涌入西柏林。对他们来说,能够得到的最好工作就是承接转包的缝纫业的活,因而便宜的日本缝纫机很受他们的欢迎。此外,日本“兄弟”缝纫机公司已在爱尔兰设立了一家装配厂,而爱尔兰和西德有非常好的外交关系,如果拟议中的“混合税”计划按照“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非歧视性原则执行的话,爱尔兰向西德出口缝纫机将受到致命打击。

凑巧的是,据说曾被戴高乐总统描绘成“半导体收音机推销员”的池田首相 1962 年访问了欧洲,为缓和德国缝纫机制造商协会的反铺设平了道路。因为协会的理事长当时碰巧是施瓦布博士,“安卡·凤凰”公司负责缝纫机部门的经理,他的公司对经销日本半导体收音机极有兴趣。当时,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是非要让成品挤进德国市场不可,而是想把零部件售给德国厂商。当德国工业界的一些代表受日本贸易振兴会的邀请访问日本时,他们被带着参观了好几家零部件厂。据报道,在他们亲眼看到有“胜家”

标志的零部件正在日本生产时感到十分吃惊。这件事证明日方原来的看法是对的,因为“胜家”已经成为德国制造商的主要竞争对手。这样,日本缝纫机工业终于成功地在欧洲市场中最难打进的西德市场获得了一席之地;以后的道路平坦多了。战后时期,日本政府官员在帮助和支持缝纫机工业成为第一个成功的日本出口部门这一过程的每一阶段中,所表现出来的最细致的关心和耐心,确实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sup>15</sup>

### 其它出口项目

继缝纫机工业之后,照相机工业和钟表制造工业先后崛起,它们随着出口的不断增长,得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因而也迅速发展起来。表 3.4 用金额列出了这两个工业部门发展过程,同时表明随着这两个工业部门的发展,出口份额所占据的十分重要的地位。1953 年前后日本实际上没有照相机出口;在那一年,政府设立了照相机出口检验所,目的是维护产品质量,使日本照相机在国外的形象一开始就不会受到损害。随后,在树立日本照相机形象方面取得了迅速的进展。不久,日本就成为世界照相机市场上最大的出口国,这在表 3.5 所列的三个照相机主要出口国出口量中可以看得到。

表 3.4 钟表和照相机生产、出口和进口额(若干年份) (单位:百万日元)

	钟 表			照相机及零部件		
	1955 年	1965 年	1975 年	1955 年	1965 年	1975 年
生产(A)	8039	58161	227179	10649	66259	242127
出口(B)	453	8633	106575	1680	31236	155275
进口	567	2416	31967	28	331	10768
(B)与(A)之比(%)	5.6	14.8	46.9	15.8	47.1	64.1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1976年6月15日,第80页。

表 3.5 1965 年和 1974 年西德、美国和日本照相机出口量

	西 德	美 国	日 本
1965 年	2255000	907000	1611000
1974 年	3059000	1978000	4846000

资料来源:《经济学家》1976 年 6 月 15 日,第 80—81 页,《贸易和工业白皮书》(各论),1975 年日文版,第 145 页。

像缝纫机、照相机和钟表工业这些出口部门的成功史是引人注目的,它们无疑反映了日本战后发展时期特有的活力。但是,这三个工业部门在一般年份毕竟一共只占出口总额的不到 2%,很难说它们在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出口发展中起了主要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看看近年来成为主要出口项目的产品,例如钢铁制品、机动车辆和船舶,从而了解它们的生产和出口增长情况以及这些增长是怎样实现的。如果我们作一番探索,可以发现缝纫机工业成功史的根本因素——即家长式的政府指导如何使它在国内竞争和政府对其出口的支持之间保持恰如其分的平衡,从而在其发展过程中,既提高了质量,又通过革新和发挥规模经济效益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在一些主要工业部门中也基本上同样体现出来。表 3.6、3.7 和 3.8 概括了这三种主要产品的增长过程,同时表明在每一种产品的总产量中,出口份额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表 3.6 钢制品生产、出口和进口量(若干年份) (单位:千公吨)

	生产(A)	出口(B)	进口	(B)与(A)之比(%)
1950 年	3754.3	399.0	1.5	10.6
1960 年	17855.0	2044.3	176.4	11.4
1970 年	77570.2	16123.3	32.1	20.8
1974 年	101970.7	30765.1	81.4	30.2

资料来源:篠原三代平,《论工业结构》,筑摩书房,1976年,第286页。

表 3.7 乘用车生产、出口和进口量(若干年份) (单位:辆)

	生产(A)	出口(B)	进口	(B)与(A)之比(%)
1957年	47121	410	6179	0.9
1960年	165094	7013	3450	4.2
1967年	1375755	223491	14350	16.2
1974年	3931842	1727396	42218	43.9

资料来源:藤原三代平,《论工业结构》,第287页。

1955年和1975年间,日本的出口按美元计算增长了27.7倍,而表3.9中所列的这些主要产品的出口份额增长幅度超过相应的比例。

表 3.8 铁壳船生产、出口量(若干年份) (单位:千吨)

	生产(A)	出口(B)	(B)与(A)之比(%)
1955年	735	384	52.2
1960年	1759	934	53.1
1970年	9917	7606	76.7
1974年	17541	15596	88.9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1975年经济统计年鉴》,1976年出版,第208页和236页。

表 3.9 1950年至1975年间主要产品占出口总额的份额

	钢铁制品(%)	机动车辆(%)	船舶(%)	总计(%)
1950年	8.7	0.0	3.2	11.9
1955年	12.7	0.3	3.9	16.9
1960年	9.6	1.9	7.1	18.6
1970年	14.7	6.9	7.3	28.9
1975年	18.3	11.1	10.8	40.2

资料来源:按日本银行《1975年经济统计年鉴》(第205—208页)数字计算得出。

毫无疑问,日本从 50 年代初开始的整个世界贸易异常迅速增长中获益匪浅,并且由于 1949 年在其经济恢复时期所确定的日元低汇率,更使它得以发挥这一有利条件。因此,它的增长弹性几乎达到 2.0,或者说它的年出口增长率达到世界贸易总增长率的两倍。60 年代后半期,随着早些时候许多研究成果的投入应用和规模经济的发挥作用,日本工业部门在世界舞台上的蓬勃发展尤其令世人注目,在许多工业领域中,按生产率和市场份额计算,日本开始走在前列。在 1965 年到 1971 年期间非共产党国家间贸易量的增长中,日本钢铁制品的出口增长占 54%,机动车辆出口增长占 46%,民用电子产品和设备、铁壳船以及通用机器的出口增长分别占 90%、54%和 38%。<sup>⑧</sup>

#### 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吗?

在这一章中,我们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在高速增长时期,即大约在 1952 年至 1973 年期间,有效需求来自何方?上面,我们已经费了一些笔墨,详细描绘了出口发展中取得的出色成就。在此,可以回顾一下尼古拉·卡尔多在 1971 年著作<sup>⑨</sup>中提到过的一段话,大意是从英国政策需要上考虑一个国家可以通过补贴出口和(或)低估货币汇率刺激出口来提高经济增长率。上述分析表明,日本确实“享有”一段低估货币汇率时期;而且还可以补充一点(虽然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讨论),在一些出口工业部门,采取双重价格制的做法,实际上等于对出口实行补贴。<sup>⑩</sup>显然,这些因素和做法刺激了日本的出口。然而,问题是日本在那二十年中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因出口刺激而持续增长的呢?所起的作用又有多大呢?

大家都承认,从单纯的叙事角度看,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的经济增长是出口主导型的。一些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1)出口增长一直高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2)从实际值看,商品和劳务出口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不断提高,1955 年为 7.6%,到 70 年代初期



达到 14% 以上；(3) 在本文提到的三十年中，特别在制造业部门，出口在国内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或多或少一直保持着增长的趋势。但作为一种分析概念，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就另有含义。例如，理查德·凯夫斯认为，<sup>⑩</sup>要形成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就必须存在着确实已经导致经济租金收入和实际收入上升的外生动因，这和因增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投资，提高国内生产率引发的经济租金收入和实际收入的上升完全不同。他认为，区别外生动因和内在动因的一个简单检验方法是，看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如果是正相关，动因是外生的；如果是负相关，则动因是由于国内供给的变化。

在关口末夫的帮助下，劳伦斯·克劳斯曾把凯夫斯的这一检验方法应用于对日本的分析，他发现，“日本的经济增长在 6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中显然不是出口主导型的，因为 1961 年的出口价格指数（按 1970 年为 100 计算）是 92.0，这一指数实际上一直保持到 1968 年，这一年的指数只达到 92.9，而出口量则增达 232%。”<sup>⑪</sup>克劳斯也承认，“即使日本的经济增长从分析角度看总体上不属于出口主导型，但并不是说出口在增长中的作用不重要，”他接着指出，出口增长的一个作用是“使能够取得较大规模经济效益的一些工业部门发展得更快，但这些工业部门的国内销售额占总产值的比重大得多，因此，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内。”<sup>⑫</sup>

从理论上讲，凯夫斯认为如果动因主要来自外部需求，价格和出口量的变化应该是正相关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但他依据的理论模式实质上是静态的。即使抽象地看，某一工业也完全有可能通过实行双重价格制，成功地成为一个出口部门，然后成功地扩大生产规模，充分利用规模经济，使价格和出口量变化出现负相关。对在日本二十年间出口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那些工业部门不管作何种详细分析都可以证明，由于成功地推动出口发展，使得通过增加人力和实物资本投资促使生产率提高成为可能，并且正如建元所

指出的那样，<sup>②</sup>出口和经济增长的国内因素如厂房设备费用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

### 作为有效需求一个来源的私人投资

从以上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在日本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出口的战略重要性几乎是无可辩驳的。但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私人投资起的作用无疑是最重要的。我们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涉及到这一问题，曾对先进工业国的国内储蓄值和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作了相互比较。这里，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把重点放在国民支出方面，比较一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几个成员国的非住宅业固定投资与国民总支出之比（见表 3.10）。尽管日本的比率（在所列时期内平均为 18.4%）只高出西德或法国几个百分点，但在整个时期一直位居榜首。同时，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同期库存增加与国民总支出的比率，日本也是这些国家中最高的，达 3.3%，其次是法国（2.2%）、意大利（1.8%）、西德（1.7%）、美国（1.0%）和英国（0.8%）。

表3.10 非住宅业固定投资与国民总支出之比——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比较

（单位：%）

	日本	美国	英国	西德	法国	意大利
1962—1964年	18.9	5.8	7.7	15.8	14.1	13.6
1965—1969年	17.6	6.7	8.0	14.7	14.6	11.3
1970—1974年	18.7	6.4	8.5	15.4	15.6	13.1

资料来源：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国民核算》的统计数字计算得出。日本银行的《经济和金融比较统计：日本和其它主要国家》（1976年，第23—38页）也综合了这些数字。

从这些数字比较中，人们可以发现，人们不同程度的奋发精神能使私人投资活动在国民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出现如此巨大的差

别。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分析日本逐年、逐个工业部门的具体事例，就会对这个国家特有的一些规律性特点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特点是：

1. 主要企业集团奉行的所谓以“经营齐全”为准则的行为。
2. 通产省家长式的行政指导。
3. 政府对开拓新厂房场地的先期投资。
4. 有利于私营企业的各种减轻赋税的特别措施。
5. 低利率政策。
6. 有意延缓贸易和资本流入自由化进程。
7. 对工业用水和用电给予特别补贴。

我们已经在前面的一节中讨论过第一个特点。其余的特点涉及到政府在经济发展时期的作用这个大题目，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论述。

#### 4. 工业结构的变化

以上的讨论表明，在 1953 年至 1973 年这二十年的高增长时期中，日本的产业构成必然经历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通过简单的计算就能很容易地看出，即使各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没有变化，劳动力也没有出现净增加，只要劳动力从低增加值部门向高增加值部门转移，就能增加国内净产值。假设一种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一个部门中的人均生产率为 10，另一个部门中的人均生产率为 30，最初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中数字相等，比如说各有 50 人。这时，总产值是 2000。再假设把生产率低的部门中的 10 人转移到生产率高的部门。那么，现在的总产值是 2200，或者说提高了 10%。当然，这种转移很可能需要增加资本，因为高生产率部门往往资本集约程度较高。

现在，可以用统计数字说明，日本战后时期的经济发展史是一

部工业结构巨变史。表 3.11 概述了这个国家三大经济部门中有报酬劳动力构成的变化。这种变化(其中第一产业中劳动力人数的相对下降特别引人注目)可以结合三大部门中每一劳动力单位的收益能力进行考察,如把整个经济每一劳动力单位的收益能力的平均数视作 1,那么第一产业是 0.41,第二产业是 1.20,第三产业是 1.23。而且,在制造业部门中,增加值高于轻工业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在这二十年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相对比重显著上升。从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生产与整个工业生产之比来看,它们所占比率也一直持续上升,1955 年是 51%,1965 年提高到 64%,1975 年高达 75%,这也许是当年先进工业国中最高的。表 3.12 所列统计数字有力地证实了这一趋势,它表明 1950 年后新产品的出现对扩大生产规模的作用。从表中可以发现,1950 年至 1969 年期间,工业生产增加了 18 倍,但其中 1951 年前已有的老产品比率却缩小到只占总数的 60%左右,而新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和石化产品)的份额持续大幅度上升。这样,即使个别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没有提高,工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自然也能提高整个经济的平均生产率。我们可以说,这是所谓的日本高速增长“奇迹”的又一个方面。

表 3.11 1947 年至 1974 年有报酬雇佣劳动力构成的变化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劳动力人数 (千人)	百分比	劳动力人数 (千人)	百分比	劳动力人数 (千人)	百分比
1947 年	17810	53.4	7430	22.3	8019	24.3
1955 年	15360	37.6	11900	29.1	13640	33.4
1960 年	13400	30.2	14810	33.4	16150	36.4
1965 年	11130	23.5	18010	38.1	18150	38.4
1970 年	8860	17.4	21440	42.1	20560	40.4
1974 年	6730	12.9	22510	43.3	24290	46.7

资料来源:总理府,统计局。

表 3.12 新产品对扩大日本战后工业生产的相对作用

(1950 年的工业生产量 = 1.00)

(括号中的数字是占当年总量的百分比)

	1951 年前已有商品 <sup>a</sup>	1951—1954 年间第一次出现的商品 <sup>b</sup>	1955—1959 年间第一次出现的商品 <sup>c</sup>	1960—1964 年间第一次出现的商品 <sup>d</sup>	总计
1950 年	1.00(100.00)	0			1.00
1955 年	2.05(92.8)	0.15(6.8)	0.01(0.5)		2.21
1960 年	4.14(81.2)	0.65(12.7)	0.28(5.5)	0.03(0.6)	5.10
1965 年	6.65(72.7)	1.19(13.0)	0.93(10.2)	0.38(4.2)	9.15
1969 年	11.19(61.9)	2.43(13.4)	2.56(14.2)	1.90(10.5)	18.08

注:

- a. 其中包括钢铁制品、有色金属、机床、铁壳船、硫酸、硫酸铵、棉纺织品、水泥、平板玻璃等。
- b. 其中包括现金出纳机、电冰箱、日光灯、电视机(黑白)、乙内酰胺、喷气式飞机燃料、合成纤维和纺织品等。
- c. 其中包括拖拉机、复印机、空调设备、真空吸尘器、半导体收音机、电子计算机、环氧乙烷、丙烯晴、酞酸、聚苯乙烯和合成橡胶等。
- d. 其中包括铝合金窗、电子计算器、算术计算机、彩色电视机、二氧化碳、聚氨酯泡沫塑料和聚丙烯等。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经济白皮书》(1970年,日文版)编制。

## 注 释

① J·M·凯恩斯在1937年“高尔顿讲座”上对优生学协会的发言,《优生学评论》,1937年4月,第16页;后被收入《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选集》第十四卷“概论和以后的发展”第二部分,第124—133页,麦克米伦公司,圣马丁出版社,1973年。

② 肯尼思·E·布尔丁1984年1月30日在日本国际学院举行的对外关系宴会上的发言,后刊登在《日本国际学院院刊》第四卷第二期 1984年春季号

(第1—7页),第6页。

- ③ 用Y表示国民生产总值, N表示劳动力, K表示现有资本额,再用角注表示时间,我们可以写成:

$$G = (Y_1 - Y_0) / Y_0, x = (N_1 - N_0) / N_0, y = \left( \frac{Y_1}{N_1} - \frac{Y_0}{N_0} \right) / \frac{Y_0}{N_0}$$

$$\alpha = (K_1 - K_0) / Y_0, \beta = K_1 / Y_1 = K_0 / Y_0 \text{ (暂时假设资本系数不变)}$$

那么,

$$y = \frac{Y_1}{N_1} / \frac{Y_0}{N_0} - 1 = \frac{Y_1}{Y_0} / \frac{N_1}{N_0} - 1 = \frac{G+1}{x+1} - 1$$

$$\therefore G+1 = (x+1)(y+1)$$

$$\text{或 } G = x+y+xy = x+y \text{ (} xy \text{极小, 可略去不计)}$$

从而,

$$\alpha = (K_1 - K_0) / Y_0 = \left( \frac{K_1}{Y_1} \cdot Y_1 - \frac{K_0}{Y_0} \cdot Y_0 \right) / Y_0$$

$$\text{根据假设 } \frac{K_1}{Y_1} = \frac{K_0}{Y_0} = \beta$$

$$\alpha = \beta \left( \frac{Y_1 - Y_0}{Y_0} \right) = \beta \cdot G$$

$$\text{或 } G = (\alpha / \beta)$$

- ④ 参阅《科学工业革命》,莫带尔、罗兰和斯通出版公司,纽约,1957年。作者的姓名一直不为人们所知,但以后发现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是P·M·斯威齐。
- ⑤ 三菱经济研究所《三井—三菱—住友:前财阀企业的现状》,东京,1955年,第19页。例如,住友银行于1952年12月恢复旧名,不再称大阪银行,三菱银行于1953年7月恢复旧名,不再称千代田银行。三井银行于1954年1月恢复旧名,不再称帝国银行。
- ⑥ 修正部分于1953年9月1日起实施。
- ⑦ 参阅政治经济研究所:《日本经济趋势》第21期,1955年5月。
- ⑧ 参阅日本银行《经济和金融比较统计:日本和其它主要国家》(日英

对照)。

99. 参阅经济安定本部《1952财政年度经济调查报告》(日文)1952年,第39页。
100. “星期四会”是为了集团成员的利益举行的,但它有时起的慈善作用值得一提。当我任一桥大学校长、想为大学图书馆购买收集有珍贵经济史料和文献的“伯特·富兰克林文库”时,想请私营公司提供捐助,我只是去拜访了一次“星期四会”的聚会,向他们解释“文库”的价值,三井集团大约二十位总经理一下子就同意捐赠给大学三百万日元。我有理由认为我不是唯一的受惠者。
101. 参阅丹尼尔·I·冲本《通产省和市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加利福尼亚,1989年,第134—135页。
102. 这就是所谓的“新财阀”集团(如日产集团)得以兴起、开始从事当时新兴的化工和汽车等工业的原因。
103. 宫崎义一(《战后日本企业集团》,第268—278页)详细分析了重新组合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经营齐全”原则在60年代得到进一步的贯彻。
104. 我知道,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整个振兴史应该包括对工人阶级作用的讨论,在任何一个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他们毕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题目。但基于眼前的目的,有多方面的原因使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不详加论述。前面有一章曾经提到战后初期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使资本家阶级据有对劳方讨价还价的强有力地位。确实,在许多场合发生过劳工运动十分活跃的事态。但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会基本上是“企业工会”,工会成员中普遍都有一种“害怕受株连”心理。甚至当劳资双方冲突恶化而出现摊牌局面时,劳方最终也会意识到,他们的生活福利和雇主的生意兴隆是休戚相关的。例如,一直被国外企业所仿效的日本在“质量管理”方面的业绩,只是在工会会员的乐意合作下,才可能取得。日本劳资关系中的另一个特点是,私营公司中有许许多多总经理和经理人员以前就是本公司的工会领导人。战后日本的工会激进主义活动主要局限于国营企业和政府机关,那里缺少市场激励机制。

- ⑭ 这一段取材于林晋太郎博士的回忆录,他从1961年初至1964年8月曾任日本贸易振兴会轻型机械部门的主管,他的回忆录刊登在《经济学家》(1976年6月8日)第82—89页。
- ⑮ 参阅宇野武志《日本工业中期展望和结构变化》(日文),日本兴业银行,1976年,第4页。
- ⑯ “国民经济目标的冲突”,《经济杂志》,1971年3月,第1—6页。
- ⑰ 上面已经提到,在缝纫机的促销阶段,出口报价实际上比国内市场价低一半还多。双重定价的另一例子是50年代中期正处于发展关键时刻的钢铁工业。当时钢铁工业习惯于通过国内市场的销售赚取丰厚的利润,当遇到供过于求时,就把产品以低于国内市场三分之一的价格销往国外。化肥,特别是硫酸铵的例子更为明显:1959年至1967年间,出口价和国内市场价之比大致保持在75%左右,后不断下降,1971年时只有39%。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些年份对硫酸铵的总需求中,出口比率一直保持在二分之一左右,当时最大的买主是中国——一个难对付的讨价还价者。
- ⑱ 理查德·E·凯夫斯:“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和新经济史”,见杰格迪什·N·巴格瓦蒂等主编的《贸易、国际收支和经济增长》,北荷兰,1971年,第403—442页。
- ⑲ “日本和世界经济”,见休·帕特里克和亨利·罗索夫斯基主编的《亚洲新巨人——日本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布鲁金斯学会,1976年,第400页。
- ⑳ 同上书,第401—402页。
- ㉑ 建元正弘:“日本的稳定政策和它与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关系”(1974年6月10日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公共经济学国际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



## 第四章 政府在高增长时期的作用

前面一章对政府在经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作了前瞻。本章就集中讨论自战争结束以来日本资本主义复活这一方面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反映灾难性经济情况的社会环境已糟到这种程度,需要由政府出来实行全面计划;直到1957年以前,政府一直在不断地认真起草这些计划。本章的第一部分扼要地对这些计划作一历史评述,说明这些计划是按照“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基本构架”的方向——实际上是全面计划思想的对立面——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的。因而这样编辑出来的许许多多文件结果都成了空想的通天之塔。

在日本政府为帮助工业而实行的所有计划中,外国观察家普遍认为,“行政指导”是一个最明显和独一无二的特征。所以,下面要突出论述这个题目;但是还有其他相当重要的家长式支持的措施,虽然在讨论时经常一笔带过,却大大有助于加强日本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本章的其余部分将在这些方面进行具体讨论。

### 1. 政府的全面计划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左翼社会科学家用来表示二战前日本政治经济制度特点的一个名词,在那种制度中,国家与经济垄断结构无法分开地结合在一起,具有一种走向军国主义扩张的内在趋势。这是公认的表述日本战前政治经济的非常恰当的名词。随

后,战争的失败意味着这个制度的破产;早期的占领政策试图取消日本战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两个主要部分,即财阀垄断和各种各样的战争潜力代之以实行一种真正民主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占领当局还采取步骤使以前作为军国主义国家忠实的和必不可少的仆役的文职人员“非封建化”。这样看来,在战后最初年代,一个再生的日本应该找到一种方式,使它发展成为完全不同于追求“亚洲共荣圈”的具有帝国主义野心的民族国家那样的社会。正像在第一章里所简略提到的,日本外务省所创设的由进步知识分子组成的“专门调查委员会”拟制过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些激进的改革意见,其中包括在重要的经济部门中应采用计划原则的意见。1947年4月大选的结果,社会党以多数票获胜,接着组成以社会党人片山哲为首的联合内阁。该内阁立即于1947年7月建立长期计划秘书处,开始实行以计划为导向的日本经济复兴方案,后虽经不断修改,但其精神延续不变几乎达十年之久。片山哲内阁的倒台和1948年占领当局采取的“逆向路线”,改变了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特别是在保守的吉田茂内阁领导下,由政府实行全面计划的思想被搁置一边。这一事态发展是很自然的,因为日本资本家阶级在随着财阀型集团复活而出现的逆转过程中,已重新获得了信心。但是回顾一下1947年到1957年这十年中协同政府工作的“计划派”成员所作出辛勤劳动的简史,还是很有意义的。

### 一系列“全面计划”的起草和被搁置一边

在1948年到1957年这十年内,被授予起草政府关于经济恢复计划任务的这个机构共提交了至少十个报告,后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修订,这一事实说明这些计划只是作为权宜之计的书面计划,而不是准备认真付诸执行的。可以说,唯一的例外是第一次于1948年5月拟成的“经济恢复计划草案”,它制定的目标是到1952年生活水平可以恢复到1930—1934年的标准,届时,据认为,日本

对外帐户可接近平衡,失业人数可减少到比较容易解决的 200 万人的额度。它建议,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应越来越向重化工业倾斜;1948—1951 年外援需要约 15 亿美元。该计划草案本身的主要内容是逐年地详细阐明经济的各方面问题,从人口和劳动力变化的规划,各种主要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的供应明细表、生产率变化、外贸前景、国家财政一直到社会经济报表。这项计划并概括式地指明了实际执行中的几个问题,例如:(1)由于在战后市场混乱的情况下,高利润率并不与高位次的社会需要程度相一致,因而政府仍然需要采取强有力的管制措施;(2)政府管制应选择在一有限的领域内,集中必要力量,以使这种管制措施真正见效;(3)少数经济活动,如新开发的水力发电和煤矿可以由政府本身直接进行等等。计划制订者似乎对于计划的不完全性,特别是对于实际执行的步骤,并不存在什么幻想,他们对能从宏观经济关系和具体的物质需要出发,按照一定经济发展速度,尽可能现实地提出为经济复兴所需要的条件和需要这一点是感到满意的。因此计划草案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

全面计划的第二次尝试是 1948 年 3 月片山哲之后的吉田茂内阁进行的。在当时日本经济因通货膨胀干扰而不稳定的背景下,新内阁虽远不如其前任那样具有“计划意识”,也明显地感到迫切需要有计划地复兴经济,并在 1948 年 5 月建立一个广泛的由吉田茂首相本人领导的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新的委员会以以前的计划草案为依据展开工作。当然,通过获得更多的经验,它采取了更现实主义的态度;从一开始就认识到执行任何一项计划都要同直接的通货膨胀问题作斗争。因此,它把 1949 年到 1953 年的计划期分成两个分阶段:第一个分阶段是从 1949 年到 1950 年,目标是实现经济稳定,第二阶段是从 1951 年到 1953 年,要达到经济生存能力,也就是达到充分就业下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再求助于外国经济援助。然而,外部因素很快地使该委员会焦虑不安。该委

员会基本上倾向于想通过加倍努力,增加紧缺商品的供应来抑制通货膨胀。可是占领当局显然另有想法。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正如第二章所论及的那样,美国政府决定派遣扬格代表团到日本,以制订一项协调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接着就发表了“九点计划”,以后又有约瑟夫·道奇的访日,以对制止通货膨胀和建立单一汇率给予强有力的指导。道奇的思想不容易和在经济复兴计划委员会的想法中占统治地位的计划工作原则相协调。委员会的许多成员虽则为一种新占领政策的形成所触怒,但仍继续工作,多少使自己适应于道奇计划,因而于1949年5月底完成了一份长篇报告——“经济复兴计划”。道奇到达日本同自日本投降以来最保守的吉田茂内阁的组成一起发生,这纯属历史上的偶然。吉田茂首相对这项计划持严厉的批评态度,建议“以具有更多国际意识的观点推倒重来”。他所说的“国际意识”指的是什么,从来没有讲清楚;但是该委员会经过某些人员调整后,又花上了几个月时间,进行修饰性修改。然而,原来的精神已不复存在,挽救也不见效,终于在1949年9月决定抛弃这项计划,吉田茂在10月间向国会解释说:“长期计划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经济复兴计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座纪念碑,建立在以前所有计划与规划之上的纪念碑,它汇集了不计其数的新的统计材料,并在短短的一年内发表了519项文件。它在计划要求的构架内,组成了一份优异的归纳性研究报告,几乎对可以计量的各种问题都作了最详尽的探讨。该计划深刻注意到当时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局限性,提出把计划工作限于以下四个方面:(1)作出最大努力,扩大出口;(2)强调资本积累和投资资金的合理使用;(3)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限制人口增长;(4)经过精简之后,保留有效的政策管制。

吉田茂继续执政,一直到1954年12月,国会投不信任票把他的内阁赶下了台。只要他在执政,是不可能制定出像他在1949年

亲手埋葬掉的那种全面计划或全面规划的。然而,在对日和约生效、日本在 1952 年 4 月重新获得独立以前,也有过一批可以列入计划和规划一类的政府研究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既能反映时代的需要,又由于政府内那些制定计划的官员们的努力,说明了它们的尽责守职。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五个这样的计划:

1. “实现经济自力更生的条件”或“EOS 研究报告”——1950 年 6 月公开发表。
2. “经济自力更生计划”——1951 年 1 月公开发表。
3. “B 号文件”——日本代表团于 1951 年 9 月在对日和约旧金山会议上提出。
4. “1957 年经济情况表”——1953 年 2 月公开发表。
5. “岡野计划”——为了使世界银行访问专家对日本急需国外贷款以获得经济生存力有深刻印象而于 1953 年 11 月编写的。

看一下世界银行的一位专家罗伯特·加纳尔对岡野计划有什么反应是饶有兴趣的。加纳尔返美之后,在外交政策协会于纽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批评性的评论,说道:

“依我所见,日本政府似乎既没有什么全面计划,也没有一个把私人资本引入最重要经济部门的具体计划。所以,我曾建议,由于有资金流入非重要部分的危险,日本政府可建立一个机构,以便决定投资需要的先后次序。但他们反对这一建议,说他们一直宁愿要‘自由企业经济’而不要‘计划经济’。然而,就我来说,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政府下决心让私人资金流入最重要渠道一定会同‘自由企业经济’的要求发生矛盾。”<sup>①</sup>

吉田茂内阁制定的最后一个计划和规则是“全面发展计划”,于 1954 年 9 月完成。它特别强调迫切需要有地区发展规划,通过开发日本国内资源,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吉田茂对“计划”这个字眼十分厌恶,随着他的下台,官方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新的鸠山内阁领导下,经济审议厅重新被

命名为经济企划厅，新首相还命令对研究日本经济的长期计划作好准备。在吉田茂执政期内长期受到抑制的计划工作官员们的热情又被激励起来，着手进行了一项包括多方面的广泛研究，并于1956年1月发表了“经济自力更生的五年计划”（从1956年财政年度到1960年财政年度，即从1956年4月到1961年3月31日）。这项计划并不限于简单地提出为目标年份所规划的基本数字，它还按照各项基本政策和各政府部门的职责说明了执行计划所需要采取的措施。事实上，大多数所建议的措施尽是同意某些政府部门所乐于实行的想法，而这些部门也就得以为要求增加预算拨款而找到借口。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起草计划的这届政府尽力讲明，其基本立场是最大程度地尊重私人积极性，尽量少动用任何一种集中计划形式，而且也因为经济企划厅在战后日本官僚政体的权力结构中是最弱的一环，结果该计划没有随之引发出多少特别同计划目的和意义相联系的具体措施。不管怎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措施的需要越来越小，因为日本经济显然由于自身的动力已显示出一种远远超出最乐观人士预期的增长能力。回想起来，日本高速增长“奇迹”的头五年正好同该计划的实行人期相一致。

日本政府鉴于1956年的计划已迅速变得陈腐过时，不得不重新予以考虑；1957年岸信介内阁的诞生为对计划的重新评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根据首相在同年8月初发布的一项新指令，书面计划人员又重新开始工作，并迅速制订出“新长期经济计划”，并经内阁于1957年12月批准。这项计划起讫期为1958—1962财政年度，共五年。它要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与合理的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制约条件相适应的最佳增长率是多少？答案是：实际国民总产值年增长6.5%——一个相当野心勃勃的数字。还有，纸上描绘的计划和计划内容的现实性这两者之间的连贯性可以说比以前的计划有所改进。但是在计划的执行方面，以前各项计划

所特有的缺乏实际现实性的特点依然存在。这一计划的官方文件一开头就说：“这项计划是使经济在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基本体制构架内运转的指路牌。”文件继而指明“诸如财政、货币与贸易和外汇政策等间接手段作为执行计划的工具”，明白宣称“政府尽力不采用直接管制措施”。

换句话说，政府实行全面计划的基本思想最后终于被舍弃，相反，另一种思想，即该计划是“在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的基本体制构架”内“作为经济运转的指路牌”的思想则用明白无误的词句突出出来。政府所说的“指路牌”作用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是指政府准备（虽然不作承诺）当私人企业行为与“指路牌”出现明显背离时采取某些行动，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政府打算实行某种“指示性计划”。它为了这一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有效手段就是“行政指导”，这将在下一节再作讨论，同时还将讨论日本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其它手段。

这里要附带提到一点：无论如何，1957年的“新长期经济计划”仍然走上了以前大多数计划的老路，并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就遇上1959年和1960年经济最显著增长——所谓“岩户景气”时期，而被视为过时搁置于一边了<sup>2</sup>。这样，就为另一个更乐观的计划的出现准备了条件（至少心理上如此），1960年诞生了著名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实际国民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2%的指标。这倒更像是一句政治口号，显然，依靠全面计划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 2. 行政指导

### 行政指导的性质

在前一章里，我们对缝纫机行业取得成功的经验作了具体的描述，说明“家长式行政指导如何能够在国内竞争和政府对外销

售的支持这两者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从而通过创新和规模经济显著地提高生产率,同时并改进产品质量”。政府部门的这种办法就称为“行政指导”,并且经常被外国观察家突出出来作为“日本株式会社”的一大特点。最近一本美国出版物<sup>③</sup>把“行政指导”解释如下:

“‘行政指导’这个词是指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政策。这是日本政府普遍用来支持或加强各种宏观和微观政策的一种方法。

实质上,行政指导涉及到利用其影响,劝告和诱导的办法来使得企业或个人按照政府认为可取的那些方式进行活动。诱导和劝告当然是由有权(现在和未来)提供——或者撤销——贷款、赠款、补助、执照、租税优惠、政府合同、进口许可、外汇、批准卡特尔协定以及其它有利(或不利)待遇的官员提出的。但是,认为行政指导仅仅是挥舞胡萝卜与大棒两手,都是不正确的。倒不如说,个人接受政府领导的日本传统和普遍承认政府官员拥有优于一般企业所能得到的知识、经验和信息,再加上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念、信念和政治偏好,这些条件都有利于使这一方法获得成功。”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机构或者官员在不具有明确的合法权力情况下,能够,而且确实可以指导或诱导私营企业或个人采取或不采取某些行动,这就是日本行政指导方法的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也可以进行这类实践。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在日本比在其他国家更能被普遍接受和有深远基础的行政管理办法,它并且因盛行的官僚—产业联系而增强。通过这种官僚—产业之间的联系,退休的政府官员可以转到企业,经常是转到过去有工作关系的大公司里担任高级职位。“这种从政府向产业的转移……自然就助长了一种推断,即尚在工作岗位上的官僚,在正常情况下,总要使自己的行为会增进将来为私人企业有酬聘用的前景,而一旦退休进入产业界,他们又将会维持和加强企业与政府之间



的各种联系”。<sup>③</sup>

战后日本行政指导方法行之有效的最重要方面是在主要工业投资计划中所发挥的协调作用。正如前面关于财阀型集团的“经营齐全”原则所解释的那样,在有些工业中,有一种在扩张生产能力方面定标过高的趋势。除非在实际建造新工厂之前采取一些限制措施,否则,非常可能的是市场力量本身将不得不发挥会使投资企业深感失望的作用。在这里,行政管理在两个阶段上进行干预,这两个阶段都曾被形象化地比喻过。第一个阶段就像“踩麦田”,这是在日本麦田里实行的一种办法,踏踩长得过高的麦根来加固幼嫩麦苗。第二阶段就像建立“山上小屋”,如果早知道有这种小屋,那就能诱导登山者更敢去冒险。

协调投资的“踩麦田”阶段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

1. 日本政府通产省给予直接的行政指导,如水泥工业的制氮工业;
2. 在通产省的产业结构审议会中的产业基金委员会中设立一个特别的小委员会,如同钢铁工业中所实施的;
3. 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在特别的双边会谈中,通过讨论进行协调,如化工、造纸和纸浆工业、人造纤维工业。
4. 在特定法律的基础上,对扩大生产能力规定许可证制度。

在所有这些协调投资的形式中,具有行政指导性质的头三种形式,不可否认是限制竞争性的,并在发生投资过度或过小时由政府承担一部分责任。这种情况自然就导致在协调投资方面行政指导的第二阶段(“山上小屋”)。当实际的生产能力扩大过多时,通产省就只得采取向全产业建议协调削减开工率的办法。最近几年来,这种做法又辅之以公正交易委员会援引“反衰退卡特尔”的法律程序,使有关企业同意在有关产量、销售量、定价、工厂开工率方面限制竞争行为。不论哪一种情况,各个企业都可以怀着一种安全感对投资进行适宜的规划(要不然会显得过于雄心勃勃),犹似

那些知道山上建有气候突然变坏时可以保护他们的紧急小屋(掩蔽体)的登山运动员那样。

### 钢铁工业的实例

这些家长式的方法毫无疑问会鼓励整个制造业出现全面的高投资率;并且毫不令人奇怪,投资会再呼出投资,甚至一项过分野心勃勃的投资计划事后回顾起来也会是值得进行的。日本钢铁工业的例子在这方面特别有启发性。

1955年——也就是日本人均收入据称已恢复到二战前(1934—1936年)水平的那一年——日本的粗钢产量为940万吨,而美国为1.0617亿吨,苏联为4527万吨。但是,到1974年,日本产量提高了11.34倍,达1.1713亿吨,而苏联提高2倍,为1.36亿吨,美国提高0.25倍,为1.322亿吨。日本钢铁工业这一显著发展的过程是在通产省的行政指导下,由产业基金委员会的钢铁小组十分有秩序地进行的。在每五年的时期内,都制定出一个所谓“合理化投资计划”,其扩大生产能力的总投资目标是通过官员和工业代表的协调讨论,在各竞争企业中间或多或少友好地加以分配的。这五年一期的总投资目标额的惊人发展过程如下:

1951—1955年	128.2(10亿日元)
1956—1960年	622.7(10亿日元)
1961—1965年	1146.0(10亿日元)
1966—1970年	2242.8(10亿日元)

特别是在60年代及以后,钢铁工业极其起劲地引进新生产方法,主要是扩大各种基础设备的单位规模,如高炉和轧钢机。许多人都意想不到,到1975年10月,在全世界运转着的20座最大高炉中,以原苏联的克里沃埃·罗格高炉居第一,其炉内净容积为5026立方米,而有13座高炉是日本的。<sup>⑤</sup>在应用连续铸钢法方面,日本钢铁工业也居世界首位。

随着基础设施的单位规模越来越大,六家大钢铁公司(八幡、富士、川崎、神户、住友和日本钢管)<sup>6</sup>或多或少彼此展开了竞争,这就引发了通产省官员和大融资银行的忧虑,他们对于因过大的增资可能引起剧烈竞争的危险表示担心。面对这种情况,行政指导以一种坚定的姿态进行工作,建议合并八幡和富士这两家最大的企业。早在1966年中期,就按照当时日本兴业银行行长中山素平的建议私下进行活动<sup>7</sup>(该行是长期对大钢铁公司提供融资的重要银行)。中山素平成了促使合并的一种驱动力。根据他的看法(1965年的经济衰退触发了他的这一想法,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强烈),竞相建立大高炉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国家经济实力的浪费,而如果减少一些竞争性企业,已经开发出来的各种新方法将可以更合理地应用到工业中来。通产省官员显然同意这种意见,战后日本最大的一次合并计划就此悄悄地着手进行。这一行动的新闻在1968年4月间泄漏在一家报纸上,在公众中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也直截了当地反对这个意见。然而,经过中山素平耐心和巧妙的操持,再加上通产省官员强有力的行政指导,终于在1970年3月间使八幡和富士这两家钢厂的合并付诸实现,从而诞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家钢铁公司,即新日本制铁公司。这家公司在1975年生产原钢3252万吨,居于世界之首,其后是美国钢铁公司,生产原钢2395万吨,远远落在它之后。

### 行政指导的其它形式

行政指导当然并不仅仅限于投资协调。例如,在价格管制问题上,即使已制定了特别立法(稳定人民生活的紧急措施法)并于1973年12月由国会批准,其目的是为价格管制提供明确的合法权力,可是这项法律就像一把“未出鞘的刀”,人人都知道它锋利无比,只是因为这把刀的存在,政府的行政指导就可以“得心应手”。事实上,随之而来的价格冻结措施(涉及石油产品和50到60种其

它基本商品的批发价格以及 148 种商品的零售价格), 只在丙烷、火油和卫生纸三种商品上缓用了该特别立法权。所有其它商品的价格都是只通过行政指导管制起来的。

可以这样说, 日本银行为处理银行信贷所实行的窗口指导, 也是日本当时流行的行政指导的一个方面。

实际上, 战后日本产业政策史上巧妙地运用行政权力, 使特定产业度过难关的事例是极多的。其中一个例子是在 1953—1954 年衰退后的时期内, 对造船业采取一种隐蔽性补贴措施, 当时认为出口市场是唯一的营救渠道, 可是, 价格—成本状况并不完全有利, 而明目张胆地实行补贴又过于显眼。因此, 只有求助于采用一种给出口造船商分配食糖许可证的行政措施。由于当时外汇匮乏, 食糖进口必须严格限制, 从而使国内市场上的食糖价格非常高。当时, 通产省官员心中的方程式变量是: (1) 使日本船只在国外有竞争力所需要的补贴幅度; (2) 国内市场可以承受的食糖零售价格; (3) 食糖进口商可以赚到的溢价。当时的工作是计算(1)的总额, 除以(3), 求得“需要”进口食糖的数字, 再按这笔数量, 把进口许可证分配给船只出口商。这样, 出口船只的价格可以减低 20% 到 30%; 通过这一措施提供的“隐蔽性”补贴额在 1954 到 1955 年 1 年多一点的时间内据说达到 100 亿日元。这笔数字应与当时日本贸易振兴会 5 亿日元的年预算相对比来看。“虽然在国内外有越来越多的批评, 指责日本把行政指导广泛运用于多种目的, 但通产省至少“一直维持着这种办法, 把它作为避免官僚作风、复杂的法律程序和工商界与政府之间发生对抗的一种手段”。“可以恰当地说, 是日本社会气氛中的那种传统上不受欢迎的公开合法程序, 造就了这一通过适合于日本的非正式的、半自愿式的交谈和指点解决问题的办法。

### 3. 工厂用地的开垦

#### 开垦的理论根据

同获得资本和劳动力相比,通常认为获得工厂用的土地不成问题。制造业中的所谓“土地生产率”与农业中的“土地生产率”是无法类比的,前者高得多,这点是十分真实的。举例来说,在1970年,574万公顷的农业用地生产出45790亿日元的总产值(每公顷的产值约为80万日元),而10.8566万公顷的工厂用地生产出578150亿日元的总产值(每公顷的产值约为5.32亿日元),每公顷的产值比例是1比665。这样看来,如把2%的土地从农业转入制造业,就立即可以使工厂的土地面积增加一倍。事实上,当1970年农林省面临国内大米生产长期性供应过多的难题时,就提出了腾出33.7万公顷的稻田休耕,给予原种植者以适当补偿的办法。正在那时,农林相仓石先生宣布,一项长期计划研究使他相信,将可以永久性地把20万公顷的稻田转用于其它方面。据计算,也就是有可能把工厂用地增加两倍,而不会造成多大困难。

但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厂址用地如果要达到高效率要求,一定要符合许多条件,如可以获得适量的工业用水、运输方便、接近劳动力供应来源等等。即使恰巧现在休耕或废弃不用的稻田能够满足那些条件,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障碍,就是土地的转让价格,它要使买卖双方都感到满意。拥有土地的农民自然要求其价格不仅能弥补他从土地上所失去的一笔笔未来收入,而且能弥补他转换职业所需的费用;不久人们发现,用开垦的办法开辟一块土地,即使为了补偿捕鱼权的损失而必须同时支付一笔费用的话,其价格也比较便宜。开垦土地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随着海洋运输设施(如自动仓库、从巨型船只上装卸物资的滚动传送设施等等)显著的技术进步,在海边毗邻合适港口的地方建立工厂,对于有大量货

物运输的那些工业,例如钢铁工业,就意味着可以大大减低成本。

要得到一块土地作为厂址,通常是私营企业自己的事,由自己勘查和择定一个特定的厂址,签订购买一块土地的合同。但是在战后的日本,按照前面一段所解释的那种环境,政府承担了开垦工厂用地的先期公共投资,再提供诸如港口和公路支线等基础设施,从而使私营企业花在所需工厂用地上的费用降到最低点。早在1953年,就通过了一项称为海湾地区促进基础设施法的法律,授权运输省(负责海湾地区开发事业)制定开垦计划并发放开垦许可证,而这方面实际负责执行的是地方长官。但计划工作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包括全国土地开垦的总目标面积以及对具体海湾地区的分配数。当然,开垦的土地最终是要售给寻找厂址的私营企业的,但是最初的开垦费用由地方政府融资,地方政府则可以依靠大藏省的信托基金局供资,也可以为此目的而发行债券。

### 开垦的规划方法

从计划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全国性开垦规划所采用的一套方法特别令人感兴趣,现可以用1971—1975年的五年计划作为例子加以说明。这项计划制定于1969年,当时全国已开垦的土地有27184公顷。得出最后的开垦目标数字所采取的步骤如下:

1. 1969—1975年实际国民总产值的年增长率测算为10.6%,到1975年可达958600亿日元(按1965年价格)。

2. 根据过去的经验,可以在国民总产值和制造业的总产值的数量关系中推断出一定的规律性,这就可以测定后者在1975年可达960000亿日元(按1965年价格)。

3. 1965年制造业的土地生产率为每公顷3.30亿日元,到1975年合理的预期土地生产率可提高到4.98亿日元(按1965年价格)。

4. 将制造业的总产值(2)除以土地生产率(3),可得出

192900 公顷的数字。

5. 从 192900 公顷中减去 1965 年已用作厂址的面积(97500 公顷), 政府估计 1966—1975 年所需要的新厂址土地面积为 95400 公顷。

6. 并非全部工厂用地都要从开垦的土地中获得。1963 年从开垦中获得的土地所占比例为 46.2%, 1966 年为 45.5%。从而, 假定在 95400 公顷的所需总面积中, 通过开垦可提供 45%, 即 42900 公顷。

7. 除了厂址本身以外, 还需要有用于公共目的的辅助土地面积, 也就是在需要开垦的总数上再加上 35%, 即总开垦面积应为 57900 公顷。

8. 在这个总数中, 预计在 1966—1970 年期间可完成 14700 公顷, 还留有 43200 公顷为 1971—1975 年的目标数字。然而, 其中约有 10% 可由私人企业主办, 即五年内应由海湾地区当局负责开垦约 40000 公顷。

当制定该项计划时, 估计每公顷开垦费用平均为 4500 万日元——这在大多数地方比郊区农村土地价格的一半还要低。

自 1954 年以来, 政府在开垦工厂用地上所作的先期投资就是这样进行的, 这大大有利于 1955 年以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厂址问题的解决。下面是每五年期内为了工业目的而完成的土地开垦数字:

1956—1960 年	2321 公顷
1961—1965 年	11670 公顷
1966—1970 年	13287 公顷

如上所述, 这样的计划必须加快步伐, 以达到 1971—1975 年土地开垦数字 40000 公顷的高水平。然而, 1970 年左右, 环境问题特别严峻, 阻碍了把风景区海滨改造成工厂用地; 1971—1975 年实际完成的开垦面积为 12512 公顷。事实上在 70 年代这十年

内,政府和工业界在关于扩大可获得的适于工厂用地的看法似乎需要作急剧的修正。无论如何,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势在必行,因为1971—1975年五年内,国民总产值的实际增长率平均为4.4%,而1969年预编的开垦计划假设为10.6%。

## 4. 工业的特别减税措施

### 日本的轻税负

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工业公司的税负比其他先进工业国家要轻。形成这种有利情况的背景是日本经济多少有点与众不同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就整体而言,日本税制对纳税人征收的税比较轻。按其合国民总产值的百分比来看,1972年日本的税收,包括全国和地方税在内为21.2%,而挪威为45.7%,西德为36%,法国为35.8%,英国为34.7%,美国为28.1%。<sup>⑨</sup>这一相对低的数字在战后日本是比较典型的,虽然在1955年和1974年之间略呈上升趋势。对形成这一特点起作用的因素是:首先,在宪法第九条制约下的国防计划最小化;其次,至少到那时为止,日本政府不愿意使社会保险计划发展到与其他先进国家可比的水平。

在日本工业公司承担较轻税负的背景下,第二个特点是日本公司在资本结构中,大量依靠借债。关于这个问题,上面已经有所叙述;在这里,重要的一点是借入资本所支付的利息是作为费用支出,在得出应课公司税的利润额之前扣除。表4.1所示的1974年大制造业公司的公司税总额(在日本多少具有代表性)相当能说明问题。从表中可以看出,只要日本企业大量依靠外部融资,从宏观角度来看直接公司税往往只在利用资本而获得的收益中占较小一部分。



表 4.1 公司税对制造业公司的影响

(1)折旧	17700 亿日元
(2)支付的利息	23100 亿日元
(3)税前利润	16930 亿日元
(4)公司税	7550 亿日元
(5)税后利润	9390 亿日元
(6)分配的红利	4060 亿日元
(4) ÷ (3)	44.6%
(4) ÷ [(2)+(3)]	18.9%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经济和金融统计比较：日本和其它主要国家》（日文）1976年5月，第113页。这里引用的数字是337家主要制造业公司的总数。

### 对公司实行的税制刺激措施

除了这些普遍有利的条件外，作为一项政策，还对私营公司实行一系列的减税措施。政府和企业界双方都有着一种广泛的共识，即税制应积极地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这样，虽然可以说1949年肖普税制改革代表团对日本税制中各种分散的特别条款进行了一次清理，并协助日本在1950年制定了一套井然有序的税法，日本政府仍抓紧，特别是在1952年重获独立之后，颁布了一个又一个所谓特别租税措施法，主要目的是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些法最初包括：对出口收入实行特别减税；对出口亏损准备金实行免税；减低利息和红利的税率。

在这着重依靠减税措施的初期阶段以后的二十年内，特别租税措施的发布之多确实令人眩目。<sup>①</sup>除了在注释①列举的准备金免税规定之外，当然还有其它许多税制刺激措施，如加速折旧，对勘探国内外矿藏的支出给予特别补助，对旧有财产帐面价值的承转实行延期缴税，对特定企业资产的重置实行延期缴税，对来自转让的资本的资产所得实行特别税，对来自土地的资本所得实行特

别减税,对与1971年货币升值有关帐务实行特别规定,对亏损可以结转下期结算或与前期合并计算,对某些收入类别的记帐实行特别规定等等。

### 关于减税的一些分析

从经济分析的观点看,有三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即(1)由于这些特别措施,实际的公司所得税事实上是如何减低的;(2)大公司无疑比小公司能从这些特别措施中得到更多的好处,如果有的话,它们得到的差别性好处有多少;(3)这些措施对促进企业投资和出口有什么确切的影响?

回答以上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参阅一份比较日本和美国公司所得税的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减低程度的研究材料<sup>13</sup>。这份研究材料对1965—1972年的税率作了比较,得出1972年的数字如下:

	最高名义税率	实际税率
日本	48%	20.1%
美国	51%	27.2%

这里显示的减低程度在进行比较的八年内都相当稳定,其作者评论说:“日本实际上还可以按这个方向(即利用减税来鼓励私人投资的方向等等)比大多数其它国家走得更远。”

然而,这份研究材料有一个原来可以避免的简单化的缺陷,即其“实际税率”比“名义税率”降得更低主要是用“扣除折旧准备金前的利润”作为“实际税率”的公司税基计算得来的。1974年,一个专家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为东京都政府对由于特别措施而得以减税的程度进行了一次更详尽的研究,从百分比(“名义税率”和“实际税率”均使用同样税基)和绝对数两项计算了减税的程度。<sup>14</sup>1974年测定的绝对数为:公司所得税减掉了17900亿日元,而付给地方政

府的公司税减掉了 7930 亿日元。与前一数字相对比的是该年实际缴付的公司所得税为 58160 亿日元,总的减税幅度达 23.6%。

这里引用的这份研究材料实际上是根据每种特别措施,逐项计算了减税情况,并且编制了一份表式以显示出各种规模公司企业获得减税的不同程度,从而也有助于理解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二个问题。它只根据大藏省官方发表的资料,<sup>⑩</sup>算出最小型公司(资本总额不到 100 万日元)的减税程度(1974 年)只有 4.5%,而最大型公司的减税程度则不断提高到 42.1%(资本总额为 100 亿日元或更多)。

日本的公司税制中有一种累进倾向,人们原会以为大公司要在它的净收入中付出更高比例的所得税。但是,实际上却适得其反,这可以从上述减税程度的不同上推测出来。现有一份更直接地讨论这个问题的报告。植草益<sup>⑪</sup>曾主要根据官方统计,对各种规模的公司实际税负作了具体分析。根据他的材料,1971 年资本总额为 1000 万到 5000 万日元的中型企业的实际公司所得税率为最高(30.7%),随着企业规模增大,税负平稳下降,最终资本总额达 100 亿日元或更多的最大型企业的税率降到 21.8%。

上述第三个问题,即特别减税措施对企业投资和出口产生什么确切的影响是较难回答的。这些特别减税措施急迫地为国会所通过(往往得到企业界的强有力支持而不顾学术界经济学家的合理反对),这一事实就可以说客观上证明了企业界认为这些减税措施至少对它们有帮助。此外,在应付公司所得税中,减税达到四分之一的程度这一事实也说明减税措施是很有促进作用的。现在还有各种按“促进出口”、“设备现代化”、“增加收益留存”、“加强企业实力”等目标分类的具体减税统计数字。<sup>⑫</sup>但很难从这些数字中就某些特别税制措施对某特定工业产生的影响作出实质性判断,因为这些影响在某个适当的时点上是非常关键性的,即使影响的范围不大。

当然可以进行一种案例研究。例如,研究一项减税条款允许出口产品的生产商扣除海外总销售额 3% 及高到扣除其出口营业净收入额 80% 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条款实行于 1953 年到 1965 年,后来就被取消,因为它直接违反关贸总协定关于禁止出口补贴的规划。突然取消一项减税措施,会给那些受到减税实惠的企业带来暂时的困难。这里的问题就有点像研究汇率定值偏离对出口工业产生的影响那样,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能不看到 1965 年日本的出口工业已经相当强大,足以抛弃前面提到的那些特别支撑措施,那时这些支撑措施已完成了其使命。

前面提到的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虽然总结说:“关于特别租税措施对日本经济增长的影响所进行的研究,多半没有明确的结论”,<sup>⑩</sup>其原因涉及到许多像特别租税措施对促进家庭储蓄和促进私人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肯定是得不出结论的,但就特别租税措施对企业投资(如钢铁工业和机器工业部门)和出口(如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期等时期)的影响而言,毋庸置疑,它们已发挥了重要作用。

## 5. 低利率政策

### 低利率信贷配给制度

前几节一再提到日本企业主要依靠外部资金为企业投资融资,从这一事实可以容易地理解利率水平具有特别重要意义。在这里,利率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市场变量,在自动配给可供投资的基金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功能。通过不受人际关系支配的供需规律的相互影响,提高利率可减少过度投资需求,而降低利率可以诱发新的投资。

然而,战后日本所显示的主要并不是通过市场利率的自由变动来平衡供需关系,而是由下面几个单位随机决断来分配资金:

(1)日本银行；(2)主要商业银行；(3)专业银行，如日本开发银行等；(4)财政投融资局。同时也使利率结构在低水平上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此外，还采取一种办法，有计划地对特定工业提供补助，使它们的利息负担维持在低水平上。

日本银行采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是所谓“窗口指导”，相当于上面提到的在经济管理中为实现政府政策而采用的行政指导在货币政策领域中的应用。这一工具是用于对每家银行的总贷款额规定具体数量额度，采取的方式是当各银行来到日本银行的“贴现窗口”前时，提出建议。但各银行总是会接受其指导的，而当每家银行所提供的贷款额为行政指导所限制时，每家银行反过来不得不对其贷款客户采取某些配给方式。这样，商业银行，特别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自然就倾向于偏爱同财阀有传统联系的借款户。此外，不仅是一家银行的贷款总额受到日本银行“窗口指导”的控制，而且后者还经常作出正面的或反面的非正式提示，例如，在1973年日本银行作了一项指示，建议“投机性购买商品和土地”的贷款必须加以拒绝。

目前就投资资金的两个来源——专业银行和大藏省——而言，这些机构的性质，决定了其资金的分配是以特定政策考虑为主来确定的，利息率的考虑处于第二位。还有，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财政投融资局所掌握的资金数量并非微不足道。其资金来源主要是资金运用部的负债，其中，在一般年份中邮政储蓄占有一半以上。这些资金数量的大小可从以下与日本各银行存款余额的比较中看得出来。

	1965年	1975年
各银行的存款	20653	92921
资金运用部的负债	4754	40556
邮政储蓄	2573	22958

(年底数字，单位为10亿日元)

可以看到,邮政储蓄与其说具有活期存款性质,倒不如说具有定期存款性质,它在1975年差不多占各银行存款的四分之一;这些资金都完全流入大藏省的资金运用部,根据财政投融资局的预算计划加以利用。确实,这样分配的很大一部分基金被用于诸如房屋建造(约20%)、筑路(8—10%)、运输和通讯(12—14%)和其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目的。但是还保留一大笔资金投资于基本工业(1960年高达13.6%,到70年代减少到约3%),扩大出口和经济合作(10%以下)之用。当时,从资金运用部贷出的为期25年的款项所定的利息率为6.5%,当然低于商业银行贷款的利率,也低于固定的债券收益率。

所谓“低利率政策”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根据所谓“窗口指导”的特种货币工具和从政府或半政府金融机构所能获得可投资的资金多少而制定的直接配给政策。因此,可以维持或多或少固定不变的较低的利率,并对日本高速增长年代投资需求的高涨作出贡献。

正如埃克利和石井所写的:“低利率提高了从厂房、设备和存款的实际投资中所获得收益(相对于这些投资的成本而言)的现值。可是这种投资额是受到限制的(用信贷配给方法),不让它扩大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会使投资收益下降——或投资成本上升——至足以把企业主利润减少到和企业主最低供给价格相等的地步。这可以说是日本投资需求高涨的最基本原因”。<sup>⑧</sup>

### 公众储蓄的供给

就像应对照资本预期收益率计划来判断利率水平的高低一样,也有一个利率要多高才能使足够多的资金流入金融机构的问题。与利率相联系的储蓄供给弹性是很小的,而当我们注意到非常大的流动资金通过各种银行机构从家庭流入企业界时,不能不惊叹这怎么可能呢?表4.2以60年代中期的一个典型年份为例,对日本和美国有代表性大银行的贷款利息收益率和成本比例作一

比较可以看到,日本和美国的重大差别表现在存款上面,主要原因是美国活期存款约占银行存款总额的三分之二,而活期存款只占日本各银行负债的10%。这种情况当然可以使日本各银行持有较长期的资产。但同时,其利润也缩减了,在营运资金总额中只占0.48%,而美国银行则占1.63%。然而这并不是说日本银行界的经营不佳,事实是在高速增长时期它们的经营规模急剧扩大,实际上超过了按当时价格计算的国民总产值的扩大程度<sup>⑩</sup>,使它们在低利润的情况下也繁荣兴旺起来。同时,随着银行机构的相应发展,尽管凯恩斯预言吃利息的人会无痛苦地死亡,但给个人带来的利息收入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表4.3显示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息收入所占百分比同其他一些类别相比的数字。可以看出,第一产业业主的收入在1951到1974年期间所占的比重急剧下降,而个人的利息收入则显著增长,1951年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1.4%,到1974年增加到7.8%,而个人的股息收入则大致稳定在一个低水平上。

表 4.2 银行的成本和利润——日本和美国的比较

	日本	美国
贷款的利息收益率	7.00%	5.61%
吸收存款的成本	6.52	3.98
付出存款利息	4.12	1.86
营运费用	2.40	2.12
利润	0.48	1.63

资料来源:大藏省银行局金融制度研究组。这些比例数字是1966年后半期的状况。

表 4.3 各类收入在已分配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相对份额

	(若干年份)		
	1951 (%)	1961 (%)	1974年 (%)
农林渔业的业主收入	22.7	11.3	4.9
个人的利息收入	1.4	4.6	7.8
个人的股息收入	1.1	1.8	1.2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国民收入统计年报 1976 年》，第 60—65 页，年份指财政年度，即每年的 4 月 1 日至次年的 3 月 31 日。

总之，必须再次强调，所谓“低利率政策”主要是在一种固定的利率结构背景下，给企业配给投资资金，并利用公众将大部分收入以银行存款和邮政储蓄形式进行储存的倾向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在分析日本战后的投资热潮中，人们很难低估各种金融机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必须指出，日本银行作为一家具有管理各种银行机构的权威和能力的中央银行，实际上，它在各种场合独立于政府基本政策的程度比之其它中央银行（例如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要小得多。

## 6. 贸易和资本流入自由化的拖延

### 贸易自由化

日本在 1963 年接受关贸总协定第十一条款，1964 年又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八条款，同年 4 月又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换句话说，可以认为 1964 年标志着日本通商政策在关于非关税限制方面（如直接的或通过外汇审批而实行的数量控制）的一个转折点。但是，到了 1964 年，日本的经济已恢复其实力，达到



足以在大多数制造业生产方面抵挡国外竞争的程度,而仍享有制造业廉价劳动力的绝对优势,并同时在很大程度上赶上了其他先进国家尖端技术水平。

回顾起来,日本政府采取自由化步骤的灵巧的时间选择,经常提醒“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这不能不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实际上,举例来说,早在1961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执行董事弗里德曼先生来到东京进行年度磋商时,要日本参加“第八条款”的压力已经十分明显。但日本推迟三年以后才接受第八条款;在这段时间中,日本继续谨慎地一个一个地选择自由化的项目,以尽量减少某一特定工业的竞争劣势。在日本,经常把1960年到1964年夏天这段时期称之为“贸易自由化的第一阶段”,自由化比例1960年4月为41%,到1964年10月,逐步提高到93%,1965年10月,又采取重大步骤对成品乘用车的进口实行自由化,虽然一般仍依靠关税政策来保护国内生产商。

随着日本接受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国际义务,它在原则上不再采用贸易数量限制,而且不得不取消当时贸易中的外汇管制措施。但是在这方面,还允许某些进口项目作为例外,并称之为“剩余项目”。减少这些“剩余项目”的数目是日本自由化第二阶段的事,而这个阶段直到70年代初期才到来。取而代之的是60年代后半期出现的一种由所谓“肯尼迪回合”协议推动的逐步减低关税的总趋势。1968年5月日本接受了这项协议,以后在大约三年内把关税水平减少了30个百分点之多。表4.4概括了汽车产品的从值关税税率,从中可以看出这个过程。日本汽车工业大约在1961年感到来自国外的一种强大的要求日本贸易自由化的压力时,它仍然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对自身前途捉摸不定,并向通商产业省要求继续实行各种保护措施。<sup>⑧</sup>但是,正如上一章表3.7所示,1960年以后,汽车工业有了奇迹般的发展,它可以轻易地对付1965年的自由化和以后减低关税的措施。

60年代后半期是日本企业界和官方主要考虑减低关税和高度重视资本内流自由化的时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1966年4月1日的“剩余限制性项目”数为120个,第二年实际有所增长,直到1969年才恢复到1966年120个的水平。但从1969年起,“剩余项目”稳步减少,最后到1976年3月降到27个。这些项目主要包括农产品和制造业部门的少数几种产品,如电子计算机和皮革产品。这样,70年代上半期通常被称为贸易自由化的第二阶段。

表 4.4 以百分比表示的汽车产品关税税率  
(1968—1974年)

	汽车成品的关税税率			零部件的关税税率		
	小型	大型	大卡车	发动机	底盘	轴承
1月						
1968	40	35	27	30	30	25
1969	36	28	21.6	30	24	20
1970	34	17.5	18.9	30	21	17.5
1971	20	17.5	18.9	30	18	15
1972	10	10	10	15	15	12.5
1973	6.4	6.4	8	12	12	10
1974	6.4	6.4	8	6	6	6

资料来源:根据日产汽车制造公司的《汽车工业手册,1976年》(日文)第371页编制。

### 资本流入的自由化

对以直接投资为形式的资本流入自由化的时间选择也尽量安排得减少对国内新兴工业带来损害。

对日本的占领延续了约七年。在此期间,美国的统治地位不仅在重大决策方面,而且也在给予经济援助和为美国经济渗透奠定基础方面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紧随占领结束后的几年里,自然立刻就可以看到日本依靠美国所留下来的这种影响,并且有一种要求引进美国资本建立分支机构或者建立合资企业的强大压力。后者的例子已在前面一章讨论日本缝纫机工业发展情况中述及。在直到1963年7月之前的那些年代里,日本规定外资企业必须同意不把利润汇出日本才允许在日本建立其企业。早在战后初期可口可乐装瓶公司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在接受这种限制的条件下就在日本建立了分支机构。然而,这种限制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发生矛盾;在1964年日本决定成为参加基金组织第八条款的国家时,它不得不取消这项禁止将股息汇往国外的规定。从此以后,日本能够制约外国直接投资的唯一办法就是根据《外资管制法案》进行筛选。此外,由于日本在1964年4月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它就有责任尽快地实行资本贸易的自由化。特别是美国政府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以进一步迫使日本接受美国在汽车和计算机这类工业中的直接投资。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预料到的;通商产业省以它固有的对保护国内企业的关心,在60年代初派出一个专家组前往欧洲,调查美国资本向各个工业活动领域渗透所产生的影响。调查的成果载于一份称为《美国资本在欧洲的渗透》备忘录。该备忘录虽然从未公布于众,但为所有有关人员认真阅读。回想起来,那时在欧洲的美国直接投资已有显著增长,从1957年底的41亿美元增加到1964年的120亿美元以上。

日本政府采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鼓励当时称作为中性名词的“工业改组”,如八幡和富士合并成新日本制铁公司那样;另一方面提出所谓“对半公式”,即准许建立的新企业中,来自日本以外的资本要达到50%。1967年7月后,政府又采取某些自由化步骤,并

仍忠实地遵循“不太快也不太慢”的原则,把一个又一个工业列为可以“50%自由化”一类。但这个公式只适用于建立新企业。外资参与已建成的企业则受到更严格的管制,理由是日本公司所持有的高金融杠杆作用,或公司股东股份对总资本的低比率,会使外国人得以在利用资本总额中占极小的比重,而获得现存大企业的控制权。只是到1973年5月,日本才在原则上接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协定,使资本流入完全自由化,只有少数几种工业作为例外仍留在“不准名单”上。但当时大多数工业,包括一度受到垂涎的汽车和电子计算机工业,已经依靠日本自身的资本,获得了足够的实力,经受得住来自外国在日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几乎各种竞争。

## 7. 水电的补贴

因利息成本不同,工业用的水电成本在各工业部门中是参差不齐的。对有些工业部门来说,这些项目的成本在总成本中所

表 4.5 制造工业水电成本所占的份额

	(单位:百分比)	
	水	电
生铁	0.74	0.55
钢条	0.66	0.62
钢板	0.48	1.13
水泥	0.44	4.72
硫酸氨	7.35	34.42
尿素	2.58	2.78
粘胶短纤维	1.69	0.36
纸浆(DSP)	4.63	9.26

资料来源:佐藤武夫:《水经济学》(日文版),1965年,第191页。

占的百分比要比利息成本所占的百分比高得多。政府对工业用的水电费采取尽量抑低的政策,在某些制造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表 4.5 列举一些代表性工业的水电费成本在制造成本总额中所占比重的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无疑是粗糙的,指的是最后加工阶段两者的比率。有人利用投入—产出表对 1961 年数字作过更精确的计算,显示出原钢生产的电费占成本的份额高达 18.96%,水泥为 8.54%,化学纤维为 17.95%。<sup>②</sup>

### 工业用水

关于工业用水,所用的数量多少是随着工业生产指数的增长而不断增加的,从 1962 年的每日 3590 万吨增加到 1972 年的每日 1.015 亿吨。但是可以从表 4.6 中看出,在这十年中工业用水的

表 4.6 1962 年与 1972 年工业用水的供应来源

	1962 年	1962 年		1972 年	
	每吨成本 (日元)	利用数量 (千吨)	比重 (%)	利用数量 (千吨)	比重 (%)
总计	3.34	35931	100.6	101457	100.0
公共水厂					
工业用水	3.36	2201	6.1	11491	11.3
城市用水	16.22	3029	8.4	3530	3.5
地表水	1.58	6237	17.4	8257	8.1
地下流动水	1.93	2583	7.2	3163	3.1
井水	2.83	11046	30.7	15243	15.0
其他	1.96	671	1.9	884	0.9
再循环水	1.95	10165	28.3	58889	58.1

资料来源:《地下水政策的基本方向》,工业结构委员会工业用水基本政策小组委员会提交的一份中期报告(日文),1975 年 11 月,第 3 页。“1962 年每吨成本”数字引用通产省编《工业用水统计》,1962 年;总额的每吨成本是加权平均。本表不包括海水。

供应来源有了显著的变化。相对来说,利用再循环水多了,利用井水多了。这是政府采取劝阻使用地下水、以免使工业集中地区地面下沉进一步恶化的深思熟虑的政策的结果。为此,工业用水的供应价格或多或少按井水成本确定,而在供水系统建设阶段和供水点提供必要的补贴。在供水系统建设阶段的财政补贴程度据测定为资本成本的近 20%,而供应价格的补贴,虽然后几年有所下降,仍约占 17%到 7.5%。<sup>②</sup>

## 电 力

同水的情况不一样,工业用水和民用水的加工成本完全不同,而电力不管是用于工业还是用于家庭方面,都是同一产品。毫无疑问,大规模用电所需附属设备成本要比个别家庭用电户便宜。但是,如果我们看看 1962 年这一典型年份,家庭用电量所占的比重是 18.7%,而在电费总额中的比重是 35.9%,这些数字明显地表明在家庭用电和工业用电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补贴。

电力工业的成本会计比较复杂,计算交叉补贴程度的数值不可避免地会有差异。然而,60 年代初期一项公认的数据说明,“家庭用电的电费定在比应有成本高出 6.4%的水平,而工业用电的电费定在比应有成本低 4.9%的水平上”。<sup>③</sup>通过国际比较,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交叉补贴的情况。表 4.7 对 1962 年(按每千瓦小时的单位电费)日本和英国的电费作一比较。

这种交叉补贴到 60 年代后期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当 1974 年向上调整电费时,对大规模用电户提高了 84.8%,而对家庭用电户适度提高了 28.6%,使得这两类用户的电费差距大大缩小。但即使经过这次修订,前者的每千瓦小时单位电费仍只有后者的 52.9%。交叉补贴是否仍需保留,是可以争论的。但是,毫无疑问,它在 1974 年以前那段高增长时期,对用电集约型工业曾

发挥重要作用。

表 4.7 家庭用电和工业用电电费比较——日本与英国

	日本(日元)	英国(便士)
(1)家庭用电	11.95	1.665
(2)工业用电	4.59	1.349
(3)(1)/(2)(%)	38.4	81.0

资料来源:《公用事业费用及其背景的国际比较》(日文)统计研究会,1965年3月,第19页。

## 注 释

- ① 引自林雄二郎:《日本的经济计划》,东京,1957年,第144—145页。这里的这段话是从日文转译成英文。
- ② 1955—1957年的快速增长期在日本是指“神武景气”,其含义是指自日本传说中的第一位皇帝——神武天皇——时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景气。1959年和1960年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率又都高于“神武景气”时期(8.9%和13.3%)。因此,又比之于更早的天照大神(太阳女神)出自天岩洞口的神话,称之为“岩户景气”。6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又经历了再一次持续高增长时期,我们又得称之为“伊弉诺景气”,伊弉诺是日本群岛创始时的一个男性名字。
- ③ 加德纳·埃克利和石弘光:“财政、货币和有关政策”,载于休·帕特里克和亨利·罗索夫斯基主编:《亚洲新巨人——日本的经济是怎样运行的》,布鲁金斯学会,1976年,第236—237页。
- ④ 菲利普·H·特里基斯和铃木幸夫:“日本的政治、政府和经济增长”,载于帕特里克和罗索夫斯基主编:《亚洲新巨人》,第785页。
- ⑤ 这是:第2、第3、第6、第7、第8、第9等名次。根据日本钢铁工业联合会提供的资料,转载于篠原三代平:《论工业结构》,1976年,第258页。
- ⑥ 在《幸福》杂志发表的1963年世界最大工业公司100家(美国以外)排名录

中,这6家公司的排名次序如下:八幡第31名,富士第57名,日本钢管第65名,神户第70名,住友第86名,川崎排不上名次。

- ⑦ 参见对伊东光晴的访问文章,载于《经济学家》,1976年7月6日(第76—83页),第79页。
- ⑧ 林信太郎在《经济学家》(1976年6月22日,第80页)杂志上发表的他的访问文章里回顾了这一情节。林当时在通产省中负责农产品和海产品(包括糖在内)方面的事务。这种补贴措施极为有效,许多“出口”船只实际上是由日本船运公司购置。
- ⑨ 埃克利和石弘光:《财政、货币和有关政策》,第239页。
- 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收入统计:1965—1972年》,巴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75年。
- ⑪ 为了说明起见,我们这里举出一张作为1975年税制刺激措施一部分的准备金免税项目名单:
  - (1)呆债准备金
  - (2)退货未售出的损失准备金
  - (3)奖励准备金
  - (4)退职金准备金
  - (5)特别修缮准备金
  - (6)保修某些产品准备金
  - (7)价格变动准备金
  - (8)开拓海外市场准备金
  - (9)海外投资亏损准备金
  - (10)冲绳岛自由贸易区投资亏损准备金
  - (11)中小型企业结构改进规划准备金
  - (12)防止金属采矿矿场污染等准备金
  - (13)特定铁路建设折旧准备金
  - (14)原子能发电建设折旧准备金
  - (15)特定煤气设备建设折旧准备金



- (16)造林准备金
- (17)控制污染准备金
- (18)股票交易亏损准备金
- (19)干旱准备金
- (20)异常风险准备金
- (21)赖帐亏损补偿准备金
- (22)证券交易责任准备金
- (23)商品交易责任准备金
- (24)电子计算机买回亏损准备金
- (25)保证计算机程序质量准备金
- (26)参加冲绳岛国际海洋博览会准备金

关于这些准备金的详细情况,见《日本租税大纲》,1975年(英文),东京,大藏财务协会1975年,第87—94页。

- ⑫ 约瑟夫·A·帕奇曼和贝塚启明:“税收”,载于上引休·帕德里克和亨利·罗索夫斯基合编《亚洲新巨人》,第343页。
- ⑬ 东京都新财源构想研究会:《有关大城市租税制度不公正性的矫正》,1975年1月;同作者:《不公正的租税制度和财政结构的改革》,1976年8月。此两著作均发表在山本雅司主编的《改革城市财政结构的建议》(东京,新地书房,1979年)中。
- ⑭ 大藏省编:《公司企业的情况和统计》,年度丛书
- ⑮ 植草益:“公司税制度是怎样实际运行的?”《东洋经济》,1973年8月4日,第52—59页。
- ⑯ 同上书,第57页。
- ⑰ 约瑟夫·A·帕奇曼和贝塚启明著,载《亚洲新巨人》,第361页。
- ⑱ 埃克利和石弘光著,载《亚洲新巨人》,第205页。
- ⑲ 1956年底,城市银行未清偿贷款额达1.4万亿日元,而1956年的国民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为9.7万亿日元,或占14.4%;但到1974年底,前者增加到32.3万亿日元,而后者按当年价格计算,增加到132.5万亿日元,

或占 24.4%。

- ㉔ 特别可参阅今井善卫的回忆文章,载于《经济学家》,1976年9月14日(第78—85页),第82页。今井当时曾担任通产省国际贸易局局长。
- ㉕ 参阅日本产业构造研究所:《根据1961年投入—产出表对日本重化工业的分析》(日文),1964年。
- ㉖ 参阅《公共企业1971年年鉴》(日文),内务省财务局编,年度丛书。
- ㉗ 佐藤武夫:《水经济学》,东京,岩波书店,1965年,第193页。

## 第五章 转折点的到来

10%增长率的年代迟早要结束,这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在70年代开始时,资产阶级不愿意承认这一趋势。而后1973年第一次石油冲击的到来,不仅残酷地唤醒了人们对于高增长必然短暂的认识,而且也使人们看到了高增长阶段的不利方面。首先,人们注意到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况,这就是:尽管存在着一个非常高的生产增长率(意味着成本的降低),通货膨胀的趋势仍旧存在,对这种情况需要作出解释。这里试用“结构性爬行通货膨胀”的观点加以说明。其次,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意识到环境的恶化,当局最终不得不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立法改革,使得1970年在日本被称作“公害元年”,或者说进入环境挑战时代的一年。这样,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外部不经济和不能交易的舒适环境,自然就开始对用GNP指数表示的经济增长福利内涵提出疑问。由此,到70年代早期,战后日本资本主义高增长时期必然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 1. 1973年首次“石油冲击”

#### 转折的信号

我们在上一章中用来解释日本经济大约从50年代初就开始的二十年高增长的调查分析,也可以同时用来解释增长率为什么最终下降。首先,至60年代结束时,战后许多临时性促进增长的因素,其大多数效用已经或多或少地发挥出来了,例如像给予“康复期高尔夫球运动员”那样的优惠汇率和在最新技术领域中的迎

头赶上所发生的有利效应,在延缓自由化进程中所享受到的温室效应,以及通过开拓合适的海岸、提供由政府贴补的厂址方面的一次性效应等。而且,对高增长率有贡献的产业向高附加值部门转移的结构性变化,到70年代前半期几乎已发展到了它的极限;其他一些因素如对产业的特殊免税措施和所谓的“低利率政策”等,则已日益为人民大众所不满。人们怀疑它们是否仍然能像早些年那样发挥作用。另外一些日本所独有的因素,例如“政府指导”的广泛运用和家庭的高储蓄倾向虽然还存在,但仅仅这些因素不大可能会使50、60年代过高的私人投资率维持下去。正如俗语所说,“绳索能拉而不能推。”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正如我们在下一部分将讨论的那样,人们对环境的关切进入了新的境界,这从总体上看,必然会对市场导向型的企业行为产生抑制作用。

另一方面,代表日本统治集团情绪的乐观主义,在70年代到来之际,并无任何减退的迹象,很可能是因为:显得过于野心勃勃的“十年倍增”计划,实际上超额完成了。就实际GNP增长率而言,“岩户景气”开始的60年代前半期,达到了10.04%的年平均增长率,而以“伊弉诺景气”结束的下半期,更达到了11.54%。如以1960年的指数为100,则1970年为277.7。同样,就人均实际国民收入而言,十年内翻一番也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因此只有小部分的政论家对于像1970年总体能源研究委员会(一个政府咨询团体)所提出的日本1985年总的能量需求与供给可能性估计提出过疑问,该委员会认为在1970年到1985年期间,经济将会以实际GNP年增长率8.5%到10.6%增长。我们应记住(备作将来参考):在这项对1985年估计中,石油进口高达6.5—7.23亿公升。

借着这一高增长姿态的东风,1972年出现了“收入倍增计划”的后续计划,即田中角荣(1972年7月成为首相)发起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这一计划所阐明的总体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相当合乎时宜的。它强调要争取“进入‘人权复兴’的新时代,在那

个时代,人类、太阳和绿地,而不是大城市与产业,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主人。”<sup>①</sup>为了明显地与这一思想相一致,该计划提出疏散全国工业中心,为此务必发展大型运输和通讯网络。田中还认真地提出,到2000年,日本1/5的平原地带将成为高速公路区,到1985年,将有2700万辆卡车承运6000亿吨·公里的货物。<sup>②</sup>计划中的1970年到1985年实际GNP年增长率预期可能达到“潜在的10%”,到1985年,GNP达到10000亿美元水平(1970年价格)。

田中于1972年7月上台,随着这项计划事先公之于众,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土地价格猛涨,尤其是那些被该计划新圈定的、即将开发的工业中心地区。1973年10月,原先为汽油价格所设置的拦坝被冲垮了,四个月内原油价格(阿拉伯轻质原油)由每桶3美元升至11.65美元,<sup>③</sup>这对于田中内阁及其支持者来说是更大的冲击。这样,所谓的“首次石油冲击”光临了日本,带来了令人惊厥的影响,这一事件被十分合适地称之为“新价格革命”。

### 首次“石油冲击”

日本特别容易受到世界市场上原材料和燃料涨价的损害,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间石油价格增长四倍,倾刻之间就对经济产生了影响,如表5.1所示。从1973年后半期至1974年前

表 5.1 1973—1974 年有效需求成分的变化

	1973年7-12月到 1974年1-6月的百分比变化(%)	下降总额中各个 成分的相对份额(%)
私人消费开支	8.5	40.5
政府消费开支	3.7	-2.3
政府固定资本投资	-6.6	5.4
工厂、设备的私人投资	-19.8	58.3
存货投资	-0.6	0.2
出口与国外收入	1.6	-2.2
国民总需求	-9.2	100.0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经济研究所,以1965年价格的实际价格指数计算。

半期有效需求的几个组成部分呈显著下降(实际价格)。

特别要指出的是,“私人消费支出”和“工厂、设备的私人投资”,实际上占了有效需求下降的全部,这样,日本也同样进入了“滞胀”时期,即萧条与通货膨胀共存的时期。但日本的特点是:它比其它国家更清楚地立即意识到一种新的情况。它标志着一次基本上为新“价格革命”所制约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一次包含着原材料和工业燃料成本的不可逆转的上升。最初,日本产业对付这场“价格革命”的唯一方法,是利用前一阶段丰厚的利润积存来吸收成本的上升,而利用这一方法争取时间的同时,再寻求新的突破口。如果我们计算一下主要企业的“实际利润”(即帐面利润扣除折旧和存货价格调整),它们在1973年10月至1973年度的结帐期内,立即转呈为负数,如表5.2所示。至此,持续至1973年会计年度的“美景良辰”,在石油危机后一去不复返了。到1975年会计年度前半期(1975年4月至1975年9月)又出现了全面赤字。失

表 5.2 首次“石油冲击”期内主要企业的“实际利润”

(单位:10亿日元)

会计年度	
1965-1970(半年的平均值)	531
1971:上半年	570
下半年	570
1972:上半年	490
下半年	400
1973:上半年	580
下半年	-410
1974:上半年	260
下半年	290
1975:上半年	-80
下半年	130

资料来源:经济企划厅,《日本1976年经济白皮书》(日文版),第278页,根据日本银行《主要经营状况分析》的统计数据计算。

业人数也从 1972 年平均 735000 人上升到 1974 年第四季度的 850000 人,到 1975 年第四季度更达到 1130000 人的顶峰,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与老年人就业人数相对下降得最严重。

如前所述,即使没有 1973—1974 年的石油冲击,令人欢欣鼓舞的 10% 增长率年代,到 1970 年也已或多或少地逝去,尽管日本资产阶级不愿意承认这一趋势。而后,石油冲击的到来,不仅遽然唤醒了人们对高增长短暂性的认识,也使人们看到了高增长时期出现的某些不利方面。特别是,与增长时期同时出现的结构性爬行通货膨胀以及环境破坏事件更加频繁地发生,已成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的主要问题。同样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福利内涵问题。现在我们逐个加以探讨。

## 2. 结构性爬行通货膨胀

### 生产率提高与价格变化:理论上的联系

从理论上说,实际 GNP 的高增长率,意味着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和(或)总工作时间(或总的活劳力)的增加。这两个因素,在战后日本都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前者,正如第三章中所说明的那样。再从理论上说,在竞争性市场中,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降低,从而也意味着市场价格的下降。19 世纪最后 25 年里发生在英国的事例完全符合这一理论预期。名义人均收入从 1873 年的 35.15 英镑下降至 1893 年的 34.71 英镑,但对价格的下降进行调整后,实际人均收入(按 1913—1914 年价格)从 1873 年的 28.81 英镑增至 1893 年的 39.00 英镑<sup>④</sup>,上升达 35.4%。然而,这也许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最典型时期所特有的事例;从那以后,除了美国在繁荣的 20 世纪 20 年代中那短暂的几年外,就很难找到可与之相比的显示出竞争性市场力量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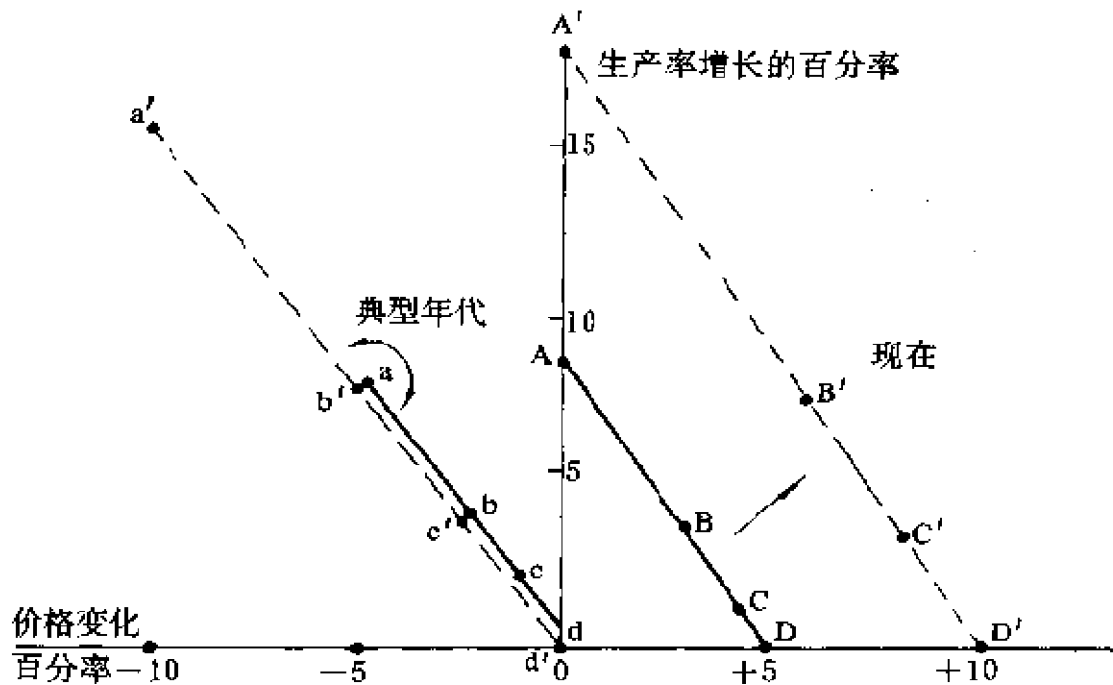
现在,市场不完善使得寡头公司求助于抬高定价,它与工会相

当强的抵消力量加在一起,已在像日本这样的成熟资本主义国家中,产生了一种不同的情况。下面先以一种假设的例子将两种情况作对比,如图 5.1 所示。

假设一国经济中有四个产业:(a)汽车制造;(b)纸张制造;(c)水稻业;(d)理发业。由于每一产业都有着独特的技术条件,其生产率的提高自然各不相同,就像在实际世界中那样。它们的年增长率以汽车制造业的 7.5%为最高,其次是造纸业 3.5%、水稻业 1.5%,理发业则为 0。假设在模拟的标准竞争条件下,每一产业的生产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导致价格下降 0.67%。从而,在年生产率增长率为 7.5%时,可以促使价格每年下降 5%,等等。对于理发业而言,由于生产率没有提高,价格亦就保持不变。这些关系在图 5.1 左侧用呈  $60^\circ$  负角的一条直线标出。它连接 a、b、c 和 d 点,其中 d 稳定在原点上。现在再假想技术条件发生了变化,四个产业的年生产率都翻了一倍,汽车制造业从 7.5%上升至 15%等等。这在标准的竞争条件下意味着价格降低率也会比前期加倍:汽车制造业由 5%上升至 10%等等。这一新的关系在图 5.1 中以一条连接 a'、b'、c'和 d'的虚线标出。需要指出的是该线与前一条线角度相同,但超出了前一条,d'仍在原点上。如四个产业的权数相同,则整个经济平均价格下降率从 2.1%升至 4.2%,反映经济中总的生产率的提高。

这里让我们来看一下图 5.1 右侧标出的现在对照图,和典型年代一样,假设仍是四个产业,并且存在着同样不相等的生产率增长率。但新的情况中具有主导意义的假设是:无论生产率增长达到何种地步,增长率最高的产业(例子中的汽车制造业)一直位于表示价格变化为 0 的垂直线上。并且假定:各产业与生产率增长最大的产业之间所存在的生产率增长差异,将导致其价格上升到这种差异的  $2/3$  之数,仍以负  $60^\circ$  的直线标明(见图 5.1 中右侧连接 A、B、C、D 的实直线)。这种假设的理论基础是:(1)通过少





	典型年代		现在			
	生产率增长百分率	价格变化的百分率	生产率增长百分率	价格变化的百分率		
汽车制造业	a	7.5	-5.0	A	7.5	0
	a'	15.0	-10.0	A'	15.0	0
纸张制造业	b	3.5	-2.3	B	3.5	+2.7
	b'	7.0	-4.7	B'	7.0	+5.3
水稻业	c	1.5	-1.0	C	1.5	+4.0
	c'	3.0	-2.0	C'	3.0	+8.0
理发业	d	0	0	D	0	+5.0
	d'	0	0	D'	0	+10.0

图 5.1 百分率的提高与价格变动——理论上的

数制造者控制市场时抬高定价的做法,生产率提高所得的利益是由产业内部“资方”与“劳方”所分享,而不是通过价格的降低转让给消费者;(2)工会的抵销力量,随着他们的自我为中心的注意力

转放在他们在行业或企业中所处的相对地位上面,帮助了上述做法的实现(当资方得以不通过提高它们产品售价来消化工资的提高时,他们并不会强烈地抵制工会提高工资的要求);(3)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全国化,自然而然地会出现一种工资率平均化的倾向。(除了诸如需要多年培训的特殊技能,劳动强度特别高以及工作中所内在的不快或危险等因素。)

如果这种假设得以成立,那么不但生产率增长率和价格变化率之间的关系会像图 5.1 中的 AD 实线那样,而且当生产率增长率都提高一倍时,这条线会向右上方移动一段距离,这段距离的长度,取决于由 A 到 A'直线上移的幅度,如连接 A'、B'、C'、D'的虚线所示。这样如果四个产业的权数相等,整个经济的平均价格上涨率就从 2.9%到 5.8%,翻了一番。典型年代和现在之间的这一差异就非常明显。在假设同样的生产率增长率的条件下,前者会引起普遍的价格下降,而后者则是普遍的价格上升,而且,生产率增长率越高,则前者价格下降幅度越大,后者则价格上升的幅度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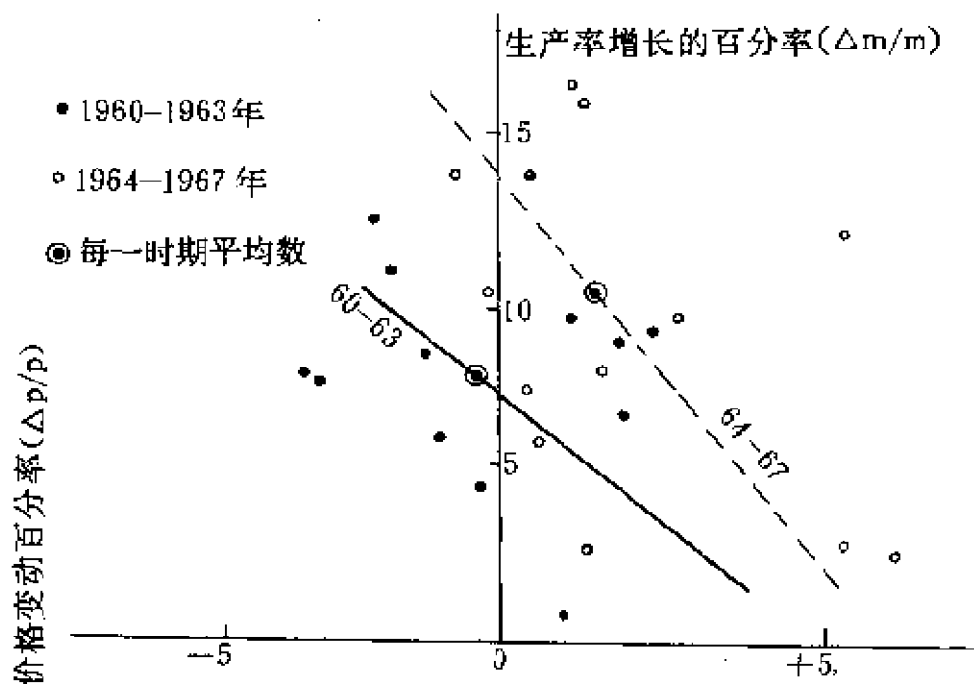
### 生产率提高和价格的变化——目前的经验

上述的对照图是假设的。但人们很难对其与日本近来物价上涨的相关性提出辩驳。比如,政府经济事务委员会下属的计量经济分析小组委员会为编制“新长期经济计划的中期报告”(1966 年公布),曾对 1954 年至 1964 年日本经济成就作出了详细的经济计量分析,他们从实证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即 GNP 增长率越快,消费物价上涨率也越高。并且,自那以后,在日本形成了一种共识,即 GNP 增长率定得太高会引起更快的通货膨胀趋势。这种分析是针对原材料和工业燃料的供给弹性都有利于日本的时期而作的,其协方差数据也表明通货膨胀趋势至少不是由于以后随石油危机而来的全世界“价格革命”所引起的。

从我们上述的假设分析中所能得出的理论预期,事实上已为几个产业的生产率增长率和产品价格变化相对比的统计分析数据所证实,如图 5.2 所示。图中将两个四年时期:即 1960—1963 年和 1964—1967 年进行了对比。在每个时期,我们早先的假设大体上得到了证明,即生产率增长最低的产业或多或少显示出物价上涨率最高。而且,还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从 1960—1963 年到 1964—1967 年的生产率增长率的全面上升使得最小方阵线明显向右上方向移动。

如果我们进一步把分析范围扩大到包括制造业以外的农业和服务业等产业部门,那末上面用以说明爬行通货膨胀和高 GNP 增长率并存这一事实的假设前提,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如果仔细调查几个行业中卖方垄断性定价策略和工会在逐年的集体谈判中讨价还价的行为模式,那末也可以进一步获得取证。值得注意的是,工会抗衡力量最强的产业,也是生产率增长得最快的产业。只要这些条件继续存在,各种各样的市场不完善也同时存在,那末今后日本经济要规避高 GNP 增长率和几乎同等程度的爬行通货膨胀之间的紧密联系,将是十分困难的,除非从政治上考虑实行一项有效的收入政策。一些日本经济学家称这类通货膨胀为“生产率差异引起的通货膨胀”。但笔者选用“结构性爬行通货膨胀”这个词。

根据上述分析,现在概括地引述有关的统计数字,以证实(尤其是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特别快的时期,正是批发价格指数爬行增长、消费价格指数则较大幅度地上升而日元汇率又趋于坚挺的时期。在前一章(第三章表 3.1)我们已引用了五年期年均增长率(1970 年到 1973 年则用三年平均数)统计数字,说明在 1950 年到 1973 年的高增长时期中制造业生产率增长趋势,现在我们可以再列出每个五年期内的价格水平百分比变动数字(见表 5.3)。在表 5.3 最先和最后两个分期中发生了朝鲜战争和石油冲击两突发事



	$\Delta m / m$		$\Delta P / P$		$\Delta m / m$		$\Delta P / P$	
制造业(平均数)	60-63	7.4	-0.3	纺织品	60-63	6.3	+2.2	
	64-67	10.9	+1.6		64-67	9.4	+2.9	
钢铁	60-63	8.3	-3.4	食品加工	60-63	0.3	+1.2	
	64-67	15.5	+1.1		64-67	2.1	+1.3	
有色金属	60-63	8.4	-3.7	橡胶制品	60-63	5.4	-1.5	
	64-67	11.6	+6.2		64-67	5.1	+1.0	
工程设计	60-63	8.3	-1.4	皮革制品	60-63	9.0	+2.2	
	64-67	14.1	+0.3		64-67	2.9	+6.2	
化学制品	60-63	12.1	-2.6	木材加工	60-63	-2.2	+7.3	
	64-67	14.0	-0.9		64-67	2.4	+5.6	
石油及煤制品	60-63	14.0	-2.9	制陶业	60-63	9.1	+2.3	
	64-67	17.2	+0.4		64-67	7.5	+1.9	
纸和纸浆	60-63	9.4	+1.0	烟草业	60-63	4.1	-0.2	
	64-67	6.7	+0.4		64-67	10.8	-0.1	

注：表中， $\Delta m / m$  代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百分率。 $\Delta P / P$  代表批发价格变化的年平均百分率。前者摘自日本生产率中心编辑的生产率研究文集，后者是通过对本国银行所公布的部分批发价格系列指数进行计算得出的。

图 5.2 生产率增长和价格变动——实际情况

件。不过,即使把这两者排除在外,仍然清楚地说明:制造业异常高的生产率增长,必然意味着制造业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但结果却没有出现价格的下降以造福于消费者。还需指出的是,1971年12月签订的史密森协定,使日本的固定汇率提高了17%(升至1美元兑308日元)。

表 5.3 1950—1973 年生产率增长和价格变化

	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 年平均百分率(%)	每一时期的价格水平变化	
		批发价格	消费价格
1950—1955	17.5	+39.0	+35.1
1955—1960	6.2	+2.7	+10.1
1960—1965	8.9	+2.1	+35.0
1965—1970	17.8	+11.2	+29.2
1970—1973	10.4	+15.9	+24.5
(1970—1975)		(+56.5)	(+76.8)

资料来源:批发价格水平的变化是根据日本银行《1989年经济统计年鉴》(1990年3月)第316页上的统计资料中计算的。消费价格水平的变化是根据《1990年日本国势总览》(1990年6月)第589页上的统计资料中计算的。

### 3. 对环境的日益关心

#### 日本容易遭受损害的环境

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标志着日本经济出现了另一个转折点,那就是,人们提高了对工业化社会中环境破坏的认识。日本人确切地把1970年称之为“公害元年”,<sup>⑤</sup>或者是进入环境挑战时代的第一年。

熟悉的缩写字“GNP”在日本,比在任何其它国家更可以用来表示国民总污染(Gross National Pollution)。不容置疑,二十年的极高增长率,是以牺牲各种各样不能交易的舒适环境为代价的,

并且是使广大民众承受非货币损失的原因。事实上,市场上导型经济中采取的各种反污染措施,正可有助于产生新的有效需求来推动 GNP 增长,就像谚语中所描述的:某一个社会,由于有意识地通过“引进”蚊子,为杀虫剂和蚊帐创造了市场需求,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失业问题。另外,还应该指出,尽管其它国家经常把优美的环境作为“只有当收入达到相当高水平后才可以享受到的一种奢侈品”,<sup>⑧</sup>然而在日本,环境污染地区的特点总是由这些地区的穷人承受其恶果。

当我们考虑到按可居住的单位土地面积计算,以日本的产业密集程度为最高(这也许比其它方面更能说明日本独一无二的特性)这一事实时,这就毫不足怪了,比如,70年代早期,日本每1000平方公里可居住土地面积上的石油消耗量是8770万桶,而德国是4990万桶,英国是3150万桶。与此相似,日本每1000平方公里可居住土地面积上的用电量为2680亿度,而西德只有1330亿度,英国只有1090亿度。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提出的那样,这就是“日本公司”要为填海造地开发土地作出巨大努力的背景。然而,这种努力对于环境来说有极大的破坏性,濑户内海的目前状况是最典型的例子。作为指定的国立公园之一、濑户内海在《濑户内海环境保护法》(1973年)中被描述为“不仅是日本和世界上无可比拟的大自然美景所在,而且也是日本宝贵的海洋资源宝库”。但是,为了产业利益而推行的填海造地持续了十年有余;而现在在这块沿着濑户内海海岸线的为日本三大主要岛屿所围绕、并且有三处海峡与太平洋和中国的东海相通的22000平方公里土地上,却集中着全日本53%的钢铁制造能力,40%的石油提炼业,35%的石油化工业,63%的炼铜业和76%的炼铅业。如果把这一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加在一起,它比英国这些产业的全部生产能力还要大,并且在5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现在已砌起了水泥墙。以前曾一度成为日本人的骄傲的自然美景现在从环境的角度来看,已成

了头号有问题地区；尽管采取了种种反污染措施，这里的环境仍然日趋恶化，比如，这一地区具有代表性地点的平均透明度，从 1953 年的 9.3 米下降到 1972 年的 6.3 米；同期，氮和磷酸的浓度分别从 1.5ppm 和 0.33ppm 上升到 3.6ppm 和 0.54ppm。赤潮或海岸植物群的异常扩散，据报导 1974 年共发生了 298 次，而 1970 年为 79 次，1950 年只有 4 次。

濑户内海地区发生的一切或多或少地代表了盲目追求高增长率而忽视环境优美的行为方式。尤其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相对地极为迅猛的扩张(第三章已讨论过)，这些工业大体上比其它产业具有更大的污染性；
2. 城市化程度大大超过了人口的变化；<sup>⑦</sup>
3. 大众消费市场爆发性的发展，尤其是私人汽车的消费<sup>⑧</sup>。

以上各点使得补偿性社会费用的支付可悲地滞后，这些就是高增长率时期环境破坏的明显特征。

那么，与日本高增长有联系的环境恶化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总体上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对这种恶化作出数量上的测定：(1)污染源喷发的污染物；(2)可客观地测知的环境污染现象；(3)对人类和其它有价值物体所造成的损害。对于这三者有必要作出明确的区分。由于在每一方面都有各地区的各种特点介入其间，因此要用单一的测量“污染”的方法来作出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甚至对同一地区不同时间作出比较，都往往会令人误解。而且，当我们从上至下研究这三个方面时，必须记住环境破坏的量的变化通常会引起质的变化。换句话说，在进行任何国际间比较时，有必要把污染的绝对值和诸如环境吸纳能力、地理结构、人口密度、当地政府机构所采取的反污染措施等等联系起来评估。

## 足尾和达克镇相比

所以，把战前两大铜冶炼中心的历史作一比较是有益的，它们就是美国的达克镇和日本的足尾。常常和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多种目的发展相联系的达克镇史话，讲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坐落在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麓的、由高大硬木林所围绕的一个美丽村庄，转变为一个繁华的铜矿冶炼中心，随后又变成了荒凉之地，周围林地荒芜，河水污染，鱼虾无以为生，原先绿油油的牧场变得光秃秃的。发生在达克镇之前的是足尾<sup>⑤</sup>的史话，它同达克镇的情节十分相像，并且在日本经常被作为经典的公害例子来引用。这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达克镇坐落在人口稀少的地方，而足尾靠近一条河，这条河在 50 公里的流程中直接影响着已开垦的、人口密集的 200000 公顷土地。对足尾炼铜业的反抗运动起初并不具规模，不会对崛起的资本主义工厂产生什么不利影响。这家工厂甚至还采取了高傲的姿态，否认他们的生产活动和沿河农民的灾难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政府也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实际上站在炼铜厂一边。但反抗运动仍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及至该地区的国会议员田中省三把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成为运动的领导之后，声势大振。田中时而使这个问题为国会瞩目，时而夜以继日地与当地农民在一起，以增强抗议组织的力量，时而又直接上禀天皇（1901 年），他的这些活动对取得炼铜厂的某些让步和使得政府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很有帮助。但是工厂作出的让步是：（1）付给一笔赔偿金，很可能主要是为了贿赂村中长老们，而不是按比例地赔偿农民所受到的损失；（2）宣布将从德国进口并且安装“过滤设备”。后来证明这套设备是用来再生可再利用的废料的，并不具有提出抗议的农民所期望的那种改良功能。抗议活动就此以比以前更加凶猛的形式出现，使人联想起以往的佃农暴乱事件。当时最激进的是谷中村的农



民,政府则通过指定谷中地区为利根川泛滥时应急用专用地的方式给运动以致命的打击。农民们被迫放弃在那儿耕作,拿着一丁点补偿金,流落他乡。田中仍像以前那样竭力反对这种作法,但没能改变内务省的政策。以后,随着这一事件的失败,足尾的反抗运动迅即失去了原来的势头<sup>19</sup>。

### 得而复失的教训

足尾史话的特点是把公害问题主要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斗争,而没有形成为一个法律的问题。人们本来指望,像足尾公害事件那样引人注目的问题,其污染的溢出源如此明显,至少可为制订一项新的法律框架、控制这类不可避免的冲突起到推动作用。但是当时的法律专家并没有对那样明显的需要作出反应,当时的时尚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动力不该受到任何足以抑制其功能的阻力。但非常明显的是,日本环境恶化的历史与日本工业化的历史一样久远,这方面可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我们就不想在此详细讲述了。更需要指出的也许是,日本资本主义在经历了某些引起利益冲突的突出事件之后,已逐渐摸索到了反污染措施的基本要领,并已在采取行动,即:

1. 合理选择设厂地点,若有必要,把工厂迁至新地点;
2. 控制污染源头;
3. 渗滤措施;
4. 削减生产等紧急措施;
5. 对受害者补偿。

然而这些教训在 20 年代末日本开始军国主义冒险后的一段时期内被一下子搁置一旁,及至战后重建时期又几乎完全被遗忘了。战后日本引起人们注意环境恶化问题的早期报导为:

1. 1953 年,水俣地区猫和鸦发生痉挛性死亡的报告,继之以窒素(氮)公司在 1956 年 5 月向当地卫生局所作的第一份关于水

候一些居民患了“无法解释的疾病”的报告。

2. 1959年,四日市(日本最早石化联合企业之一所在地)市民向市政府申诉,说明气管炎疾病突然增长的事实。

3. 1955年,在第17届外科专家大会上报道了在神通河沿岸某一地区存在当地称为“痛痛病”的特殊病例。

所有这些事件随后进发为全国范围内的大争论,每一事件都被诉诸法庭。但60年代是向前冲刺的年代,这些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要性只为当时少数有关科学家所重视。

### 意识的新转变

然而,随着日本的经济发 展势态的继续,科技经济力量变得失去控制或外部不经济性大大扩展的危险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公众反抗实际和潜在的工业污染的运动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有效。如在1964年的三岛—沼津事件中,人们成功地阻止了在当地建立一家工业联合企业。从而,政府最后不得不从总体上认真地处理公害问题,起草了《有关控制环境 污染的基本法》,并在1967年7月经立法机构通过。1968年12月联合国大会发起召开一次有关环境的国际会议,并于1970年春,由日本作为主办国主持了一次讨论环境恶化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国际专题讨论会,这股势头更加风起云涌。

可以说这次专题讨论会从许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尤其是在闭幕会上通过的《东京决议》,其中的一部分讲到:

“首先,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强烈要求以法律形式通过这样的原则,即:人人有权享受一种不包含任何危害人们健康和福利以及自然景观(包括美丽景色,它将是当今一代留给后一代人的宝贵财富)的优美环境。”

这个声明,是重新确定公民在环境方面应享权利的一个出发点。它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对上述《基本法》措词的修订。

这一 1967 年制定的法律包含了对私营企业集团的——项妥协，这就是在第一条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说明该法目的的文字：“在前段所规定的生活环境保护中，应同时考虑到需与稳健的经济发展相协调。”这里所谓的“协调条款”所包含的意思是，控制环境污染的需要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应服从于促进经济活动的要求。但这条款早在制定时就引发了许多批评，并在随后几年中，成为激烈争论的焦点。于是政府最终决定建议修订这条法律，删除有争议的这一段。1970 年国会的一次会议通过了这项修订案，在第一条第一段中阐明的目的是“保护国民健康和维持他们的生活环境”，可以说这比以前的条款减少了其相对性。这次国会会议后来被称为“公害会议”，因为除了基本法的修订外，它还通过（或修订）了十四项有关环境保护的其它法案。它还要求建立一个新的部门——环境厅，负责制定和发展关于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并协调其它管理部门在这一领域中的活动。环境厅后于 1971 年 7 月成立。

### 反污染诉讼和标准

在 70 年代的最初几年，有关环境问题的诉讼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也值得注意。在从 1971 年 6 月到 1973 年 3 月这短短的、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四起主要公害审判案例，均以代表环境恶化受害者的原告获得胜利而告终。它们是：

1. 镉中毒引起的“痛痛病”案；
2. 汞中毒引起的“新潟水俣病”案；
3. 引发呼吸道病的“四日市污染”案；
4. 汞中毒的“熊本水俣病”案。

除了“痛痛病”案例可以援引《采矿法》中有关负有完全责任的规定外，其它案例都主要依据民法 709 条，“无论谁有意或无意侵害他人权利都必须赔偿所引起的伤害”。这一条款确定了违法行

为的一般责任,但从未意图受理诸如四日市污染损害等案例,因而,在受理以上每一案件中,法庭都陷入缺乏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文依据的困境,不得不寻找新的处理办法。

通过对上述四个案例的判决,应该说法庭确实已建立起几项法律原则,这些原则有可能在将来的污染案件审判中进一步得到巩固。在“痛痛病”案例中,法庭同意将流行病学的证据作为其因果关系充足的证据而被接受,这一原则将易于更快地使那些存在科学争议的案例中的受害者获得赔偿,因为如果要获取科学上必要的和充足的证据将要花费许多年。在“新潟水俣病”案中,举证责任落在了处于被告地位的企业而不是原告身上,从而前者必须提出其流出物不会导致水俣病的证明。这项原则一旦确立,将在规范和便利受害公民诉诸法院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在“四日市污染”案中,有效地应用了民事侵权行为原则。这起案件具有的一

表 5.4 空气质量和汽车排气标准之国际比较

	空气质量标准,1975 <sup>a</sup>			年份	汽车排气标准		
	二氧化硫 (ppm)	粉尘 (mg/m <sup>3</sup> )	二氧化氮 (ppm)		一氧化碳 (g/km)	碳氢 (g/km)	氧化氮 (g/km)
日本	0.04	0.10	0.02	1976	2.10	0.25	0.60
日本				1978	2.10	0.25	0.25
美国	0.14	0.26	0.13	1975 <sup>b</sup>	9.30	0.93	1.93
加拿大 <sup>c</sup>	0.06	0.12	0.10	未来	2.13	0.25	1.94
法国	0.38	0.35	n.a.		n.a.	n.a.	n.a.
瑞典	0.25	n.a.	n.a.	1975	24.20	2.10	1.90
意大利	0.15	0.30	n.a.		n.a.	n.a.	n.a.

注:

a. 所有数字为日平均值或与此相当者。

b. 联邦政府标准。

c. 指安大略省。

资料来源:根据各种政府资料编制而成。

个特点是原、被告双方为数众多,在任何一个原告所受到的伤害和任何一个被告的行为之间实际上无法证明存在具体的因果关系,即使援引“证据优势”的宽松标准也无济于事。这样就为扩大民法第 719 条的范围、使它为适用于包括“四日市污染”案例一类污染事件开辟了道路。在“熊本水俣病”案件中,司法上的革新包括:(a)扩展污染公司的责任概念,将其责任追究到自然环境遭受侵害时(甚至在人体健康受到伤害之前)算起;(b)重新计算应付给受害者的赔偿金而不管公司早期支付的赔偿费为多少;(c)把所指控企业的内部机构作为单一法人规定其法律责任。对于这些立法上的革新,在环境诉讼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今后如何进一步发展,还有待事实来说明。

毫无疑问,1972 年 7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有关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大会,至少在随后几年内,为日本公私两方面的反公害策略和运动提供了新的推动因素。例如,日本社会中普遍的态度,是对空气质量和汽车排放物采取比其它先进工业国家更为严格的标准。表 5.4 显示了当时一份研究报告所得出的对比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日本空气质量中对二氧化氮的要求和对汽车排气中的各种氮的氧化物控制非常严格。事实上,这些标准也是日本国内汽车制造商和公众所激烈争论的焦点,后来(1978 年)环境厅作了补充和修正。

另一个可以证明日本在那个年代致力于采取反污染措施的标志见之于私人企业中反污染投资占工厂设备总支出的相对比重上,1965 年这一比率为 3%,大致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相上下。但在随后几年,日本的比率稳步上升。1969 年达到 5%,1972 年上升至 8.6%,1975 年最终增至 18.6%<sup>①</sup>。就绝对值而言,私人企业反污染投资额在十年中增长了 39 倍,从 1965 年的 297 亿增加到 1975 年的 11783 亿日元。还必须补充一点,即正如本节开始时简要提及的那样,GNP 的计算不仅包括所生产的“货物”和劳务,还

包括为消除在生产“有用商品”过程中所伴生的“有害物”而营销的“除害”品，因而这也同样构成有效需求的一部分。

### 市民运动的高涨和挫折

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日本民众继续对政府和私人企业促使环境恶化的任何行为持批判态度；并且随着高速增长时期的发展，环境问题日渐成为人权问题，而不是主要从成本—收益上考虑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要求享受“环境之权”、“享受自然界统一体之权”、“享受海滩之权”、“享受阳光之权”等等。这些有关公民基本民权的观念就成为为环境而斗争的民众运动的理论武器。但是，当我们研究这些运动中每一次事件时，不能不对其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特点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一方面无偿地把大量精力和时间投入到运动中去；而另一方面对手十分顽固不化，他们集结现存体制中的一切手段于自己一边，包括“法律的拖延和官吏的傲慢”在内。一些读者也许会记得所看过的一部日本古典影片《生存》，它描述了一个患病的区行政官员的故事。这位官员在当地市民的支持下，克服了各种困难和阻挠，终于成功地为市民建成了一座小公园，最后他在公园的秋千上含笑死去。与此相反的是，在填海造地为满足工业需要而造成成千上万公顷土地上面所显示出来的那种轻而易举的姿态。后者在一些政府官员头脑里酝酿以后，就得以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最终得以完成。这个对比，就像是一大群人，包括妇女和孩子，在一片没有道路的荒芜之地，吃力地推着一辆沉重的货车，和一队训练有素的机务人员在光滑的铁轨上驾驶着一列流线型火车那样突出。

随着高速增长时期公众对整个环境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醒，大众舆论越来越赞成采取保护自然和控制污染的行动。现在所需要的是要修建“道路”和“铺上铁轨”，使市民们要求改善人类环境的车辆，得以比以前更容易地推进。在这方面，日本可以从1970年

密执安州所颁布的一项立法(称《托马斯·J·安德森·高登·洛克威尔环境保护法案》<sup>(19)</sup>)中学到有益的经验。它是由密执安大学教授约瑟夫·萨克斯提出的。萨克斯教授曾是前面提到的东京专题讨论会的参加者,他对前文提及的《东京决议》的起草作出了比其他任何人都大的贡献。萨克斯在制定《密执安法律》过程中的基本思想是:普通市民应该早在污染损害能够被推断出来的阶段就在审判污染案件中扮演司法部分的角色。

#### 4. 对 GNP 指数中福利内涵的思考

大家都同意用 GNP 或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讨论经济增长,而且在公众的讨论中,人们已经习惯于把 GNP 的增长等同于至少近似于经济福利的增长。这个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持有的观点当时是有其坚实的基础的。例如有一段时间,资本主义国家中大量的失业直接导致数百万人承受严重打击,当时任何能够扩大有效需求的办法,甚至包括毫无意义地在地上挖洞然后填上,只要它能带来就业的净增长,都被认为是提高福利的积极步骤。事实上,在大萧条随后的一段时期中,经济学家们头脑中关于 GNP 增长与经济福利增长的紧密联系更加有了发展,这主要应归功于经济思想领域中的凯恩斯革命。我们中的大部分人也都赞同这一观点,即对于那些还停滞在糊口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以 GNP 衡量的经济增长,也许是意味着经济福利的进步。

##### 经济发展程式的负效应

由此而形成了一种通常的概念,即把 GNP 的增长等同于经济福利的增长。但是朝鲜冲突爆发后,日本经济以罕见的高速度增长的二十年中,这个概念受到了极大的怀疑。对此怀疑的几种具体形式在本章前几节中已经讨论过,这种对 GNP 指标福利内

涵进一步思考的抬头,是战后日本发展过程出现转折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可以先举一些伴随着(以 GNP 大小衡量的)经济高速发展的急剧变化而产生负效应的具体例子。有一点非常重要:这些负效应从来都不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有意创造的,而是市场机制对可称之为“上帝”的消费者的短期刺激所作的或多或少的忠实反应。我们举的这个例子选自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个普通侧面。两代人以前,东京市民日常习惯去公共澡堂洗澡,在家中不安装任何私人浴室。公共澡堂曾经是日本最民主的场所,在那儿除了非常有钱的人外,每一个人都赤裸裸地互致问候或互通款曲,回家时意气风发、心满意足。但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战后时期,家家户户接连设置私人浴室。有私人浴室的家庭成员就不去公共澡堂洗澡。60年代末,这些公共澡堂顾客数量急剧减少,自然使得浴资上升,以求收支平衡。浴资上升引起了两个后果:挫伤了顾客光顾公共澡堂的积极性,同时又促使市民们等候尽早置备家中浴室。因此尽管浴资上升了,东京一些公共澡堂还是不能维持下去而被迫关门。到1970年,东京尚有二千多家公共澡堂(分布在23个街区)为这些地区1/3人口服务。但是衰败的趋势仍在继续,每年有20到30家澡堂关门。那些仍不得不依靠公共澡堂的市民基本上都是穷人,他们负担不起安装私人浴室的费用,或者家中也没有地方安装。当附近的公共澡堂关门后,他们怎么办呢?要么,只得将就不洗澡(这对日本人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要么,就走两倍的路程,到较近的、尚在营业的澡堂去。不管怎样,实际上穷人受到了歧视,但没有人能指责那些浴室老板,他们只是忠实地服从市场指令而已。富裕给富人带来了舒适而将困难留给了穷人。

与此多少相似的事例是私人小汽车进入城镇和郊区人们的生活之中。四十年以前日本人拥有私人小汽车的很少,几乎每个人都以这种或那种公共交通工具代步。但随着富裕程度的增加,一



个汽车时代很快来到了日本。设想四十年以前,有一条从郊区中心到城市商业区的、通畅的公交线路。首先,不妨假设 A 先生增加了收入,决定买一辆小汽车代步。只增加一辆汽车对道路拥挤程度无足轻重,A 先生可以轻快地超越他的同事们上下班所乘坐的公共汽车,同事们都羡慕 A 先生。不久,他们当中的 B 先生也买了一辆汽车,脱离了乘公交车的行列。随着富裕阶层的扩大,C 先生、D 先生等也如此这般。于是,道路开始变得拥挤。公交车不得不减速行驶,并且失去了主顾。公交车现在被迫提高收费,这同时又进一步加速了原来的主顾加入小汽车拥有者的行列。对汽车的需求越大,汽车价格就越便宜,这样也就更易于为一般公众所购买。等到三分之二的上下班乘客放弃了公交车,公交行业就会发现它不得不中止那条路线的营运。一旦真地发生了,那些余下的三分之一上下班乘客就被一下子剥夺了乘坐这种习惯性交通工具的权利,痛苦地感到拥有一辆私人轿车已经是生活所必需。这时道路已变得拥挤不堪,每个人都会觉得还是原来那种通畅快速的公交车更好些。但必须记住,在这过程中的每一步,市场都是忠实地听命于消费者的指令,市场机制本身不能逆转这个过程。有一句话恰当地指明了这点:“这是一条不变的历史真理,即随着社会变得富裕,人们不再能够享受那些当他们贫穷时所能享受到的快乐。”<sup>13</sup>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日本的 GNP 快速增长所带来的负效应。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前面章节中已经讨论过的那个环境破坏所造成严重社会后果的突出例子。这些后果总是使得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环往往受害最深。然而,由于 GNP 概念本身内在的局限性,关于 GNP 作为衡量福利标准之不可靠性的思考还可以进一步扩展到它与我们社会许多方面的联系上面。

## “市场失灵”实例

首先,GNP 的概念(或与之相关连的国民收入概念)是建立在市场上货物交换的基础上的,意指包括在市场上交换的各种货物和劳务。其必然结果,GNP 的计算单位可以说是市场上的货币价值,如果 1 克有毒的鸦片与 1 公斤大米的市场价格相等,那么这两者在国民收入帐目中就被认为是等值的。福利内容在本质上是具体的,但当所有的商品和劳务汇总到 GNP 或国民收入中时都只有单一的内涵,即其市场价值,从而所得出的这种数量上的记录并不一定能与具体的福利内容相联系。

马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究竟谁是何种特定货物或劳务的福利内涵的评定者呢?如果有人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个人自作决定的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正如密尔顿·弗里德曼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按他自己的意愿愚蠢地行事(假设他的行为不伤害别人),也要比他受命明智地行事要好。这就是一种自由放任主义的观点,它将竞争性市场经济体系置于优于其它任何体系的地位。然而,即使是这种观点的积极拥护者们,也承认有着可归入“市场失灵”的事例存在。它们至少包括两类:(A)存在着几乎完全不能进行市场估价的“物品”或者所需要的东西——“物品 A”,诸如自然美之类;(B)即使在运行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也很经常地产生被称之为“外部效应”(正效应和负效应)的“物品 B”和“有害品 B”。这些市场失灵事例也许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市场估价上间接地反应出来。但是,正如在以牺牲自然美为代价扩大建设事业的事例中那样,GNP 的计算方法充分考虑其建设的一面而忽视被牺牲一面的不利后果,而且那些用来改善“有害物 B”的经济活动,如果作为反污染措施出现在市场上,也会以正值计入 GNP。

换句话说,除了 GNP 概念有短期政策倾向外,如果某种假设

能够成立,特别是如果市场失灵的因素微不足道的话,那么 GNP 的大小和经济福利数量之间的长期联系就可以肯定下来。更具体地说,这些假设是:(1)正的和负的外部效应都不重要;(2)具备消费者上帝的条件;(3)奖励制度失效的情况,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毫不重要。的确,即使在竞争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这三条假设也不能完全成立。外部负效应常常十分严重,如 19 世纪后期,由于足尾炼铜厂的污染对农业和林业造成的损失所显示的那样。还可以说,消费者是上帝的说法也仅仅只是经济学家自鸣得意的推理而已。一百多年前,约翰·拉斯金在向制造商们作的一次讲话中说道:“作为制造商,你们一定要牢记,你们的事业是要像供应市场那样来形成市场[……]。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你们的一生将成为败坏公众情趣和鼓励公众浪费的一生。你们用艳丽的商品所获得的购买者的偏爱,肯定是基于他们的虚荣心上面;你们用新奇产品所创造的每一项需求,也就在消费者之中滋生一种不满足的情绪;而当你们隐退,过上赋闲生活时,你们也许还会回想起作为晚年的自娱,想起正是在你们过去的生产活动范围内,你们的一生成功地阻止了艺术的发展,败坏了人类的美德,混淆了你们国家的行为规范<sup>19</sup>。”

拉斯金无疑是位敏感的人;但在他的讲话中确实有一真知灼见,即“制造商在形成市场”,这一点即使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年代,也不能轻易地驳倒。至于第三条假设,只要看一下这一事实就足够了:由于继承财产所造成的歧视倾向,给一些幸运者以优越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不依靠自身的努力,便可获取国家大馅饼中的一份。

尽管有这些背离,但我们可以说,在竞争资本主义的全盛时期,GNP 的大小与经济福利之间有紧密联系的假定,相对地并不存在足以令人误解的涵义。但在今天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情况就不同了。不仅由于技术进步大大增强了产生外部负效应的可

能性<sup>⑨</sup>，而且，与此同时消费者的偏爱也正在逐渐地起变化，现在那些不能用数量计算的、保障舒适生活的各种权利，正日益受到比以前更大的重视。

### GNP 的非福利成分

有活力的市场是那种能够经受得住最终消费者“货币投票”的市场，这些消费者投出“货币投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获得生活必需品。但问题就在这里。在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往往是相对于那个社会所建立的制度和别的条件而言的；人们的需要又常常被商品和劳务供应者人为地刺激出来，在极端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可以将市场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换句话说，在那些消费者所投的、随后作为 GNP 组成部分的“货币投票”中，有一些选票的福利意义是值得怀疑的。这里我们可以将它们归入四类：

1. “生活费用”类；
2. “收入干扰”类；
3. “体制化浪费”类；
4. “社会财富耗竭”类。

下面对每一类作简要的解释。

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消费支出中，有某些项目可归入必要费用一类，而且我们希望其所占比重越小越好。冷天取暖费用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正如我们在诸如东京那样拥挤的城市越来越多地观察到的，在环境舒适方面得不到补偿的很高的交通费<sup>⑩</sup>。但是还有更为复杂的生活费用类消费的例子，它们诱使公民由于制度或社会的发展而投出他们的“货币选票”。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据说在美国<sup>⑪</sup>广为使用昂贵的夜盗警报器，以对付日益猖獗的夜盗事件。的确，在费用类消费和最终目的物消费之间往往很难划出一条明确可靠的界线；但也有以前曾经是奢侈或半奢侈品而成为一种必需品的鲜明事例。本节前面已经描述过

的,战后日本公共澡堂和公交车的消失就是这样的好例子。

至于“收入干扰”,最早是由熊彼特提出的。他以在鸡尾酒会上开玩笑的口气,揶揄美国的律师职业,讲到他在办理加入国籍的繁琐手续中,曾经不得不依赖于他们的服务。毫无疑问,凯恩斯也会同情他,因为他也明显地感到美国律师的存在实质上是多余的。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词中所讲到的那件事是相当闻名的<sup>⑩</sup>。“收入干扰”现象可以定义为:那些原本非必需的服务,通过社会的内在机制变为必需的服务而产生的收入。为什么一种特定的服务会成为一个特定的社会体系内所必需的,这通常可用它的历史背景来解释。当然,在把某一职业作为“收入干扰”类时,并不含有任何轻蔑的意思。事实上,一种“收入干扰”型职业,在一特定的社会中,往往吸纳了该社会的精英,而且这些精英也显示出自己是这个社会中的出类拔萃者。如果说在美国,律师是“收入干扰”型,那末我们可以说在日本的银行家和不动产商亦是如此。战后日本的另一种行业,也可以纳入这一类,即那些为从幼儿园一直到大学各层次青年人所设的辅导学校的过度扩展。这些青年人渴望能通过教育体制中名牌学校的人学考试。根据近年来对家庭中花于这种额外教育上的开支所作的各种测算,其数字已超过大多数家庭的基本食品开支;而这个行业已成为最成功的行业之一,拥有各种自备的现代通讯设备和视听设备。这个行业所从事的活动就是大大增加了为实现某种目标而支付的中介服务费用;只要这种扩大开支的活动确实存在,那末便可以说这类“收入干扰”的现象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其次,简单说一说“体制化浪费”。维布伦早在1904年就写道<sup>⑪</sup>:

“从工业的角度看,纯属浪费的额外工业支出吞噬了大量货物与劳务,这一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地发展下去。如果这种浪费性支出缩减了,那么其逻辑结果必然会出现一次相当严重的工商业

混乱,随之而来的就是萧条。”

这是个预言,但是称这些浪费的支出为“从工业的角度看,这些支出是纯粹的浪费”则会使人误解。企业就其精于算计来看,本质上是憎恶浪费的。关于某一商品或劳务是否属于浪费,不能“从工业的角度”来判断,只能从最终消费者的角度来判断。这里的问题并不是要对奢侈或浪费作出道德评价。经济学家站在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决不会对一个以浪费自娱的人费下点口舌,但是当浪费在这方面已形成制度,以至于一种会被消费者所喜欢的、不那么浪费的替代物被有意地不投入市场时,我们就应该分析一下造成这种现象的机制,并从中懂得经济福利的含义。有关内在的故意制造不耐用商品以刺激消费的事例多得不胜枚举,正如万斯·帕克德的著作所广为传播的那样。加尔布雷思也充分分析了刺激GNP膨胀的这类开支的机制。战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体制化浪费”的例子,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故意使照相机、冰箱、电视机等耐用消费品很快坏掉,以及生产商与销售商方面过度增长的广告支出。

引起我们对GNP的福利内涵提出疑问的最后一点与社会财富的耗竭有关。现在,正如我们能靠提取我们以前的储蓄来增加我们家庭每月支出那样,我们可以通过耗尽我们资源藏量而不重置的方法来提高GNP。当然某些用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是无法重置的,地球的矿物藏量就是这种类型。对于这些资源,说重置它们是毫无意义的,摆在我们面前唯一可选择的办法,就是当耗用速度大大超常时,就想方设法节约使用。但是也有各种其它类型的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的时间模式,在使用后使之再生的社会财富,森林及海洋资源即属于此类。在这一类中还可以包括干净的水、自然美景和其它环境资源,所有这些都为我们生活得健康、欢乐提供了条件。一个国家忽视了保护这些舒适环境的需要可以使其GNP的增长速度比重视保护环境的国家发展得更快。

在这方面，战后日本高速增长时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就像前面章节中所说“牺牲花园扩大厨房”的很好的例子。

### 费雪概念体系更能说明问题

日本 GNP 在二十年中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可以证明它包含了上述使 GNP 膨胀的所有四个因素。然而那些信奉“经济增长程式”的人，当被问及这一点时，也承认，从福利的角度来看某些 GNP 增长因素是可疑的，并且提出，为了弄清福利内涵，我们可以编制一个净国民福利(Net National Welfare)指数，作为全面衡量标准，或者编制一个以病床数、公园面积、识字率、污水处理设施、每户居住面积等可分别定量的特定指标为基础的福利指数。当然，人们不必怀疑这些福利指数的有用性。但是为了眼下的目的，重新认识欧文·费雪的“资本”与“收入”的概念也许更有效果<sup>②</sup>。四十年前，肯尼斯·布尔丁就呼吁人们注意这些概念<sup>③</sup>，尼古拉斯·卡尔多<sup>④</sup>也在提出他的“支出税”建议时，感到它们很有用处。对费雪来说，“收入”只包括最终消费所得到的各种服务，不管是来自他们的物质或者人文环境方面，这两者合起来可称之为“社会财富”或“资本”。社会财富不仅包括生产者的实际资本，如工厂、设备，也包括今天所谓的“共同财富资源”、地质资本和消费者实际资本。在这个概念体系中，“生产”被限定为社会财富的增益，“消费”被限定为从社会财富中的扣除。由于“收入”本质上是与社会财富存量成正比，“消费”就对“收入”产生负效应，而“生产”则产生正效应。需要说明的是，曾经与费雪在这一问题上发生争论的庇古也承认，如果对“一个社会在长期时间序列中的经济福利比较”感兴趣，费雪的概念体系是恰当的<sup>⑤</sup>。正是为了这个目的，当我们研究经济中的福利内涵时，我们不妨重新运用费雪着重“存量”而不是“流量”的概念。

罕见的日本 GNP 高增长率所带来的值得怀疑的后果，使我

们深切地感觉到采取另一种衡量方法的重要性,即扩大社会财富的范围,使之不仅包括“共同财富资源”那样的非物质成份如自然美景,而且也包括积累和体现在人力生产要素中的知识和技能。对这方面认识的提高,标志着到70年代初日本“经济增长程式”已出现转折点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报》和提出“只有一个地球”口号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也反映出国际社会的共识。

也许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即对GNP为衡量标准的“经济增长”的不满意,促使我们许多日本人同时回想起久已忘怀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名言:“没有必要指出,资本与生产的静止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也处于静止状态。各种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仍可以和以前那样大有发展余地,当人们不再被只求生存下去的思想所主宰时,提高生活艺术(极大可能会得到提高)也就大有可为”<sup>20</sup>。

## 注 释

- ① 田中角荣:《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东京:日刊工业新闻社,1972年),第218页。
- ② 同上,第124页和第115页。
- ③ 与1970年底每桶1.8美元的价格相比,这意味着增长了5.47倍。
- ④ 参见菲力斯·迪恩和W·A·科尔《英国经济增长》(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2年),第329—330页。
- ⑤ 在日本,人们常用“kōgai”(公害)一词来指西方所说的“污染”“损害公众”等词义。“kōgai”的字面含义是“对公众造成的麻烦和损害”,可以替代英语中的“环境污染”一词,因为它简短,所以文中常用该词。
- ⑥ 参见休·帕特里克和亨利·罗索夫斯基《亚洲新巨人》,第906页。
- ⑦ 1960年至1970年,三大城市地区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的人口从3738万增加到4826万,增加了一千多万。



- ⑧ 日本每千人拥有小客车的数量从1959年的3.4辆上升到1975年的154.0辆；到1969年，每一千公顷平地的各种汽车数量，在日本已超过1300辆，而第二大车辆拥挤国西德仅为750辆。
- ⑨ 足尾位于利根川一大支流渡濑川的上游，东京正北一百公里，日光西南二十公里。早在1610年就在该地发现了铜，间或有些波动外，该地铜矿在德川幕府的直接管理下成了两个半世纪中最大的铜供应地。明治维新后，铜矿转给了私营公司。1877年以后，在古河无情的管理之下，铜矿变成了现代化炼铜的一大中心。随着炼铜业的现代化和兴旺，必然会出现不受人们欢迎的结果，首先(约在1880年)是对利根川中鱼源的损害，接着(1888年后)又影响到靠河水灌溉的稻谷收成，不久又危及到生活在沿河两岸的居民健康。
- ⑩ 的确，达克镇的问题是在20世纪30年代得到处理的，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远迟于足尾案例。然而在大卫·李莉安索尔领导下的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官员在环境问题处理中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对公民福利要求的强烈意识，与日本官僚在对待足尾案例所表现出来的冷漠形成鲜明对照。
- ⑪ 日本政府环境厅：《1976年环境白皮书》(日文版)，年刊，第513页。
- ⑫ 参见高柳信一“密执安州环境法”，《公害研究》，1971年夏，第1卷，第1期，第55—57页；亦见约瑟夫·L·萨克斯和罗杰·L·康纳“1970年密执安环境保护法案：进度报告”，《密执安法律评论》，1972年5月，第70卷第6期，第103—106页。
- ⑬ F·J·费雪：“16、17世纪：英国经济史上的黑暗时期？”，《经济学》，1957年2月(第2—18页)，第3页。
- ⑭ 1859年3月在希拉德福德的讲课。参见J·罗斯金《两条道路》，史密斯和埃尔德，伦敦，1859年，第109—110页(着重号是作者添加的)。
- ⑮ 在这一点上，E·F·舒马赫的话是很恰当的：“大自然总是知道何处何时应该停止。……在一切自然物中都有一种度量——大小、速度或力量。结果是，自然体系(人类是其中的一部分)往往是自我平衡、自我调

节和自我净化。但技术就不是这样。……技术不承认自我限制的原则——例如就大小、速度或力量而言，因而它也就不具备自我平衡、自我调节和自我净化的作用。在微妙的自然体系中，技术，尤其是现代世界的超级技术，像一个外来体在起作用，因而现在有许多排斥它的迹象。”（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伦敦，布朗德和布里格斯有限公司，1973年，第136—137页。）

- ⑩ 伊凡·伊里奇事实上甚至这样建议：完全从GNP中扣除运输费用。参见伊里奇讲坛编《伊里奇在日本的讲话——人类的希望》（日文版），新评论社，东京，1981年，第177页。
- ⑪ 参见《纽约时报》，1970年8月16日。人们不禁会想起一个世纪前一位“经典”经济学家说过的一段敏锐的话：“哲学家产生思想，诗人创作诗篇，传教士从事布道，教授编写教材，等等。罪犯制造罪恶。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详细考察后一种分支和整个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们便可以打消我们自身的许多偏见。罪犯不仅犯罪，也产生了刑法，并且还产生了讲解刑法的教授，此外还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书刊，那位教授正是通过这些书刊将其讲解作为‘商品’上市。这便给整个国家增加了财富，这就完全不同于书刊作者写书所得到的自乐，像精明的见证人罗歇尔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罪犯甚至还产生了整个警察队伍、刑事法庭、治安官、法官、刽子手、陪审团等，所有这些不同的行当，构成了社会劳动分工的许多分支，发展了人类精神方面的各种能力，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满足这些需求的新的方式。单单刑罚就引发了许多最富有天才的机械的发明，并雇佣了许多可尊敬的工匠从事这类器具的生产。……罪犯对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还可以详细罗列。倘若没有窃贼，锁具会达到目前这般精巧的程度吗？倘若没有伪造者，纸币会达到目前这种完美的地步吗？……犯罪事件，由于它经常采取新的盗窃财产的手法，也就导致了新的防御手段的诞生，正如罢工导致机器的发明一样具有生产能力。”或许今天已没有几个经济学家能说出这段话的作者，它来自K·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外语出版社，莫斯科，1964年，第1卷，第375—376页。

- ⑩ 这里还有一段相关的文字,见R·F·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生平》,麦克米伦,伦敦,1951年,第583页:“世人皆知我有这样的抱怨:即从这块律师多如牛毛的土地上所造成的结果来看,当‘五月花’从普利茅斯启航的时候,它一定充满了律师。约三年前,在只有我的秘书陪同下,初次造访在华盛顿的莫根索先生的时候,你们财政部的小伙子们便好奇地问他:你们的律师呢?当解释说我没有律师时,对方反问道:‘那么谁来替你思想呢?’”
- ⑪ T·维布伦:《商业企业理论》,纽约:曼托书社,1904年,第120页。
- ⑫ I·费雪:《资本和收入的性质》,麦克米伦,纽约/伦敦,1906年。事实上,费雪早就发展了这一整套思想,并发表在“什么是资本?”一文中,《经济杂志》,1896年12月。按照他儿子的说法,这一思想产生于“1894年的夏天,当他从劳特布伦嫩驾车去泽马特时,他说:‘就在我看着一条有进水和出水的灌溉槽时,我突然明白,资本和收入的基本区分,实质上与槽中的水和流入流出的水的区分一样。’”参见I·N·费雪《我的父亲欧文·费雪》,纽约,彗星出版社,1956年,第123页。
- ⑬ K·博尔丁:“收入或福利”,《经济研究评论》。
- ⑭ N·卡尔多:《一种支出税》,艾纶和昂温,伦敦,1955年,第54—78页。
- ⑮ A·C·庇古:《福利经济学》,伦敦:麦克米伦,1932年,第36页。
- ⑯ 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新版,朗门,格林有限公司,伦敦,1926年,第751页。

## 第六章 双重“价格革命”

石油冲击的“价格革命”是由外部引起的，但是城市土地的“价格革命”是由内部引起的。这两种工业活动所不可缺少的最重要生产要素，石油与土地的价格革命发生在不同时间所产生的影响，引起了资产阶级的不安与兴奋。不安是因为需要对工业能源的使用习惯进行一次重要的重新调整；兴奋则是因为有着获得城市土地投机赢利的机会。

石油冲击对价格影响是相当大的，但是为寻求替代能源而需要作出的政策调整和节约石油使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官方专家们开始时的预料。这样，对 70 年代初级能源的供求计划不得不加以重大修改，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向公众呼吁接受“核能时代”的到来。

在另一方面，城市土地的“价格革命”，涉及到一种本质上不存在替代物、且提高使用效率的可能性也十分有限的生产要素。从而城市土地的增长失衡趋势持续不衰，直到 80 年代末，创造了“土地价值的神话”，出现了广泛的、无节制的投机活动。政府在处理这一事态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根源于古老的、私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的观念，我在这里要对此加以批判地评述。

本章以扼要地讨论与 1972—1974 年通货膨胀有关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当作为结束，其时正值双重“价格革命”在日本出现。

## 1. 两个“价格革命”的同时出现

70年代开始后,越来越明显的是,支持日本近二十年10%增长率的特别促进要素正在失去其活力,转折点已近在眼前。接着,作为一场“价格革命”的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企业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他们遽然意识到,需要对因利用大量异常廉价石油而繁荣起来的许多产业部门的成本进行大调整。然而,凑巧的是,几乎在这同时,另一场“价格革命”也莅临日本——这就是被田中角荣于1972年提出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所刺激起来的城市和工厂土地“价格革命”。虽然土地价格的过度增长在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已经开始,但直到1972年才出现战后日本第二次土地价格高涨,这其中有大约十年的喘息期。不久,“疯涨”一词即为政府官员们所引用。尽管与石油价格在短短三个月内增长了3倍相比,1972—1973年间城市土地价格的年增长率还不到40%,但若以1956年作为下述两种价格的基年,那么到1975年3月,城市土地价格非同一般地猛涨,它与批发价格指数之比为13:1<sup>①</sup>。换句话说,土地价格的增长趋势更为持续,尽管中间有一些间歇,1960—1962年为其第一次高潮,第二次高潮则几乎与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同时到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970年代初莅临日本的双重“价格革命”,它发生于工业生产中两种普遍需要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石油和土地。因而,在此简单地谈谈主题以外的古典价格革命事例,也许是合适的。

## 2. 价格革命的古典事例

我们经常把“价格革命”一词理解为指16世纪初期和17世纪

前半期发生在欧洲国家的那次过度价格增长。据 J·汉弥尔顿伯爵称：“早在 16 世纪，西班牙的价格就有上扬趋势，首先发生于安达卢西亚，并且也以那里上涨得最快，而且持续了 100 年之久，其最低和最高点都超过了以前水平。安达卢西亚的价格在 16 世纪上半期翻了一番还多，到世纪末增长了四倍以上。在离安达卢西亚最近的新卡斯蒂尔地区，价格增长了三倍；在老卡斯蒂尔—列昂和巴伦西亚，价格也增长了两倍半”<sup>②</sup>。毫无疑问，“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供应量的急骤增长，……[尤其是]由于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之后白银生产的爆炸性上升，在扎卡特卡斯、关那华托和波多西发现的、蕴藏量极丰的矿藏以及在 16 世纪中期采用汞合采矿方法，所有这些都引发了价格革命”。<sup>③</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价格革命过程中，货币工资的增长明显滞后，例如，在 16 世纪的英格兰，物价增长了 150% 而货币工资仅仅增长了 1/5。凯恩斯认为，工资滞后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伊丽莎白和雅各宾时代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成果的重要部分为投机商所攫去而不是被工资收入者所享有”<sup>1</sup>，他接着说，“在现代世界历史中从来没有过如此长久、如此丰厚的使商人、投机者和奸商牟利的机遇”。<sup>④</sup>

的确这样。由于外生的干扰影响了金属货币存量 and 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而引起的这一价格革命的古典事例，其特点是产生了对牟利有利而不是对工资有利的新的相对价格结构，正是这种结构促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

当然，在许多国家的经济盛衰史中，都有着许多其规模相当于，或更大于那次“价格革命”的通货膨胀型价格增长。例如，法国 18 世纪 90 年代纸券和市政债券的恶性通货膨胀；美国在 1861—1865 年南北战争期间的美钞遭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后德国惊人的通货膨胀；日本 1944—1949 年间成百倍的价格狂涨；等等。然而，这些事例都是由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异常失衡而引起的

总体价格增长,并且由于无控制地或无法控制地发行不能自由兑换的纸币而导致的。

西班牙价格革命的事例,明显不同于其它,前者或多或少是由单个外生因素引起的相对价格结构的突然和较大的变动,而后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战争及其伴随事件引起的过度需求和对不可兑换纸币的无节制地发行。与此相对照,我们可以把与1973—1974年石油危机,又与1972—1973年日本城市土地价格猛涨相联系的事件称之为“新价格革命”。在后两者中,失衡的价格发生于几乎普遍应用的生产要素,从而可以预期,经济效益的一般原理将会促使启用另一种生产要素来替代(只要有此可能),或者采用一种更为经济地使用该方法。下面我们看一下进入20世纪70年代及其后的“双重价格革命”是怎样影响日本经济的。

### 3. 石油冲击引发价格革命的结果

#### 石油冲击对价格的影响

石油价格革命的后果自然是全球性的。中东标准品质石油的每桶价格,在三个月内(1973年10月1日至1974年1月1日)从3.01美元涨到11.65美元,几乎增加了三倍。实际上,从1970年末起价格已经开始渐渐增长,当时每桶报价为1.8美元<sup>⑥</sup>。随着原油价格的上涨,主要发达国家的批发价格指数,几乎毫无例外地或多或少突然出现了上涨趋势,如表6.1所示。的确,美国在1971年8月作出的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决定,加剧了这一通货膨胀的趋势。就在尼克松宣布这一政策之后,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立即开始上升,在1973年7月高达115.10美元/盎司,而1970年仅为37.375美元/盎司。随着黄金价格的攀升,各种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都从1972年春季开始上扬。这样,路透社农产品和矿产品指数,在1972年6月到1973年6月间几乎翻了一番。还有,石

表 6.1 与上一年相比的批发价格指数增长(%)

	1973 年 10 月	1974 年 7 月
美国	16.5	20.4
英国	13.1	25.1
西德	6.8	15.6
法国	16.9	25.8
意大利	20.6	41.3
日本	19.1	34.2

资料来源：宫崎义一：《新价格革命》(1975)，第 117 页。

油价格在 1973 年增长三倍是引起相对价格结构重新组合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这个新的组合中，能源和原材料开始长期性地占据较大份额。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那次古典价格革命给兴起的资产阶级提供巨大的机遇，而这次则不同，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得以在受发达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的剥削和压迫之后，开始从它们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上面古典的和最近的价格革命的重要性，都在于在实力对比中促成了具有永久性质的历史性转变。

### 日本的政策调整——期望和克制

那么，石油价格革命对日本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呢？就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日本经济产生或多或少的消极影响而言，我们已在上一章作了一个概括性的回顾<sup>(7)</sup>，现在需要对具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调整，即寻找能源替代物和努力节省石油耗用作一番讨论。

为了这个目的，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能源消费的增长趋势和初级能源结构的变化，如表 6.2 所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三十年中，日本能源消费增长了九倍，来源也由原煤急转为石油，后者在 1975 年占据总能源消费的 7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相对是最高的。



表 6.2 能源消耗及其来源——若干年份

能源消耗总量 (1933 = 100)	来源——相对比重(%)					
	石油	煤	天然气	其它	总计	
1933	100	8	69	12	11	100
1948	100	5	60	21	14	100
1966	500	60	26	11	3	100
1975	1000	72	18	6	4	100

资料来源：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我们也可以在这儿归纳一下从 50 年代初到 70 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能源状况特征。其主要特征是：

1. 对进口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近几年来接近 88%。
2. 初级能源总供给中的石油比重非常高——如表 6.2 所示达到 60—72%；这些石油几乎完全进口。
3. 工业消费比重要高于绝大多数国家——它在初级能源消费中占 57% (1975 年)，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为三分之一<sup>⑥</sup>。
4. 初级能源用于发电的部分也高于其它绝大多数国家——大约占三分之一。

处于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不得不面对油价革命在各经济领域内所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影响而采取对策，特别是不得不修改总能源的供求计划。立即可以预见的是寻求石油替代能源和致力于石油的节约使用已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首先，作为讨论能源问题基础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作出任何一种动态调整所需的时间。例如，在日本建立一座发电厂所需的基本时间，据说大约是十年，而以一座燃煤发电厂代替一座燃油发电厂，也将需要一段不短的筹划期。因此，对一个国家能源政策的任何总体讨论的出发点，将是根据对各种期望、可能性和可行性的最复杂评估而提出一项至少有关未来十年的该国能源供求计划。这样的计划，可以首

先将主要的着重点放在或多或少客观存在的限制因素上,然后列入各种经过缜密研究的政策措施的结果,作为调整因素。

当日本政府着手对石油价格革命的影响作出反应时,它必须考虑到力争达到的目标和限制因素是什么?一个决定性的力争达到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十年中保持合理的充分就业,这可以用实际GNP值的某个最低增长率来表示。政府内外的绝大多数专家,当时都认为在随后的十年中,每年6%的增长率是最低限度,低于它失业率就会增长,除非建立一个相当激进的多人分担一份工作的制度。对当时的工业结构来说,一种激进的转变必然需要时间,充分就业的期望因素就为工业使用能源的总需求建立起一个框界。

除了上文提到的建造新电站所需设计时间以外,还有什么限制因素呢?对日本来说,供给方面限制因素的主要考虑是与石油进口有关的一些问题。在石油价格革命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的主要供给来源是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33.8%)、伊朗(17.0%)、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1.4%)、科威特(8.3%)、阿曼(3.7%)和伊拉克(3.1%),它们一起占1977年全部供给量的77.3%,而亚洲的印度尼西亚(13.6%)和文莱(3.4%),它们一起占到17%。换句话说,中东的石油对日本来说极其重要,这也进一步意味着,从那个地区到日本的航线必须在任何情况下得到保证。超级油轮(“昭和丸”)1975年1月份在马六甲海峡的搁浅和4500千公升石油的泄漏,引起该地区国家对超级油轮经过海峡采取限制性措施,这样一下子便暴露出日本所常用的石油运输线岌岌可危的处境。因此,日本的能源问题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国际政治和外交纷争之中,甚至达到这样的程度:美国施压日本将其海上交通“防卫”线扩展到1000海里,以减轻美国舰队在这一成为日本进口石油生命线的海域的负担。

另外一个限制因素当然是环境问题,它在最近几年里,已越来

越受到重视。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时,日本在能源问题方面对环境的关心,特别集中于核能的使用上,政府也正在对这种取代石油的替代性能源给予高度的重视。在1975年10月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官方对1985年的目标是,核能发电能力达到6000万千瓦,中期目标到1980年达到3177万千瓦,但在核能方面,人民群众的共识却来得较晚,这是由于这个国家是上次大战末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有些人将这种敏感视为一种“核过敏症”。但现在众所周知,日本在接受常被称为“浮士德式交易”中持犹豫态度,并不是什么例外。同时,政府试图通过对那些同意建造新核电站的地区提高补助额度的办法,来加快新电站的建设。但随即在很多地区掀起了反对的浪潮,迫使新电站的建设步伐放慢。从而,先前的1985年6000万千瓦的目标(1970年计划中数字)远未完成;1988年实际发电能力为2890万千瓦。

另一个与环境有关的能源是从三千米或更深的地下岩层开采出来的地热能,其探索性的研究早就开始了,前景是在合适场地建立一座发电200万千瓦到300万千瓦的电站。日本在这个方面实际可能获得的全部能源,估计达到14500万千瓦。一个主要的障碍是,绝大多数合适的场地都在国家公园范围内,所以环境方面的考虑成了拦路虎。

上面我们讨论的能源问题对于环境的含义,涉及到寻求替代性能源供给的问题;不用说,能源问题和环境的关系要广泛得多、复杂得多,正如“未来资源委员会”主席查尔斯·J·希奇博士所写的那样:

“能源问题是一个环境问题。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一起构成世界上最大的环境破坏因素,其所造成的恶果不胜枚举,且令人恶心;煤炭工人因坍井和黑肺而死亡;发电站、工业生产过程及汽车所造成的空气污染;空气中二氧化碳成分的增加,可能导致影响深远的天气反常变化;海洋石油泄漏;酸性矿场废水造成的水污染;

以及露天开采对自然景观的损害”。<sup>⑧</sup>

我们可以轻易地列举更多的日本能源问题对环境所产生的具体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有：在填海造地的土地上建立发电厂对自然美和怡人的海岸所造成的破坏。在这儿，我们没有必要更深入地谈论这个问题，只是必须强调环境保护是发展替代能源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限制因素。

### 能源供求计划

总体能源研究委员会(OERC,一个政府咨询组织),在考虑到种种需求和限制以及节约工业和民用能源实际可能性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修正日本近期能源供求展望的工作,因为他们预见到1973—1974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的油价上涨是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修正差不多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最近(本书写作时)一次是在1990年。当我们现在审视这一修正过程时,我们极为深刻的印象是存在于当时变化无常的年代中的各种变幻莫测的因素,使拥有群体智慧、富有才华的专家们,也不得不像一件永远做不完的工作那样经历一而再、再而三地修订其研究成果的过程。我们可以将OERC计划中一些主要项目的重要数据和一些实际达到的统计数字并列在一起进行比较(见表6.3)。值得注意的是,1988年三项实际达到的数值只相当于1970年制定的1985年计划数的一半或更少;即使是最近的对2000年所作的计划数字,也比在石油危机后的1977年所作的1985年计划数字要小得多(除了核生产能力以外)。

表6.3所显示的1988年实际数值与上面显示1975年能源消费中石油占72%的表6.2相比表明,石油进口<sup>⑨</sup>在所有初级能源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57.3%,这意味着替代性能源填补了其中的差额。在1975年到1988年期间煤和水力发电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而核能和天然气的比重则有很大的提高。还有,1988年实耗

表 6.3 能源供给: 计划与实际

	总的初级能源 石油当量( $10^6$ 公升)	石油进口 ( $10^6$ 公升)	核生产能力 ( $10^6$ 千瓦)
<u>对 1985 年的计划数</u>			
1970 年 7 月	933—1029	650—723	60.0
1977 年 6 月	660	432	33.0
<u>对 2000 年的计划数</u>			
1990 年 6 月	597	308	50.5
<u>实际达到数</u>			
1975 年	390	288	6.6
1988 年	482	276	28.9

资料来源: OERC。

的全部初级能源, 只占 1970 年所作 1985 年计划数一半左右, 这一事实确凿地表明, 作为石油价格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 在能源耗用上已有了很大的节约。

### 能源节约的可能性

节能是怎样取得的呢? 表 6.4 显示在基准年间, 三个部门(工业、民用和交通)在能源耗用方面的年平均变化率。1979 年发生了第二次石油危机, 我们从表 6.4 中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无论在哪个部门, 都要比第一次大, 其中工业部门在两次危机后节约了能源的耗用。因为工业生产指数的年均增长率在 1973 年至 1979 年间为 2%, 在 1979 年至 1986 年期间为 3.1%, 从而可以推断, 整个工业部门能源的利用效率无疑提高了。

民用部门在节能方面只获得了小小的成功。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 1975 年前后, 日本民用初级能源的平均耗用量相对少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 而正处于逐步赶上的过程中。假定以美国的下面

表 6.4 各部门能源消耗的变化

(单位: %)

	工业	民用	交通	总计
1969—1973	+8.5	+11.5	+9.2	+9.2
1973—1979	-0.8	+ 3.3	+4.2	+0.9
1979—1986	-2.1	+ 1.9	+1.3	-0.4
1986—1988	+5.4	+ 5.3	+4.8	+5.3

资料来源:通商产业省。

两个指标为 100,就可以用人均 GNP 和民用能源人均消耗量两者相对数之比,将几个国家的人均 GNP 能源集约度作一比较,如表 6.5(指 1975 年)所示。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汇率下,1975 年日本人均 GNP 相对能源集约度和其它西方国家相比是最低的。如果用更近期的汇率(1 美元合 150 日元)来代替 1975 年的 1 美元合 300 日元,那么,这一比较就更为明显。

与其它大多数西方国家相比,可以说日本在民用能源消耗方面,更少节省余地,这得力于日本的气候比其它国家温和以及日本各大城市建有高效、低成本的大众化交通系统。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工业结构的转变以及整个交通工具的转变所带来的大量能源节约。特别是后者包含着那些依政府政策而定的不可忽视的可能性。表 6.6 列出了每一种运输单位能源消耗系数(假定 100% 负载),它表明当今日本存在这些可能性。

1975 年交通运输所耗能源达  $70 \times 10^{13}$  千卡,几乎占当年日本初级能源总消耗的 20%,这部门的能源节约将大大有利于促进日本的能源活力。但事实上,家庭以及交通运输业的抉择要视众多因素而定,以至于市场机制不一定能促使达到能源耗用的最佳效率。近年来,高能铁路运输工具的使用相对逐年下降,特别在货运

表 6.5 人均 GNP 能源集约度——国际比较(1975 年)

	人均 GNP (美元)	相对数 (A)	民用人均能源消耗 (10 <sup>3</sup> 千卡)	相对数 (B)	(B) (A)
美国	7120	100	26304	100	1.00
西德	6670	94	14774	56	0.60
法国	5950	84	11253	43	0.51
日本	4450	63	7173	27	0.43
英国	3780	53	13420	51	0.96
意大利	2810	39	7408	28	0.72

资料来源：人均 GNP 引自《世界银行图表集》(1977)；能源消耗值来自日本能源经济研究所。

表 6.6 运输单位能源消耗系数

货运	方式	运能	千卡/吨·公里
	卡车	8 吨	320
	电气列车	500 吨	50
	货船	499 总吨	60
客运	方式	运能(人数)	千卡/人·公里
	公共汽车	50	60
	客车	5	190
	上下班火车	144	30
	流线型火车	100	70
	B747-SR	498	100

注：假定 100% 负载。

资料来源：日本政府运输省。

方面，而整个交通部门每单位能源消耗系数则在上升。这里问题不仅仅关系到要改变用户偏爱的模式(加上成本因素)，而且关系

到那些体现国有铁路公共事业性质的制度特点和各种交通方式外部效应的内部化程度问题。人们希望,能源效率的紧迫性将迫使主管当局比以前更认真地解决这些看似难以处理的问题。

尽管到 1988 年总能源耗用比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日本以前的计划数急剧下降了,但 OERC1990 年 6 月提出的所谓《中期报告》,对未来的展望仍然非常黯淡。虽然曾任政府资源和能源厅负责人的山本雅司庆幸自己在 1973—1988 年间,使每单位 GNP 的能源耗用节约了 36%,或者说使每 1 亿日元 GNP 的能源耗用(按石油当量计)从 1973 年的 225 公升下降到 1988 年的 144 公升,但 OERC 主席稻叶秀三明确指出,即使核能生产能力 12 年内增长到 5 千万千瓦(增加 40%),1988—2000 年间总能耗仍需要再降低到每单位 GNP 能源耗用 92.3 公升。稻叶特别向公众呼吁:“要么接受我们能源供给的核时代,要么大大节约家庭用电和汽车用油!”

石油价格革命的影响仍在继续。

## 4. 城市土地的价格革命

### 城市地价的飞涨

虽然现在任何社会生活中的生产和消费都离不开能源和土地这两个基本要素,但面临价格革命时,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就能源而言,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所讨论过的,存在着各种形式的替代资源供给,而且即使是短期的,也有着许多有效的节约方法。但土地方面,替代资源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且提高使用效率总体上说也是有限的。当然,开垦浅滩地区能够增加土地的供给,并且可以通过变农田为工厂用地的办法来适应需求的变化,但这些措施都受制于各种互补条件的限制,其数量不会很大。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是可能的,如农业上的精耕细作和城市里摩天大楼的建



造所证明的那样。但在今天日本都市拥挤不堪的条件下,各种各样的环境限制,以及污水处理设施可悲的滞后,阻碍了摩天大楼的建造。因此,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城市土地的需求超过供给是不可避免的,就这个意义而言,会造成地价或多或少地持续上涨。

事实上,战时和战后初期,日本城市地价并没有与通货膨胀同步上涨。如果以1936年9月作为二战前基期,城市地区的地价(全国平均)到1946年1月只增长到2.6倍,而同期批发物价指数增加到7.6倍,到1951年3月,这两个指数的差距又逐步拉开,前者增长到76.0倍,而后者增长到318.7倍。只是在1956年,这两个以二战前基期计算的指数才开始趋于平衡。因此,为了比较城市地价和批发物价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以1956年作为基期。还有,1956年的国内人均实际收入差不多恢复到二战前水平,这也进一步证明将1956年作为基期是合理的。

从1956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到来时,批发物价指数保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水平,17年只增长17%。而另一方面,城市地价的趋势却大不相同。正如本章开始时所说的,在196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时期和1972年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时期,城市地价各有一次明显的上涨。后者几乎和第一次石油危机同时发生,我们把它称之为地产的“价格革命”。即使这一次“价格革命”时期过后,地价的高潮也未能马上退去,而第三次上涨又始于1986年。这样,可以说,在1956年以后,日本总共经历了三次地价高潮,把它们作为单独的互相关联的论题来对待是合适的。

首先,让我们汇集一些统计数字,将城市地价和批发物价指数变动作一比较。出于这个目的,我们选取了六大都市的城市地价指数和东京银行批发物价指数(均以1956年3月为基期),然后将后者除以前者,得出比率。如果这两个指数平行运动,则比率为1,如果比率为2,则表示城市地价上涨两倍于批发物价指数(当然

假设两者均呈上升状况)。下列数据显示 1956 年后一些关键年份的有关比率。

1956 年 (3 月)	1.0	
1959 年 (9 月)	2.2	} “第一次高潮”
1962 年 (3 月)	6.1	
1971 年 (9 月)	15.0	} “第二次高潮”
1973 年 (3 月)	20.2	
1986 年 (3 月)	25.2	} “第三次高潮”
1990 年 (3 月)	68.2	

我们可以看到两者间不断扩大的差距极为惊人。1956 年至 1990 年批发物价指数大约上升到 2 倍,而大城市的平均地价上涨到 145 倍,其差距达 68.2 : 1。

### 产生的资本收益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1956 年批发价为 1 美元的商品,在 1990 年标价 2 美元,而 1956 年价格 1 美元的每单位城市土地,在 1990 年标价为 145 美元。初看起来,这简直难以置信,但事实确是如此。这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巨额的资本收益。究竟有多大呢? 经济企划厅的一份官方估计表明<sup>①</sup>,一年内(1987),全国的这种资本收益总额高达 416 万亿日元,超过日本当年的 GNP(343 万亿日元)20%强;而同期美国的统计数字表明,1987 年地产的资本收益大约占 GNP 的 5%,<sup>②</sup>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异乎寻常的独特性。不用说,在 1956 年至 1990 年的三十多年间,当城市地价上涨到 145 倍,地产的累计资本收益必定是 1987 年数额的倍数。我们不禁要问起这些资本收益的形式和归属问题。

第一轮资本收益归属包括三种形式:(1)通过税收直接吸收;(2)市场上实现的收益;(3)未实现的潜在收益。

关于通过税收直接吸收的收益,由于相关的税种是房地产税、

赠与税和遗产税,这些均是以确定的土地面积记录为基础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精确的估计。确实,房地产的实际税率极低,只相当于土地市价的 0.05%,而其它发达国家的税率则达 1% 以上。不过当土地市价在三十多年内上涨到 145 倍时,房地产的实际税率的滞后则是不可避免的。举例来说,如果 1990 年实际税率为 1%,那么,仅房地产税一项就要超过大多数拥有房产和土地的城市居民的全年收入。与其它国家比较的另一个更令人信服的方法是看房地产税金总额合该国 GNP 的比率,这种比较表明,近年来日本的房地产税负担高于法国或西德,1988 年日本的房地产税合 GNP1.6%,而法国是 1.2%,西德是 0.8%。事实上,从 1970 年到 1988 年,日本的这个比率几乎已上升了一倍。<sup>⑬</sup>通过遗产税征收的土地资本收益相比之下要大得多,近年来,大约占遗产税负的 70%,从 1980 年的 7000 亿日元上升至 24000 亿日元,或者说增长两倍多。由于地价的投机性上涨,房产税负也无节制地提高,原本要想节省一笔税负,恰好导致对地产需求的增长,因为购买地产的借款可以从遗产税负中全额扣除,而地价是根据远低于市价的所谓“路线价”(国税厅对全国沿着主要道路的土地所做的评估地价,以它作为课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基准——译注)来估价的<sup>⑭</sup>。这种情况真是自相矛盾之极。

土地资本收益的第二个归属是其中已实现的收益部分。当三十多年内地价上涨到 145 倍,创下了被称为“地价神话”的记录时,即使是外行人也会极其自然情不自禁地利用时机,通过买卖土地赚钱,更不必说那些金融专家了。资本收益税可以是一种障碍,然而,不仅这种税非常宽松,而且通常还有一种对付办法,即:拟定两份合约,一份用于真正的交易,而另一份列出一个低得多的价格以应付缴税。因此官方的资本收益税入统计,不能确切告诉我们所实现的资本收益的范围和数额大小。而据大众媒体报道,存在大量所谓的“地滚地”事件,也就是在几年的短期内,重复地按不断增

长的价格买卖同一块地皮。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被称为“地皮炒家”的职业，它不同于一般的房地产交易商和投机者，专门从事将毗邻的、属于不同主人的小地块圈起来，按大面积出售，赚取更高的利润。大城市中心的好多地块就因这一买卖方式丧失了历史性的街区氛围。不用说，一般的房地产交易商，还有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律师，在地价飞涨的这数十年间，大发其财，其人数（如果不是其威信）也因此而增加。

最后，第一轮的土地资本收益的第三种形式是存在于土地所有者手中尚未实现的潜在收益。对于每个“高增长”期内以这种形式保存的这一部分收益不大好估计，但经济企划厅的一项官方估计表明，1987年归入持有土地家庭的资本收益（包括已实现和未实现的）总共267万亿日元，而一年支薪雇员的总收入是189万亿日元。根据这个事实，我们有把握作出这样的推论，即：那一年持有土地家庭的资本收益中很大一部分尚未实现，考虑到城市里面的小私营店业主（划入家庭这一类）所持有的土地所有权不啻是他们的生活权，存在这一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对于拥有住房的工薪阶层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与其实现自家小块土地的资本收益，还不如继续住在原来的有他们熟悉的街区商店、公园、学校等设施的地方；而且，寻找并搬迁到另一住所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之多往往使他们打消了卖地的念头。

就工商业公司而言，他们的潜在资本收益情况有着根本的不同。对他们来说，未实现的资本收益大得异乎寻常。国土厅呈交了一份正式报告给政府税收审议委员会，这份报告对比了1970年和1988年工商业公司土地持有的情况，具体数字如下（单位：10亿日元）：<sup>⑤</sup>

	帐面值	公布值	潜在资本收益
1970	7600	42500	34900
1988	80600	514500	433900
增长	73000	472000	399000

换句话说,18年里未实现的资本收益增加了近400万亿日元。在这份报告里,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调查公司对占有土地不加使用这个问题的回答:1978年百分之九的公司声称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使用这些土地。”1989年作这种回答的公司增加到百分之五十。而且,报告披露说1989年工商业公司拥有的未使用土地至少有百分之七十八尚无使用计划。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工商业公司一般都从事土地投机活动,充分利用地价的“棘轮效应”。各种金融机构在土地投机的狂潮中所扮演的角色更是不容怀疑,这个问题将在我们谈到反土地价格革命措施时述及。

公司保存潜在资本收益的一个重要含义是,它们对公司证券价格的有利影响,我们可以举一个大公司“新日铁”为例。它拥有8300公顷土地,价值“至少为8.2万亿日元。”<sup>(6)</sup>这家公司报告称,截至1988年3月份的经营期内,其往来帐户赤字超过1亿日元。然而它的股票市价仍以如下方式上升(单位为日元):

	最高	最低
1986	276	153
1987	454	168
1988	969	353

当一位报界人士批判性地指出大量持有未使用土地所产生的对公司股票价格的影响时,该公司的首脑斋藤英四郎先生作了一个避重就轻的回答:“我们的股票价格还没上升到四位数字呢。”<sup>(7)</sup>他强调指出,任何打算对未实现的资本收益进行征税的想法,就等同于对自由企业基本原则的否定,这反映了当前日本企业界的主导想

法。

我们已经回顾了第一轮资本收益的归属,这种资本收益是在34年中批发物价指标仅仅增加一倍,而城市地价上涨到145倍的情况下产生的。当然还有随后一连串的问题,诸如已实现的收益如何耗用,以及它对整个政府税入的影响等。但我们现在必须转到讨论造成土地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上来。

## 5. 土地价格革命的主要原因

### 私有财产权的意义

采取或不采取政策举措都能使社会经济领域中发生某些事件;而在土地价格革命中,不采取政策举措也许是比较采取举措更加重要的原因。由于开始于1960年的连续三次土地价格“高潮”,在短短三十多年里使城市土地价格上升到145倍,我们认为,这定会使日本政府意识到,应在那时候采取积极的对策来避免城市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如果没有其它政策意图)。然而政府几乎没有采取措施来刹住这个势头和扭转局势。原因之一是,很多执政党的政客<sup>⑧</sup>都是土地价格革命的受益者,并且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中断他们政治基金的重要来源。但是,对土地价格飞涨采取“无为”政策的有代表性的辩解是:“我们不能违反宪法中关于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的条款”,这句话是曾任建设大臣和自治大臣的主要保守政治家河野一郎先生于1965年说的。<sup>⑨</sup>

诚然,1946年11月颁布的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公民取得或持有财产的权利不受侵犯。”这一句话是日本战前1889年宪法第27条的重复;而“不可侵犯性”这个概念可以追溯到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此后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一再可以看到。尤其是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他把财产权作为天赋权利的一个方面进行辩护,指出它是“一种法律不得侵犯而且必须保护的權利”<sup>⑩</sup>。

但是,也有人认为“财产概念会受到时间的不断消蚀”(欧内斯特·比格尔霍尔)<sup>①</sup>。正是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占领当局在1946年日本宪法草案里面提出了这个概念,说:“土地和所有自然资源的最终所有权属于作为人民集体代表的国家。”我们曾在第一章里详细地把这个问题和占领当局的各项改革联系起来作了详细论述,并且讲到日本政府强烈抵制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意见,最终成功地代之以我们现在宪法里的措辞。但是随后在日本的法律专家中发生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重点是“保障私有财产权”指的是什么。一方面,例如石井照久教授认为,在日本,“财产权的社会和公共利益意义”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以致于政府在限制那些据称根据财产权而提出的非正常要求方面表现得很胆怯。而另一方面,蜡山正道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要注意以下的事实:财产的经济价值必然随着社会结构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把财产权作为没有数量含义的“基本人权”来保障。日本的法律界仔细研究了这一问题,最终在我妻荣教授提出的对财产权内容的解释上取得了共识,这一共识已为这一领域的许多专家所赞同。他把宪法第29条“财产权”限定为“一种属于个人的、在自由竞争条件下凭藉自己的劳动和/或资本赚得的或积累起来的财产权利。”<sup>②</sup>

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个定义是有相当限制性的,因为一方面,现代社会自由竞争的条件只存在于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更重要的是,外部因素(如伴随着尖端技术而来的生产社会化特征)对个人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几乎不存在任何个人能说他单独“凭藉自己的劳动和/或资本赚到和积累起[自己的财产]”的孤立的事例。这一点在某个人由于在他拥有的一块土地附近造铁路而抬高了地价的例子里特别明显。在该事例中,其巨大的资本收益可以在8年内达到土地原有价值的百分之三百,这是1988年政府《建设白皮书》所承认的事实。对于这种狂热状态,还有一则报

导称,转让小金井高尔夫球场会员权的市场价格达4亿日元(约是一个普通职员一辈子收入的两倍),因为谣传这个非常接近东京城区的高尔夫球场,在不久的将来将服从城市的建设需要而宣告结束。其中涉及的巨额收益将是四十年前它的价格的一千多倍。很清楚,需要用税收措施来吸收这类横财。换句话说,提到有关地产的“不可侵犯财产权”时,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当今日本土地、特别是城市土地的价格构成部分。

### 城市土地的价格构成

就像其它任何可以出售的东西一样,首先可以说土地的价格是供给与需求的函数。一方面,土地的供给经常被认为是固定的,教科书上描述为P-Q象限上一条垂直竖线。不过这是被高度简单化了,因为除了开垦创造新土地的可能性之外,土地的供给通常是有地区性的,并且指的是某一类土地,不管用于农业还是住宅或商业目的。另一方面,需求一般是一种派生需求,其开价是以涉及的土地上产品价值和边际生产力为基础的。

按照这样的解释,我们可以讨论土地的价格构成,不过我们必须马上意识到,这样的讨论是以生产性利用土地为前提的,也就是说,这里指的是使用权,而非必然指财产权。当财产权成为主要关心之点时,为投机目的而持有土地将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方式,并且极可能在一个预期价格将持续上涨的时期内,会产生所谓的“备用需求”。在土地价格棘轮效应的影响下,这就成为一种投机活动,构成了从土地上牟取资本收益的需求:持有一块土地备用,似乎也是土地供给的一部分,但持有者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某个时候获取资本收益。如果这样的“备用需求”相当大时,总需求就超过了实际供给,价格上涨的压力就会变得越来越大。教科书上有关“不确定经济学”的解释告诉我们,投机者的行为也可起到某种积极作用,因为通过他们贱买贵卖的行为,可以有助于平衡不同地区或不



同时间的价格差。就粮食、可可或金融证券等商品的投机者而言，这可能是对的。土地投机者甚至还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起到改进资源分配的作用，只要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以对土地收益上涨趋势的期望为出发点。不过最近几十年日本对城市土地的投机需求，如置于三十多年来价格上涨到 145 倍的背景下去考察，就不能被理解为实际收益上涨的反映。

现在我们开始研究近来日本城市土地价格构成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投机因素不得不作为一个具有重要份量的外来因素而被搁在一边。有些专家在讨论土地私有产权的所谓“不受侵犯”的过程中提出，土地的价格就像一个在核心周围包裹着许多外层的洋葱，有必要一层一层地剥开，直至真正的内核，只有这个内核，才可认作是私有产权的客体。要剥去的第一层和最大一层就是城市土地价格构成中的投机成分。

那么，哪些是其它的外层呢？又有哪些是我们达到核心前所要剥掉的外层呢？

假定我们从一块用于农业的土地开始，而这块土地又正处于扩建的市中心近郊。对那块土地的需求是随着对其产物需求而产生的派生需求；这块地的价格反映了这些产物的市场价值；如果价格上涨，它也只是和产物的市场价值同步上涨。不过一旦那块土地成为城市建设的目的物，就会招来多种多样的建设费用，诸如建造新的道路、水厂、排污管道和其它公共设施等。不久还将建造学校、医院和公园。通常这些建设费用最初由地方自治机关承担（在一些例子中由中央政府承担），并且自然地会反映在土地价格之中。举例来讲，这块农业用地的基价是每单位面积 1000 日元，经过建设后可能升至 1500 日元。由谁来支付这 500 日元的差额取决于有关地区的管理体制和其它条件。其差额可以通过向出售者征收资本收益税的形式被吸收，也可以部分地由房地产中介商承担，或者再部分地由购买者承担，如建设排污管道和公用事业等费

用就是这样。但无论如何，所增加的 500 日元是不能被算作是原农用土地所有者财产权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在达到洋葱内核之前，这是必须剥去的外皮中的一层。

另一层要剥去的外皮是，由外部经济的介入而引起的价格上涨。前文提及的通过开设一条新铁路线而获得巨额收益就是一个例子。在二战后日本，这种事件非常普遍，有许多报导谈到一些暗中参与新线路计划的政界知情者预先低价购买了处于重要位置的土地，并在计划公诸于众后卖掉。像官方白皮书承认的那样，原来每单位面积 1000 日元的土地，其价格很快涨到 4000 日元。在这些例子里亦是如此，原先的土地持有者并不具有要求获得这笔可能进入他们口袋的巨大收益的资格。甚至在尚未通过出售土地得以实现其收益时，也有理由征收其土地增值税。

这样，为了达到洋葱的核心，以弄清有关土地私有产权的量度，所必须去除的外层是：(a) 投机活动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b) 外部经济影响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c) 必要的建设费用所造成的价格上涨部分。

### “土地价值的神话”

如果同意上述关于城市土地价格构成的分析，那么很清楚，所谓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只能限于我们所用的比拟——“洋葱的内核”。而这“不可侵犯”的信条，却被保守的当权政治领导人用作他们不采取对策来制止过去三十多年来城市土地价格不同寻常地上涨的托词。他们的无所作为表面上就是基于这一信条，并引用宪法的条款作为依据，但所造成的“土地价值神话”——土地价格将永不下跌——却被政治家和贪财者大肆利用，使日本社会害上了也许会被维布伦称之为“体面的敛钱狂”的病症。

投机因素是造成三十多年来城市土地价格上涨到 145 倍的最最大的持续的原因，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另外两层被剥掉的“洋葱

外皮”几乎无法解释创纪录的土地价格革命。如果需要对这一看法提供证据的话,那末请看上·一部分引用的 1989 年政府对工商业界的调查结果就足够了,它揭示工商业界持有的未利用土地中,至少有 78% 尚无使用计划。这是对持有土地用于投机目的的明白的招供。

另一方面,我们当然不能忽略造成城市土地价格上涨的实际推动作用。上面我们提到过 1972—1973 年的第二次高潮是与田中首相所提倡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紧密地相联系的。特别是这位洛克希德丑闻中的政治领导人也是一名土地投机的大师,并且带头造成一种承认为建设目的进行“地滚地”活动为合法的社会环境。在 1986 年以后的第三次高潮中,大多数观察家都一致认为 80 年代东京瞬间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创造了外国人办公和住宅用地的大量需求,对于这两者收取高于正常的租金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像六本木的阿克—希尔斯那样所谓的“智能大厦”,装备有 24 小时服务的最新信息设备,其办公室每单位面积(6×6 英尺)的月租为 6.2 万日元;邻近的有四间卧房的标准住宅单元月租金为 150 万日元或 1 万美元。毫无疑问,服务于这种需要的建筑商是有能力为此目的而吸纳很高的土地成本的<sup>(23)</sup>。

总之,不管是什么刺激因素对城市地价起了积极的影响,当它一旦产生影响时,“土地价值的神话”必然会使随后的投机性价格上涨远远超过原先刺激因素的提高收入可能性所能达到的水平。这就是导致三十多年中城市地价狂涨到 145 倍而批发价格只翻了一番的机制。

## 6. 土地价格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对策

### 一些社会经济后果

土地价格革命的社会经济后果如此多种多样和影响深远,以

致于我们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只能以概括的方式列举一些说明性的例子。

首先,普通市民希望在像东京这样的城市里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尽管很小的房子的梦想破灭了。一位大学毕业生终生受雇的平均总收入目前估计在 1.66 亿日元左右,仅仅够买东京中央地区 500 平方英尺的一室户公寓。据称在西方,一个人要购买住房的标准费用,约为包括他的收入、储蓄和可借款在内的一年可支配资金的五倍。如果将这个尺度用在日本一个普通的工薪族身上,其数额大约是 3000 万日元,尚不够在东京的中央地区买上一坪(6×6 英尺)住房用地面积。因此,如今的时尚是各大公司竞相向他们的雇员提供舒适的公司住房,以吸引求职者中的佼佼者。另一方面,由于已经达到的富有程度尚不足以购买家庭住房,日本的年轻一代正转向据称能获得像“富豪那样感觉”的消费方式,诸如购买昂贵的进口小汽车,全家去国外度假胜地豪华旅游等等。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反常的、摆阔气的消费。

其次,就像可能预期到的那样,土地价格革命的分配效应是极其不公正的。例如,国税厅每年公布的“高额所得税纳税人”名单就雄辩地揭露了这一事实。这张名单过去一直由工商业巨头排行在前,但是近几年来发生了变化,名单上前五十名几乎都是那些卖地获利者<sup>64</sup>。甚至那些还没有从他们拥有的土地上实现资本收益的人,他们以持有的财产作抵押而获得贷款的可能性,随着他们潜在资产价值的增加而大大增加了。《读卖新闻》1990 年 6 月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反映了公众对资产差距扩大的感受。有 71% 的答问者回答存在差距的扩大;而 1988 年 1 月民意调查中作同样答复的人为 48%。

第三,对公共工程的影响十分明显。在日本,近年来有人反复提出一种建议(部分地是由于来自外国的压力),要求日本重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刺激内部有效需求来替代出口驱动。从中曾根

执政(1982年11月至1987年11月)开始,日本政府就正式赞同这样的建议,尽力鼓吹扩建公共工程,这是政府能够发挥积极性且负担其费用的一个主要领域。然而,可以预期的是,公共工程建设正是那种通常都必须征地的活动,而土地价格过度上涨就成了阻碍很多项目按期完成的一个主要因素。举一个例子来说,被称为都市环二路的完工就由于无力出资购买虎之门至新桥仅1350米(0.84英里)的一段土地而拖延了好几年。政府发觉自己没有能力负担购买所需土地的费用,这笔费用目前已上涨到4287亿日元,约占工程总费用的99.7%。国土厅1987年3月宣称,如果土地价格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上涨的话,这项工程的完成将要延迟108年。这使人想起中国的一句古话:“要等黄河清,一百年也不行。”

东京尤其缺乏的是建造人行道、公园、儿童乐园所需的土地。在这里,当局的努力同样被土地价格革命所阻滞。与公共建设项目面临的这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在东京的一批大使(代表31个国家)向日本外务省提出一项前所未有的请日本政府帮助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这个问题已变得如此紧迫,以至于一些国家,像乌干达,已经决定关闭它们在东京的大使馆;另外一些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和西班牙,则决定将他们使馆房屋及占地的相当一部分出售。外国使馆处境如此窘迫,倒是对日本的富裕的一个可悲的注释。

第四,价格革命的一个更长远的后果,已经为那些十分重视城市社区中那种温馨融洽睦邻关系的人所注意,那种睦邻关系现正在日益破灭。无节制的地价上涨所产生的离心作用,剥夺了社区生活原有丰富多彩的内容。一个著名的时事评论家最近就此评论说:“熟悉的面店,而后另外一个老朋友——洗衣工,从街角消失了,留下的空地现在已被带刺的铁丝网圈了起来,不知从哪里吹来的冷风源源袭来……长期和睦相处的值得信赖的邻居们几乎不知

不觉地走了,一些难以形容的陌生人搬了进来,当我们相遇时甚至不说声‘你好!’……我们怎样才能<sub>在东京恢复曾有过的健康气氛?</sub>”<sup>②</sup>这样的评论几乎一点也没有夸张,在曾经充满生机的东京商业区街头,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失落感。这是土地价格革命带来的多么严重的后果!

### 对策的基本前提

如果我们不提及克服这个顽症的对策,我们关于土地价格革命的讨论就是不完全的。然而,从60年代早期的第一次高潮起,已经有许多文章谈论这个问题,并且在最近的将来(就我在1990年8月写这本书时而言)仍将会有许多文章出现和提出建议,因而对我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只限于提出一些我认为在讨论对策时很重要的一些基本看法。

首先,我想强调讨论中的两个基本前提的重要性:

1. 对土地的这种财产权不是不可侵犯的,土地政策必须向充分承认使用权的方向调整。

2. 制定土地政策的前提是应该对我们想建立的城市类型提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规划,——让广大市民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参与的一种规划。

这就是说,为了实现这些前提,应拟制法律和管理体制,作为订立公共规划所不可少的实用指导原则。

由于我特别强调承认土地使用权以取代私人财产权的必要性,因而在此简短地对这个问题作一历史回顾是适宜的。

首先,我们会问,为什么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私人财产权被认为是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权和生存权一起,已成为社会进化过程中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的文明社会是公民作为商品所有者通过商品交换来维持自身经济生计的一种社会。因此,一个人的生存权是建立在他作

为一个商品所有者持有的财产权基础上的。对那些独立的、所有权与工作过程是一致的自由民(自有农、手工业者、独立的制造业主)来说,很清楚,保证其财产所有权本身就是保证其生存权,因此所有权自然而然被看作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权。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演变过程意味着“劳动力”变成了像是“私有资本”统治下的一种商品。正像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为了使劳动力变成商品,劳动力的出卖者、即劳动者必须在双重意义上获得“自由”:第一,不附属于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在市场上提供劳动力;第二,他们与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相分离,并且从销售他们劳动产品的事务中脱离出来。换句话说,造成了所有权和劳动相分离。这种分离不仅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财产权与不拥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的生存权相分离,而且进一步意味着两大主要阶级: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关系。

总的来讲,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财产权和生存权的分离一直在继续并进一步加剧。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即使在今天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仍有相当多的个体业主在拥有的一小块土地和一些生产和贸易工具的基础上经营着小企业。对这些人来说,不可否认财产权和生存权在人权的概念中合而为一。与此相反,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中,国有土地极少,大多数人强烈要求一种独立于生存权之外的财产权(例如:资本主义企业主或过寄生生活的地主的财产权),这样的财产权可以称之为“非维生财产权,”它与基本人权无关,应该为了公共福利而予以限制。

即使在要求非维生财产权的土地所有权中,土地的使用权仍是问题的核心。举例来说,从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观点来看,在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的利用中,一种合理的权益是能够雇佣或解雇劳动力的所有者,而不是像对奴隶那样占有他。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也同样如此。只要在由双方协议的期限和租金条件下保证其使用,一个以商品生产为主要目的的资本主义企业会感到,维护这

样一个协议要比坚持其对所占有土地的财产权少很多麻烦。

总的可以这么说,无论是农业用地或者城市土地,土地政策最好要把重点放在它的使用权上,而如今那些赞同财产权“不可侵犯”原则的人,都是主要关心从他们的资产组合中所占有的土地上获得预期投机性收益的一批人。这后面一点与日本最近的土地价格辩论特别有关系。

### 建议的对策

在回顾历史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继续谈其它几点与当前土地价格革命对策有关的基本意见。

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能像英国《土地授权法案》(1967年)中阐明的那样,在执行国家、地区或地方计划时,能取得立法机关的支持,以确保在恰当的时候得到恰当的土地,这将大大有利于公共机构规划其土地政策。为了这个目的,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将是,赋予一个合适的政府机构以按剔除因地理环境改善所增值的部分后的净价强制购买土地的权力。补偿条款是公共机构征地的关键。在这方面,人们会想起1962年意大利曾经试图建立一个为建造低成本住房而征市内土地的自筹资金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可以按照作出计划决策以前两年的价格征购所需土地。这个条款后被宣布为不合乎宪法,并作出了让步性的妥协,将自计划决策日到实际强制征购日的间隔期内市场价格上涨因素也计算进去。在日本,近几年的情况通常是,上述这段间隔期要持续好几年,在这段时间里,官方的“公布价格”自身往往上升一倍多。显然,在今天的日本扩大市区公有土地是必需的,但与此同时,必须大大改进补偿条款,使私人土地拥有者得到的横财降到最小程度。

这个意见给我们带来了另一个密切关系到缩小土地价格构成中投机因素的问题。一般说来,与此有关的一种更直接的政策性



工具是实行一种税收制度,它主要有三种类型:(a)不动产税;(b)对已实现收入征资本收益税;及(c)对潜在收益征资产增值稅。从1960年第一次土地价格暴涨高潮时起,日本国内争论的焦点就集中于应该以哪一种征税方法作为抑制城市地价上涨趋势的主要工具。在作者编写本书时(1990年8月),似乎包括全国工商业组织成员在内的大部分专家都倾向于征取(a)类税,或提高持有土地财产的税率以鼓励更合理的生产要素流动。他们提出,如果在提高这种土地持有税的同时免除资本收益税,将会促使土地所有者出售手中的土地,增加市场上的土地供给。这个论点通常总与这样的设想有联系:甚至不太高的资本收益税也会产生一种“锁住效应”,或产生一种因对这种财产征取特种税而“锁住”财产持有者手上的某种特定财产的效应。这里牵涉到许多相当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处于物价持续上涨趋势的情况下,这种趋势会造成大量的“备用需求”,并大大地限制了“锁住效应”这一设想的适用性。因此我们此处将不详细讨论为缩小土地价格上涨趋势中的投机因素而应采取的征税措施问题,而只说明一点,即特别在一些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强烈要求增加上述(b)类税或增加已实现收入的资本收益税<sup>⑥</sup>。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1990年6月发布的《关于土地税制改革的基本政策》中,国土厅支持这样一种意见,即:采用累进资本收益税,同时对工商业所持有的土地财产潜在收益开征新的土地持有税(相当于上文(c)类税)。

最后,我们简要地提一下特别自1986年第三次城市地价暴涨高潮以来出现的许多建议,它们涉及到东京大都市功能的分散化规划。近年来,大概由于国际金融活动日益集中的缘故,东京经历了罕见的土地价格暴涨。政府建议每个部门都应采取步骤,至少将一个厅或局从东京迁到不那么拥挤的地区,但不出所料,这一建议受到了强烈的抵制。然而许多私人团体的专家提出一系列要在东京湾人工岛上进行庞大建设的计划,其中最野心勃勃的当推黑

川纪章集团,它建议在东京湾通过填海造出一个有三万公顷的人工岛,以便把中央省和国会搬迁过去,同时建设一个供500万人居住的住宅中心区。该计划回避了许多很现实的、与东京湾本身固有的多种功能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不能加以认真考虑。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赞同必须设法制止,如有可能,应该扭转如今向东京集中的趋势。在这方面,征收某些特种税是合适的,例如:对要在东京中心区获取更多办公用地的公司征收特别的企业税;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市中心上班的雇员人数为比例对企业主征收一种特别附加税;以及废除给予设在东京的政府和其它公共机构享有的豁免不动产税条例;等等。

### “土地基本法”

从1960年早期第一次城市地价上涨高潮期起,日本政府就通过它的部门机构或根据政府咨询团体的建议,反复重申将采取适当步骤来抑制城市地价暴涨趋势;然而事实上行动却很少。最后,在沸沸扬扬的公众舆论推动下,政府决定提出一项《土地基本法》,并预定于1982年12月在国会通过。这是一项宣言式的立法,以作为随后采取具体步骤的基础。该项法律将会产生什么结果,还有待观察,其五个“基本政策思想”如下:

1. 在土地使用上,公众福利观点将处于优先地位;
2. 应采取符合各地区实际条件的正确使用土地;
3. 对土地的使用应作出规划;
4. 土地不得作为投机的目的物;
5. 当土地升值时,受益者应按其收益大小承受相应的负担。

重要的是该法律中有一条款,明确规定有必要采取步骤来扩大中央或地方政府所持有的公共土地(第十二条),尽管在“基本政策思想”中没有明确阐明。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该法律的“基本政策思想”也为采取反投机政策措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基础。

《土地基本法》只是一个开端,因此,我在这里关于土地价格革命的讨论只能是一个中间阶段的报告。

## 7. 宏观经济管理不善

在关于现代社会通货膨胀的讨论中,我意识到我们决不应低估政府和/或中央银行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性。上文关于“双重价格革命”的讨论有意集中在能源和城市土地问题上,并特意对1972—1974年日本通货膨胀未作充分分析。在这方面,1973年9月即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前,日本批发价格指数已比一年前增长了18.7%,这就需要作特别的论述。这不能单独用1972年第二次城市地价上涨高潮来解释。如果我们对那个时期进行更详尽的分析,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地价上涨的部分责任应当由货币当局来承担,它大致从1970年末到1973年第一季度,一直在实行积极信贷扩张政策<sup>67</sup>。

### 1972—1974年通货膨胀的责任

关键问题是,日本银行当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控制,并且实际上确实控制了货币发行量。依据马歇尔的K值(无论按 $M_1/GNP$ 或 $M_2/GNP$ 比率)计算,货币扩张从1970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起就明显开始;日本银行当时的解释是为了适应市场上资产流动性的需求。这尽管有其真实的一面,但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对“强力货币”数量或对储蓄银行信用创造的货币基础所能实行的控制程度。“强力货币”是中央银行和储蓄银行之间进行结算所使用的货币,它包括储蓄银行在中央银行中的存款和所发行的现金;在日本,更甚于在别的国家,它受制于日本银行名声很坏的“窗口指导”等所体现的管理政策。这种“强力货币”的供给途径是:

- a. 由国际收支顺差产生的对外汇资金的净权利。

b. 除 (a) 以外的对财政部门的净权利。

c. 日本银行以贷款、债券等形式向私营企业发放的信贷。

从 1971 年第一季度起, 这种“强力货币”及其组成部分的供给见表 6.7。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尽管从 1971 年直至 1972 年上半年日本国际收支顺差有了非凡的增长, 在外流通的强力货币净增量相对比较适度, 1971 年底与前一年相比增长率不到 15%。这是通过减少对财政部门的净权利和从私营部门收回中央银行的贷款实现的, 换句话说, 是日本银行实行中性政策的结果。如果我们再来看一看表 6.7, 从 1972 年最后一个季度开始的那个时期, 情形就有很小的改变。从那时起, 尽管当时直到 1973 年第二季度的国际收支顺差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势头, 但其 (c) 项所占的比重, 或者说中央银行对私营部门贷款所占的比重, 无疑高于项目 (a) 所占的比重, 或者说高于外汇资金净权益所占的比重。另外, 从表中还可看到, 在外流通的“强力货币”增长率与前一年相比, 从 1972 年第四季度起就猛增至 30% 或更高, 并在 1973 全年中都保持这一速度。

鉴于第一次石油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影响只是在 1973 年 10 月之后才发生, 从而上面所概括的统计数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 1956 年到 1972 年上半年一直保持大致稳定的批发价格指数, 自 1972 年第三季度起有了明显增长, 到 1973 年 9 月, 比一年前上升了 18.7%, 这一事实说明, 通货膨胀的根源必须从与 1973 年 10 月后石油价格突变无关的因素中寻找。毋庸置疑, 我们在本章前面几节所讨论的土地价格革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土地升值是 1960 年便开始持续的一种趋势, 很难解释从 1972 年下半年以来批发价格的显著增长。美国在 1971 年 8 月决定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也产生了通货膨胀冲击影响, 结果造成了许多国际贸易商品价格的上涨, 这在本章的前面一节已提到过。但更重要的因素是货币当局的宏观经济政策, 导致了“强力

表 6.7 “强力货币”及其成分的供给(1971—1974)

	与上年同期相比的在外流通“强力货币”的净增长量 (10 亿日元)	左栏的 年增长率 (%)	增长来源的成份		
			(a)* (10 亿日元)	(b)* (10 亿日元)	(c)* (10 亿日元)
1971(I)	76.9	15.3	67.6 ( 61)	-70.3 (-63)	114.4 ( 102)
(II)	80.3	15.9	168.0 ( 481)	-157.2 (-450)	24.1 ( 69)
(III)	97.0	19.5	391.7 ( 428)	-234.6 (-257)	-147.9 (-162)
(IV)	90.1	14.5	440.0 ( 518)	-163.2 (-192)	-192.0 (-226)
1972(I)	78.5	13.5	435.6 ( 593)	-144.7 (-197)	-217.5 (-296)
(II)	100.7	17.2	317.4 ( 337)	-155.4 (-165)	-67.9 (-72)
(III)	112.0	18.9	160.6 ( 155)	-152.4 (-147)	95.6 ( 92)
(IV)	205.8	29.0	174.0 ( 88)	-198.1 (-100)	222.2 ( 112)
1973(I)	222.1	33.7	178.7 ( 82)	-164.8 (-76)	203.7 ( 94)
(II)	255.6	37.2	122.9 ( 49)	-155.5 (-62)	281.2 ( 113)
(III)	265.6	37.6	23.0 ( 9)	-193.1 (-75)	429.2 ( 166)
(IV)	313.9	34.3	-188.4 (-62)	-78.1 (-25)	572.0 ( 187)
1974(I)	241.1	27.4	-246.8 (-107)	-167.6 (-73)	645.1 ( 280)

注: \* (a)、(b)和(c)的含义,参见正文。

(a)、(b)和(c)项下括号内的百分比指占这二项总和的比率,它们仅仅与第一栏的数字大致相当,因为略去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项目。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经济统计年鉴》,小宫隆太郎制表,见前引书,第 32 页。

货币”供给的明显增长。为什么会采取这样一种政策？诚然，1971年春工商业活动看来出现了下降趋势，并且担心继美国1971年8月的决定之后日元的汇率预期要上升，这将造成日本出口徘徊不前，私人资本形成减少。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情况促使日本银行采取了“银根松动”的货币政策，它声称是为了扭转那种趋势。这种政策虽然给私营企业部门创造了相当大的过度流动性，却一直持续到1973年的第四季度才恢复资本形成。在整个1972年，货币当局都在鼓励货币供给的扩张，直到1973年11月才决定提高存款准备金比率，又于同年4月提高官方银行利率。然而上述政策的效果却姗姗来迟，这从表6.7中整个1973年持续的“强力货币”高水平就可以看出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当局的宽松货币政策（特别是从1972年到1973年春季期间）应对1972—1974年的通货膨胀负有责任。要不是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过度流动性，从1972年开始的城市地价“第二次高潮”也许就不会如此泛滥。

### 汇率政策的回顾

在此有必要对与刚才讨论过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当汇合在一起的日本政府汇率政策进行简要的回顾。可以回想1949年4月，日本还处于被占领状态下所建立起来的单一汇率：1美元合360日元，当时的许多专家都认为这个汇率正好像是给一个康复中的高尔夫球选手的一种不利条件。不久以后，由于日本制造业恢复了潜在的效率，又进一步赶上居于前列的西方国家，这个360日元1美元的汇率显得日元低估了。在第三章（表3.1）中，我们比较了1950—1973年间一些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其表明，以1950年水平作为100，日本的指数达到1412。而美国和英国都是210，西德是411；也就是说，日本的增长大约是英国或是美国的7倍。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它就意味着：随着几十年的过去，

1949年建立的360日元1美元的汇率,日元是被严重地低估了。事实上,西德在1961年使马克升值了5%,又在1969年升值9.3%。但是,日本政府面对着主要由于日元低估引起的明显贸易失衡<sup>①</sup>,仍坚定不移地维持原有的汇率。根据1971年12月史密森协议,日元对美元升值了16.88%(中心汇率定为1美元兑307日元)。然而即使在这个汇率上,1972年日本贸易仍然出现很大顺差,事实上比1971年还要大。很清楚,甚至在美国于1973年2月决定美元贬值10%以前,日元已被低估了。不管怎样,史密森协议于1973年3月崩溃了,从而进入了第二次浮动汇率时期。结果日元立即上升到了1美元兑265日元的水平。但是再一次,日本银行以“逆转肮脏浮动”的方式进行干预,通过抛售以前积累起来的美元,吸收对日元的过度需求,从而使日元的汇率维持了大约7个月的基本不变,直到第一次石油冲击的发生。

这一汇率事件与1972—1974年通货膨胀的关系(就它与石油冲击前那段时间而言),就在于实行严格地钉住低于均衡汇率水平的日元固定汇率,从而促使把国外高得多的商品价格引入了日本。如果日本在1972年6月英国放弃史密森协议时也这样做了,情形可能会大不相同。事实上,在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春这段重要日子里,汇率调整的延续加剧了为抵销国际收支顺差而采取的宏观经济管理不当的后果。

如果就此结束本章而不指出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从1972—1974年的通货膨胀经历中(就货币和汇率政策而言)所学到的极有价值的一课,那是不公平的。因此当1979年第二次石油冲击发生时,他们对这突发事件所作出的政策反应就比较符合当时的需要。

## 注 释

① 1956年至1975年,当批发价格指数上升到1.88倍时,城市土地价格(全国

平均数,不是指那六大都市)则上升到 24.1 倍。

- ②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12卷,1968年,第473页。
- ③ 同上书,第474页。
- ④ J·M·凯恩斯:《货币论》,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4年,第2卷,第158页。
- ⑤ 同上书,第159页。
- ⑥ 这里说明一下,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冲击期间,每桶油价从1979年1月的13.34美元上升至1980年11月的32美元。
- ⑦ 我们没有论及的一个直接而又重要的副作用是城市居民普遍感到恐慌,生怕因此而买不到家用必需品,如卫生纸和清洁剂,这说明了在日本分配体制下城市居民心理的典型反应。宫崎义一的《新价格革命》,对这一事件从社会经济角度作了杰出分析。岩波书店,1975年,第12—108页。
- ⑧ 在这方面应该指出的是(正如我们在第四章末尾所讨论的),通过交错补贴工业用的费率(以牺牲民用利益为代价)被过分降低了。每千瓦小时的单位费率在1962年为38:100,优惠工业用户,虽然这一比率在1974年调整为53:100。
- ⑨ 查尔斯·J·希契:“我们未来的能源”,《主题报告人》,1978年夏,第3页。
- ⑩ 日本石油供给中99%以上需进口。
- ⑪ 日本银行《研究日报》转载,1990年4月,第56页。
- ⑫ 联邦储备委员会:《美国经济决算表》,转载于上引书,第57页。
- ⑬ OECD《收入统计》,汇总于日本政府大藏省《参考资料》1990年,第6页。我亲身的经历颇能说明东京房地产税的增长趋势。在我所居住的一小块土地上,1989年我所支付的房地产税是1956年的38.2倍,而这个时期的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到5.3倍。
- ⑭ 征遗产税的地产评估是基于国税厅编制的所谓“捷径费率”,它一般只占市场价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还有另外两类官方评估的土地价格,一类



是“公告价格”，国土厅每年编制一次，指的是“当交易自由和正常进行时，1月1日的价格”。这些“公告价格”的绝对值或多或少跟着实际交易价格变化，并通常约为后者的50%到70%；另一类是自治省公布的房地产税“评估基准价格”，这只占目前市场价格的5%。我们在本节中使用的城市地价指数是由日本房地产研究所编制的，它主要着眼于土地价格的趋势（和波动），正因为如此，它是享有盛誉的一种实际价格变动指数。

⑯ 参见《日本经济新闻》，1990年4月18日。

⑰ 《文艺春秋》，1990年8月，第150页。

⑱ 《每日新闻》，1990年8月5日。

⑲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记住，目前的自由民主党是1955年11月两大保守党合并而产生，从那时起，三十多年来自由民主党一直是执政党。

⑳ 与《朝日新闻》荒垣秀夫的一次对话，载《朝日放送》，1965年1月。

㉑ 《杰里米·边沁的经济学著作》，第1卷，W·斯达克编，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伦敦，1952年，第332页。

㉒ 《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12卷，1968年，第592页。

㉓ 《宪法研究委员会第十三届全体会议记录采编》，1958年，第40页。

㉔ 《经济学家》并没有忽视东京高昂的土地成本，它在1987年10月3日那一期上（第25页）评论道：“如果本杂志这一页是东京头等房地产中的一块土地的话，那么购买它要花一百八十万日元（约一万二千美元）。相反，如果这么一页大小的土地是伦敦城内成为最近头条新闻的一笔地产交易的一部分，那么也不过是三千四百美元。房地产，就像日本的其它许多东西一样，发疯般地昂贵。”这儿我们可以作个补充说明，在1987年9月至1990年3月期间，日本的城市地价指数上升了73.8%。

㉕ 列于1990年榜首的某先生所付的所得税为32亿日元。

㉖ 日比野和幸，《朝日新闻》，1987年12月27日，第一页。

㉗ 例如，小宫隆太郎的论述，《现代日本经济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东京，1975年，第225—268页；稻田献一：“都市的土地税制”，《世界》，1987年

12月,第123—136页。

- ② 小宫隆太郎详尽地探讨了这一问题,见其《现代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东京,1988年,第一章“1973—1974年通货膨胀的原因”。
- ③ 在尼克松1971年4月15日宣布之后的十一天内,日本仍以360日元的汇率开放其外汇市场,并在其外币储备中增加了39亿美元;接着在8月至12月第一次浮动汇率时期,日本银行通过市场再买入27亿美元来执行其“肮脏浮动”政策,造成一种日元价值不会下跌的印象。

## 第七章 公司资本主义的进程

在本章里,我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日本的“公司资本主义”,它在7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显著的转变。但是首先要简单地描述一下日本经济成就所取得的“日本雄居第一”的地位;再说明这一地位是就作为未分配收入(S)、折旧基金(D)和总投资(GV)之间差额,或者说 $(S+D)-GV$ 的“净内部剩余”这个概念而言的。直到最近以前(正如前些章节所指出的),情况确实是这样,那时这个数额通常是负的,以至于必须用相当大的外部借款(L)来弥补差额。但是,实证研究材料表明,日本制造业公司的 $(S+D)/GV$ 的比率逐渐上升,从高增长时期初期(1956—1960)的60%左右,增至70年代后半期的100%以上,并且在80年代仍保持着这个水平。这并不是因为完全没有间接融资,而是净内部剩余的增长导致了公司内分工的最新发展模式,扩大了一家公司参加一种以上产业(产生了联合大企业)和跨越国界(全球化)的活动和控制范围。这种趋势同时也突出了以前那种大企业控制众多互相联系的公司之所有权方式在新形势下的重要意义,从而进入了我所说的“公司资本主义”阶段。

本章其余部分用于讨论(1)以一个特定工业(家用电器和电子工业)和一个区域(在澳大利亚的日本资本)为代表的全球化趋势;和(2)作为反映公司资本主义充满信心地发展的日本私有化趋势,较详细地说明国有铁路的具体例子。

表 7.1 人均 GNP 的比较数字(1950—1988)

	日本	美国	英国	西德
1950	131	1 897	744	468
1955	273	2 446	1 068	825
1960	468	2 852	1 390	1 302
1965	919	3 629	1 877	1 942
1970	1 949	4 952	2 254	3 041
1975	4 475	7 401	4 254	6 784
1980	9 103	11 996	9 567	13 296
1985	11 098	16 760	8 134	10 355
1988	19 905	18 570	12 107	18 373

注：按各自的现行汇率折算成美元。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小宫隆太郎制表。

《现代化日本经济》，第 157 页；1988 年的数字摘自日本银行，《经济和金融比较统计——日本和其它主要国家》，1989。

## 1. 资本主义的“胜利”？

### “位居第一的日本”？

战后四十多年，日本无可比拟的人均实际 GNP 增长所反映的日本经济成就，说明了现代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混合经济资本主义的成功史实。表 7.1 列举了几个发达国家用美元表示的人均 GNP 比较数字。

日本人均 GNP(用美元表示)在大约四十年内获得了 151 倍的增长，紧接其后的佼佼者西德，增长了 38 倍，这确实是引人注目的，即使把我们的比较基期定在 1970 年，也就是十分接近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结束的那一年，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随后的 18 年里，日

本的增长超过 9 倍,而西德是 5 倍。从与日本竞争的发达国家的立场来看,日本在世界出口市场中份额的显著增长也许会令人惊恐,这从表 7.2 中就可以发现。日本这一份额的相对上升,实际上出现在日元几乎升值 100%<sup>(1)</sup>的那段期间内,这在国外一定会被看作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同时又遭到嫉妒。

表 7.2 日本在世界\*出口市场中的份额

(单位:%)

	总出口	制成品	机械设备
1955	2.4	4.2	1.7
1960	3.6	5.9	3.9
1965	5.1	8.1	6.7
1970	6.9	10.0	9.8
1975	7.0	11.3	12.5
1980	7.1	11.9	16.3
1985	10.1	15.5	22.0

注: \* 不包括共产主义国家。

资料来源:小宫隆太郎《现代日本经济》,第 157 页。

因此难怪会在日本之外出现许多的评论和书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解释日本的成就,并且(或)预测日本仍旧会有光明的未来。最早作出这种预测的是著名的未来学家赫尔曼·康<sup>(2)</sup>,但是这方面更为典型的是由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艾兹拉·伏格尔写的书《位居第一的日本》。他在书中用下述的话概括了他的观点:

“目前,在政治和文化影响方面,甚至在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日本并不是世界上的头号大国。然而,日本的体制在处理后工业时期各种问题的有效性方面无可争议地是头号大国。考虑到它的有限空间和自然资源以及拥挤的人口,日本在经济生产率、教育水

平、保健和控制犯罪方面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考虑到日本不仅在 1945 年而且在 50 年代中期（即二战后的经济恢复基本上已经完成后），在以上这些方面仍然是那么落后，那么日本的成功就更为惊人”。<sup>③</sup>

就在最近，澳大利亚评论家默里·塞尔描绘了一幅多少有点离奇的未来画面（也许作者并不是认真的）：

“未来日本帝国的轮廓是清楚的：英国和爱尔兰可能会分别成为日本的香港和澳门，正适宜做日本在欧洲的转口贸易；美国将是日本的非常富有的印度——一块绝妙的土地；澳大利亚可能成为日本的澳大利亚，成为充满冒险和酗酒的土地，正适合充当日本持不同政见者和依赖国内汇款度日者的流放地。只留下餐桌上的残羹剩饭给别人；荷兰也许给印度尼西亚人，法国给越南人。”<sup>④</sup>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日本史教授加文·麦克考马克引用了这一段话，并在一本美国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资本主义的胜利？来自‘头号’（日本）的证据。”<sup>⑤</sup>他实际分析了战后日本社会的体制与其经济成就之间的关系。伏格尔也对“[日本]今日体制的有效性”很感兴趣；这些评论很自然地促使我们研究日本资本主义的演变，暂不管这种演变成功与否，它已经历了其现代史上最辉煌的高速增长时期。

## 2. 日本公司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如果被问到战前日本资本主义有哪些特点（如果有特点的话），那么被提问者会指出：（a）它的财阀结构或者以家庭为基础的控股公司对主要产业的严密控制；和（b）制造业公司为扩展业务而强烈依赖间接融资。

战争结束后，日本受制于占领当局的各种改革，上面提到的第一个特点被认为应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样要对日本军国主义负

责(埃德温·鲍莱)。起初提出的是彻底解散财阀结构的计划,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曾讨论的那样,随着1947年前后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大改变,该解散计划本身也变得半心半意,1952年占领结束后不久,战前的类似财阀结构又复苏了,虽然是以一种略加修正的、不那么富有侵略性的方式出现。至于上文提到的第二个特点,或者说日本产业公司资本结构中对外债的强烈依赖,战后的改革根本没有触及,而且正如第四章中论及的那样,这个特点继续或多或少作为一种典型存在,一直到进入高速增长60年代。

经济体制的演变往往要在多年以后才能为我们所见到,因此在回顾中,我们现在才认识到日本资本主义制度某些方面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是有关供给机制和公司资金的使用方面。简而言之,说到这里人们会想起一个在美国经常反复提到的论断,那就是说公司的内部储备金是美国供给投资资金的方式<sup>⑥</sup>,这一经营信条直至最近以前才在日本偶而被接受,但经过那一段高速增长时期的演变后,现在已经成为一种确定的基本常识。这一节研究这种变化着的情况,并提出一些简要说明,目的是阐明各相关因素之间概念上的和一部分因果性的关系。

### 公司资金的来源和使用——系统性的考察

让我们来考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制造业部门内的马歇尔公司,并以在日本持续了20年之久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背景。战后初期,这个赢利企业的典型经营模式是从银行获取它的净投资资金和努力扩大它在专业产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通过提高生产率,尽最大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盈利地位以逐渐增加企业内部储备金。当这个企业发展生产时,它的折旧提存(D),不论怎样计算,都必然大于它所需要的重置费用(R),从而产生了一项剩余,即 $D-R > 0$ 。这项剩余加上发放股息后的企业内部积累(S)在某个特定年份可能仍不足以支付计划的净投资额(V),即

$D-R+S < V$ ; 这时企业就仍继续仰赖银行的长期贷款(L), 即  $V = D-R+S+L$ , 这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阶段, 对此我们已在第四章中作了特别的说明。这是日本公司投资资金构成的一大特色。

随着这种有利的高速增长时期的继续, 这家企业在本行业中已发展到具有一定规模, 它很快占有卖方寡头垄断地位, 使它能够推行一种足以阻碍新加入产业者的价格政策。自然, 此后就是该公司利润激增, 带来了比以前多得多的内部储备金(S), 其数目如此之大使其能支付全部净投资(V)的费用而有余, 即  $S-V > 0$ 。一旦这个企业取得了这种地位, 一种新的剩余可增长到  $(D+S)-(R+V)$  的额度, 我们把它称为“企业的内部净剩余(NS)”。

于是, 企业又面临着如何使用这些内部净剩余的问题, 有这么几种可能的方式, 即:

1. 偿还它的银行借款;
2. 增加科学研究支出;
3. 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4. 开拓原来专业以外的经营活动;
5. 进行证券和地产的投机性投资。

这家企业并不能一下子利用所有这些可能性, 但当我们考察由无数家企业组成的整个经济, 那末随着经济不断高速增长, 总的内部净剩余是流向所有这些方面的。

这些事态发展中的每一步当然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 如果银行贷款大规模地偿还了, 银行就不得不为其可贷放资金寻找其它出路。他们通过转向购买股票和证券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财阀型的多企业结构中, 中心银行与过去极其依赖该银行的联系企业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将如何呢? 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以后将再论及。

对于上文提到的第二种事态发展方式, 即科学研究支出的增



加,只要说明这一点也就够了:这种支出实际上有着一种新的发展方向,即支持我们所回顾的这段时期的高速增长。至于第五点,即对证券和地产的投机性投资,我们已在上面一章基本上讨论到了。而第三、第四点中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的演变模式。

首先,有如下四种教科书式的分工模式:

1. 企业内分工,古典例子是亚当·斯密的制针工厂,由独家企业计划控制。

2. 同一行业内企业之间的分工,在竞争条件下没有中心控制机构,可认为服从“看不见的手”的调节。

3. 国内社会或行业间的分工,经常受到精心制订的国家政策的干预。

4. 可认为建立在比较利益基础上的国际分工,有时也被幼稚工业保护政策等所扭曲。

确实,在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各种各样修正以上模式的变化,例如,垄断的发展使(1)、(2)合并起来或者帝国主义剥削严重限制了上述(4)中隐含的经济合理性。但也许更为显著的是企业内分工的最新演变模式,即将一家企业经营与控制的领域扩大到跨行业与跨国界的地步。这意味着当私人资本(资本主义下基本经济活动单位)越来越壮大,就会趋向于发展行业内分工,一方面创造一种联合大企业的多行业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组织跨国公司进一步开拓全球化时代。这些趋势既植根于上文提到的“企业内部净剩余”(NS)的增长,又同时显示了私人资本具有把一种接一种的社会体制和功能都能接纳进来,使市场成为许多更小的私人资本单位都参加的大市场<sup>①</sup>的内在动力。换句话说,过去的一家代表性企业,被马歇尔喻为“森林中的一棵树”,所主要关心的是企业内分工,其利润最大化,“主要是通过试图改变新古典模式中的那些外生决定参数(时尚、国家政策、技术、竞争结构)来实

现的”。<sup>⑧</sup>在我们前面提到的四种教科书式的分工中,只限于第一  
种(企业内的“制鞋厂”模式)才是唯一可让为两独立企业的计划

以多种工业和跨国界管理范围为目标的内外部积累最大化来实现自我扩张。由此,个人成了从属于被称为“公司体”的自我永存的组织的工具,而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人。

表 7.3 制造业公司内部基金的相对增长(五年平均数)

(单位:10 亿日元)

	内部储蓄(S)	折旧(D)	总投资(GV)	$\frac{S+D}{GV}$ (%)
1956—1960	77.5	181.3	442.2	59
1961—1965	92.6	502.9	940.2	63
1966—1970	353.8	934.4	1950.7	66
1971—1975	463.8	1696.9	2864.0	75
1976—1980	811.4	2354.2	2903.1	109
1981—1985	1193.4	3605.7	4744.5	101
1986—1989*	1907.5	4671.8	5976.2	110

注: \* 四年平均数,缺 1990 年数据。

资料来源:由宫崎义一在其《现代公司理论入门》一书中所列表式。(有斐阁,1985年)第 358—359 页。数字摘自日本银行《主要公司经营分析》。作者根据同一来源补充了最新资料。

上面引述的简要画面具有理论抽象的性质,多少有些简单化了,而且有些地方需要加以限定。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举出一些实证材料,说明日本在高速增长时期及其后资本主义体制的演化模式。

### 内部净剩余的实证材料

实证方面第一点需要讨论的是成熟公司内部净剩余(NS)的上升趋势,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标出的 $(D+S)-(R+V)$ 。在表 7.3

中,我们加上了 R(重置)与 V(净投资),把它们和定义为 GV(总投资)。其趋势被清楚地显示出来:它证实了这样的论点,即虽然高速增长期开始时,制造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外部基金为其总投资的来源,但  $(S+D)/GV$  的比率,或者说内部基金占总投资的比率,在 70 年代稳步增长,最终到 1976—1980 年间超过了 100%,80 年代也或多或少地保持在该水平上<sup>11</sup>。

表 7.4 特定行业内部基金与总投资的比率

	1960 年比率	1970 年比率
建筑业	58	146
精密机械	34	154
水泥制造	47	107
食品加工	50	103
电力机械	29	109
批发业	64	115

资料来源:宫崎义一:《日本经济的结构与状况》(第二卷)筑摩书房,1985 年,第 220 页。

如果我们检验特定行业的这一比率,我们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到 1970 年已经超过了 100%的界限,如表 7.4 所示。到 1974 年这样的工业的数目进一步扩大,扩展到包括化肥(121)、金属制造(136)、橡胶制造(104)、采矿(117)等工业。

公司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内部资金的另一面便是金融机构投资模式的改变,表现为持有股份的显著增长,它们持有股份在总股份中所占的相对份额从 1950 年的 12.6%稳步上升到 1971 年的 32.6%,而私人持有股份的份额从 1950 年的 61.3%下降到 1971 年的 37.2<sup>12</sup>。这样一种转变模式自然反映在公司之间股权持有的交叉网络上,这种交叉网络现在比过去更为广泛地存在着。而金

融公司在其中经常占有主导地位。占领时期结束后复活的财阀型集团的情形尤其典型。对于财阀集团内部持有股份达到的程度，只要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1967年住友商事（贸易公司）的十大持股者中，为首的是住友银行（占8.06%），其它九家公司也都可以确认属于住友集团，这十家总共持有商事公司总资本额的42.5%。

如果我们将各家新复活的财阀集团的资本额加起来，计算集团内部持股占各集团总资本的百分比，我们发现，随着高速增长的发展，它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正如表7.5所示。每一财阀集团内部各公司的矩阵型相互持股已由宫崎统计并列表<sup>93</sup>，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今天存在于集团内部许多工业公司之间交叉持股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们在前面第三章所提到的，其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各集团内盛行很密切的交叉董事制，并为各有关经理每月例会的制度所巩固。

表 7.5 财阀集团内部交叉持股比例的趋势

(单位: %)

	1963	1965	1968
住友	14.26	15.13	18.62
第一	10.18	10.26	15.84
富士	9.85	10.41	13.57
三菱	12.91	13.93	16.35
三井	8.27	9.51	11.20
三和	6.96	7.73	9.60

资料来源：宫崎义一：《日本经济的结构与状况》（第一卷）（筑摩书房）1985年，第241页。

理论上，这种矩阵形的交叉持股与二战前的财阀体系有所不同，但实践上它与后者几乎完全一样起作用，并且与二战后所称

“联合大企业”<sup>(9)</sup>极为相似。尽管早期私人企业的独立或通过合并与兼并的方式发展，均采取横向或纵向扩展的形式，尤其发生在1895—1907和1920—1939年间的美国，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中多样化或联合大企业型的公司拓展呈现显著增长。例如，“1961年至1969年间，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当时已经是一家非常大的电讯跨国公司)又向别的领域拓展，兼并了美国最大的面包商、美国最大的连锁旅馆、美国最大的营造商、美国第二大汽车出租服务公司及许多大金融保险公司”。<sup>(5)</sup>在日本，财阀集团公司习惯于采用前一种网络型的模式。而丰田汽车公司等独立大企业则模仿如ITT等美国公司所采取的那种方式。

### 丰田案例

丰田汽车公司，在1989年日本大公司公布收入中名列榜首，1990年《幸福》杂志的一次调查中将它列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公司。它作为丰田自动织布机公司的分支机构成立于1937年8月。成功地创立该公司的是丰田佐吉<sup>(6)</sup>，一位自始至终与财阀集团没有任何联系的独立的发明家与企业家。丰田佐吉在他逝世(1930)前一年，从英国“普拉特兄弟”公司获得了100 000英镑，作为他自动织布机专利权的专利收入。他把这笔钱全部交给了他的儿子喜一郎，嘱咐他用作研究和开发的基金以建立一家新的汽车制造企业。从此，丰田汽车公司形成了一个传统，即不依赖外部资金进行投资。诚然，在早期它也依靠发行公司债券作为融资手段，但这些债券到1978年已完全偿清，所积累的内部净剩余已完全足以支持公司参与部分银行业务活动，当年的贷款利息收入即高达360亿日元。

30年代后期，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正处于上升时期，丰田汽车公司奉军事命令集中生产军用卡车。整个战争期间自然还是这

样。直到 1959 年,公司的诞生地举母市被易名为丰田市后,汽车制造才真正上马。众所周知,此后丰田迅速扬名。丰田公司推行的合理化政策对它的员工及附近的分包工场来说是相当苛刻的,因此以《绝望的工厂》、《汽车王国令人沮丧的黑暗》为题的报道大量出现。但只需列举一项统计就足以证明,丰田公司到 1976 年在汽车生产的价值生产率方面所取得的遥遥领先的地位。下面是当年几家最主要汽车公司的人均税后利润比较(单位:日元):

丰田	2 570 000
日产	1 340 000
通用	1 140 000
福特	650 000 <sup>17</sup>

通过这种途径,丰田继续上升成为世界第一号汽车生产商,内部净剩余不断增长,这些净剩余首先被用在建立起一家给顾客贷款的融资公司上,而后又用在建立海外分支工厂上。最后,公司决定发

表 7.6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五年平均数

(单位:10 亿美元)

1956—1960	0.09
1961—1965	0.13
1966—1970	0.53
1971—1975	2.47
1976—1980	4.13
1981—1985	9.43

资料来源:大藏省。这些数据来自大藏省,根据向该省提出申请及批准数,但经常有些投资活动并未最后拍板,即使拍板了,但时间也可能延迟一年多。然而,这些统计很有用,它们都根据产业和投资目的国而分类。日本银行在出版的国际收支刊物中另有一套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其绝对值小于大藏省数字,约小 40%—60%。

展成联合大企业,并修改了公司章程,将其业务扩展到飞机制造及维修、与海运有关的业务及房地产业。这就是在日本的高速增长时期一家巨型公司内部净剩余大量增长的符合逻辑的结果。

### 3. 全球化趋势

#### 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

我们上一节已提到过,随着高速增长期中内部净剩余的增长,还有一种利用这些净剩余的可能性,就是向国外直接投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统计数字来证实这种趋势,如表 7.6 所示。目前所能得到的最新数据是,1986 年为 223 亿 2 千万美元,几乎是 1985 年数字的两倍。我们可以回想起制造业公司的内部储备金(S)加折旧(D),在 1976—1980 年的五年平均数比他们的总投资(GV)还高,达 109%,而 1971—1975 年期间这一比率则是 75%;这一事态的变化,在 70 年代对外直接投资(DFI)的显著增长上明白地反映了出来。

毋庸置疑,二战前日本资本就进行了广泛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那些投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远东地区的剥削手段而已。战后,日本遗留在国外——如在中国(包括以前的满洲)——的资产都已被没收或清算;战后日本只能完全从零开始其海外冒险,以平等或低人一等的姿态在世界各地合作。而且,直到 1951 年,仍被盟国占领着的日本才被允许开展直接海外投资。然而,即使这样,那时日本的国际收支地位,使得日本政府不得不严格限制发给对外投资企业许可证,以防耗尽并不充裕的国家外汇。从而,在 50 年代初重新开始对外直接投资时,当初拟定的范围被限制在:

1. 为便利出口销售而在外国设立贸易公司和银行的分支机构;
2. 与促进和开发自然资源相关的大型投资项目,如阿拉斯加



的纸浆(1953年),巴西的米纳斯·加莱斯钢铁工程(1957年),以及阿拉伯的石油(1988年)。

60年代,这一范围扩大到主要在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建立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如纺织和食品工业)的生产基地。这里,主要的动机明显在于后者的保护主义政策及转移比较利益。然而,DFI总额仍是有限的,直到政府在1969年到1972年6月期间采取措施,完全放开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输出控制,DFI才有了真正的动力。在1951至1971年的二十一年中,DFI总额只达36亿美元,而在1972年到1973年的两年中猛跳到58亿美元——形成二战后的第一次投资高潮。

这次高潮背后的促成因素是:(a)日元汇率的升值(从1971年的360日元比1美元升到1973年的265日元比1美元),使日本的出口品在海外价格升高;(b)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发展,日本的实际工资明显上涨,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利益进一步地转向较不发达的其它亚洲国家;和(c)至少直至1973—1974年石油危机时的十分有利的国际收支地位。尽管石油危机对经济有某些消极影响,如在前面一章中讨论的那样。但这些促成因素同样继续在70年代发挥作用,支持了高水平的DFI,直到快进入80年代第二次投资高潮光临日本时止。特别是,从1981年起,年投资资金流量开始明显地上升到90亿美元的水平;1985年和1986年的两年总量(345亿美元)竟相当于1952—1981年30年间的总量。但这一时期,有一新的促成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开始使日本政府头痛的日本和那些指责日本不公平竞争的国家间的摩擦不断增加。早些时候,贸易摩擦,尤其和纺织品出口相关的摩擦就已存在。但这次是新的商品——基本上是60、70年代日本高技术产业比其它发达国家表现更出色的结果<sup>18</sup>。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受影响的国家开始对日本产品采取各种进口控制措施,如提高关税,运用“反倾销”条款,建议日本“自愿”限制出口等等。面对外贸的这

种新发展,并且担忧这种趋势可能继续加剧,有着很大出口贸易利益的日本制造商开始认真地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特别是在贸易摩擦正引起各种问题的国家。值得一提的是,在通产省对已在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的日本公司所作的一次调查中,各有关行业中这种投资行为动机所占的百分比如表 7.7 所示。从表中我们能看到,从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第二次高潮具有哪些新的特征:即(a)主要动机是对付贸易摩擦问题;(b)与之相关的普遍是高科技产业;以及(c)投资目的地为发达国家<sup>⑩</sup>。

表 7.7 在发达国家建立子公司的动机——按产业划分

产 业	为了对付贸易 摩擦问题(%)	为了在相关国家 保持或增加市场份额(%)
办公机械	96.7	极微
机 床	77.1	14.3
家用电器	53.6	13.6
电子工业	30.0	32.1
汽车工业	66.0	24.0

资料来源:通产省《通商白皮书》(1986年),第182页。除上述两种以外的动机,这里未选载。

正是在这种发展过程中,DFI的增长伴随着日本企业的全球化趋势而出现,也涌现了制造业各个领域的许多跨国公司(MNC)。然而,同时必须指出,特别从80年代前半期起,全球化的潮流开始扩展到了金融、保险和不动产领域,经常出之于寻求减轻税负的动力<sup>⑪</sup>。

现在我们可以说日本资本主义已经置身于(虽说迟了些)世界资本主义的前列。世界资本主义现在有着许多主宰着这个世界大部分市场导向型经济的多国和跨国公司网络。日本是这场全球化

竞争的新参加者,这可以见之于表 7.8。该表列出了 1981 年各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产值和该国正常出口总值的比率。重要的是,比如美国跨国公司,其国外子公司的产出是该国出口总量的两倍多。日本被列在表格的最后一行,其全球化比率最低,只有 12.2%,其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的产值只占出口值的 20.3%。

然而,1981 年后,随着生机勃勃的日本资本主义的继续前进,情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就如前面指出的 DFI 增长情形一样。这种趋势直到撰写本书时(1990 年 9 月)还没有什么减弱的迹象。在这里,我们也许该探索一下全球化模式中有代表性的两例:其一,一个突出的产业部门——家用电器和电子用品产业;其二,一个突出的地区——澳大利亚——近年来日本资本家逐鹿的好去处。

### 全球化模式剖析——电气电子产业案例

日本家用电器、电子用品产业的增长和发展的历史,不仅生动地说明了高技术产业的自然特性(这真得用一卷书来论述),而且也说明了全球化趋势的许多重要特征<sup>①</sup>。但是,这里我们只能满足于对一些要点作粗略的勾画。

战后日本家用电器、电子用品产业的增长真可谓是奇迹,1955 年产值是 1924 亿日元,至 1986 年则达 23.9 万亿日元,增长了 123 倍,占当年整个机械产业的 39.6%,高于以 32.6%居于第二位的运输设备产业(包括汽车工业和造船业)。这可以用该产业各个部分的出口增长来扼要说明,如表 7.9 所示。该表很清楚地表明了电气电子用品产业中一些组别的变迁情况。其中照明装置和收音机加在一起,其比例从 1960 年的 62.3%下降到 1985 年的 1.9%,而另外三类——录像机、工业电子产品和电子部件(半导体装置、集成电路等)——从 1960 年的 16%上升到了 1985 年的 65.2%。产品构成上如此剧烈的转变,以及某些其他类别所处地位的明显

表 7.8 跨国公司销量和各国出口总量比较——1981 年

国别	公司数	跨 国 公 司			该国出口值	国外生产除
		销售值(百万美元)	海外子公司产值	全球化比例	(百万美元)	以出口(%)
		(A)	(百万美元)(B)	(%)(B)/(A)	(C)	(B)/(C)
美国	239	1 427 819	483 286	33.8	233 677	206.8
瑞士	10	42 934	34 044	79.3	27 049	125.9
英国	67	263 320	128 133	48.7	102 201	125.4
瑞典	16	39 512	28 166	71.3	28 401	99.2
法国	20	144 031	57 632	40.0	106 425	54.2
西德	33	218 517	80 447	36.8	176 090	45.7
荷兰	8	45 436	29 261	64.4	68 715	42.6
日本	62	251 832	30 831	12.2	152 030	20.3

资料来源：引自宫崎义一《现代企业论入门》，第 346 页。该表利用了詹姆斯·斯托普福德《世界跨国公司指南》(1983 年)和日本银行《外国经济统计年鉴》(1981 年)的资料。

稳定(如家用电器和彩电)，一方面反映了技术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竞争情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外国政府有明确目的的政策措施，以及 60 年代以来，二十五年内产业本身所采取的全球化步骤。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直到 1951 年，尚被占领的日本才被允许开始直接进行海外投资，其最初的意图是建立贸易公司的分公司以特别有利于推动海外销售。有关电气电子业的情况亦是如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资本新兴起来的生产基地主要是在东南亚国家，通常以与当地资本合资的形式出现。大体上说建立这些企业的动机在于：(a)可绕过那些国家的保护主义措施；和(b)利用当地大量存在的低工资率优势。那时的产品主要限于家用电器和无线电接收设备。

表 7.9 电气电子用品产业的出口构成(1960—1985 年)

(单位:占出口总量的百分比)

	1960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重型电器机械	8.3	8.2	10.0	15.4	14.7	10.9
家用电器产品	4.2	4.0	4.9	4.8	5.5	5.2
照明装置	9.0	6.8	3.0	1.7	1.9	1.4
家用电子产品	61.1	54.6	55.8	43.9	36.8	31.5
(收音机)	(53.1)	(23.9)	(12.6)	(4.8)	(1.2)	(0.5)
(黑白电视机)	(1.1)	(11.1)	(6.8)	(2.4)	(1.6)	(0.2)
(彩色电视机)	—	—	(5.5)	(7.8)	(5.1)	(5.4)
(录音机)	(3.6)	(10.4)	(22.0)	(19.0)	(13.4)	(7.1)
(录像机)	—	—	—	—	(8.0)	(14.2)
工业电子产品	3.4	7.8	13.1	15.8	14.8	24.4
(电脑)	—	—	(0.6)	(1.5)	(2.2)	(9.9)
电子部件	14.6	18.6	13.1	18.4	26.3	26.6
总和(以 10 亿日元为单位)	93.6	276.7	1051.4	2154.6	5566.5	11169.4

资料来源:冈本泰夫,(3),第46页;根据大藏省《海关统计》。

虽然,日美间的摩擦早在 1959 年电子工业联合会(EIA)向民防动员办公室(OCDM)提出反对日本晶体管收音机大量“涌入”美国市场时就已经开始,但直到 60 年代中期,日本先是出口黑白电视机,后是出口彩色电视机显示出巨大的势头,表明贸易摩擦已严重到促使日本的供应商建立海外生产基地的地步。回顾一下,我们可以说就彩色电视机而言,转折点出现在 1976 年。当时西尔维尼亚公司上书美国政府,宣称五家日本制造商违反了《关税法》第 337 条款。结果,美日政府在 1977 年 3 月达成了维持“正常市场状态”和日本奉行自愿出口限制的协定。这一事态发展自然导

致了日本公司更加努力发展国外生产基地,到1979年在美国基地生产的彩电供应已超过了日本本土向美国的出口。从那以后,在海外生产的日本彩电与国内生产的彩电的比率从1979年的41%持续上升到1987年的95%。但到1987年,日本已不再能指望在美国的彩电进口市场上占较大的份额,那年日本只占6%的市场份额,而台湾占31%,韩国占22%,墨西哥占19%。

电气电子用品产业中另一个由于日本占世界供给份额的激增而导致贸易摩擦,从而刺激日本制造商在适当时机扩展全球生产基地的领域是电子部件,特别是半导体工业。

1965年,世界前5位半导体制造商(括号内为其份额)是:得州仪器(32)、费尔柴尔德(18)、西格奈提克斯(15)、威斯丁豪斯(12)和摩托罗拉(6);而到1982年,两家日本公司——日本电气(NEC)和日立挤入了前五名。1987年这一排名变为:日本电气、东芝、日立、摩托罗拉和得州仪器。1986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IC(集成电路芯片)供应商,雄辩地说明了在这一充满竞争的领域内的迅速变化。1985年,美国份额为48.5%,而日本为39.9%;双方位置在1986年发生了逆转——日本占46.1%,而美国占42%。在更为精密的DRAM(随机动态进入记忆)领域,日本早在1981年已开始进入领先地位,它占据了世界64K·DRAM供应的66%,(领先的供应厂是日立和日本电气),而美国只占31%。我们也许可以说1977年组成的美国半导体工业联合会(SIA)很早就开始寻求措施(例如上书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来抵御日本产品的侵入,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但这些步骤在1985年前并未取得成效。在这一年,256K·DRAM的明显竞争优势受到美国军方和航空技术部门的关注,SIA开始对日本厂商提出了倾销指控。这导致了两国官方的冲突,结果便是1986年鉴定的、为期5年的“日美半导体协定”。事实上,这一协议使日本承担了自愿出口限制<sup>②</sup>。

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半导体工业逐步开始其全球化趋势。70年代中期首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建立生产基地,而后80年代开始更大规模地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在几乎所有这些例子中,有一个特征是:在当地建立的公司全部是日本母公司拥有百分之百股权的子公司,这表明了母公司对这类企业的特别重视。因而当1986年前后,日本的百万位DRAM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国外的日本子公司几乎同时跟进——显然是整个产业的一项战略行动。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电气电子产业的全球化趋势不仅限于扩建隶属于本国的经营单位,像日本的日本电气公司在其它一些国家扩展生产基地那样,而且我们也日益注意到一种在全球主要制造商中间寻求竞争条件下共处地位的趋势,采取的办法有的是通过建立合作企业协议,像日立和得州仪器关于开发16M·DRAM那样,有的是通过把重点放在各自的专业上进行劳动分工,就像欧洲三大企业:荷兰飞利浦公司专门生产SRAM,德国西门子公司专营DRAM和法国汤普逊公司专攻EPROM(可擦掉、可编制供读记忆程序)。这是否说明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在某个领域已能比过去更有组织地引导自己,这个大问题还有待未来去作出回答。

在结束对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的讨论时,让我引用R·V·拉马钱德兰的一段话<sup>28</sup>:

“在人类文明的漫长历史中,人们看到经济力量的中心转来转去。最近的转变期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后来扩及地理及文化都相近的欧洲及北美地区。其它地区无力吸收新工业技术却似一种壁垒,保护了这些国家的工业。战后日本的巨大成就似乎在于它能够打破这些壁垒,并在西方国家传统主宰的地区和它们展开竞争的能力。现在另外一些国家,如韩国,也像日本将高效的生产技术引入低成本国家。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随之而来的贸易扩张将使西方和亚洲国家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但人们怀疑,

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会带来又一次的世界经济正常的扩展呢，还是预示着经济力量的再一次历史性转移。”

看了这篇文章，我们不由想起布鲁克斯·亚当斯在一个世纪前所作的卓有远见的预言：“近千年来，经济中心一直是向西转移，西班牙战争只是由于它越过了大西洋才令人震动。也许在两代人的时间内，美国将会转过身来，它的最大经济利益将会覆盖它视为内海的太平洋”。<sup>24</sup>历史证实了亚当斯的预言，随着日本的战败，太平洋出现了一个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期。起初美国的领导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它把日本当作初级伙伴那样采取家长式态度，而与此同时，又把日本作为对付共产主义中国的堡垒。就在那段时间（1952年）里，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爵士写道：“作为对日本人的惩罚，澳大利亚的军队将保护日本，而日本人自己则打躬作揖，一门心思发展其生产和商业，如果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得知有这样一种设想，那将是一大打击”。<sup>25</sup>事实上，日本在1952年重新独立后确实在一门心思发展其生产及商业，不久就成为由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公司首脑们1967年组成的“太平洋区域经济会议”和1968年建议正式成立“太平洋区域组织”中的平等伙伴。到1975年5月京都会议提出“环太平洋战略”时，日本已历经了二十年创记录的经济迅速增长期，太平洋的领导地位已从美国转移到了日本。这一转折对澳大利亚经济的冲击至少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在本章前面已引用默里·塞尔的话：“澳大利亚可能成为日本的澳大利亚，成为充满冒险及酗酒的上地，正适合充当日本持不同政见者和依赖国内汇款度日者的流放地。”但近年来日本产品和资本的涌入具有更为严重的特征。现在居于澳大利亚的实业巨头与早先英帝国时期的“靠领汇款度日的人”大不相同。下面我们可以列举日本资本侵入澳大利亚社会的一些确凿的证据<sup>26</sup>。



## 在澳大利亚的日本资本

日本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急剧增长速度是最令人吃惊的。1986—1987年财政年度末,美国还居于在澳外国投资的首位,其后是英国和日本。但在1981年到1986年的五年里,日本的数额增长4倍多,英国仅增长1倍,美国仅增长1.5倍。而以年均投资流入额来讲,日本在1987—1988年超过了英国和美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外国投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该年60%的日本投资都集中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上<sup>(27)</sup>。事实上,最近几年日本在澳大利亚的投资特点是扩展对不动产的控制,主要目的是开发拥有旅馆业和高尔夫球场等完善设施的游览胜地,以吸引富有的日本游客。据报导:“一个拥有无数资金的日本商业财团意图购买悉尼都市区的所有私人高尔夫球场,……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将使高尔夫球场的所有权和已被日本拥有的主要国际城市旅馆联系起来”。<sup>(28)</sup>这是日本资本囊括大百货公司及港口、电站等基础设施的一种纵向兼并。日本政府本身也置身于开发的热潮中,它提出了建造一座高科技城或称作“多功能城邦”(MFP)的规划,即把工作和居住区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社区,它强调用户利益,融合“高科技”研究开发产业、休闲设施和十万人的住房于一体。涉及的资本费用估计达五万亿日元。

虽然像MFP等计划和由日本资本购置的惹人注目的许多房地产已经吸引了澳大利亚公众的极大注意,并且他们经常持严峻的批判态度<sup>(29)</sup>,但日本资本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仍在更悄悄地和稳步地进入澳大利亚其它经济部门。

首先要指明,澳大利亚是外国在本国产业中占有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80年代中期,外国利益集团在各部门占有百分比情况见表7.10。更有报告说,“到1990年,五百家澳大利亚大公司中的约三百家估计将被合并或者接管”<sup>(30)</sup>。日本在这方面的参与是

相当多样化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拓宽它的覆盖范围。早期日本资本的侵入是以从事澳大利亚进出口的贸易公司为特征的。到 1988 年,三井、三菱和伊藤忠等九家日本贸易公司占有澳国全部出口值的五分之一强,特别是在农业和矿产品贸易上占主宰地位。其中矿物资源特别重要,自然日本人力图买下澳大利亚全部供应来源,就如购买澳大利亚的原料那样。因此,日本最大的能源公司之一,出光矿产,一直设法买下澳大利亚煤矿,现在已拥有在昆士兰的艾本尼泽蒸汽煤公司 49%和安莎姆蒸汽煤公司 22.5%的股权;其它日本公司也紧跟而上。对日本特别重要的另一资源是林业产品,特别是用于纸浆和造纸业的木片。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片出口国,而日本是最大的进口者,购买世界供应量的大约 75%—80%。例如 1985 年,世界约有 1400 万立方米交易,日本买下 1180 万立方米,其中澳大利亚提供了 680 万立方米。这里日本资本又再次插足,控制供应来源。大昭和,日本第二大纸浆和造纸公司,早在 1969 年就赢得在新南威尔士的伊登建造一家价值三千五百万澳元的纸浆和造纸工厂的投标,但是它并没有去建厂,而是在稍后将控股投入到原由哈里斯·霍尔丁斯建立的一家公司,成为该公司木片产品有保证的购买者。

对于制造部门而言,汽车工业高踞日本参与在澳投资的榜首。二次大战结束前,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就一直在澳大利亚设厂生产,然而随着日本三大制造商(丰田、日产和三菱)战后的进入,现在这个国家已不存在独立的本地制造商了。不过,这一工业的概貌有点复杂,丰田和 GMH 合办一家合资企业,而日产和福特在某一项目上进行合作。联邦政府采取步骤鼓励出口,例如减免进口部件关税,其赋税额度达到等于整车出口值的程度,并进一步取消了从 1988 年 4 月以来对进口乘用车的数量限制。还有以澳大利亚为基地的工厂的任何出口计划必须首先经东京或底特律总部批准。此外,丰田的那种可被称作“联合大企业倾向”

表 7.10 澳大利亚工业中外国所有权的比重

部 门	年 份	外国所有权(%)
采矿业	1984—1985	44.7
矿产加工业	1981—1982	46.3
制造业	1982—1983	31.9
人寿保险	1983—1984	40.3
普通保险	1983—1984	34.9
金融公司	1986	38.1
银行业	1986	21.0
农业土地	1983—1984	5.9
运 输	1983—1984	5.1

资料来源:《联邦投资评审委员会报告》(1987—1988年)第22页,由大卫和威尔赖特重新制表,第102页。

促使公司与澳大利亚几家电视网签订了广告和资助协议,结果引发了有点嘲讽的论调:“电视观众认为自从1月[1989]起电视上澳大利亚就只有—家汽车厂商——澳大利亚丰田汽车销售公司——的看法是可以原谅的”。<sup>④</sup>

根据日本政府通产省的一份年度调查<sup>⑤</sup>,到1989年3月底,澳大利亚有61家日本控制的制造业企业,实际上覆盖了每一个重要领域。除汽车生产外,电信设备和电子产品等领域正在快速变为日本资本的重要附庸,像日本电气、富士通和三洋这些公司已经牢固地树立了自己的地位。与以日本为基地的房地产和建筑活动特别有联系的金融服务业,近几年来也有显著增长,一批日本银行已经在澳大利亚获得经营全部银行业务的许可证。其它像证券公司和保险等一些金融机构也不例外。

总的说来,前面已经提到,人们有这种印象,澳大利亚近几年

已经成为日本资本所喜爱的狩猎场,其中还包括“色情业”,称作“暴力团”那样臭名昭著的团伙从事皮条客勾当<sup>②</sup>。

### 全球化的理论

在结束这段关于全球化趋势的讨论时,就与对外直接投资相关的理论问题作一简短的评述是合适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们都很清楚,争论是从1966年雷蒙德·弗农提出产品周期的假说开始的<sup>③</sup>;这一理论公认为与美国50、60年代的经历有密切关系。产品都要经历创新、成熟和标准化阶段;在早期创新阶段,领先企业自然企图通过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来开发获利的机会,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在这方面是个典型的例子。在弗农假设之后很快产生了一种新的强调通过寡头卖主垄断的差别化而获得优势的理论;海默、金德尔伯格和凯夫斯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sup>④</sup>。这个理论的要点是将对外直接投资的任何成功归因于投资企业的垄断优势。然而,随着70、80年代全球化趋势的进展,越来越多的视线集中到寡头垄断企业通过出口广义的“管理资源”(不仅包括资本本身,而且也包括技术诀窍、管理技能和拓宽市场的能力)把外部因素内部化的内部动力上来。最早提出这种解释者之一是小宫隆太郎<sup>⑤</sup>,他将E·T·潘思罗斯提出的管理资源的基本观点融入了自己的理论之中<sup>⑥</sup>。

小宫的理论实际上与本章早些时候说明的观点,即关于公司资本主义下内部净剩余的不断积累趋势,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大扩展独家企业的计划管理范围(甚至包括国际间的分工)。我们可以说公司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这对于主要国际资本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或冲突的缓解会有什么影响,是一个需要单独加以研究的问题<sup>⑦</sup>。

## 4. 私 有 化

### 私有化运动的背景

公司资本主义以在高速发展年代的发展中所赢得的信心,促使日本的政界和企业界领袖竭力模仿这方面的领头人——撒切尔政府的私有化计划。当时正出现政府财政中的“3-K 赤字”——Kokutetsu(国有铁路)、Kome(大米补贴)和 Kempo(健康保险),这需要一个相当大胆的财政紧缩计划。因此,政府决定在1981年3月建立临时行政改革委员会,显然目的是要使行政功能总体合理化,但又有着研究国有企业私有化问题的特定(未公开)授权<sup>②</sup>。当委员会开始其工作时,无可否认的是,这个机构推行私有化的未公开的从属目的是削弱国有企业工人中倔强的工会力量。当时,日本最大的全国性劳工联合会是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简称为“总评”),政治上最靠近日本社会党左翼。这个联合会的成员总数达到450万,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大约有70%是公职人员和国有企业工人,而“国劳”(国有铁路工会)又以最激进著称。

但是人们也许要问,他们怎样通过国有铁路私有化来削弱这个铁路工会的力量呢?答复比较复杂,我们必须追溯到国有铁路在战后的历史。可以回顾布赖恩·胡佛1947年来到日本,对行政机构改革提供建议,他确信问题的症结在于所有公职人员工会(包括那些国有企业工会)的纪律性;因此他的一个自然的结论就是:通过法律禁止所有公职人员的集体劳资谈判和罢工,不管他们从事的是何种工作类型。胡佛的改革建议遭到占领当局劳工部的反对,但最后在1948年7月得到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批准。然而,为了缓和胡佛建议的严厉性质,麦克阿瑟同时写信给首相芦田,指示他把国有铁路和垄断企业分开,分别组成国有公司,允许其雇员进行集体劳资谈判,尽管不<sub>·</sub>许<sub>·</sub>罢<sub>·</sub>工<sub>·</sub>,代之而起的是建立调停和仲裁程

序。于是在 1949 年 6 月诞生了全部由国家出资的日本国有铁路（简称“国铁”）。

在那些日子里，把对公共负责与日常决策中管理自主权结合在一起“的“国营公司”概念十分有吸引力。很显然，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的成功经验与大肆渲染的“民主在前进”口号都需要好好地研究与仿效。但是将西方的“国营公司”概念移植到日本殊非易事。特别在“管理自主权”，如在国铁，这一自主权受到了法律、官僚及政治制约和干预的极大限制，以至于高木文男（1976 年 3 月至 1983 年 12 月任国铁总裁）一度抱怨，他的困难就像是一个被束缚了手脚的游泳者。国铁所受的限制包括：（a）对票价的法律约束；（b）对投资计划的政治干扰；（c）对人事政策及工资等级的官僚控制；及其它种种限制措施，诸如禁止铁路局持有现金超过一天以上等等<sup>④</sup>。为了抵销这些限制的影响，政府财政当局对国铁财务上的困难习惯性地给予照顾，但只是部分地代偿帐簿上的赤字，而不是逐年了结。这种情况助长了当时流行的一种感觉——“我的后台是太阳旗（铁饭碗的意思）”或者一种对缺乏纪律以及对管理部门和劳工过分行为采取宽容态度；后者的过分行为从本质上来讲是与“不准罢工”的法律规定密切相关的。管理部门无权同工会议定工资率，而工会则被禁止罢工，于是工人的不满与牢骚就以各种不同方式发泄出来，诸如拒绝在提高生产率的竞赛中和在现场协商制度中合作。但最自相矛盾的是，在这个禁止罢工的行业中号召罢工的事件却比其它任何允许罢工的行业更多。最终，在 1975 年 11 月 26 日为“争取罢工权利的罢工”动员了国营企业的 100 万名雇员参加。铁路工人的罢工持续了 8 天，这在日本铁路史上是运营全部停顿最长的一次。最终的结局不仅是工人们罢工失败，五千多名铁路工人被处罚，工会被要求赔偿 202 亿日元，而且使得大多数公众对铁路工会产生了一种普遍的敌对情绪。政府利用这一机会特别对“国劳”展开攻击，谴责当时广为流传的“我的后台是

太阳旗”这种纵容态度，事实上在为国有铁路的私有化作准备。

### 国有铁路案例

私有化的实际行动，如前所述，开始于 1981 年春，花了四年（日本电话电报公司）至六年（日本国有铁路）时间才告完成。政府将国有铁路私有化的进程决不是一帆风顺。议会和广大群众争论的主要问题是：(a) 国营公司趋于破产的起因与责任；和 (b) 实行私有化的同时将整体网络分解为地区性公司的计划中所存在的种种争议之处。在这里，我们将仅仅讨论第一个问题。

国有铁路所涉及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协调追求高效率的企业经营原则和保护公众利益的义务。如果后者（必然涉及具体成本）能够确定下来，并为此而由政府专项补助，公司将可以在其营运中作为已知数而加以接受。但是情况常常是，即使像大米运输和学生车票享受折价而产生的具体成本能够加以确定，有关部门也不来弥补公司收入中的这类亏空。更重要的是，公司要负担接受二战后从中国大陆遣返的 100 000 员工（他们以前在日本控制下的中国铁路上工作），以及经营因政治原因建立的、不可能收支平衡的地方支线的额外费用。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公司的经营原则不得不作出妥协；但为了顾及公众利益而承担的公司费用份额却是无法计算的。而且，公司决定收费标准和票价的能力受到 1948 年《国有铁路收费标准和票价法案》的限制，这一法案规定：(a) 它们应有助于推进产业的发展；(b) 它们应有助于工资和物价的稳定；(c) 它们应适当弥补成本；以及 (d) 它们应全国统一。这些规定往往自相矛盾，往往成为与公司效率原则相冲突的原因。

换句话说，公司很难协调企业效率原则和强加的保护公众利益的义务，结果有如把灰尘扫入地毯底下，以使房间看上去干净一样——地毯下面积聚着大量债务。

当内阁在 1985 年决定实行私有化时，公司的累积债务达

16.7 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人均负债 140 000 日元。而 1985 年一年中公司的债务就有 1.847 万亿日元,其构成如下(单位:10 亿日元):

(A)总帐中的赤字	317.8
(B)由于额外退职造成的赤字	762.1
(C)由于额外养老金支付造成的赤字	355.8
(B)+(C)	(1 117.9)
(D)发展“高速火车”的资本费用	412.1
(B)+(C)+(D)	(1 530.0)
总计	1 847.8

上述(B)与(C)两项是由于政府单方面命令公司吸纳从中国大陆遣返的 10 万员工所造成的结果,从而成了就公司方面来说与经营无关的负担。另一方面,(D)项事实上不属于赤字,而是可在以后年份中得以回收的正常净投资支出。公司应予负责的关键性赤字项目是(A)。在上述 1985 年的结算帐目中,这笔数额很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赤字从 1983 年起一直在减少,在随后两年内减少了一半。私有化的鼓吹者引用 1.847 万亿日元的总赤字高叫有“赤字倾向”,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理由之一是在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铁路营运正日趋无利可图;在西欧国家中,每年由政府来弥补赤字已变得习以为常<sup>④</sup>。但在日本,总帐上的每年赤字却被允许积累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而且,有关收费标准和票价的法律规定阻止了公司按通货膨胀趋势调整价目表。每一次的调整都要经过国会的审查,并且每一次都会错过合适的时机<sup>⑤</sup>。表 7.11 显示了在二战前基期和 1976 年 12 月相隔四十年间铁路有关价格和其它价格相比所表明的时滞。



表 7.11 1934—1936 年和 1976 年可比价格的增长

	1934—1936 年平均数	1976 年 12 月	倍数
报纸(每月)	98.5 钱	1 750 日元	1 779
公共浴室(成人)	5 钱	120 日元	2 400
明信片	1.5 钱	20 日元	1 333
消费价格指数(东京)	1	1 128	1 128
批发价格指数	1	675	675
国有铁路			
(1)客运费(一类地区)	1.6 钱	7.9 日元	506
(2)货运费(每公里吨)	1.6 钱	7.54 日元	471
(3)包裹运费(20 公斤,二类地区)	1.75 日元	7.50 日元	429

资料来源:日本银行《统计月刊》。

### 对运输行业制订总体规划的必要性

上述的情况不足以解释日本铁道部门的赤字倾向性特点。更加根本的原因是,以前铁路的半垄断地位近几年开始为飞机和公路运输的有效竞争所削弱。这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日本也不例外。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从 1950 年开始的 40 年中,日本主要运输工具所占份额的变化,表 7.12 概括了已发生的显著变化。在客运和货运方面,铁路份额的显著下降及伴随而来的公路运输份额的增加是非常醒目的。这里很自然地引出一个问题:这种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各运输工具间的真正公平竞争造成的。于是就引起了铁路和公路及空中运输是否站在“完全平等地位”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政府对每种交通工具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支持程度的不同。例如,高速公路的建设——公路运输扩展的一项基本条件——其资金不仅由开车者支付的燃料税

收入提供,还得到政府从其总帐中划拨的补贴,而航空港建设,其初期支出全部由政府负担。但是相应的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总是靠自筹资金,这方面的资本成本往往占了铁路公司开支的很大比重<sup>43</sup>。铁路货运还受到另一种障碍:即往返火车站的特快服务,是由一家独立的、兼营长途卡车运输的公司所操纵。

表 7.12 主要运输工具的相对比重——1950—1987 年的变化

(单位:%)

客运(人·公里)	铁路	公共汽车	汽车	船舶	飞机
1950	90.0	7.1	0.6	2.2	0.0
1965	66.8	21.0	10.6	0.9	0.8
1975	45.6	15.5	36.3	1.0	2.7
1987	31.1	9.3	55.6	0.5	3.5

货运(吨·公里)	铁路	卡 车			沿海船运
		商用车	自有车	总计	
1950	52.3	3.7	4.7	8.4	39.4
1965	30.7	12.0	14.0	26.0	43.3
1975	13.1	19.2	16.8	36.0	50.9
1987	4.6	34.6	15.8	50.4	44.8

注: a 空货运因份额极小,在此表中被略去了。

资料来源:运输省《运输经济统计手册》(1989年)。

现在需要的是制订一项整个运输业的全面计划,以及对各相互竞争、又往往相互补充的各种运输手段的成本和效益进行系统地评估。铁路毕竟是最安全的、最节约能源的、相对又最节省空间和对环境污染最小的客货运方式。并且,就如德国联邦铁路的一位主管说过的那样<sup>44</sup>,铁路是一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观点也为许多日本人所接受。国家对运输业的全面规划必须拓宽到考虑所有这些因素,而不仅仅是单纯地关心运输业一

个部门的赤字问题。

于是我们迎来了最后一个问题,即能否指望国有铁路的私有化会解决往日的主要缺陷,并满足社会对提高日本整个运输业为民造福的要求。在写本书时(1990年9月),要对这些问题给予明确的答复为时尚早;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日本保守政府的私有化浪潮(至今已在铁路、电话电报以及烟草和卷烟各领域获得了成功),与紧随着高速增长期而来的公司资本主义的大步前进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 注 释

- ① 1949年4月,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定在360:1;1971年12月的《史密森协议》将其升值至308:1。从那时起,它一直在上升,1985年底的报价为200.6:1;而到1987年,它已升值至122:1。
- ② 参见赫尔曼·康:《诞生中的日本超级大国》,普伦蒂斯—霍尔,恩格尔伍德·克里夫斯,NJ,1970年。
- ③ 艾兹拉·F·伏格尔:《位居第一的日本——给美国的教训》,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2页。
- ④ 默里·塞尔:“顺从必然”,《时报文化增刊》,1989年4月28日—5月4日(第443—445页),第445页。
- ⑤ 《每月评论》,1990年5月。
- ⑥ 参见F·C·克劳福德《美国富裕的三角关系》,纽约,1943年,第67页。
- ⑦ 这一接纳过程的另一种公式将是加尔布雷思的“修正了的序列”概念,它用大公司“出来控制市场,进而操纵市场行为,并塑造其服务对象的意识形态”,来取代“顾客是上帝,需求创造生产”的旧经济学说教。(参见J·K·加尔布雷思《新兴的工业国家》,休顿·米夫林公司,波士顿,第3版,1968年,第222页。)对于巨大私人资本包容一切的贪婪的趋势,有一篇文章用一事例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见《幸福》杂志(1964年7月),其很具表现力的题目是:“谁拥有头脑中的东西?”讲到的史实似乎典型地说明:

- 科学的头脑本身屈从于利润导向的私营公司的指挥。
- ⑧ 萨缪尔·鲍尔斯和理查德·爱德华兹：“分歧的多样性：加尔布雷思和激进的政治经济学”，《不寻常的智慧：纪念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文集》，S·鲍尔斯，R·爱德华兹和W·G·薛帕德编，休顿·米夫林公司，波士顿，1989年，第48页。
- ⑨ J·K·加尔布雷思：《新兴的工业国家》，休顿·米夫林，波士顿，第xviii页。
- ⑩ 保罗·萨缪尔森最近也写道：“我的《经济学》和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的每一新版本都只得进一步让位给公司—官僚掌权和股票拥有者无权的伯尔—米恩范式。”（保罗·A·萨缪尔森：“作为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加尔布雷思”，萨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和威廉·G·薛帕德编《不寻常的智慧：纪念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经济学文集》，休顿·米夫林公司，波士顿，1989年，第125页。）
- ⑪ 增长趋势本身似乎在20世纪80年代停顿下来了，但讨论最近的事态发展需要作较复杂的分析，因而就不在此处展开了。例如，1981—1985年比率降至101，可以用那几年总投资的急剧增长（与1976—1980年相比增长了63%）加以解释。
- ⑫ 参见宫崎义一：《日本经济的结构和成就》，筑摩书房，东京，第2卷，1985年，第33页。
- ⑬ 宫崎义一：《日本经济的结构和成就》，筑摩书房，东京，第1卷，1985年，第238—239页。
- ⑭ 这一概念的标准论述可以在马赫勒普中找到：“横向一体化是生产同样产品的企业管理部门的联合。纵向一体化是相互使用（加工、组装、分配）产品的企业管理部门的联合。多样化为一家公司的生产规划增加了新行当。如果一种新产品与早先生产的那些产品迥然有异，被分类为另一类的产业——诚然这是非常任意地分类的——人们便称这样的公司已成了‘联合大企业’。拥有好几家属于完全不同产业的公司，有时被称作‘聚集’。”菲里兹·马赫勒普：《垄断政治经济学》，约翰·霍普金斯出

版社,巴尔的摩,1952年,第110页。

- ⑮ 阿兰·休斯:“联合大企业”,《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麦克米伦,伦敦,第1卷,1987年,第574页。
- ⑯ 家族姓氏是“Toyoda”,但汽车公司在1937年成立时,汽车型号的拼写改成“Toyota”,这就成了公司的商标。有关丰田汽车公司的发展史,参见尾高焯之助、小野桂之介和足立文彦《日本的汽车业:有关公司发展的研究》,经济研究丛书,第26号,一桥大学,经济研究所,纪围屋有限公司,东京和牛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11—130页。
- ⑰ 参见鎌田慧《汽车王国的阴暗》,铃沢书店,东京,1984年,第107—108页。
- ⑱ 请读者参见表3.1,它比较了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以1950年的基数为100,1973年日本的有关指数为1412,美国和英国均为210,西德为411。
- ⑲ 1981—1985年五年平均DFI为94.3亿美元,其中23.8亿美元投于制造业;具有特征的是,投于发达国家的占了这个数值的一半还多(13.6亿美元)。
- ⑳ 从1981年至1985年这五年中,金融和保险领域的DFI总额为84亿美元(年均均为17亿),其中1985年为38亿。在其它第三产业中,DFI数值更大,同期总数为132亿美元。1985年,整个第三产业的DFI占了总数的54.4%,而同期的制造业占22%。
- ㉑ 有位经济学家最近就此作了最详尽的研究,见冈本康雄“跨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跨国化”(3)和(4),《经济学论集》,第55卷,第2期(1989年7月)和第56卷,第1期(1990年4月)。在下文对日本电气电子业的探讨中,我大大地受惠于上述的研究。
- ㉒ 有关半导体工业方面日美之间贸易摩擦的细节,参见T·A·普格尔“高科技产业的贸易政策限制:以半导体为例”,《贸易摩擦和经济政策》(R·萨托和P·华切尔编),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87年,第184—223页。

- ②③ R·V·拉马钱德兰就第十一章的“讨论”，萨托和华切尔，同上书，第229页。
- ②④ 布鲁克斯·亚当斯：《美国经济的霸权地位》，纽约和伦敦：哈帕兄弟出版社，1947年，（1980年再版），第104页。
- ②⑤ 罗伯特·戈登·孟席斯：“从澳大利亚看太平洋的局势”，《对外事务》1952年1月（第188—196页），第190页。
- ②⑥ 有关这个题目的详细论述，请参见艾伯·大卫和泰德·威尔赖特《第三次浪潮：澳大利亚和亚洲的资本主义》，萨瑟兰，新南威尔士，澳大利亚：兰夫特书社俱乐部合作有限公司，1989年。
- ②⑦ 根据外国投资评审委员会的报告，见《悉尼晨报》，1989年3月6日。
- ②⑧ 奥斯卡·兰迪可，见《每日镜报》，1989年1月13日。
- ②⑨ 1990年1月23日，电视“10频道”就日本资助的MFP是否该在悉尼建立的问题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对此作否定回答的高达91%（《朝日新闻》，1990年1月25日）。还有人指出，一名日本开发商为购买在悉尼的伍德斯特里姆高尔夫球场支付了15.68亿日元，是原主人期望值的三倍。（《朝日新闻》，1990年2月20日）。更为普遍的是，人们对日资购买房地产所引致的通货膨胀影响感到焦虑不安（参见麦克斯·华尔什，载《悉尼晨报》，1989年2月2日）。
- ③⑩ 大卫和威尔赖特：《第三次浪潮》，第229页。
- ③⑪ 利·赖特，载《悉尼晨报》，1989年3月30日。
- ③⑫ 《日本企业在国外的经营活动》，通产省国际企业课编，1990年3月。首次调查是在1970年。
- ③⑬ 参见大卫和威尔赖特《第三次浪潮》，第150—151页。
- ③⑭ 雷蒙·弗农：“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经济学季刊》，第80卷，1966年5月，第190—207页。
- ③⑮ 斯蒂芬·海默：《国有企业的国际营运：海外直接投资研究》，剑桥，麻省理工学院，1976年（博士论文，麻省理工学院，1960年）；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海外的美国商业》，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8年；以及

理查德·E·凯夫斯：“国际公司：外国投资工业经济学”，载《经济学》，新丛书，第38卷，第149期，1971年，第1—27页。

- ⑳ 小宫早在1967年就用日文提出了这一理论（“经济学家”，1967年7月25日，后来载于他的著作：《现代日本经济研究》第七章。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5年）。他的更全、更新的阐述见他的作品“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事实和理论上的思考”，载西尔维奥·波纳编，《在多中心世界中的国际金融和贸易》，麦克米伦，伦敦，1990年。
- ㉑ 埃蒂斯·T·潘罗斯：“外国投资和企业的发展”，《经济杂志》，第66卷，1956年6月，第220—235页。
- ㉒ 对这一题目富有挑战意味的讨论见史蒂芬·基尔和大卫·劳《全球政治经济学：前景、问题和政策》，赫特福德郡：哈维斯特—维特西夫，1988年。
- ㉓ 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的前几天，该委员会85岁高龄的土光敏夫将委员会其他成员召至办公室，向他们展示了他与铃木首相交换的秘密备忘录，它上面明确写着，私有化的改革是委员会必须执行的一条命令（参见丸山靖雄《证言第二临调》，新地书房，东京，1984年，第24页）。
- ㉔ 公司现金销售收入的可观数额可被投资于短期资金市场，以赚取一些利息收入；但这样的话，所有站点票房就得每天将所有的纸币和硬币解到指定的银行。还有别的限制因素：如公司不能以折扣价与货运商签订长期合同；不能灵活运用预算内为推行考绩制度所设的工资基金总额。
- ㉕ 据《日本国有铁路1985年审计报告》年刊的资料，1984年，国家资助（除补偿性支付以外）与国营铁路当年收入之比为：英国铁路公营公司：54.6%；德国联邦铁路：74.3%；法国国有铁路：87.5%。
- ㉖ 只是在1977年，法律修改为：费率和票价的问题由运输省来决定，而不是由国会拍板。
- ㉗ 特别要参阅石川达次郎《国有铁路——其功能及其财务结构》，交通日本社，东京，1975年，第2章。
- ㉘ 载于《朝日新闻》“人民的声音，上帝的声音”一栏，1986年8月11日。

## 第八章 日本往何处去？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这一章准备讨论日本资本主义有希望向着积极的国家建设规划方向演变的问题。题目的性质表明，本章的结论部分必然地反映我的个人见解，而我知道，我的同胞并不一定赞同。

不管怎样，首先要扼要讨论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主义正在向着一种混合经济型的社会经济组织转变，从而正走在与社会主义趋同的道路上。这种转变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使私营部门内部也建立起计划体制。可以认为混合经济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可避免地它是各种社会原动力的混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何能使“社会经济增添活力”，作为这样一种社会的共同目标。就日本来说，这一问题的具体答案在于立国的两大支柱，即(1)“人类回归”和(2)“和平宪法”。更具体地说，这里可以重复本章结尾的一句概括的话：“要造就这样一个日本，它在世界裁军方面走在前列，持之以恒地同疾病作斗争，使日本成为世界保健中心，重视名胜景点地区旅游设施的建设，积极进行国际间文化艺术领域内的交流，非常愿意增加日本对联合国大学的贡献；致力于通过援助和贸易消除困扰第三世界的贫困问题；日本将成为这样一个国家，生活于其中的人将坚信能共同捍卫值得捍卫的积极的价值观。”或许还要加上一点：即我确信这样的前景对日本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不仅具有清醒作用，而且也有激发活力的作用。



## 1. 两种制度的趋同趋势

### 二战前的各种观点

柏林墙被推倒的象征意义就像在东西方之间打开了一扇通向和睦共处新阶段的大门,还有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原理的广泛推崇,使我们自然地想起,六十多年前马克西姆·列特维涅夫遇见富兰克林·罗斯福时的颇有先见之明的一句话(后者当时刚当选为美国总统)。这已在第二章被引用过;列特维涅夫所说的实质上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虽然在20年代各树一帜,但两者正在越来越靠近,不久就会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美国将有“60%的资本主义”,而苏联则有“40%的资本主义”,尽管这其中仍有“20%”的差距。

美国方面,30年代早期有一个名叫林肯·史蒂芬的曾经在苏联革命后访问过该国的记者,也同样地预言了这一和睦共处的关系,他归纳他的印象说:“苏联是一块人民神志清醒、怀有信心的土地。”他又加上一句,“而苏联人认为是其主要对手的美国,不管多么无意识地正在轨道上奋跑,似乎很可能将使我们产业界中的管理、投资和处于支配地位的巨人,以及政治与艺术——通过盲目地不断摸索——绕着地球向相反方向跑,以致到达同一会合点,正像有些人正在认识到这一点,并说了出来那样。”<sup>①</sup>

列特维涅夫的话准是用的外交辞令,史蒂芬的判断则是靠直觉的。但早在2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学家已经谈论两种敌对的社会经济制度趋同的可能性。其中最著名的是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资本主义虽则经济上取得了稳定,甚至稳定性还在增加,却通过使人的思维理性化,创造了与其自身的基本条件、目的和社会体制不相容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并且(虽然不是由于经济的必要性,甚至在经济福利方面要作出某种牺牲)正在变成另一种制

度,你称不称它为社会主义,则仅仅是个人偏好和选词不同而已”。<sup>②</sup>

熊彼特,作为一位社会科学家,赞同这样一个基本哲理,即的确存在符合科学规律的社会经济发展客观法则;他直到生命的尽头仍坚持这一观点,即:“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不仅破坏了它自有的体制,也为另一种体制准备了条件。”<sup>③</sup>这种观点,虽然带有历史进程中社会演变理论的性质,但并不一定是导致趋同的思想。不过从资本主义立场来看,它最起码为承认这种体制会发生重大转变作好了准备。

### 从社会主义角度看

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义角度看,奥斯卡·兰格<sup>④</sup>掀开了新的画面,早在30年代,他就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这种社会主义将保留纳入中央计划委员会控制下的价格变量作用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换句话说,兰格认为,中央计划委员会应起到市场的作用,制定出“把生产要素结合起来,选择一家工厂的生产规模以决定一个产业的生产和资源分配以及记帐时价格的变量功能等方面的规则”。<sup>⑤</sup>当价格的变量功能用作记帐规则后,通过反复试验的方法,客观均衡条件将会形成价格结构体系。这样,据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合理的经济核算之间将不会存在根本性的矛盾。

不管怎样,兰格是当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直到1943年,苏联的经济学家才开始接受与兰格倡导的观点相类似的理论。在苏联抵抗希特勒入侵的、艰难的战争年代,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3年7月/8月)发表了一篇由其编辑部审定的文章<sup>⑥</sup>,它肯定了“价值规律”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联系。这事实上意味着,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为了获得经济效益,资源的配置可以、也必须服从市场上非任意的、

客观地决定价值的原则。如果作这样的解释,那末新的见解就会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理论相左;按照保罗·斯威齐的说法,新的见解可以概括为:“指在一个商品生产社会中起作用的那些力量,它们规定着(a)商品间的交换比率,(b)每种商品的产量,和(c)劳动力在各个生产部门的配置。价值规律存在的基本条件是有一个由私人生产者通过相互交换满足其自身需求的社会。”<sup>⑦</sup>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价值规律只是作为一种内在规律,从个体的角度看是‘一种盲目的规律’在发挥其作用,并在充满非本质波动的混乱中维持社会生产的均衡”。<sup>⑧</sup>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常把“价值规律”看作是“计划原则”的对立面,这就不可避免地在美苏两国引起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提出的新观点是否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了不可否认的修正这个问题<sup>⑨</sup>。如所预期,兰格为杂志编辑部解了围,<sup>⑩</sup>附带地还从马克思手稿中引用了他认为确凿的材料作为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除后,社会生产仍在进行,在不同生产部门中,价值决定仍在这样起作用,即劳动时间的调节,不同生产群体间社会劳动的配置,以及与此有关的帐簿记录,都比以往更为重要。”<sup>⑪</sup>马克思所用的“价值决定”一词(原文为:die Wertbestimmung)是否与“价值规律”几乎一个意思是有疑问的,但是按照兰格的见解,即:价格变量的作用受控于中央计划委员会,社会主义下的“价值规律”屈从于计划机构的决定,同时又能发挥市场的功能。

苏联内部的争论一直持续到 K·奥斯托维梯尔诺夫在共产党的机关报《布尔什维克》<sup>⑫</sup>发表了似乎是官方的结论时止,他回顾了社会主义传统观点<sup>⑬</sup>,然后他勉强承认了“价值规律”对于计划原则的附从作用,因为苏联的经济仍然是“保留、并且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他的文章毫无疑问是对国内争论各派作出的妥协姿态,意图避免在战争期间出现观点上的尖锐分裂。实际上,值

得指出的是,奥斯托维梯尔诺夫在结束他的文章之前,特别强调了“在保卫祖国的重大战争中”,严格节约资源(人力和物力)耗用的迫切需要才引发了对包括“价值规律”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原理的反思。<sup>⑭</sup>在当时处于最严峻和人力供给压力下的苏联高层领导人中引起这种思考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依靠官僚控制和详尽计算的计划经济需要巨大的人力资源。这一反思无疑是后来苏联倾向于明显重视市场原则的因素之一。但无论如何,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取更加自由的管理经济事务原则的大门,在30、40年代就已打开——列特维诺夫在30年代早期就预见到向“40%的资本主义”趋同的趋势。

### 战后的评述

换句话说,在二战前就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的历史趋势。在战后期间,这些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谈论这些趋势,以致保罗·萨缪尔森甚至在他的普通教科书中也说:“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和简·廷伯根有理由指出,虽则不无夸张,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向单一的现代产业形态趋同的趋向——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经济”。<sup>⑮</sup>实际上由于把规范性的观点(尤其是廷伯根)<sup>⑯</sup>引入到这个主题中,二战后这一趋同的论点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廷伯根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即所有的社会,不管它们以何种社会经济制度为特征,其共同目标应该是使它们当时公民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和为其后代的利益取得最佳的经济增长率。根据他的观点,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策措施将分为两种:(a)对于规模报酬递减规律起作用而外部因素的影响极少的经济活动(如在零售贸易中),市场支配作用可以尽情发挥;和(b)对于规模报酬递增规律起作用(可能会出现垄断)而外部因素的影响又可能较大的经济活动(如铁路),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旨在建立最佳体制的

社会都必然会趋同于一种混合经济的类型。廷伯根自己知道,这一命题会有许多不同的限定条件;但几乎无法否认,他现在代表了西方经济理论家中的多数派。

## 2. 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的混合经济

### 私有化和全球化的趋势估计

1979年5月,英国撒切尔夫人在选举中获胜,其政府随后就实行私有化,80年代这一趋势逐渐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如上一章所述,日本也跟上了这一趋势,它在1981年3月建立了一个拥有特别授权的特别委员会,来研究国营企业私有化的问题。这个世界性趋势的高潮是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起的于1986年2月在首都华盛顿召开的一次国际性私有化会议,有来自46个国家的近500名代表参加。国务卿乔治·P·舒尔茨向与会代表发表了演说,他说这个会议象征着一次“经济思想的革命,一次不寻常的革命,因为它是对我们曾经坚持但却又偏离了的原则的一次回归。这些原则就是个人自由和私有企业,它们在200年中使世界所起的变化比过去2000年中的所有变化都要多。”<sup>12</sup>尽管长期的评估还得等待未来的历史学家来作,但似乎存在着一致的看法:“英国的私有化计划已被广泛誉为头等重要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一大成功。它导致股份持有者的大量扩大,国库增加了数十亿英镑收入,国家对工业政策的参与也已经大大地降低了。”<sup>13</sup>

近几十年来,另一重大趋势是资本主义大企业以多国和跨国公司形式开展的全球化活动。我们已经谈了一些主要与日本有关的这一趋势的具体情况;这里还可以再谈一下这一趋势对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意义。在战前,我们观察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其它方法来扩大他们在国外势力范围的那种全球化。那是在列宁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矛盾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时

代。但现在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些过去是帝国主义列强剥削对象的殖民地几乎都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先前为了资本的利益所进行的武装干涉也已不再为人们所宽恕。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私人资本的全球化,尽管加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霸权统治,但不会产生它自己的矛盾?换句话说,这是否是“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几乎不需要对社会主义的社会模式作出妥协的一个方面?

私有化和全球化这两种近年来的趋势,似乎支持了这样一种在世界各个角落被吹嘘的观点,即用罗伯特·海尔勃劳纳的话来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在正式开始后不到七十五年就已经结束了;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sup>19</sup>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趋同的假设也不得不加以修正;甚至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演变的至理名言也要被加以批驳。因此,我们不能避而不认真地对待这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可以认为,前面引用的乔治·舒尔茨的讲话,具有征集志同道合者的性质。尽管撒切尔夫人所倡议的“股份持有者的民主”已经被许多作者如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特丽霞·阿伯丁等人誉为是预报 21 世纪主要“大趋势”的先声,<sup>20</sup>然而专家们似乎比较一致的观点是,世界范围内私有化的流行更主要地是一种政治举措,而不是经济举措,是“组建其政治同盟军的战略”。<sup>21</sup>这里所包含的理论问题相当复杂,我们只能述及一些与我们讨论有关的基本要点。与此有关的变量有:(a)所有制问题,即私有制或公有制;(b)市场力量和竞争程度;(c)计划和管理办法的性质;(d)效率的几种尺度。所有这些都是影响公司积极性和行为的、彼此相互密切联系的决定因素,任何简单笼统的论述都是不恰当的。尽管如此,下面阿萨尔·林德贝克的概括可以认为代表了当今大多数经济理论学家的观点:

“中央经济计划在动员、积累和资源的迅速再分配方面可认为具有其优势。……与此相比,在市场制度下,各独立企业间的竞

争,在静态的分配效率和技术效率方面,可能是相当成功的,条件是要实行某种中央计划,管理好集体性商品和外部经济并保证充分利用资源——最低限度的一种凯恩斯稳定政策。”<sup>32</sup>

所有制的二分法(私有制与公有制)和市场关系的二分法(竞争与垄断)是不平行的,指明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样,以英国为例,在普遍存在有效(实际的或潜在的)竞争的市场上,(如阿默萨姆、英国宇航、企业石油等公司所处的市场),可以发现(实证材料亦如此)私有制——从而私有化——是有效和合适的,“但当政府实行私有化的用心扩大到包括据有广泛市场力量的企业时,政策上的困境就变得更加严重。在存在垄断的地方——亚当·斯密说的‘有效管理的大敌’——宁愿私有制而不要公有制的理由大大削弱了:不能再指望私有经济的有效利润追求会导致社会的有效结果。”<sup>33</sup>

换句话说,可以很有把握地归结为:80年代的私有化高潮并不必然意味着像乔治·舒尔茨说的那样,无条件地回归到“个人自由和私有企业原则”,也不是像奈斯比特和阿伯丁所预言的那样,是向“人民资本主义”的不可逆转的演变。

那么全球化的趋势怎么样呢?这里涉及的问题同样远非简单,尽管可以确定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主要大国间的核战争看起来也很不可能发生,但我们应记住跨国公司(大多数都是大垄断企业)都在实行国际范围的严密计划战略。“无国界经济”是当今世界普遍使用的一个术语,它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政策对它们的活动常常一无阻挡,除非有时要利用那样的政策。然而正在形成的贸易和货币集团之间同时也确实存在着对抗,如“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以统一的德国为主要力量的欧共同体取消内部壁垒的步骤,以及日本金融贸易业在东南亚日益上升的统治地位。我们在上一章里讲述了与电气电子业有关的这种对抗的一个具体例子。当现在的每一个贸易和货币集团都变得更加坚固时,未来将会变得怎么

样是难以确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断定，今天的世界资本主义远远不具备这一特征，即在数不胜数的私人企业间存在着原子结构型的竞争；同样可以断定，当今存在的集团竞争还没有得到相应的控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经济体制趋同的问题才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

### 技术进步的作用

私有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回顾，已经使我们确信（如果使我们懂得什么的话），在历史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许多重大的方面有其自我完善的体制。因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在这一演变过程的背后，有着哪些基本的限定因素。无数的经济学家过去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似乎都同意维布伦的观点，后者认为技术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维布伦的论点是：技术进步是积累性的，同时又是不以企业家的意愿或行动为转移的；并且，技术进步将带来体制的变化，首先导致一种常见的萧条状态，然后导致一种垄断经济。在这种垄断经济中，利润得到了保护，但人力和物力资源则长期得不到充分利用。

在更近时期的经济学家中，特别是 J·K·加尔布雷思顺着维布伦的传统，强调技术在改造资本主义体制模式中的作用。他的频繁地被引用的名言，最简炼地概括了他所持的立场：“市场的敌人不是思想观念而是工程师。”<sup>②③</sup>他说的“技术为主宰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以下六个论题：

1. “任何一个项目从开始到结束的间隔时间不断延长。……技术应用越彻底，与知识的应用距离也就拉得越远。”

2. “除了因生产增长而资本增加外，投于生产的其他资本也更多。上述时间的增加和投于在制产品的投资增加，都是要花钱的。”

3. “随着技术的增长，时间和资金对特定技术的投入，会变得



更加不灵活。这个项目在被分割和再分割成组成部分之前,必须精确地加以规定。”

4. “技术需要专门人才。……并不令人意外的是,系统的知识只有经过掌握它的人,才能开花结果。”

5. “专业化不可避免的对立面是组织化。这是一项使专家们的工作取得一个协调一致的结果的工作。……实际上,把专家们组织起来的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需要有专门负责组织工作的组织专家。”

6. “由于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和资本,和这种投入的缺乏灵活性,以及需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再加上在先进技术条件下、市场行为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这就产生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sup>⑤</sup>

这些要点综合起来,有足够的说服力说明技术进步对领先企业的体制行为模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尤其从我们在第三章中已说到的“科学工业革命”的角度来看。

技术进步属于实际财富范围,不属于社会体制范围,它的确影响到生产方式,就是使后者发生通常是大幅度的质的变化。加尔布雷思关于技术的论点说明了这个历史进程。但正是马克思,反复论述了这一点,甚至大胆地提出了在自动化的应用方面会有发展的更长期的预言。下面我们引用他的有关论述:

“当大规模工业不断发展时,实际财富的创造较少依赖于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量,而更多依赖于劳动时间内动用的工具设备的能力。这些工具及其高效益并不与生产它们所需的直接劳动时间成正比例;其效益更多地依赖于科技进步达到的水平,换句话说,依赖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人的劳动似乎不再被生产过程所圈住,人更多地在生产过程中充当观察者和调节者,……他跳出了生产程序,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角色。”<sup>⑥</sup>从这点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社会个人”,或者说那些“通过其社会存在而取得并精通对自然界的知识”的人的出现,其结果是劳动时

间不再作为财富的衡量尺度,因而“交换价值必然不再是使用价值的衡量尺度。……依赖于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模式于是便寿终正寝。”<sup>②</sup>

这其中的含义十分深远。首先,随着自动化和其它运用在生产上的先进技术的进步,劳动对产品所作的原子结构型贡献的存在条件将不可避免地消失,“社会个人”将得到发展。然后基本要素价格的决定将失去不受人们情感影响的市场客观性而可能变成市场力量关系的产物。实际上,我们已经处在生产模式演变过程中的这样一个阶段,即私人企业(至少在加尔布雷思所指的“计划体制”下)可以或多或少决定他们毛利率的大小,而组织起来的工人,若足够多的话,也能成功地从他们雇主那儿满足他们的工资要求。

### 作为一种生产模式的混合经济

加尔布雷思和马克思的上述思考都指出,市场导向型的自由企业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转变为其他模式。这种其他模式因为现在还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术语,可以称它为“社会资本主义”或“混合经济”,也就是说,是一种在有众多的公共管理手段干预(以实现社会既定目标)下,价格机制作用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的经济组织体系。在瓦西里·里昂惕夫用过的一个有趣的比喻中,他把它比作一条帆船,它的帆(自我利益动机)迎着风,而舵(公共管理手段)引导着方向。由于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的标准教科书将混合经济定义为“非共产主义国家中的主导经济组织形式”<sup>③</sup>,我没有理由不称混合经济为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生产模式。

现在,支持混合经济这一概念的理由不再限于当今技术进步的影响。“市场失灵”现象大量发生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并且我们知道在许多例子中,纠正现在市场不完善性的各种办法并不能

解决所发生的消极后果。日本在这方面最恶劣的事例是环境破坏,我们在第五章(第三节)已就此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从理论上讲,更基本的问题是存在着无法市场定价的许多珍贵物品,诸如自然美景和众多的野生物种。就这方面而言,价值标准也是受个人情感影响的。但是,人们很难反对这样一位老妇人的观点,她住在计划中的地区性开发区(在鹿儿岛的志布志海岸)邻近,对开发计划持反对意见,说“我宁愿在干净的天空下吮酸梅而不愿在烟雾缭绕的空气里吃牛排。”

赞成混合经济的论点中,也许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利润所起作用的变化。传统的情形是,利润不仅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标志,而且也是这种增长的源泉。甚至在今天,利润仍然是作为经济增长先决条件的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在上一章(第二节),我们已联系当今日本的公司资本主义充分地研究了这一方面。现在的问题是,利润是否仍能被毫不含糊地当作“对经济增长作贡献的标志”。人们普遍都同意,在不完全的竞争条件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他们的要素供应是划得来的,是可以赚取一笔实在的利润作为有意或人为造成短缺的回报。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古典模型中,利润是对创新者和企业家暂时的超额回报;说它们暂时的,是因为在一定时间内,它们会因对手和模仿者的竞争而消失。当然当一种从创新中获得的利润消失时,另一种就会产生;利润作为报酬不断流向一批又一批成功的创新者,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然而在资本主义的最近阶段中,具有寡头卖主垄断力量的大公司,能够通过维持卖主价格和其它诸如将某种创新据为私有、作为绝密诀窍等手段,来保证自己源源不断获得超额利润。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利润已经变成了衡量成功地阻碍别人分享生产率进步的程度的标志,而按理这种生产率的进步应是有益于大家的。混合经济也不容易对付这种情况。但是如果能说公司资本主义下的内部净剩余并不真实反映社会所期望的那

种创新活动,那末赖斯特·索罗提出的“设立一个相当于企业投资委员会组织的全国性委员会,把投资资金从‘夕阳’产业改道流向‘朝阳’产业”<sup>20</sup>的建议,从混合经济的角度看,是相当贴切的。

最后,除了上文所提到的各点以外,我们不得不再加上一点,即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保证资源充分利用和制定帮助弱者和贫者的基本福利措施方面的积极作用,这是混合经济固有的一大特征。

我们可以概括如下:

1. 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向混合经济类型的社会经济组织或“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它走在与社会主义趋同的道路上。

2. 这场转变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或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私营部门内部的计划体制。

3. 但是市场失灵,或者尤其是外部的不经济性,已变得如此恶名远扬,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支持公共干预——混合经济的普遍特征。

4. 随着大公司寡头卖主垄断力量的加强,利润的作用也已变化到了人们提出对经济投资方向进行公共干预的程度。

5. 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和收入的福利导向型再分配继续成为混合经济的固定特征。

因此,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了一个混合经济生产模式的时代。我们将走向何处还不能肯定。在下节中我们将讨论日本的情况。但是在此可以提出一个总的论点,一个和每个社会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或者其特异性有关的论点。我认为经济剩余的形式每个制度都不相同,譬如封建主义制度下的地租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资本利润。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混合经济被理解为一种不同的生产模式,那么混合经济下的剩余形式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定义是混合经济,所以其答案就不可能很明确。可以认为,这种剩余包括私人资本的利润和国家控制下的社会基金。但

重要的是，这两类剩余的分界线是可移动的，这取决于社会的共识。正是在混合经济的这个特征上公众可以把他们对于社会发展的愿望投向这个方向（进一步私有化）或另一个方向（走向社会主义）。

### 3. 日本经济的前景及日本在整个世界中的作用

#### 关于国家政策的两个基本支柱的建议

大约三十年前，我写了一篇以《日本是一个大国吗？》为题的短文，开头我引用了下面一个我们在孩提时代常听到的寓言：

“从前有个村庄，那里住着三兄弟，名叫强壮、富裕和热心。起先，强壮凭他强健的体力统治着家族，强权即公理是当时的原则，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强壮开始变老了，不能像以前那样维持他的权威了。那时，第二个兄弟富裕已集聚了相当的财富，并建造了一批仓库。换句话说，美德的标准已从强权转移到了富裕上。一天，村子里发生了火灾，烧光了富裕的所有仓库。一夜之间，他就变得一无所有。火灾之后，一场流行病在村子蔓延开了，学过医学的第三个兄弟热心很快就能说出那是一种什么流行病，他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挽救了村里很多人的性命。”故事还说，“如果你今天去参观那个村庄，你就会在村子中央找到热心的雕像。热心战胜了强权和富裕。”

个人美德的标准在人类历史中的变化也多少沿袭了这样一个过程。然而，对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声誉来说，我们也许仍停留在强权和富裕的时代。但我深信，总有一天衡量国家的标准也会变化。依照强壮的标准来看，日本目前算不上一个“强国”，但按照富裕的标准，人们普遍认为日本现在已是一个“大国”。本节所要讨论的问题，正是今后日本将如何发展。

正如前几章所讨论的，在二战后的时期，日本经济已显示了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显著成就。虽然日本基本上还是资本主义，正在向我所称的“公司资本主义”发展，但按我们上面的定义，它已是一种混合经济。日本在 1955 年后二十年内所取得的高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在许多方面的引导。同时，补救市场失灵的许多措施已成为国家政策中公认的一大特征。但确实，混合经济意味着它是几种社会动机的混合体，一方面存在着盈利的动机，另一方面又存在追求社会福利的动机，这两者常常彼此矛盾，因此就出现了关于使经济增添活力的最主要原则问题。

我们谈到“使经济增添活力”时，通常与 GNP 的增长率相联系。然而，正如第五章(第四节)中关于 GNP 增长的福利含义论述中可推论出来的那样，情况并不总是如此。按照更前面章节中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话来说：“没有必要再指出静止的资本和生产状态并不意味着人类进步的静止状态。各种思想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都还可以有很大的发展余地；提高生活艺术也大有可为，当人们不再为活得下去而困扰时，提高生活艺术就更具可能性。”<sup>⑩</sup>换句话说，在日本处在已获得的丰裕阶段中，对社会经济进步的意义重新定位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在紧接着高速发展阶段的几年里，许多日本最高级别的官员早已开始谈及这种重新定位。例如，日本首相(1972 年 7 月—1974 年 11 月)田中角荣在他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1972 年)中写道：“我们正在进入‘人类回归’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应该是人类、太阳和绿色，而非大城市或工业，高于一切。”同样，三木武夫，当时环境厅的领导人，后来田中的继任者，在 1974 年 6 月呼吁国民大会通过《自然保护宪章》，并说：“该宪章可以看作是告诫我国人民价值观念应有明显转变，特别是告诫那些行使政府和地方公众团体职权的人们的宪章。至少，它树立的价值标准不同于那些仅仅重视经济效益的价值观，而极其注重对于人类健康、幸福和美好的向往。”还有，福田赳夫(1976 年 12 月—1978 年 12 月任首相)1977 年夏在马尼拉的

演说中也指出：(1)从历史上说，经济强国也总是军事强国，但日本拒绝走军事强国的道路，并且尽管日本有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能力，但它决定不拥有核武器；(2)这也许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日本别无其他选择；(3)日本坚信它可以通过竭尽全力建立国内外的和平与繁荣，而不是依靠向其它国家实施武力威胁，来对世界作出最好的贡献。这些原则后来被称为“福田信条”。

这些论述中有两个基本的主题，一个是田中所述的“人类回归”，即尊重人类自己应作为社会和经济管理基础。另一个是，世界唯一的日本《和平宪法》应该是国家外交政策的主要依据。

在这里，我们不必对这三位前后相继的首相是否全力地遵循他们所倡导的政策提出疑问。无论如何，事实说明上述国家政策的两大基本支柱与大多数日本民众的观点是一致的；而且，这些观点在政治领袖们的声明中也得到反映。下面，我们将论述某些与日本社会的未来有关的具体问题，这个社会将把“尊重人类”和《和平宪法》作为制定政策的方向。下面的论述会涉及到比经济学范围更广的话题，但它附带地也会阐明日本所渴望的那种混合经济类型的特征。由于这涉及到未来，因而按照各人基本立场的不同会出现各种分歧的观点；还有我必须提醒读者，这篇论文的以下部分比先于它的那些分析和论述更带有我个人论点的色彩。

### 《和平宪法》及防务问题

首先，我们考虑防务问题。日本的生存依赖于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是人们的共识。由于日本要从海外进口约55%的基本食物（以原热量卡计），以及大部分的主要工业原材料，更不用说初级能源了，一旦海上通路被阻，日本将不得不屈服。如果事实确实如此，日本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维持其海上通路的安全呢？目前的回答是否定的。如果这种防御超出了它的军事能力，日本又怎能够在一种像希特勒发起的疯狂的军事入侵中保卫它自己呢？

认为日本能以其本身的军事能力完成这项任务是一种错觉。

如小宫隆太郎所写的那样：“日本自我防御的主要目标应该是防止日本卷入各种冲突，并保持其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姿态。为了享有和平，我们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努力防止战争的爆发。为达到这个目的，军事防御力量并不具有任何积极意义。”<sup>31</sup>最近，肯尼斯·博尔丁在访问日本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我会说，你们投入国家防御中的每一块钱都在削弱你们的国家防御。……日本的安全取决于日本不成为任何一国的威胁，日本越是建立攻击性国防力量，越是对比你更有威胁性的国家造成更大的威胁。……即使是在西方的牛仔时代，毫无武装的卫理公会传教士也许比有武装的牛仔们有更大的生存机会。”<sup>32</sup>回忆一下川岛正次郎的名言也是很有启发性的，那是他作为参加1965年4月在雅加达召开的第十届亚非年会的特使回国后接见记者时说的<sup>33</sup>：“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事实上日本没有武装使得日本具有了重要的资格条件。东南亚国家明显地感觉到，不能信赖一个有强大武装的日本作为冲突的仲裁人，而没有武装力量的日本则可以在这个地区扮好和平使者的角色。”这种印象仍然会在亚洲存在下去。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25年内，尽管有《和平宪法》的存在，日本武装力量的规模按年预算支出计算，已经达到世界第三位。<sup>34</sup>

日本的重新武装有着三个限制因素，那就是：(a)《和平宪法》指明了“决不保持陆海空武装力量以及其它战争潜力”；(b)“非核武器三原则”，即不生产、不占有、不从外国引进核武器；和(c)国防开支最高不超过“GNP的1%”。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也许会想，尽管战后以来日本不曾遇到来自任何国家的威胁，这三条限制怎么会被突破呢？但事实是这已经发生了，<sup>35</sup>这个过程的主导因素是根据《美日安全条约》而实行的美日军事联盟。该军事联盟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苏联威胁”——美国和日本政治领导人强加在日本公众脑海中的一种印象，



以致于一度为防卫厅长官的栗原祐幸亦公开表示：“提醒日本人民认识到苏联的威胁是我作为一位政治家的责任。”然而，即使在冷战高潮期，军事部门要唤起日本人民对《美日安全条约》的支持，也不是件容易的事。1959年3月，东京地区法院作出了一个著名的伊达裁定，称“依据《美日安全条约》而来的美国在日本驻军违反了《日本宪法》，以此条约为依据的《特别刑法》是无效的。”该裁定中的有关段落值得引述如下：

“美国在日本的驻军不仅用于支援对国内动乱的镇压和日本对外来侵略的自我防御，而且如果出现必须用武装干涉来维护远东地区的国际和平和安全的战略需要时，这些部队也可以被派往日本以外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让美国军队使用的军事设施毫无疑问会被美军利用，由此使日本卷入与日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军事冲突之中。无疑这就为战祸波及我国提供了机会。”

这些都是真正带预见性的话，然而在同年9月，伊达案例被上诉到最高法院，并最终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但是公共对与美国进行军事联盟变得越来越不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要求至少重新考虑这个《安全条约》的呼声与日俱增。

一国的国防不仅仅包括军事方面，这是人们的常识。特别是当国防的争论与“应该保卫什么”或者说“应该保卫什么样的国家”这类问题分离时，争论就显得毫无意义。许多时事评论员很早就开始这样讲了，例如笠信太郎（当时《朝日新闻》的主编）写道：“既然日本没有军事实力，那么用来保护日本的应该是一种不会被其它国家轻视的精神状态”。<sup>④</sup>一位研究比较社会学的专家菊池章典写道：“缺乏热爱你的国家的意识的那种国防争论是危险的。如果是这样，难道这种讨论不应该首先针对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才能把日本变成一个真正受到日本人民热爱的国家？”<sup>⑤</sup>

## 日本立国的具体政策

这样,我们不可避免地意识到了上述“国家政策的两个基本支柱”——即《和平宪法》和“人类回归”,对前者的讨论会合乎逻辑地引起我们对后者的思考。下面也将提出对怎样使日本混合经济富有活力这一问题的具体政策建议。以“尊重人类”为导向的立国将不仅仅激发起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即清楚地认识到“我有一个值得保卫的祖国”,而且将告诫那些潜在的入侵者:攻击日本将是毫无意义和不人道的。

更确切地说,在尊重人类的基础上立国意味着什么呢?

尊重人类必须尊重生活,因此也必须重视保护和促进健康,并且它还要与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环境相联系。它进一步要求重视目标而不是手段,要求重视诸如自然美之类无法市场定价的东西;尊重人类当然也应包含重新考虑人类劳动的本质。经济学家习惯于将人类劳动与劳累等同起来,因而把它看作“负效用”,并把工资看作是对这种“负效用”的补偿。但是从尊重人类这个立足点来看,工作不应该全是痛苦和汗水。相反它应该是有目的的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它是休闲的补充而不是对立物。总的来说,一个以“尊重人类”为导向的国家会高度评价文化价值。换句话说,从现在起,日本迫切需要的是“价值观念的变化”,正如早先引用过的,前首相三木所说的“比器重经济效益的标准更重要的是那些珍视对人类健康、幸福和美好追求的标准”。

一个能满足所有这些要求的全面规划将是如此巨大——它需要有某种社会革命,从而它极可能不会被一下子提到全国议事日程上来,然而明确地指出改革的方向,迈出任何可以迈出的步伐,是极其重要的,事实上这点已做到了。朝着这些目标,我提出以下这些具体意见,作为日本国家政策的基础:

1. 作为强调人民生活和健康政策的一部分,日本应努力成

为世界的“医疗保健中心”，在作出更大努力发展医疗技术的同时，扩充和提高其医疗人员质量和医疗设备。

因为现在提供给日本民众的医疗服务仍存在较大的改进余地，所以提出成为世界“医疗保健中心”就显得有些冒昧。改进日本的公共医疗服务当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为这种改进所做的计划可以在更广义的范围内考虑，正如上面所说的，可以包括整个世界。日本在医学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套用一个经济学术语)。例如在心脏手术中，日本的医疗技术领先于世界，许多需要特别精密手术的病人从外国来到日本接受治疗。另外，日本妇女普遍的善于护理的品质是发展护士这一职业的优越条件。在国外教会慈善医院里工作的修女们，以其献身精神、谦逊和对病人的理解常常赢得人们的赞誉。但我还是感到，日本护士对其使命的觉悟程度是很高的，尽管目前日本护士总体收入低于一般水平。如果日本要成为世界的“医疗保健中心”，那么其医务人员的气质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提高。

此外，日本近来医疗设备的发展也十分惊人。以计算机操纵X线体层照相分析仪(CT扫描仪)为例，它已经在许多国内医院里得到运用，目前用于全身分析的那种型号只需花大约1亿日元(就可买到)——这是世界上最低的价格。最近的新闻报道还提到用于诊断脑肿瘤和中风的一种计算机操纵阳电子扫描仪。这种仪器是由科学技术厅国立辐射科学研究所研制的。日本作为一个和平国家，应该在这些不断扩展的医疗设备领域内，集中精力进行研究和开发。与其鼓励像武器这类“死亡工具”的出口和技术研制，我们不如在医疗设备——即“生命工具”的领域里开创新的天地。

2. 与上面第一点有关的一个主题是日本应在许多游客(包括外国人和本国人)观光的风景区(和温泉地区)建造更多的设施，以发展旅游和保健事业。

日本幸运地拥有具备各种气候条件的地区，这些地区从北到

南跨度 3000 公里,而且日本还拥有温泉和自然风景区,在那里人们可以观赏到四季的变化。以濑户内海为例,它被法律规定为“应该留传给后代,并且作为无价之宝的海洋资源宝库,和日本国内独一无二又举世无双的一大风光宝地,让公众平等地享受。”<sup>98</sup>这是日本独有的财富,像是一个多方位的国家公园;或者我们可以称它为“曾经有过的一种财富”,因为在战后经济飞速增长时期,在内海沿岸新开垦的土地上建起了许多工厂,现在有 1/3 以上是人造的海岸线。在一个难以置信的短时期内,在这个国家公园地区就建立起了等于法国和西德全部生产能力的坯钢生产设施,和及得上英国全国生产能力的炼油和石化生产设备。因而赤潮和诸如水岛泄油等事件一直给该地区带来祸害就不足为奇了。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中,日本选择了“扩大厨房而牺牲花园”的政策。然而,一些美丽的“花园”依旧在这个国家许多地方保存了下来,作为旅游胜地供人们享受。和外国同类地方相比,不可否认,日本的旅游胜地缺少较好的设施,它们的粗陋常常非常突出,不能满足游客各种各样的需要。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建议:政府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改变自己的基本立场(正如上文前首相三木所描述的那样),并且制定出使全世界都能享受到日本这些稀世美景的具体政策。<sup>99</sup>

### 3. 日本应该竭尽全力促进文化和艺术领域内的国际交流。

虽然不是众所周知,但事实上日本制造的乐器近来已风靡欧洲。1980 年 2 月底,在西德法兰克福举办了一次乐器展销会,据当时发行的法国音乐杂志《迪斯克》报道,日本制造的产品占了法国电吉他市场的 60%,合成乐器市场的 85% 和钢琴市场的 34%。在西德的乐队演奏家中也有不少人喜爱日本造的管号、小号、短笛和长号。演奏者们称,这些乐器之所以享有这样的声誉就在于日本的制造商能认真地听取音乐家的要求、并不断努力来改进他们乐器的音质。<sup>100</sup>这就再次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日本有能

力为这个高灵敏度的音乐与声响世界作出这样的贡献。这里再次说明存在着受欢迎的,出口“生命工具”代替出口武器的可能性。

日本还有其它许多吸引西方人注意的文化活动。陶瓷艺术就是一例。伯纳德·里奇(1887—1979年)——曾帮助日本陶瓷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曾经说过:“我这一生都充当了东西方之间的使者。我相信,当代人类文化两个分支之间的互相影响和联姻会成为人类联合与达到成熟阶段的前奏。”对于日常生活中一切用具都强调审美角度的日本文化传统肯定握有打开当代国际文化交流的钥匙。

不久前,前首相大平在一次关于政府政策的讲话中谈到“国家导向从经济扩张向文化扩展的转变”,并强调了“随着21世纪的到来,从这个方向立国”的必要性。如果这样,他也会全身心地同意上面这个意见的。

4. 日本应大量增加对联合国大学的资助,使它成为能为第三世界社会 and 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教育、研究和技术创新的一个世界中心。

目前,日本对联合国大学的资助位居世界榜首。这所大学是为了一定的崇高目标而建立的,但是其它大多数所谓的大国并没有对这种事业显示出热情,因而在过去,这种状况也诱使日本采取了有点不冷不热的态度。现在虽然仍不好说联合国大学能否取得那些预期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日本不应考虑各资助国家份额的平衡问题。相反,在这一关键时刻,日本应果断地扩大其义务,以便振兴这个独一无二的机构,来实现最初的崇高理想。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0年10月宣布设立国际性联合国大学规划时提出的“三个问题领域”是:(a)对战争与和平的研究,尤其是如何采取决定性的举措来处理裁军,防止战争冲突的问题;(b)有关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各国人民生活的保障问题;以及如何扭转“贫困的恶性循环”问题;(c)世界资源与技术问题;特别是,鉴

于科学技术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促进对自然和人类的最高理想而服务的手段,我们应如何将技术作为社会财富对待的问题。

上述问题的重要性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一般来说,现有大学不能有效地进行上述这些问题的教育和研究。而联合国大学能够基本上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的这些要求。既然这所大学日前建立在日本,那么这不正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吗?日本政府、学术界和工商界应该抓住机遇在联合国大学的各种活动中进行加倍的投资,最迟在联合国大学开创二十年后,它将于1991年拥有自己的独立建筑物,虽然还未找到一处适合其重要地位的校园。

5. 继续执行优先考虑的政策,日本应该提高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与技术援助水平,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也许更重要的是,应该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制成品开放更多的日本市场,在这些制成品方面,第三世界国家一定能从中获得比较优势。

目前,日本的国防开支约占其GDP(国内生产总值)的1%强,美国的比例为6%,英国是4.4%,法国为3.8%,西德3%<sup>31</sup>。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百分比相对较低。另一方面,1972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为国际经济合作确定了目标。它规定GNP的0.7%作为一致同意的官方发展援助目标(即所谓的ODA)<sup>32</sup>。该目标原本应于70年代中期达到。但直到1977年,日本的实际成绩只有0.21%,最近,到1988年这一比例达到0.32%<sup>33</sup>,仍与UNCTAD所要求的0.7%相距甚远。日本应该加快速度实现这一援助目标。但更重要的是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内容。首先,联合国确定42个国家为“最不发达国家”(LDC),建议援助资金应优先分配给这些国家。日本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成问题的,在1988年接受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前十个国家中,只有孟加拉国和缅甸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而且,日本ODA的许多资助项目在当地成了众矢之的,甚至成为抗议的目标,因为它们卷入了地方政治官员们的肮脏交易,而并没有使所期望的

益者获益。<sup>④</sup>

第三世界问题,即使仅限于经济方面,也并非只是援助所能解决的。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套建议,日本比其它任何国家都应该更积极地在促进非产油国利益上面起带头作用。几年前,一个调查有关发展问题的国际委员会,即广为人知的勃兰特委员会,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题为《南北:求生存的计划》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建议(包括资源自动从富国向穷国的转移体制的执行),关于日本政府是否认真对待这份报告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很多先进国家,包括美国,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保护他们多年来在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来的既得利益,并且有时通过军事援助和武器输出来控制这些国家。然而第三世界人民的基本历史趋势是强烈反对这些殖民主义政策的。在海外没有那些既得利益的日本,是能够将《和平宪法》作为其政策的基本框架和积极配合第三世界这股历史潮流的。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合理规划将购买力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单方面转移,毫无疑问是迫切需要的。但从长远来看,重要的问题是发达国家应向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放其市场,后者肯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在许多技术精密度较小的制造业方面获得比较利益。援助究竟是暂时的解决办法,而贸易才是长久之计。除非像日本这样的国家不断扩大进口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商品,南北经济上的差距在长期内也是不可能缩小的。我们不由地想起几年前印度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V·K·R·V·拉奥在被美国官方访问团问及“我们应做些什么才能帮助你们摆脱目前的困境?”时,他意味深长地回答:“停止对我们的援助!”南北之间贸易关系的、富有力度的调整必然意味着发达国家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甚至在短期内就进行调整。日本由于工业成熟期比较晚,而且有着过去克服国外很高的出口市场壁垒的痛苦经历,尤其应第一个赞成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更加自由的贸易,第一个主动采取步

骤,按照比较优势的变化模式进行其工业结构改革。

顺便一提,日本因为“冷淡地对待难民”,仍是国外指责的对象。当1979年7月联大难民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讨论有关印支350000名难民救济问题时,日本外务大臣园田直不得不作为发达国家中唯一尚未批准《难民地位条约》的国家参加了会议。同年10月,联合国负责难民问题的高级专员提出了一份报告,一份使日本羞辱的报告,说到当时西方国家接受印支难民的数字:美国接受130000人,法国57000人,加拿大25500人,香港9300人,而日本只有62人。日本拖延对条约的批准显然是因为有关各个省之间未能进行必要的配合。最终该条约于1982年1月1日起在日本生效。日本应该在担负起这一人道主义责任方面赶上其它国家,这是十分紧迫的。

## 结 束 语

我认为,上述建立在《和平宪法》与尊重人类基础上的五条具体建议远非梦想。自然,实现这些愿望需要时间,但使国家政策方向有一转变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的实施当然要花钱:目前日本GNP的1%为40000亿日元。对那些倡议把日本国防开支增加1%的人们,我请求将这笔钱用在上面提出的那些政策计划上。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实力,我确信这是完全可行的。

制定我在上面所说的国家政策,在我看来,是与森嶋通夫所称的“软件”方法——依赖“外交、经济或文化交流”<sup>47</sup>——相一致的。一个积极倡导世界裁军,致力于通过使自己成为国际保健中心,以与疾病作艰苦不懈的斗争,重视自然风景区的旅游设施建设,积极参与文化艺术领域的国际交流活动;极自愿地增加对联合国大学的资助,并且通过援助与贸易,努力使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折磨的日本,将使日本成为人人都确信拥有值得捍卫的价值标准的国家,成为外国向它发动攻击会显得毫无意义和不人道的国



家。

我们还需要做好多能激起青年一代热情的建设性工作。人们的爱国热情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上面我说过,当把防务问题和防卫什么分开时,对于防务的讨论就失去了意义。当问及“防卫什么”时,这个“什么”自然是指决心实施上述那些计划的祖国。不用说,在“什么”与“用什么方式防卫”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什么”就是指这个意思,那末回答“用什么方式”的问题便很简单了——不是通过扩大和强化武装。在“什么”的含义中已经有了对“采用什么方式”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

当我们这样考虑日本防务问题时,我们必然会感到,像《日美安全条约》之类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极可能日本国内公众舆论将逐渐转向支持《安全条约》的最终废除,就像是太阳而不是北风会使旅行者自己脱下其外套。换言之,热心(指前述故事中的第三个儿子——译者注)的时代必然会在日本降临,而富裕(前述故事中的第二个儿子——译者注)统治时代的GNP增长程式将被恰当地置于第二位。我想引用我所赞同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六十年前写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论文,不知是否有点异想天开——他说:“每个人都富有的那一天或许并不那么遥远。……到那时候,我们就能去掉那些困扰了我们两百年之久的伪道德原则,根据这些原则,我们曾将一些最讨厌的人类品质称颂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到那时我们将能再一次珍视目的甚于手段,珍视美善甚于实用。”<sup>①</sup>

## 注 释

- ① 林肯·史蒂芬斯:《林肯·史蒂芬斯自传》,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1931年,第872页。
- ② 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的不稳定性”,《经济学杂志》,第38卷,1928年9月(第361—368页),第268页。

- ③ 约瑟夫·A·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第3版，哈珀兄弟出版社，纽约，1950年，第161页。事实上，他死前（1950年1月8日）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1949年12月30日提交给美国经济学协会的“向社会主义进军”。在这篇论文中，他更详尽地讲述了“相信资本主义秩序趋向于毁灭自身，而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将成为[经过某些限定]可能的继承者”。（同上，第417页）
- ④ 奥斯卡·兰格和弗雷德·M·泰勒：《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学理论》，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38年。
- ⑤ 同上书，第83页。
- ⑥ 英语节译本发表在《科学和社会》，1944年春（第115—125页）；L·A·列昂惕夫等，“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 ⑦ 保罗·M·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纽约：每月评论出版社，1956年（第一次印刷：1942年），第52—53页。
- ⑧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查尔斯·H·赫尔公司，芝加哥，第1卷，1909年，第1026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添加的）。
- ⑨ 《纽约时报》迅即抓住这一机会写了一篇社论，建议苏联的官方思想来个彻底的改变。《美国经济评论》也为一些持赞同和反对意见的专家开辟了一个论坛，他们包括拉亚·杜那耶夫斯卡亚、奥斯卡·兰格、保罗·巴兰、M·M·鲍伯和其他人（从1944年3月号起至1946年6月号）。尤其是杜那耶夫斯卡亚猛烈抨击了新立场，其理由是：“价值规律”在本质上是概括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一个概念。
- ⑩ 奥斯卡·兰格：“苏联的马克思经济学”，《美国经济评论》，1944年3月，第35卷，第127—133页。
- ⑪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92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 ⑫ 引自1944年12月号，第44—60页。英语全译本的标题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科学和社会》，1945年夏，第232—251页。
- ⑬ 诸如（1）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2）不存在阶级剥削关系；（3）计划原则的优先；以及（4）取代利润动机的刺激生产积极性的新动力。

- 13 参见《科学和社会》，1945年夏，第250页。
- 14 P·A·萨缪尔森：《经济学》，麦克格劳-希尔公司，纽约，第11版，第817—818页。
- 15 参见其“最佳体制的理论”，《论文选》，阿姆斯特丹，北荷兰，1959年，第264—304页。
- 16 引文见史蒂夫·H·汉克编：《私有化和发展》，当代问题研究所，旧金山，加利福尼亚，1987年，第17—18页。着重号是本书作者添加的。
- 17 约翰·维克斯和乔治·亚罗：《私有化——经济学的一种分析》，剑桥，麻省：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425页。
- 18 海尔勃隆纳：《纽约人》，1989年1月23日。附带一提，用美国的标准来看，他是个中间偏左的政治经济学家。
- 19 约翰·奈斯比特和帕特丽霞·阿布拉：《2000年大趋势——20世纪90年代的十大新方向》，威廉·毛洛公司，纽约，1990年，第154—177页。
- 20 史蒂夫·H·汉克编：《私有化和发展》，第216页。
- 21 阿萨尔·林德贝克：“竞争和计划的效率”，载于迈克尔·凯萨和理查德·波兹编：《计划和市场关系》，麦克米伦，伦敦，1971年（第83—113页），第102—103。着重号是原有的。
- 22 维克斯和亚罗：《私有化》，第426页。
- 23 J·K·加尔布雷斯：《新兴工业化国家》，休顿·米夫林，波士顿，1967年，第32页。
- 24 同上书，第13—16页。
- 25 K·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迪埃兹·凡拉克，柏林，1953年，第592页、596页。由赫伯特·马克思译成英语，载于他的《单方面的人》，伦敦：卢特勒治和克甘·保罗公司，1964年，第35—36页。
- 26 同上书。
- 27 保罗·A·萨缪尔森和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麦克格劳-希尔图书公司，纽约，第13版，1989年，第977页。
- 28 莱斯特·索罗：《零数社会》，纽约：基础图书公司出版社，1980年，第95

页。

- ⑳ J·S·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51页。\*
- ㉑ 小宫隆太郎:“向右的可悲转变”,《当代经济》,1979年春。
- ㉒ 肯尼斯·E·布尔丁:《IHJ会刊》,第7页。
- ㉓ 《读卖新闻》,1965年4月28日。
- ㉔ 援用北约“军事开支”的定义,它包括军人的养老金。参见《朝日新闻》,1988年10月19日,对1988年财政年度的军费开支作了比较。
- ㉕ “不准携带核武器入境”这一用语由于美国核威慑(日本依赖这种力量)政策(要求)对于部署核武器要保守秘密,因而无法加以确证。因此日本政府默许美舰装备了核弹的战舰“过境”逗留,声称这不同于“引入”。自从1987年财政年度以来,“GNP百分之一”的限制已被突破。
- ㉖ 《朝日杂志》,1962年3月6日。
- ㉗ 《文艺春秋》,1979年9月。
- ㉘ 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案第3条。
- ㉙ 物质上财力上过度富足的当今日本,或许不再会给外国观光者留下像林肯·史蒂芬斯当时从苏联回美国途中首次造访日本时(1917年)所得到的印象。但这里值得引一段他写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达日本一个港口时的一段话:“我们在夜间较晚的时候到达境港,我依稀看到一个普通的景象:一条船在码头上卸货,这有多美!只见一队队长得小巧玲珑的日本妇女,穿戴整洁,身上带着淡淡的、老板或雇主的字号标志,将我们的货物搬出船舱。我们上的那辆专车看上去很小,但雅致干净,美观漂亮。第二天一大早,当我撩起窗帘朝外看的时候,我看见了——美。稻田,稻田尽头的远山,一幅熟悉的图景。东京也是如此:美,趣味高雅——日本就是一种美。我从不曾想像过,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任何一种文明,能像日本这般可爱。我也修正了对希腊、古希腊的看法,它有点像日本。我认为,当文明国家中的每一生活细节与其文化水乳交融、和谐共处时,那么这些国家都会像日本那样。”(林肯·史蒂芬斯《自传》),第768页)不过,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 ④ 根据登在《每日新闻》晚刊上的一份报告,1980年4月9日。
- ④ 参见《SIPRI年鉴1989年》,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1989年,第188页。
- ④ 定义为“为了避免加重发展中国家负担而做出的让予性援助,并给予至少是百分之二十五的赠予”。
- ④ 《日本的ODA 1989年》,外务省,1990年,第55页。
- ④ 角一夫引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实证案例,批判性地分析了日本的ODA,见其《ODA 援助的实际记录》,岩波书店,东京,1989年。作者抱怨,在这个问题的许多关键方面,日本官方故意不提供真实信息。
- ④ 森嶋在1979年9月的《文艺春秋》中写道:“现在不是用诸如坦克和导弹的‘硬件’,而是用像外交、经济或文化交流这样的‘软件’来保护国家。”
- ④ J·M·凯恩斯:“对于我们子孙的经济发展前景”,收于《劝说篇》,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31年,第369页、372页。

## 译 后 记

完成了都留重人教授的大作《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中译稿的最后一次校订，一种欣慰之感，油然而生。

我是 1993 年秋惠蒙都留先生馈赠英文原版的本书的。当时匆匆浏览一过，深感它是迄今我所看到的有关战后日本经济问题的最优秀著作之一，正如 J·K·加尔布雷思在本书序中所说，……任何一个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则决不能声称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及其前景有了充分了解。于是萌发了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同行的念头。不久，在东京就此事面询都留先生意见，承其慨诺。并通过他的斡旋，获得该书版权所有者——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同意。在复旦大学同仁的鼎力支持、合作下，顺利译迄，而奉献于读者的面前了。

都留教授不仅是当代日本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在国际上也是开宗立派的大家。他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从本书卷首加尔布雷思的“序”、马克·帕尔曼的“著者介绍”、著者的“中文版序”及“导论”中，读者可以了解到都留先生的治学生涯、学术建树、以及本书的著述意图和主导思想等。因此，于此再写什么，也许是蛇足了。然而我仍觉得应该补充一些片断，以期对我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著者的思想有所助益。

都留先生虽然主要是在哈佛大学——30 年代美国经济学的“圣地”——修习经济学的，但他的经济学——被称为“都留经济学”——却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而是一种独特

的政治经济学。我认为它具有下列特征：第一，重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第二，重视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第三，重视现实与政策（对策）相结合。都留先生是以发展的观点来把握资本主义的。他批判地对待现实，并且不断提出改造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市场”并非万能，必须用“计划”加以补充。在许多方面，“计划”甚至比“市场”更重要。在日本学术界，人们把都留经济学划入“激进经济学”、“革新经济学”一类，视其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结合物。

都留先生独特的思想及其经济理论的形成，与他的经历不无密切关系。

都留先生是 1931 年 19 岁时赴美国留学的。前此，他就读于设在名古屋的国立第八高等学校（旧制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在那里，他读过马克思主义书籍，受到进步与革新的洗礼。他追忆当时：凡冠有河上肇（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名字的书，他都找来阅读，他佩服河上的理论和实践。河上肇的代表作《经济学大纲》成了他的指路明灯，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则使他“茅塞顿开”。为反对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他与同学一起组织了“反帝同盟”，并成为该组织的三领袖之一。为此，18 岁时他遭到日本警察逮捕，被拘留三个半月，并被开除学籍。这一段阅历对都留先生日后的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哈佛就读时，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非常关心时局的发展，曾和我国青年学者冀朝鼎、陈翰笙等在纽约相与议论、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以至夜不成寐。当年，他从拘留所释放后，便远走美国。先在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学院学习，1933 年转到哈佛大学，在那里完成大学本科最后两年的学业。1935 年入哈佛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1940 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到 1942 年 6 月搭乘第一批“交换船”返回母国。他在哈佛的年代，正是哈佛经济学的黄金时代，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包括刚兴起的凯恩斯主义在

内,潮水般涌入哈佛。师生中更是群星闪烁——都留先生师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汉森等,而与日后成大名的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思、斯威齐兄弟等为学友。他作为当时唯一在哈佛读经济学的日本人,并以其超群的英语能力,受到哈佛师生的器重。在哈佛,他不仅学习了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更重要的是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学风的熏陶。这一段经历使都留先生的经济学与当时日本国内经济学中的教条主义、照搬照抄外国的学风判若泾渭。可以说,20年代末期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论,30年代所学的美国经济学和美国实用主义学风,构成了都留经济学的基础。而这本书,则体现了都留经济学的这些重要特征。

不言而喻,这本书中的观点和主张都是著者自己的,并不代表译者和复旦大学出版社。我认为,其中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过程的论述和分析,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对我国同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对日本今后走向的主张,也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加以研究的。

自1979年秋在复旦大学有幸与都留先生谋面以来,一直得到他的关心和帮助。在日本游学时,曾多次应邀参加他所主持的学术活动——如“醴泉会”等,获益匪浅。承其惠赐的《都留重人著作集》,更是常置案头,时时披阅。特别有关本书的翻译出版,包括一些细节,都得到了他的具体指导和帮助。借此机会,再次向都留先生表示由衷的谢意。同时,对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好意,也一并于此致谢。

同是哈佛出身且与都留先生有交谊的我校陈观烈教授,对本书予以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翻译介绍。邬性宏教授对翻译工作进行了统筹。马之骧、吴毓驎两教授,罗汉、徐惠忠等老师于教务繁剧中抽暇致力于本书的译校。研究生宋萍同学,出版社编辑邬红伟同志为出版事宜多所襄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最后,对资助本书出版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表示诚挚的谢意。

郑勵志

1995年初春于复旦校园